

邓小平 与中美外交风云

宫力 著



红旗出版社

邓小平

与中美外交风云

宫力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 / 宫力著.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51 - 3316 - 7

I. ①邓… II. ①宫…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 - 生平事迹
②中美关系 - 研究 - 1974~1997 IV. ①A762②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4987 号

书 名 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
著 者 宫 力

出品人	高海浩	总 监 制	徐永新
出版统筹	张景涛	选题策划	万方正
责任编辑	万方正 董良敏	实习编辑	张 燎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 - 64038529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 - 64024637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 - 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1 - 3316 - 7	定 价	45.00 元
--------------------------------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就是一本全面解析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力作。这部著作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官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凝结了他多年的学术积淀。在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这部著作得以再版,实为学术界一大幸事。

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以邓小平的重大对美外交决策和活动为基本线索,系统地归纳、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战略策略思想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

作者紧紧抓住邓小平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现了邓小平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这 20 年间,领导中国党和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邓小平的对美战略策略思想,并分析了其发展变化的轨迹。

全书正文共 10 章。第 1 章是背景铺垫,概述了邓小平对美外交实践和政策思想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背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第 2—3 章介绍了邓小平从文革中期复出至 1976 年再次被打倒这段时间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对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情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一些对美政策思路的形成,如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等待形势的变化。这些思路为以后对美政策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第 4—5 章叙述了从 1977 年再次复出到 1982 年这一阶段邓小平的对美外交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政策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考虑对美政策,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实行真正的“不

⋮
⋮
⋮
⋮
⋮

序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

001

结盟”、不打牌政策等。这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体系形成的阶段。第6—8章涉及的内容是1982年至1989年这段中美关系“发展期”。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美政策思想，比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来处理国际争端，用“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等等。这些重要论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成熟期。第9—10章总结了1989年至1992年期间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这是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大动荡的时期。为了应对复杂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针对中美关系又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邓小平的思想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有利于中美关系走出僵局，健康发展。

在导言中，作者对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发展脉络做了归纳，特别是对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作者认为，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有：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认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传统看法；中国的对美政策要服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工作重心，要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变“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理中美关系；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发展与美国这个国家间的关系区别开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用一国两制的思路解决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风云突变，把握住集中力量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根本立足点，走自己的路。

此外，在导言中，作者还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第一，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第二，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的作用；第三，强调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第四，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

从全书的内容、结构可以看出，该书是研究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研究20世纪70—90年代中美关系的力作。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丰富而精深,《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对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阐释全面而精到。但依笔者之管见,最值得称道的是,这部论著较全面地展示了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的高度来解读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确实如此,邓小平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中美关系,而是首先将中美关系同中国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联系起来,将发展对美关系看成是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环节。

邓小平对美外交实践虽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他主持中美建交谈判时期,但是,那时对美外交的大政方针是由毛泽东拍板制定的,邓小平本人的对美政策思想尚未形成或展示出来。邓小平作为对美外交的决策者,是在70年代末他再次复出之后。做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邓小平掌握对美政策最高决策权后的第一次重大对美外交实践,也是他外交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得以有机会展示出来。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对外政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紧密联系起来。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契机。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早于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发表,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几乎是同步,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就对美政策来讲,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构成了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中国需要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作者列举了邓小平从1977年5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系列言论,说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引进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比如,邓小平说:“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

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

其次,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对外开放,而美国则是重要的开放对象之一。作者通过梳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邓小平要用对外开放来带动中国经济腾飞。尽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还未使用“对外开放”这个词。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争取外援,需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为此就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对联邦德国客人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邓小平这里所讲的“先进国家”,自然包括美国。所以,向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客观上就要求同美国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顺理成章。对外开放是中国要发展对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动力。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之间的互动。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固然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种大好局面的形成,也得力于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缓和所造就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中美缓和及其影响,不仅使中国争取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友好相处的有利局面,改善了由于中苏对抗所带来的不利态势,同时也在开放意识、在现代化等方面,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可见,中国内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局面。

邓小平从大战略高度把握对美政策,不仅体现在将对美政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还体现在将对美政策与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紧密联系起来,将对美战略看成是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上。《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并用专章进行阐述。

伴随着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中国领导人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看看是否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正如作者所说的:“对于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作者认为,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世界局势终于透出了曙光,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势。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过去中国曾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到80年

代中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在1983—1987年间,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阐述了他对时代主题的看法。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采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提法。

将和平与发展确认为时代主题,为中国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提供了依据,为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解除了后顾之忧。邓小平在1985年时总结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表明,如何判断时代主题对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至关重要的。

对时代主题的认定,是对最高层次国际战略环境的评估,也涉及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认识,这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肯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了改变。以往,中国领导人担心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主要是因为美苏两家尖锐对峙,并大搞军备竞赛。邓小平通过科学分析,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而和平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此外,由于美苏两家所拥有的核武器及常规武器足可以“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去发动战争。再者,“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心目中,美国与当年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是不一样的,中国可以同美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第二,肯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表明中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而不必把主要注意力用来准备打仗。“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现在,“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正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有了较为乐观的估计,中国才毅然在1985年决定主动裁军100万,并建议所有

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中国的行为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极为有利,同时也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氛围,美国公众更容易认可美国政府同中国接近,在各领域同中国发展关系。

第三,确认和平为时代主题,有利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各国从自身的安全出发,往往迫不得已奉行结盟政策。而在以和平为主题的时代,爱好和平的国家有条件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就中国来说,“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四,确认和平为时代主题,表明中国要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邓小平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考虑中国自身的安全,他的视野更为广阔。198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谈道:“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当然,中国也需要和平,世界和平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是相统一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确立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这意味着,中国不是要搭乘世界和平的便车,而是要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中国是“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定位对中美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需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但不会对美国亦步亦趋,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以美国划线,而是以和平划线。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自主、灵活。

第五,摒弃了“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提法,为发展对美关系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在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如果同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关系过于密切,就会出现“革命立场”问题。意识形态的羁绊曾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确立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之后,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才放开了手脚,“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

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这实际上是外交工作中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对发展中美关系极为有利。

正是由于发展中美关系既符合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利益,也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要求,所以邓小平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就是在中美关系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充满信心,坚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分歧与矛盾,两国关系遇到的挫折只是暂时的。“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阐释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只是《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这部巨著的突出特色之一。作为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该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不仅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作者运用了极为翔实的文献资料,既囊括了几乎所有研究邓小平思想和 20 世纪 70—90 年代中美关系的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始档案资料。书后还附有“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以编年体形式记叙了邓小平从 1974 年至 1997 年的重要对美外交活动。

尤需提及的是,本书作者官力教授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和中国领导人对美政策思想的研究,著述甚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这部《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无疑是他的得意之作。可以说,本书是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极好的参考书,也是学人了解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

刘建飞

2014 年 3 月 10 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导 言

1971年9月13日,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林彪,因谋害毛泽东未遂,仓皇出逃,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这一事件对中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被打倒数年之久的邓小平在中国政坛上奇迹般地复出。从此,邓小平不仅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在中国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外交方面也日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1977年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敏锐地把握历史机遇,并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做出了战略决断,并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历史背景下,全面推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处理当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把握中国外交的航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中期复出后,在国际局势继续发生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怎样估量国家利益,怎样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根据形势的变幻参与对美外交谈判;在1977年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之后,如何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美政策,怎样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台湾问题,怎样经过艰苦的谈判和不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中美建交之后如何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进一步全方位地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在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之后,如何应对美国对华全面制裁,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方针,使中国在迎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并促使中美关系从低谷中艰难回升,以及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产生的深刻影响。

⋮
⋮
⋮
⋮

导
言

001

笔者认为,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序,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文革中期复出至1976年再次被打倒。这一阶段,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直接参与了美国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并参与和主持了多次中国对美会谈,由此积累了对美国外交的经验。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介入外事活动,成为周恩来在对美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后来,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逐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1974年经毛泽东亲自提议,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向国际社会阐述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开始代替周恩来,担负起中国与美国高层会谈的主要责任。

在此之后,邓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和变化,按照毛泽东“一条线”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参与制定中国的对美国政策。他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了重要会谈,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②,坚持了中国与美国建交的三项原则^③。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邓小平一方面对美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一些倒退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从国际反霸统一战略角度出发,尽量拉住美方,维护“一条线”的战略格局,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等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对美国外交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为后来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977年再次复出至1982年。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是为适应国内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际问题和中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在国际上,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把苏联作为主要敌手,因而两国都需要在各自的对外政策中增加互相协调的因素。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导了中国的对美国谈判,加速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加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关系,随后,在中国“教训越南”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与此同时,由于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美贸易协定的正式签订,使中美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获得解决,从而加强了中美经贸发展的势头。此外,在邓小平的关注下,中国与美国在文化、科技甚至军事关系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争端。这主要由于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原则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且在暂停一年之后重又恢复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邓小平对里根政府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言论,以及提高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质量和扩大其规模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而且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美关系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方面据理力争,与美方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在1982年正式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挂牌的政策。这表明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1982年至1989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美外交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确定了对美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指导原则,并突出了对美外交中的经济因素,促进了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关系的稳定发展。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进入成熟期。

在此期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提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揭示了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处理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以及一国两制的方针等。这些重要论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

∴
∴
∴
∴
∴

导
言

003

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邓小平抓住时机,一再要求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取得了巨大成效。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两国政界、军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也日益扩大。

但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同时,双边关系中也出现了一股暗流。那就是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缓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开始上升,美国时常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横加指责。1987年美国国会还通过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并邀请达赖访美,这给中美关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此外,美国一方面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另一方面又在所谓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也引起了双方的一些争执。对此,邓小平及时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从总体上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第四阶段:1989年至1992年。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邓小平外交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为应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冷战后的国际风云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

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中美双方在人权、对华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摩擦和争斗。

进入90年代,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不怕鬼,不信邪,沉着应对,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政局。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中国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由此避免了引火烧身,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

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

在此期间,邓小平为了不使中美双边关系完全破裂,还提出了中美关系总是要好起来才行的战略思路,并与美国总统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进行了重要会谈。与此同时,为排除美国国会以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干扰,中国方面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指导下,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国内外局势和中国的发展战略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方针,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是其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框架和内在逻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是对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在一系列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 and 理论创新。具体说来,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

(一)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认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传统看法。邓小平通过对美国和苏联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国际局势进行的科学分析,对美国和苏联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由此,他逐步提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在可以预见时间内,美国和苏联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世界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中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尽快发展自己。这就为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并且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新的对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中国的对美政策要服从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工作重心,要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一贯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国内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则要争取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此外,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美国的资金和技术,需要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而美国也需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而,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局。

(三)改变“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

线”的联美抗苏战略,但到了80年代,国际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因势利导,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不再与美国一起共同对付苏联,不与任何大国形成结盟关系,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在国际关系中,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这一系列战略调整把中美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之上,由此维持了国际战略力量格局的平衡,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外交经验时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④

(四)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理中美关系。对时代主题的认定,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也是中国更好地展开对美外交的前提。邓小平透过纷繁的世界各种矛盾的表象,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精辟地指出:当今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⑤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对美外交必须要有全新的思维,必须要有许多新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做法。

(五)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特别是1989年之后,美国对华实行以压促变的政策,在国际上带头对华进行制裁。邓小平坚持原则,与美国的反华举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明确提出,首先,中国内政不容干涉,中国的内政要由自己来管;第二,中国从不惧怕压力,是压不垮的;第三,处理中美关系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由此,顶住了美国施加的压力,打破了美国对华“西化”、“分化”的图谋。

(六)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发展与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别开来。邓小平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严格把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做法,与发展同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分开来。不再像70年代那样,把霸权主义连同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一起加以反对,而是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反应,由此,维护了中美关系的稳定,保证了中美国家间关系的正常进行。

(七)超越意识形态的异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有很大不同,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邓小平在制定对美

政策时,改变了过去曾出现过的“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倾向,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主张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求同存异,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而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定亲疏。在中国对美关系方面,邓小平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发展两国关系。1986年9月2日,他回答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提问:“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邓小平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的具体情况来决定。”^⑥这表明了中国外交已越来越趋向成熟。他始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同时要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避免大起大落,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八)用一国两制的思路解决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一再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突出的政治原则问题,对于台湾问题这样的“苦果”中国人民是“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⑦因此,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一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一历史难题,邓小平提出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这就是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指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⑧随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实践,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社会主义。”^⑨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去解决,这就为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提供了一个新出路。

(九)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风云突变,把握住集中力量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根本立足点,走自己的路。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中国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善于守拙,埋头苦干,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耽搁时间。由此,中国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增强

了综合实力,有力地抵御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中国打交道,同时也为逐步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处处体现出他在指导思想上的求实精神,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具体说来,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邓小平从大局着眼,不光在对付苏联威胁时,及时发展和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且在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仍能够保持冷静,看出两国共同利益仍然超过两国的分歧,由此做出了“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⑩的基本判断。这种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发展的前瞻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反观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有时却缺乏这种远见卓识。虽然美国政府曾多次宣称他们重视中美关系,而且在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时候,也的确如此,但当苏联因素逐渐消退之后,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却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战略价值已经下降,因此,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愿顾及中国的利益。这是导致中美之间一系列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邓小平一再指出,虽然中国的实力地位还算不上是一个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国家,但毕竟不是微不足道。而且,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巨大的潜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独树一帜的影响力,是一切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所不应忽视的。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处理棘手的国际问题负有重要的责任,两国和平友好相处远比相互对抗更为有利。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需要向海外开拓市场,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些长远的、战略性的因素仍将是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二,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的作用。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中国把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邓小平看来,美国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目标和对象。因此,邓小平十分重视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一再强调要吸收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把发展同美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促进国内经济建设作为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要方面。由此,中美经济合作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大量的资金和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而且使中美经济贸易因素在中美发生冲突时期,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成为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点。

第三,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发展中美关系之时,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邓小平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但这决不意味着由此可以放弃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曾实行联美制苏的政策,美国自认为中国在战略上有求于它,因此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迫使中国作出让步。但邓小平则表示,宁可中美关系倒退,也决不迁就,表现出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在此之后,中苏关系有所改善,邓小平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美国适当拉开一定的距离。1989年之后,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以压促变。但在这一点上,美国打错了算盘。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邓小平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平心而论,人权问题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这种讨论应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各自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决心,任何人都不要指望它能够接受有损于国家独立主权的现实。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治家应该有所醒悟,施加压力和经济制裁,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适得其反,损害到自身的利益。

第四,邓小平是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并且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不得不同中国打交道,不能不重视中国的市场以及在解决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于世界的东方,总要找点麻烦来干扰和延续中国的崛起。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美国开展对华外交也有两手,即胡萝卜加大棒。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美国当时的国力明显高于中国,因而它在对华关系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当美国认为需要借助中国的时候,运用“胡萝卜”的一面就多一些,而当美国认为有机可乘(例如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时,运用“大棒”的一面就多一些。邓小平对此是对症下药,采取“刚柔并济”的两手策略,与之周旋,斗智斗勇。一方面坚决顶住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所施加的种种压力直至经济制裁,并且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坚持原则,坚决反对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在处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时又十分讲究方法,做到进退有序,争而不裂,有理、有利、有节,着眼于长远。为此,他强调,中美双方要“增

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方针,体现了处理对美关系和棘手事务的灵活性。它表明,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对美政策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更为切合实际。

注释:

- ① 1976年,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但是,由于人民的觉醒,仅仅时隔一年,邓小平又一次复出。
- ② 即主张美国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北设立联络处。
- ③ 即美国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与台湾当局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
-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 ⑤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 ⑥ 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48页。
- ⑦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第三章 主持对美外交谈判

- 086 坚持“日本方式”：反对美方“倒联络处”的方案
- 091 排除“四人帮”的干扰：“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 103 邓小平访法，着眼于国际反霸格局
- 106 应对1975年的中美外交僵局
- 112 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把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第四章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思考与决策

- 122 再次复出，成为对美外交的主要决策者
- 126 倡导对外开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动力
- 130 向万斯阐明中美建交的原则立场，批评美方“倒退”
- 135 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口信做出积极回应
- 143 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一波三折
- 151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含义

第五章 全面发展中美关系的举措

- 162 出访美国，推进中美关系
- 171 从战略全局出发，“教训越南”
- 178 突出经济因素，促进中美贸易
- 184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回访中国
- 188 促成中美两国建立军事关系

第六章 应对台湾问题引起的风波与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

- 200 阐述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批评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 208 密切关注美国恢复售台武器
- 211 美台互相给予非官方代表外交特权引起风波
- 213 对里根上台前后对华政策做出反应
- 221 全面阐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第九章 打破美国对华制裁的对策

- 365 国际格局的变动与中美关系潜在的危机
- 367 在“西藏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
- 370 顶住美国对华“制裁”的应对措施
- 380 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意见
- 386 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向美国传递信息
- 390 反对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议案
- 395 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
- 403 反击美国发表的《人权报告》
- 406 争取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

第十章 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和策略

- 415 利用矛盾,恢复中美高层接触
- 422 应对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第二次审议
- 426 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基本立场
- 431 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 440 南方谈话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449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469 后 记

第一章

特殊时期的中国高层 决策机制与中美关系解冻

邓小平开始介入中国对美外交并逐渐发挥作用是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之后,而他能够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则是在1977年再度复出之后。不过,历史不能割裂,为了更好地把握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形成的背景和发展轨迹,我们有必要对邓小平复出之前,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中美关系解冻作必要的追溯。这种追溯力图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探讨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背景下,中国外交的决策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外交以及对美政策方针的调整和执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和阐述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进程,而且能够告诉人们,邓小平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介入和展开对美外交活动的。

特殊时期的外交决策机制及特点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政治运作的正常秩序受到猛烈冲击,中国高层决策机制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其一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对党内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导致中央决策层的民主生活极不正常;其二是由于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工作,^①致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地位一落千丈,形同虚设;其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组,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信

任,其权限越来越大。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碰头会^②取代政治局会议,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并由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但具有特殊身份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也向毛泽东吹风,中央文革成为毛泽东的参谋班子,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69年。当时,中国决策层出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力量,以及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代表的极左势力,他们都对毛泽东负责,而毛泽东则处于仲裁者的地位。1971年发生林彪倒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逐步复出,有力地增强了周恩来等党内务实力量。随着周恩来身患癌症,病情不断加重,邓小平逐渐代替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和对美外交谈判。随着邓小平地位的上升,他与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的矛盾日益加深,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

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外交决策而言,周恩来由于长期兼任过外交部长,并在中共高层一直分工主管外交工作,因而有较大的发言权,但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并不甘心,随着他们在中央决策层地位的上升,便开始借1967年1月刮起的夺权风潮,干预外交部的事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倒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并在外交部夺权。

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王力把外交部造反派代表找到钓鱼台^③面授机宜,煽动批判外交部长陈毅并向外交部夺权,这就是著名的“王八七讲话”。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什么机密化、神秘化,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等级森严,该批的就批,该改的就改。”^④

“王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大乱。1967年8月16日,造反派把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关押进地下室,夺取了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权力。至此,中国外交机构一度失控,造反派听命于中央文革,绕过主管外交的周恩来,也不请示毛泽东,开始以外交部名义对外发号施令,造成恶劣的影响。

8月20日,外交部以港英当局迫害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为理由,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提出强硬要求。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会后,红卫兵以港英当局未在48小时内答复外交部8月20日照会为由,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闯出一场大祸。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导致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使中国领导人意

识到外交机构失控的严重危险性,于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1967年8月25日,周恩来委托杨成武^⑤将“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报送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听取有关汇报后,于8月26日对杨成武指出:“王、关、戚^⑥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八七讲话”批示:“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成武说:“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⑦当天中午,杨成武返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至此,江青集团染指外交部的企图严重受挫,外交部的局面有所好转,外交机构失控的现象基本上得到控制。此后,江青集团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周恩来重新控制外交机构,并直接对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负责。

为了吸取教训,挽回影响,周恩来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要整顿外交纪律。毛泽东对此亦有同感,他在1968年3月22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⑧这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外交被动状况和僵硬方针的不满。

同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风行一时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样的提法,并且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⑨随后,毛泽东又于5月29日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作了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⑩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向各国传递了中国愿意同他们改善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决策层重新派出驻外使节,改变了前一阶段驻外大使几乎全都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状况。中国领导人后来还在不同场合向外宾多次解释,1967年夏季中国外交的一些过激行为是混进坏人造成的,并不代表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意图。^⑪

到了1969年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方面已初步整顿和恢复了外交机构的正常秩序。1969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混乱刚刚过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政治局。至此,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反常情况终于结束,但由于中央文革和林彪集团的多名重要成员进入了决策机构——政治局,使得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另外,此时的政治局虽已恢复主持中央正常工作,并能够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比1966—1969年期间的情况要好得多,但其拥有的权限与文革前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是集体领导受到很大削弱,毛泽东已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但政治局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均需请示他,并经他批准后才能实施。

在上述背景下,当1969年缓和对美关系问题提上中国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之后,中国高层的对美外交决策程序如下:

(一)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部门、新华社以及军方分别向中央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报送外交和军事动态(重点是美国和苏联)的分析意见和建议,以及有关国际形势、美中苏关系的内部参考材料、外电报道。虽然由于文革的特定环境,有些材料不甚准确,或投其所好,但总的说来,这些材料反映的情况和有关意见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二)周恩来具体主管对美外交工作(他的主要助手有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等,邓小平复出后即成为周恩来最主要的副手),听取外交部门的有关汇报,经常对外交部提出的有关方案和意见、建议做出批示,有相当的权限,并在对美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方面拥有较大的发言权(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中方给美方的口信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但遇重要问题需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并经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三)中央政治局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一些决定,但需得到毛泽东的最后批准。在决定缓和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曾多次召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制定有关政策和策略(如:1969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经过商讨,同意外交部关于释放误入中国领海的美军游艇上的两人,向美方作出了一个姿态;1970年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参加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的发言稿,使中方发出的信号更加明确;1970年5月16日,为抗议美军出兵柬埔寨,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外交部的建议,决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华沙会谈;同年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商定再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1971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拟定了中美预备性会谈的8点方针及对策;1972年3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美会谈的情况等),并将结果上报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批阅。毛泽东对此积极过问,有大量重要批示,林彪主管军队不主管外交,

对此很少有具体指示。

(四)中央主席毛泽东从战略上把握对美关系的大政方针,批阅有关对美政策的重要文件,经周恩来组织落实其对美外交战略部署,并有最后决定权。例如: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否定了外交部、国家体委,以及周恩来关于暂不邀请的意见,决定立即邀请。

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对美外交决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由于文革的特定环境,缓和中美关系的最初设想不是自下而上(先由外交及政策研究部门提出),而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即:最高领导人有了初步想法,然后让有关部门探索可行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宽松,外交人员在对美方针问题上怕犯错误而不敢提出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左”的影响所致,不少人思想僵化,摆脱不了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

2. 毛泽东是中方决策的核心人物。周恩来和外交部、军方、新华社等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参考材料,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亦有相当的影响力,如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队应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报告;外交部关于美军侵柬中国应推迟中美会谈,毛泽东主席应发表声明的建议(五二〇声明亦由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毛泽东起草,经毛泽东审定、批准发表);军委四位副主席关于国际局势的分析意见(其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协助安排讨论的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后来还直接参与了中美会谈);乒乓外交期间新华社向毛泽东提供的外电报道、各方反应等参考材料(其中最为详尽的是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当时为每天两版),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决策层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是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他们不是独立于中央政治局之外,而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发挥主导作用,并掌握实权。

3. 在对美外交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侧重于战略规划,周恩来侧重于具体指挥和实际操作,两人总的说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但也有认识不一致的时候。其中主要是1973年有两次大的意见分歧。从1974年起,由于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在对美外交中开始倚重于邓小平。

4.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对缓和中美关系的态度比较微妙。一方面,他们对此心存不满(他们从极左的立场出发,认为不应该向“美帝”低头,同时也不愿看到周恩来在此过程中增强在党内的地位),林彪曾在私下里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⑩在黑格访华为尼克松的中国之

行做准备时,江青等人也通过其亲信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提出过不应用电视“宣传”尼克松的意见。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缓和中美关系所持的消极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缓和中美关系是最高权威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所以他们也不好公开反对(毛泽东也从未将对美外交的大权交给他们)。不过,由于有这两股势力在中国决策层内的存在和制约,周恩来等人在讨论和贯彻缓和中美关系决策之时,一直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即便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周恩来、邓小平(在周恩来患病后代替周恩来主持对美外交谈判)等人仍不免受到来自极左派的攻击和暗算。例如,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一再借批判所谓历史上的“大儒”来影射周恩来搞“远交近攻”的政策。在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江青又借机发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指当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著者注)的马屁。”江青还攻击邓小平“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⑬这些都是后话。

中国决策层调整对美方针的促动因素

60年代末70年代初,促使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改变对美政策方针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难以为继

60年代,中国在继续同美国相对立的同时,与苏联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这种局面的形成,虽有种种客观上的原因,但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国决策层,特别是毛泽东逐步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到外交工作所致。在此期间,毛泽东否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适当缓和对外关系,以集中精力克服国内外困难的有关建议,坚持以不妥协的态度反对“帝、修、反”。^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对美方针上,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在对苏论战方面,则是反应过度,上纲上线,没有留下回旋余地。这种过分强硬的政策,给中国造成了严重损害。

到了60年代末,中国已面临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拓展空间,并且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再加上“文

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同许多国家出现外交纠纷,这就使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

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使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既不明智,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调整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利用美苏矛盾,摆脱困境,就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⑮

因此,在6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与研究。他们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美苏争霸的态势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兴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苗头。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着手缓和中美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 美国的战略收缩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

这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了中国决策层的注意。60年代后期,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感到力不从心,准备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减少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修改原来两个半战争的战略。^⑯这一趋向到1969年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关岛讲话,提出尼克松主义大体定型,这实际上是对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宣布杜鲁门主义以来的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调整。^⑰

与此同时,美国多年以来奉行的对华封锁、围堵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减轻了从西南和东南方向对中国的战略威胁,由此成为促使中国决策层考虑调整对美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时,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曾提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⑱而美国要实现这一点,同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国家中国打交道已是势在必行。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⑲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在准备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的位置摆在了莫斯科之前。

这时,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现实”^⑳,不能熟视无睹。另外,在同苏联的角逐中,美国也感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尼克松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㉑

而对中国方面来讲,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既可以抗衡苏联的威胁,也有希望与美国谈判解决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与美国改善关系,还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后来,周恩来在谈到中美交往达成上海公报时曾指出:“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②

(三)中苏冲突加剧,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就在来自美国的威胁开始减弱之时,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当时苏联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它利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之时,开始急剧扩张,这种战略态势不仅侵犯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且对与苏联有着7000公里共同边界的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这是促使中国决策层考虑改变对美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从1960年夏天开始不断挑起边境事件,并偏袒印度在中印边境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防范苏联铤而走险对华发动战争的问题。1964年毛泽东先后在会见金日成、崔庸健、巴卢库等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毛泽东认为,对此“我们要准备”。^③这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继续增兵,并与蒙古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1968年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军委于1968年1月24日,电报指示沈阳、北京等军区,要求“加强中苏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做好军事上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指示强调:“采取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指示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④。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更加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警觉和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关切。中国开始把苏联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并认为其更富于侵略性和欺骗性,由此加紧了备战工作。

进入1969年,中苏边境的局势更加紧张。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根

据苏联在珍宝岛的挑衅有增无减的形势,提出在这一地区反干涉斗争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珍宝岛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予以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总参谋部在给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重申:“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在具体斗争中,要选择重点,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⑤

1969年3月2日,苏联从两个方向出动大批武装军人侵入珍宝岛,受到已有准备的中国边防军的伏击。3月15日,苏联武装部队再次侵入珍宝岛,同岛上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发生遭遇战,苏军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先后三次打退苏军的进攻。3月22日,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问题上,提出“坚决反击,准备谈判”^⑥的策略。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在中国西部边境挑起更严重的流血事件。1969年8月13日,苏联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包围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

随着中苏边境线上火药味越来越浓,中国决策层对来自苏联现实威胁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⑦4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他进一步指出:“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都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⑧在这之后,中国的战备工作一度进入临战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决策层对于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的估计显然偏高,因此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事实和到处扩张的势头,不能不从一个侧面推动中美之间的接近。上述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战略态势的变化,以及苏联对中国边境军事压力的增大,改变了中美苏关系原有的基础,使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这样,缓和中美关系,就成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最佳选择。

中美关系解冻的最初步骤

中方做出缓和对美关系的决策是一个层层递进和对问题反复认识的过程,在此期间,既有对美方战略动态和发出信号做出种种判断和微妙的呼应,也有精心设计的外交试探和某种姿态;其间既有平稳舒缓的小步前进,也有急转直下富有戏剧性的大起大落。

在中美关系解冻的酝酿阶段,中国领导人最初通过外交部和新华社报送的有关参考资料掌握美方的动态。其中毛泽东最先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于1967年10月发表了一篇微妙的文章,尼克松当时除了表达美国应尽早从越南脱身的意向之外,还试探性地发出某种信号:“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②虽然尼克松的文章重复了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所谓威胁,但他却看到了打开通向中国之路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研究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并嘱周恩来阅读了这篇文章。^③周恩来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外交部门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在此之后,中方经毛泽东批准,于1968年11月25日通知美方,同意恢复已中断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后因意外事件取消)。^④1968年冬天,毛泽东还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书“写得不错”。^⑤

1968年12月,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外交部长陈毅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认为:“美帝的全球战略仍是以南北美洲为其巩固后方,紧紧掌握西欧,利用苏修东欧共同反华(不放弃对苏修的颠覆工作),在亚非拉做灭火工作。仅因为美帝侵越便认为美战略东移,以为美帝可放弃或不重视欧洲这是错误的。仅仅看见美苏共同反华,便以为美帝可以放弃或不重视欧洲这是错误的。仅仅看见美苏共同反华,便以为美苏之间没有矛盾,以为美帝正在放弃颠覆苏联东欧的企图,也是错误的。”^⑥

陈毅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了美国的战略重点没有东移,美苏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调和,由此不同意过分强调美苏共同反华的一面。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仍有很大周旋的余地。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重视。

尼克松当选后果然有了新的举动。他在1969年1月与沃尔斯泰斯的谈话中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没有接触,对世界是不利的。”^⑳为此,他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再次透露要与中国接触的意向。他说道:“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㉑后来尼克松透露,他当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思想中“占很大地位”。^㉒

但当时中国的《人民日报》不解其意,写文章对尼克松点名抨击并报送中央。毛泽东理解了美方传递的信息,他就此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㉓因此,他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㉔这样,尼克松发出的信息,便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问西欧,向法国总统戴高乐表明了改善美中关系的意向,并请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法国向中国进行试探。同年3月底,戴高乐出席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葬礼时,尼克松又与他进行了会谈。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Etienne Manac'h)向中国转达了美国的意向。^㉕

恰在此时,中苏在边界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在中国决策层看来,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议,要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做出必要的布置。他说:“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他还指示:“原子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㉖此时在国家安全方面,中国首先担心的是苏联,而不再是美国,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毛泽东还认为:“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㉗

1969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

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②

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促使美国对华进一步做出积极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等,引起了中方的注意。

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虽然中国此时还没有改变与两霸同时对抗的政策,但九大的报告对美国只是进行了例行的指责,而用了多几倍的篇幅抨击苏联。报告指出:苏联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要“组成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③这种对客观形势变化的认识,不能不促使中国决策层重新审视中美之间的关系。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认为有必要对国际局势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他提议由几位军方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并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他当场提出由陈毅挂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④3月1日、3月5日、3月8日、3月16日,四位元帅在中南海紫光阁连续召开了四次国际形势座谈会,随后形成了一份题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分析报告。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以及在九大期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重提这一问题。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具体安排,指示外交部及有关部门将电文和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及时分送军方四位老帅,并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最初,四位老帅领受任务时,对此很不理解,认为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的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周恩来向四位老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指出: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是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在这种背景下,陈毅等4人从1969年6月至10月进行多次讨论,先后向中央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报告及口头意见,认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

华包围圈。这些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在讨论中,四位老师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最后,在历经数月的研讨行将结束时,陈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⑤

陈毅等人这些新颖的战略分析意见,以及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步骤和建议,为中国最高决策层做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因如此,中方对美方的每一个姿态都认真研究,记录在案,并区分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反应。1969年6月,中国方面没有依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侵台十几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周恩来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出。”他在致林彪的信中指出:“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⑥此外,在处理两个美国旅游者驾驶一艘游艇在香港海面倾覆,乘救生艇误入中国领海被俘获一事时,周恩来亲自过问,于1969年7月释放了这两个美国人。这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无声的对话。

1969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完成了一份“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建议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努力改善美中关系。同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的要求下完成了全面检讨中苏关系的报告 NSC-63号。^⑦同年7

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6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去中国旅行。

1969年9月10日,正当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微妙的时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到河内参加胡志明丧礼之机,要求到北京机场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中国方面因势利导,促成了这次会谈。^⑧9月13日,周恩来将有关中美会谈内容报送毛泽东,认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并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⑨毛泽东批示:“同意。”^⑩不久,新华社宣布,中苏两国政府即将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

此举,使美国对改善对华关系有了紧迫感。1969年9月,尼克松指示美国驻波大使斯托塞尔找机会与中国大使接触。1969年11月7日,美国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长达19年的例行巡逻,并有意通过第三国(巴基斯坦)提醒中国注意这一象征性举动的意义。1969年12月3日,在华沙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示会上,美国驻波大使斯托塞尔和他的助手试图接近在场的中国两位外交官。^⑪但中国人有意回避,迅速离去。斯托塞尔追至门外,请中方译员转达说,他最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总统说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中国驻华沙大使馆立即将情况报告国内(1969年雷阳出任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时,周恩来曾要其密切注视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美国方面的新动向)。周恩来见到电文后,兴奋地转告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⑫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先后收到美国方面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信息。最初,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在收到巴基斯坦方面传递的信息时,对同尼克松政府接触持反对态度,但其意见被最高决策层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先后收到美国方面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信息。

中国决策层还注意到美国方面正在为改善对华关系做出越来越多的姿态(其中包括美国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曾于1969年10月27日致信中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探询两名因其游艇误入中国海面已被拘捕数月的美国游客(这与前面提到的7月份中国释放的两个美国人无关)的下落。对此中国外交部于11月7日向中

央报告并分析：“此举显然是美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
过此事，适时（十二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12月
4日，周恩来就此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
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⑤4}，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
示：“照办。”^{⑤5}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与美国代表在华
沙会晤，并主张公开接触，不必保密。于是，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致电中国驻
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告诉他可以会见斯托塞尔，进一步了解情况。周恩来
还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向美方传递信息，指出：“如果他们真想缓
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
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也不拒绝，可以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
了吗？”周恩来还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
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
十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⑤6}

1969年12月11日，雷阳邀请斯托塞尔来到中国大使馆，美方提出了正
式恢复两国间大使级会谈建议。雷阳马上向国内报告。12月12日，周恩来
将外交部转来的这次会见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审阅，并提出“拟搁一下看看各
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12月29日，周恩来就中美会议问题再次请示毛泽
东，拟在1月初答复：“定在二月二十日恢复会谈。”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同意。”^{⑤7}周恩来还就当时外交部人员不敢与美国官方背景的人员交往的问
题请示毛泽东说：“我外交部采取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采取只
收、只听，暂不答复的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
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⑤8}12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最终批准恢复中美华沙
大使级会谈。

这样，中国代办雷阳于1970年1月8日，回访了斯托塞尔，并且表示，
他奉命原则上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经双方商定，第一次正式会谈将
于1970年1月20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为筹备这次中美会谈，外交部起草了致驻波使馆代办雷阳的电稿及中
方发言稿并报周恩来审批，周恩来对此件修改并加写：“在我发言后，美方如
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的；
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
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⑤9}此时中方的目的“主要

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为此外交部指示雷阳“在谈判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继续谈判的余地”^⑥。这是因为中国决策层认为“目前尼克松比勃列日涅夫头脑要稍为冷静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接触是需要的”^⑦。

1970年1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在华沙举行。双方代表都表明了愿意改善关系的愿望。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代表虽仍表示：“将继续和台北保持友好关系”，但他首次提到，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他还说，美国“准备考虑派遣一名代表前往北京，同你方官员进行直接讨论，或在华盛顿接待你方政府的一名代表”。中方代表也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态度，表示：“这种讨论可以继续在大使级会谈中进行，也可以在更高级的会谈中或通过其他双方都能接受的途径进行。”^⑧这次会谈的重要突破是，双方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可以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12日举行会议讨论中美关系，认为下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和步骤”，会议研究和修改了外交部给中国驻波代办雷阳的电稿和参加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的发言稿。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将中方代表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动，周恩来认为：“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会后，周恩来将修改稿报毛泽东、林彪审批。毛泽东批示：“照办。”^⑨

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举行前夕，尼克松发表他就任美国总统后致国会的第一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其中表达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他指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⑩

而中方制定的对美谈判策略是，应本既定方针，不在其他问题上纠缠，只同它谈根本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并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探索”，不失立场地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示愿予接待。2月中旬，经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的华沙

会谈中方发言稿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⑥

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2月20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正式商定，将在北京举行更高级别的谈判，以便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

然而双方都没有料到，不久，印度支那战局的风云突变，打断了中美接触的势头。在美国国内，由于美国国务院的阻力，美方未能及时就中美会谈给予中方进一步的答复，而后柬埔寨又发生亲美的政变。这不能不使中方怀疑美方的诚意。1970年3月24日，周恩来就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日程问题致信毛泽东，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并提议“为给美方一点颜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⑥在此之后，中美双方一拖再拖，将会谈日期定在5月20日。然而，1970年4月30日，美国政府借口柬埔寨有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武装力量的“庇护所”，出兵柬埔寨，超出了中方所能容忍的限度。中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5月3日，周恩来约外交部、外贸部负责人开会，讨论支持西哈努克的问题。5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出兵柬埔寨。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外交部提出的有关建议，商定：一、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将双方联络员的会晤，定在6月20日；二、建议毛泽东发表一简短声明，支持国际反美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三、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5月1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会议情况，并附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137次会议的请示”件。毛泽东对此批阅：“照办。”^⑥

5月18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美方，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会谈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⑥。

5月20日，中国方面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50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声明。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⑩

这个声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警告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不过,毛泽东在声明中对印度支那人民所表示的支持,主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而没有任何直接卷入同美国开战的警告和暗示;而且在涉及对美问题上,他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尤其是对尼克松没有进行通常的那种点名抨击。这表明,中方虽然激烈反对美国出兵柬埔寨,但在双边关系上,还是留有余地,避免把话说绝,以待日后逐渐恢复两国的互相接近。而且,中方也有意排除了中苏接近的可能性。1970年3月19日,西哈努克亲王到达北京,曾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西哈努克的建议。这个建议遭到明确拒绝,中方提出:“可以各搞各的。”^⑪至于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指出:“也曾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除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去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⑫

由于柬埔寨问题的干扰,中美两国间在华沙的接触暂中断了。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197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鉴于目前形势,需再次推迟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原定6月20日中美在华沙使馆联络人员将依约会晤。在此背景下,外交部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提出推迟会谈,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为此建议“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⑬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报告时将“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②3}

但是,中美接近既然反映了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它就有其自身发展动力。1970年6月底,美军从柬埔寨撤出。中方出其不意地作出了一个积极的姿态。7月10日,中国公安机关提前释放了于1958年10月以间谍罪被捕的美国人詹姆士·华理柱,并且宣布在1954年以间谍罪被捕的美国人休·雷德蒙德已于三个月前自杀。^{②4}中国方面选择这个时机释放华理柱显然是意味深长的。一方面,这个行动能够对同时宣布的重开与苏联的边界河流航行谈判起到一种相互抵消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美国当权派对华发出的一连串信号的一种含蓄的回答。

不久,中国又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信号。1970年8月,毛泽东批准同意美国作家斯诺夫妇访华,并由周恩来安排。周恩来会见了斯诺,并将他与斯诺的谈话的清样报送毛泽东“以便先睹为快”。^{②5}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斯诺,并与他站在一起合影。后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张照片,并在右上角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②6}这种姿态意在表明:中美关系的演变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当局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②7}

1970年12月12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毛主席接见斯诺的安排建议报送毛泽东,并“建议在最近几天,主席接见斯诺一次”。对此,毛泽东批示:“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②8}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斯诺长谈,并有意向他透露:“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这说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已得出结论:要解决中美两国的问题,就得同美国的当权派谈。随着谈话的深入,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说道:“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 Island (长岛)。”^{②9}

毛泽东这次同斯诺的长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③0}

但毛泽东对美方做出反应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一点。事隔多年之后,

基辛格回忆道：“毛泽东主席曾经通过斯诺向我们传达信息说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当时我们怀疑斯诺传达的信息不可靠，不敢贸然采取行动。没想到，1971年4月中国方面大胆地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去中国访问，原来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考虑与我们有相似之处。”^⑧

“乒乓外交”的高层决策

在毛泽东会见斯诺后，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尽快研究美国人来华问题。据此，外交部提出了关于贯彻毛泽东对美国人来华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在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上，拟遵循以下原则：以我为主，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除对我友好的进步人士和有声望、有影响的中间人士外，还可视情况批准某些有作用的右派人士来访。在1971年，初步设想可批准若干起（大体30名左右）美国人访华，一般根据对方申请，必要时我方可从旁推动。”^⑨报告还初步拟定了一些人选。周恩来看后于1971年2月19日批示：“美右派代表还不够满意”，“随着我宣布让一些美国人来华”，“共和党有影响人士会跟着要求访华，到时还可容我选择”。^⑩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其致送国会的第二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耐人寻味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提法^⑪。这是美国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这一名称，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报告指出，中美“双方都需要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的隔绝，从而结束同变化脱节的状态”。因此报告表示，美国“准备同北京认真对话”。^⑫

虽然美方频频向中国表示善意，但是他们并没有理解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传达的信息，中国方面又在1971年3月末至4月初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作出新的试探。

中国决定参加这届比赛是经过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多次讨论，并报最高决策层再三斟酌，最后由毛泽东确定下来的。

当时中国队参赛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印度支那局势紧张，柬埔寨王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赛，并要求中国提议驱逐他们。朝鲜方面对派队参赛似乎也有些顾虑。另外，听说中国队将参赛后，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也扬言要对中国参赛进行捣乱，台湾当局的特务也纷纷活动。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国内的意见发生分歧。3月14日,周恩来委托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负责同志召集预定作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成员开会,讨论在新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参赛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已经报名,如果不去,有损国家声誉。但另一种意见认为,国际上已有几股敌对势力扬言,要对中国队下手,在这种情况下,把家底都端出去如果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最后,不去参赛的意见占了上风,并上报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听过汇报后,还是倾向于派代表团参赛。为此他在3月15日给毛泽东写的请示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⑧周恩来认为这样“既照顾了日本后藤、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加),又支持了柬和越南,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况且体育比赛究竟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⑨。

虽然报告中反映的情况错综复杂,但毛泽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是同意了周恩来的参赛意见,并决心不惜付出代价。为此,他在报告上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⑩至此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中国乒乓球队还确立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准备在名古屋广交朋友,提高警惕,保证安全,力争政治、技术双丰收。

为了随时掌握情况的发展,以便做出决策,毛泽东在中国乒乓球队一离开北京就提出,要把各国通讯社关于中国队的反应及有关电文及时向他汇报,并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催促新华社《参考资料》一出来就给他送过去。毛泽东还说明了他的战略意图:“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⑪

随着中美乒乓球代表团官员和运动员在名古屋接触的增多,在中国宣布邀请加拿大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后,美国队也表达了希望访华的愿望。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国内。

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及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人认为,现在邀请美国队访华还嫌过早,应当首先让有影响的记者或政治家来访。但也有少数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现在邀请有利于出现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

最后,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并于4月3日报送周恩来。报告提出:“我们考虑,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国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的。”周恩来对这份报告批了“拟同意”,但又在旁边加进了这样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以便为日后再次邀请留下余地。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请主席审批”^⑨这样的文字。

4月4日,周恩来将报告呈送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毛泽东把报告压了两天,他还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在名古屋,中美两国运动员的接触又有了新的发展。4月4日,敏感的记者看见美国队员科恩从中国人的车上下来,连忙围了上去。科恩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意去中国”。^⑩他还把庄则栋送给他的一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4月5日,科恩向庄则栋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庄则栋表示:“收到美国代表队队员的礼物,我感到高兴。”^⑪各大通讯社迅速报道了此事。

这一信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就此评论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⑫在此之后,毛泽东提出北京与名古屋每天通话4次,以便更快地沟通情况。

4月6日,毛泽东原本已在《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请主席审批”中“主席”二字上画了圈,交身边工作人员退还外交部办理,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对这件事情的思考。直至4月6日晚11点多钟,经过多方面的权衡、比较,毛泽东在已服用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最后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让身边工作人员马上传达他的指示。据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

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啾啾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⑨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注:即不邀请美国队的报告),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⑩

据此,周恩来于4月7日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邀请美国队访华,并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定接待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方案。为此,他专门找黄华和章文晋进行了谈话,作出周密的部署,其主要精神是:一、毛主席亲自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

时机。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美国队接待好,把它当作一个大事情来抓。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待美国队来访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二、这次来访的乒乓球队有6个。对各个队的接待工作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但重点放在美国队。三、在接待中,我们要热情主动。他们来,要和我们的运动员进行比赛,我们当然要把比赛组织好。同时要把他们的生活搞好。还要组织参观游览,让他们好好看看新中国。^⑧

4月8日晨,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⑨当晚,周恩来在一次会上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⑩

事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时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⑪

4月14日,“乒乓外交”进入高潮,周恩来在北京对美国乒乓球队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问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他还表示:“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⑫

消息传到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⑬

基辛格认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⑩

严格地说，基辛格的这番评论，有一个很大的疏漏，那就是他忽略了这场“乒乓外交”的幕后总导演毛泽东。不过，他对中方这一主动行动含义的分析还是颇有见地的。

4月26日，美国《生活》杂志（4月30日号）发表了斯诺1970年12月与毛泽东的谈话，^⑪使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意向清晰地显现出来。由于乒乓外交引起连锁反应，中美经巴基斯坦渠道终于商定美国总统特使访华。至此，中美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转机。后来，周恩来在谈到这一事件时，感慨地说道：“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情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⑫乒乓外交表明，中国在经历了5年“文化大革命”磨难之后，开始谨慎地向西方世界伸出了触角。

中央政治局确立新的对美政策

1971年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美方连续发来的口信。由于乒乓外交取得进展，中国方面所期望的美国总统特使来华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由于时间紧迫，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中方决策层觉得有必要统一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1971年5月26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商讨了中美关系问题。会后，周恩来于27日致信毛泽东指出：“二十六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已开过，大家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将写出带方案性的报告，经大家审议后，再送主席、林副主席考虑。”毛泽东在“经大家审议后”一语下面画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这样好。”^⑬于是，周恩来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写成《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并于29日宣读、修改，然后上报给毛泽东和林彪。

中央政治局认为，在中美会谈中，中方应把握以下方针：1. 美国一切武

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2. 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3. 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认真进行。4. 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5. 如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以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6. 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7. 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8. 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⑩

这些方针的新意是: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在继续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同时,亦强调力争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认真加强对台工作;并且初步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这些重要的改变,是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更容易为人接受,更有利于打开局面的新政策。

对于中方提出的这些方针,中央政治局估计,中美之间有可能谈得成,也有可能完全谈不成,但无论怎样对中国来说都无损害,而且会使中国在外交上获得主动。如果以上各项能在基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这就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了道路,如能得到尼克松的赞同,这些主张在美国大选前实现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完全谈不拢,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中国的这些主张正好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了条件。当然,中国的方针是先当权派,后反对派,因为,如果先与其反对派谈,即使得到赞同,成为竞选纲领,当选后也未必兑现。而尼克松处在当权的地位,必然急切地盼望谈判成功,以增加他的竞选资本,这就成了对基辛格访华的压力。

此时,由于中美两国长期隔绝,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对即将到来的秘密会谈抱有种种顾虑。例如有人认为,中美会谈不同一般,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也有人担心,中美会谈会不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还有人怀疑,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是诈?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中国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

中央政治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作出了冷静的回答。中

央政治局指出：“美国群众运动，在尼克松上台后，确是高涨，重点在反战和反种族歧视。有人说，运动处于抛弃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之中。我们正好以从越南撤军和从台湾撤军、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动员美国群众，影响当权派和反对派的政策，增长群众的斗志。而且，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战争，中美人民来往和两国会谈，正是动员美国群众、考验群众领导的好机会。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19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这段历史可供参考。”^⑩

关于中美会谈是否会妨碍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斗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

至于美国方面是否有诈，中央政治局确信：“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世界的必然趋势，姑不论美帝有无欺诈的可能，我现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斗、批、改阶段，战备不懈是我经常任务，若有风吹草动，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⑪

从这些分析来看，虽然还有文革期间某些“左”的语言和革命高调，但其基本论点是务实和有战略眼光的。尤其是对美国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而不是在远东的估计，美国国内还不具备爆发革命的条件，以及中美会谈的形势是美国“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世界的必然趋势的分析，都是比较准确的论断，它们构成了中国方面实行缓和中美关系新政策的理由和基础。

毛泽东于29日审阅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批示同意。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也于1971年5月29日送往巴基斯坦渠道，口信表示：“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⑫

1971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商定6月上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中美关系及有关的国际问题。

6月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宣讲

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参加会议的各方面负责人共 225 人认真讨论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并阅读了有关附件和资料,如中美关系大事记、中美双方来往的口信,以及美方领导人的讲话要点等。由此加深了对打开中美关系重要意义的认识。与会人员还听取了有关部门作的国际问题专题报告,其中有:美国和台湾情况、共运情况、外事工作、中东形势、欧洲形势和中苏会谈情况等。

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讲话。他指出:“通过这次会议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一步关心国家大事。学习和贯彻会议的精神,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动员。这有助于中央进行精神和组织的准备。如果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谈不上统一行动。”为此,他要求各地配合中央的统一领导,做好对外接待工作。他还提出:“在外宾接待工作中,要礼尚往来,不卑不亢,既不要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排外,也不要旧的奴隶主义,媚外。”^⑩

至此中国决策层确立并从思想上认同了新的对美政策和方针。

基辛格访华,中美秘密会谈

大政方针确立之后,中国最高决策层委托周恩来和外交部具体负责筹备和实施中美高层谈判,他们有相对的机动权,但重要问题须经政治局和毛泽东拍板。

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对中美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准备资料,制定方案。周恩来在与工作小组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多次研究和修改之后,于 1971 年 7 月 4 日将《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批送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注明:“在会谈中,将坚持原则,相机行事。准备对方讨价还价。遇事随时请示主席、林副主席和政治局。”^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此件最后由毛泽东审定。

1971 年 7 月 9 日,中国方面在北京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谈判前,周恩来“把以前所有的资料、信函都重新看了一遍,重温了过去几周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些要点,这就是他会谈时带去的所有材料”^⑫。

在 7 月 9 日的会谈中,基辛格对于中美之间的障碍和难题表示以下意

见：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他还代表美国政府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的自尊的解决办法。基辛格的发言改变了美国前任政府所奉行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和“一中一台”，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他也提出了美国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坚持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对此周恩来强调：“中美之间有不同看法，但应以平等的精神加以讨论和解决。”他代表中国政府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在这里，周恩来实际上是提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必须废除美蒋条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直率地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体面。”^⑩

在中美会谈的实施过程中，毛泽东是中方的幕后总指挥和主要决策人，随时关注着会谈的进展情况。7月9日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指示。关于台湾问题，当听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这段话表明，毛泽东认为，台湾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有进展，问题不大。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毛泽东认为：“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越南问题摆在了台湾问题之前，作为中美之间的第一个障碍。毛泽东还提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⑪毛泽东所关心的是战略问题，尤其是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要通过这次中美难得的高层接触，来摸美国人的底，以便最后确定中国的战略取舍。

7月10日，周恩来着重向基辛格谈了中国关于世界大乱的看法。基辛

格听后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周恩来听后放下心来，接着点出了要害说：“苏联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⑩双方经协商，决定选择巴黎作为中美联络的秘密渠道，并确定尼克松将于1972年春天对华访问。

7月10日晚，毛泽东再次听取情况汇报。当谈到拟定中美公告问题时，毛泽东老谋深算地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的話，要学诸葛亮留一手。”^⑪虚虚实实，引而不发，这是毛泽东处理微妙的中美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外交策略手段。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后各方面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就掌握中美关系方针问题向各驻外机构发出《外交通报》，指出：在处理中美关系等方面，“将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⑫

1971年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中美公告，举世震惊。至此，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打破。

对中国缓和对美关系决策的总体评价

在中国缓和对美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现象值得探讨：

其一是，中方决策层在当时对国内局势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实行了许多“左”倾的政策；但在对国际局势，特别是对美国的战略分析方面，却大体上是正确的，因而，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越来越体现出灵活性。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内政和外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之外，主要是在于，具有特殊地位的中方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虽然在晚年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至多，他认为“三七开”，即三分缺点，七分成绩），但他仍然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全。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是在毛泽东逝世后才得到系统纠正的（主要是中共决策层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但外交方面，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的失误（主要是60年代前期和中期），却是由毛泽东本人发现并开始加以纠正的。因此才有了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特别

是对美政策的大调整,因此才促进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进程。

其二是,当时中国对外方面的公开言论充满了激进的革命高调,即便在中美关系有了缓解甚至改善的情况下,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多少(例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北京的报刊仍然充斥着“反帝”宣传,甚至在基辛格一行下榻的房间里,都发现了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字样的小册子);但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毛泽东把这叫做“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笔者认为,形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既要维护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又要从现实出发,顾及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73年2月同基辛格的谈话中曾指出:“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⑩表面强硬,实质“务实”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值得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给予足够的注意。

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缓和对美关系决策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从这一决策的实践效果来看,中方通过同美方的接触与谈判,结束了中美20余年的对抗与猜疑,促进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突破口,打开了通向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道路,由此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对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和稳定国际战略格局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一决策在中苏、中越、中阿(阿尔巴尼亚)关系方面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许是中国为了实现当时的主要目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然策略运用得当可以尽量减少代价)。

(二)从决策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把握时机,作出判断,掌握分寸,采取措施,力争主动,在各个环节上处置得基本得当;但在处理与此相关的对苏关系问题上,则过分强调了斗争的一面,政策有些生硬。当时中国决策层对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军事威胁估计过高,因此在对苏外交和备战问题上作出了过度的反应,灵活性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讨价还价的地位。特别是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既喝“茅台酒”,又喝“伏特加”(虽然美苏之间的争斗并未因

此停止,但已不是剑拔弩张之势),逐渐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而中国当时没有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稍灵活一些的政策(这样既可适当缓解和苏联极度紧张的关系,又可增加对美谈判的筹码),而是与苏联势不两立,两斗俱伤,结果让美国渔翁得利。

(三)从决策机制上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当时中方的决策权过分集中于个人(主要是毛泽东),而政治局、外交部、政策研究部门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显然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所幸的是,1969年以后,毛泽东在对美外交方面的重要决策大体正确。否则,结果将有很大不同。

注释:

①在1966年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受到严厉批判,并离开了主要领导岗位。

②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外,还有周恩来、叶群(林彪的代表),以及国务院和军方的一些负责人。

③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此地办公。

④《王力和外交部造反派代表的谈话》,1967年8月7日。

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⑥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的谈话,引自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页。

⑨《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⑩《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⑪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指出:“那时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问:“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泽东说:“就是那个时期。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再次指出:“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毛泽东还解释说:那时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

⑫林立衡的揭发材料,引自中央两案材料。

⑬《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3月3日。

⑭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曾针对王稼祥等人的建议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点。这是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三斗一多”。即:

“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毛泽东认为:“‘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

⑮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1972年7月24日。

⑯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是指二战后美国曾准备同时在欧洲和亚洲进行两场战争,并且还要准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应付半场“小规模局部危机”。而尼克松政府准备改变这个战略的根据,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的判断,即苏联和中国不会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出击”。详见 DOD, Annual Report, FY1976, pp.9—10。

⑰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提出:“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至把我们拖入类似越战这种冲突中去的政策”;美国要向亚洲盟友强调,“我们仍将信守条约义务,但是,就国内安全而言,就军事防务而言,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期待亚洲各国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详见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69—1970D.C.:GPO, 1971.P.36。

⑱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48页。

⑲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84页。

⑳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

㉑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㉒周恩来与金日成的会谈记录,1972年8月24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0页。

㉓毛泽东1964年2月27日会见金日成、10月7日会见崔庸健、10月9日会见巴卢库时的谈话。

㉔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㉕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㉖毛泽东对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报告的批示,1969年3月22日。

㉗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㉙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46, no.1, 1967, pp.111—125.

㉚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后来在1974年12月12日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时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

㉛由于美国给予在荷兰叛逃的一名中国外交人员廖和叔(时任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以政治避难权,中国方面于1969年2月19日发表声明,取消了这次会谈。参见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载《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79页。

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5页。

㉝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㉞弗农·沃尔特斯著,尤懿等译:《秘密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㉟《人民日报》,1969年1月28日。

㊱ 详见 Richard M. Nixon,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February 18, 197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ichard Nixon, 1970, February 18.

⑳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2 页。

㉑《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1967 年 3 月至 1971 年 3 月。

㉒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p.351—352.

㉓李捷：《物极必反：60 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0 页。

㉔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3 页。

㉕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苏联领导人及苏驻华使馆同我联系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9 年 3 月 22 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25 页。

㉖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 年版，第 323—324 页。

㉗王永钦：《1969 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 年第 6 期。另据聂荣臻回忆，1969 年 2 月 24 日，他得知陈毅打来一个电话，说：2 月 19 日下午，陈毅等在毛泽东住处开了一个会，毛泽东指示，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聂荣臻年谱》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第 1107 页。

㉘关于四老师讨论的细节，详见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3—204 页。

㉙周恩来致林彪的信，1969 年 6 月 27 日。

㉚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8 页。

㉛苏方经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这一要求，经报毛泽东同意后，中方正式答应了苏方的要求。当时中国决策层虽然对苏联搞霸权主义的抨击越来越严厉，但也不希望边境冲突导致失控。此外，与苏联举行首脑会晤也有对美关系的考虑。

㉜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69 年 9 月 13 日。

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58、321 页。

㉞基辛格和斯托塞尔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及其随员。其实，这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担任译员的景志成。

㉟耿飏：《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载《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 页。

㊱ 1969 年 11 月 16 日，周恩来曾致信毛泽东指出：“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㊲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从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元级会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利的。”

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6—337 页。

㊴周恩来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的谈话，1970 年 1 月 20 日。

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8—341 页。

㊶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69 年 12 月 29 日。

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4 页。

㊸外交部致波兰临时代办雷阳的电报，1970 年 1 月 15 日。

㊹周恩来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的谈话，1970 年 1 月 20 日。

⑥王永钦：《打破坚冰的岁月》（一），《党史纵横》，1997年第4期。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

⑧ Richard M. Nixon,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February 18, 197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ichard Nixon, 1970, February 18, p.181.

⑨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周恩来修改的第136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1970年2月12日。

⑩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0年3月24日。

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页。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修改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毛泽东声明稿。会议认为，声明内容应突出毛泽东5月11日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根据政治局的讨论意见，这份声明又经多次修改，于5月19日，由周恩来、康生和陈伯达将修改后的二稿报送毛泽东审定。

⑫《人民日报》，1970年5月19日。

⑬毛泽东五二〇声明详见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⑭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王幼平的电报，1970年3月19日。

⑮周恩来致毛泽东、林彪的信，1970年5月27日。

⑯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1970年6月17日。

⑰毛泽东对外交部请示报告的批示，1970年6月17日。

⑱《人民日报》，1970年7月11日。

⑲周恩来致毛泽东、林彪的信，1970年8月22日。

⑳许多文章以为这张照片和语录刊登在第二天（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但实际上，这张照片和语录是刊登在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上。

㉑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㉓《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

㉔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㉕《基辛格在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周锡生：《“乒乓外交”历久弥新》，载《瞭望》周刊，1997年第33期。

㉖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注释。

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㉘ Richard M. Nixon,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ruary 25, 1971,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83.

㉙ Ibid., pp.84, 87.

㉚《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由于周的报告上有毛的批示，所以收入这个文件。

㉛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1年3月15日。

㉜《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㉝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㉞熊向晖：《乒乓外交史话》，《纵横》，1997年第10期。外交部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批示还有如下的背景：当时在名古屋举行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美国乒协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参加国际

乒联。

①路透社名古屋 1971 年 4 月 4 日电。

②美联社名古屋 1971 年 4 月 5 日电。

③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6 页。

④吴旭君录像谈话。见《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2—144 页。

⑤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记录，1972 年 7 月 24 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31—1632 页。

⑥参见钱江：《“乒乓外交”始末》，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7 页。

⑦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1971 年 4 月 8 日。

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94 页。

⑨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1 页。

⑩周恩来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谈话，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69—475 页。

⑪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33—234 页。

⑫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 2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7—268 页。

⑬Edgar Snow,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 April, April 30, 1971.

⑭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4 页。

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4 页。

⑯《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 年 5 月 29 日，中发〔1971〕第 40 号。

⑰《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 年 5 月 29 日，中发〔1971〕第 40 号。

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 年 5 月 29 日，中发〔1971〕第 40 号。

⑲口信引自《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附件。6 月 4 日，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回了口信，表示感谢中国方面欢迎他访华，并具体建议基辛格于 7 月 9 日到达北京。6 月 11 日，中方回口信表示同意这一日期。

⑳王永钦：《打破坚冰的岁月》（三），《党史纵横》，1997 年第 6 期。

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 467 页；王永钦：《打破坚冰的岁月》（一），《党史纵横》，1997 年第 4 期。

㉒章文晋语，转引自王永钦：《打破坚冰的岁月》（三），《党史纵横》，1997 年第 6 期。

㉓翁明：《“波罗行动”》，载符浩、李同成主编：《外交风云》，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 页。

㉔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42 页。

㉕翁明：《“波罗行动”》，载符浩、李同成主编：《外交风云》，第 64—65 页。

㉖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 44—45 页。

㉗周恩来修改的外交部就中美关系问题发给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稿，1971 年 7 月 18 日。

㉘《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 年 2 月 17 日，外交部〔73〕办文特 1 号。

第二章

艰难复出,介入外事工作

1971年爆发的一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林彪的倒台,极左势力受到重创,极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江青集团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另一方面,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分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军委日常工作,并强化了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权。这种局面为邓小平的复出,以及确保尼克松访华的成功,确保毛泽东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决策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随后,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包括外事干部)得到解放,在党内改变了同江青集团抗衡的态势,并极大地增强了外交工作特别是对美外交工作中的务实力量。这些变化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74年4月,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提名下,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阐述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并介入对美外交谈判。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取代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的趋势初现端倪。

“九一三”事件爆发,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表态

1971年9月13日,林彪父子妄图谋害毛泽东未遂,在北戴河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结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震动。在此之后,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但他对自己的失误也吸取了若干的教训。在他的提议下,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叶剑英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而曾经与林彪集团相互勾结的江青一伙,虽然竭力打扮成“反林”的英雄,但毕竟有些心虚,不似往日那般锋芒毕露。这些深刻的变化为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复出创造了条件,而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及时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从而使中国政坛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向党内省军级以上的党组织发出通知,正式宣布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①10天过后,文件扩大传达到地、师级。“十一”国庆节当天,敏感的人士注意到,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公开的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②这一不同寻常的庆祝方式是建国二十多年来从未使用过的。

10月3日,中共中央同一天发出两个《通知》。一个通知写道:“为彻底审查、弄清林一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一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另一个通知写道:“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③

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逐步扩大。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公布林彪罪行的通知,并于10月中旬扩大传达到基层党支部书记一级。1971年12月11日和197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④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⑤

此时,邓小平正在江西新建县一家拖拉机修配厂里监督劳动,当一名钳工。“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他已经注意到,当时的报刊、广播中没有出现“副统帅”林彪出席国庆活动的报道,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不久,问题有了

答案。11月6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突然被通知，去工厂听传达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文件传达的“政治待遇”。

邓小平听到林彪垮台的文件传达，内心十分激动，回到家中感慨地说道：“林彪不亡，天理不容！”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涯又有了新的转机。随后，他于11月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除了表态之外，他明确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封信，并且做出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⑥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固然暴露了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中国共产党的系列基本原则，林彪一伙怎么能够在党内呼风唤雨，有那么大的市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副统帅”竟然要搞政变，甚至叛国出逃，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绝大讽刺。因此，不管人们当时是否已经意识到，“九一三”事件无疑是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也使人们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狂热中猛醒，于是，在党内要求解放更多老干部的呼声渐起。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对老干部的态度有了转变。1971年11月8日晚，毛泽东接见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当介绍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代表团秘书长符浩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告诉毛泽东：他是“九十一人大字报”^⑦的签名者之一。不想，毛泽东表态却说，我赞成“九十一”。毛泽东的表态促使外交部一大批因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陈毅而遭受牵连的干部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工作。^⑧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⑨。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

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毛泽东还说: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⑩

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还没有彻底为“二月逆流”平反,但也表明了要重新认识老干部的积极态度。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⑪几小时后,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一伙攻击诬蔑,但在晚年仍为中美关系缓和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去世了。

当时,按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关于追悼会的安排是低调的,仅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按军队元老的规格办理,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将不出席。由于对陈毅的盖棺定论涉及如何对待老干部的敏感问题,因此,周恩来在审改对陈毅的悼词稿时,补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着重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然而,毛泽东在看了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之后,将悼词中功过评价等补写的文字删去了,并且批告:“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⑫

不仅如此,1月10日下午,正当陈毅追悼会即将举行之际,毛泽东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决定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这显然是一个破例之举。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意识到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意义重大,遂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和政协的负责人,以及各有关部门领导参加追悼会,并邀请当时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出席陈毅的追悼会,由此大大提高了陈毅同志追悼会的规格。这对那些饱受“文化大革命”迫害之苦的老干

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后，立即派人找来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并且充满感情地对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他跟项英不同。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搞垮了。当然啰，后来又发展到九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⑬毛泽东对陈毅的高度评价，不仅驱散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笼罩在陈毅身上的蔽眼的瘴气，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

毛泽东还看似无意，实际上却是有心地对张茜说起，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不啻是一声惊雷。因为，当时邓小平还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在经历了林彪事件之后，他对邓小平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看法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周恩来听了心领神会，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把毛泽东的这番话传出去，^⑭借此制造舆论，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读了经毛泽东亲自阅改过的悼词，对陈毅同志革命的一生作了中肯的评价。毛泽东站在前排，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次紧紧握住张茜同志的手，表示慰问之意。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上车。^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首都各大报刊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为题，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追悼会的消息，以及毛泽东同张茜同志在一起交谈的照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隔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

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⑩

对于这些涉及邓小平的消息，远在江西的邓小平虽然并不知详情，但他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仍能感受到中国政治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中美关系急剧发展，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林彪倒台使国内极左阵营元气大伤，减少了中美关系缓和进程的阻力。由于毛泽东的决断，以及他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支持，江青集团的干扰虽然给周恩来等人对美外交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却无法左右大局，从根本上阻挡中美和解的历史潮流。这时中国国内形势与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国内政治局势从激进转向相对务实的趋势，为中美关系缓和创造了一个好的氛围；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展开也强化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党内务实力量的倚重，加强了党内务实力量的地位，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基辛格访华过后，为了贯彻毛泽东确立的新的对美政策，中国外交部就中美关系问题拟就了发往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这份通报阐明了中美关系的方针，列举了需要相机处理的问题，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⑪与此同时，根据1971年7月上旬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中美之间达成的协议，中美双方于同年7月19日，正式启用巴黎秘密渠道，作为中美之间进行直接联系的新地点。1971年10月初，中美在“巴黎秘密渠道”达成协议，并同时宣布，美国特使基辛格将再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⑫为此，中国外交部于1971年10月17日，提出对国际问题和双边会谈的立场和对策，以及接待安排，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批。10月19日，毛泽东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⑬后来，在中美会谈中果然出现了中方意料不到的事情，需要临场发挥。

美方事先没有通报此次会谈要起草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可是基辛格在10月20日来华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出了这个要求。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请主席决定要不要搞。毛泽东指示，等他交出草案再研究。要搞，就搞个好公报，不搞屁公报。随后，基辛格在10月22日的会谈中拿出了美方经尼克松审定过的草案。美方交出的草案为了突出美国总统的访华成果，用了很多外交辞令来掩盖双方的分歧，同时又含糊其辞地强

调一些双方的共同点。周恩来看后不满意，决定中方要起草对案，各说各的，并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就起草中方对案的基本精神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侮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毛泽东又说：“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也难。他也是讲空话，什么维护老朋友啊，不干涉内政啊！不争霸啊，那怎么行！但是他也不好讲大国应该欺侮小国。语言上接受，行动上自由，他们是自由国家、自由世界。说什么不谋求霸权，你美国由13个州到50个州，还不是扩张、争霸的结果，后来把手伸向全世界。……现在尼克松也承认他们困难了。过去美国讲两个半战争，后来讲一个半战争，现在一个半也不行了。”毛泽东最后说：“各说各的好，你们先给他们吹吹。”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方改写出一份别具一格的公报草案。草案的序言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接着在第一部分中，中方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等等。然后，留下一些空白，由美方来填写有些肯定是不同的立场。草案的第二部分吸收了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中美双方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建议。毛泽东听过这份公报草案的汇报后表示：“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神气了。”^①

对于中方这种“过去没有过的”^②公报草案，美方颇感意外，但很快便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例如，直言不讳地阐明分歧，可以使盟国放心，而中美双方形成的共识也会显得突出、可信。因此，在复会后美方同意按中方草案的写法，不过基辛格认为中方的某种表达方式火药味太浓，应作某些修改。10月25日上午10时10分，基辛格提出美方对案的第二稿，以供讨论。当晚10时，美方又提出草案的第三稿，与中方一起讨论。26日晨，中美双方就公报草案的主要部分初步达成协议。但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碰到了较大的麻烦。美方虽然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又强调不能背弃台湾这个“老朋友”。美方还力图把美国从台湾撤军同中国保证只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中方坚决不能同意的。周恩来有针对性地指出：美国的

对外政策有一个历史传统,不可能一下子隔断,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在这方面,先有尼克松总统今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讲话,后又有最近英国保守党首相希思在该党年会上的讲话。希思承认世界发生的变化,提出了一个“新欧洲主义”,受到党内多数人的欢呼。周恩来表示,相信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时,虽然双方立场不同,但能互相了解,能谈到点子上去,能找到共同点。尼克松和希思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还不是现存力量,对此我们很满意。但是我们认为,可能把我们估计得还高了一点,可以说我们是促进世界变化的一个因素而已。周恩来还指出:“既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②

这样,经过反复的争论,最后美方做出一些让步,用一段巧妙的文字来表达美方的立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个提法是基辛格从美国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份文件中摘录的。对于美国的这种表达方式,中方表示谅解。但美国方面还要写上,中国人民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对此中方虽表示反对,但说这些遗留问题将留待以后解决。至此,公报草案引起的风波暂告平息。

从10月20日起至26日止,中美双方共进行了10次会谈,历时23小时40分钟。双方除了讨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安排和中美公报草案以及台湾问题之外,还就印度支那、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会谈的气氛是坦率而又务实的。中美双方都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

1971年10月25日,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行将结束之时,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政坛,而且对中美关系影响深刻的大事。那就是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冲破美国的层层阻挠,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著名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场动人心魄的表决改变了台湾当局长期非法占据中国席位的不合理状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更多的承认开辟了道路。这既是中美接近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是美国不愿意过早看到的一幕。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毛泽东一直很重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

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大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②

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不仅使美国政府感到震惊，就是中国方面事先也没有估计到形势会发展得这么快，因而对出席联大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在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的电报之后，周恩来总理于10月26日召集外交部党组成员及有关人员，紧急商讨派不派人出席26届联大的问题。讨论还没有结束，王海容走进来说，毛泽东请总理等去他那里。当周恩来等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后，毛泽东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周恩来说，主席本来指示……毛泽东笑着说，那是老皇历喽，不作数喽。周恩来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毛泽东明确指示：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毛泽东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毛泽东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拿起外交部填写的联大表决情况，边看边说，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1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

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接着,毛泽东就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问题作了将近三小时的重要指示。其要点如下:

毛泽东首先说,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毛泽东说,1950年,我们还在“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关于这个发言所应包括的内容,毛泽东说,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布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

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毛泽东还说，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叶剑英背诵如流：“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毛泽东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灭。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毛泽东指出，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2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²⁴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指明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宗旨和策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随后，外交部成立参加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正式组成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以外交界才子著称的乔冠华接受任务后，连续熬了几个通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赶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登台亮相的发言稿，并经周恩来亲自审定批准。

1971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

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²⁵

在大洋彼岸,联合国总部的官员们也正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对于出现这样的表决结果,也是没有料到,因此,联合国秘书处事先没有准备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只得临时向一家制旗店紧急定制。可拿到中国国旗后,他们又不清楚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挂。在联合国会址周围排列着131个旗杆,按会员国国名字母次序依次升旗。联合国官员不知道中国的位置是按代表中国的“C”,还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字母“P”来确定。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专门致电中国外交部询问。

1971年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复电指出: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地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始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²⁶

这样,1971年11月1日,两位美国黑人青年在新闻记者的一片闪光灯下,将一幅长1.2米、宽1.8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广场自北端起的第23根旗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上空飘扬,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971年11月8日晚,毛泽东亲自接见将要出发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勉励代表团应有汉朝班超出使西域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去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毛泽东还指示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总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²⁷

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²⁸

1971年11月11日,引人注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受到热烈的欢迎。有近400名记者前往机场采访。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以其潇洒的微笑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他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称“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温和的调子”。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去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这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有意在走廊以打电话为名，与中国代表团“巧遇”，并与乔冠华握手致意。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从容地步入会场，并在原来由国民党集团占据的座位上就座时，许多国家的代表涌上来向真正的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第26届联大会议主席马利克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一直开到下午，历时约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致欢迎词，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每天阅读外电报道的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⑳

最后，乔冠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发表了精心准备的长篇演说。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许多联合国会员为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后他话锋突然一转，开始抨击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其言辞之激烈，表情之严峻，不仅使美、苏两国的代表感到十分难堪，而且使整个会场受到了震动，人们开始意识到，这几天来，一直“以微笑”著称的中国外交官远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敏感的美国报纸立即登出一幅漫画：美国代表布什和苏联代表马立克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桌前，乔冠华将一碗米饭倒在他们头上。中国代表首次登台亮相就以这种以“国际讲台上非常少有的坦率和诚实”，毫不含糊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共同社记者称这篇讲话“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㉑。

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

虽然中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但筹备尼克松2月份中国之行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这说明，尽管中美之间还存着许多历史遗

留下来的种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双方一旦下定决心要改善关系,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合作性的交往,而不是相互敌对,来发展两国的共同点,并减少两国间的麻烦。

1972年1月,美方派出以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性的安排。中国外交部为此拟定了具体的接待方案,王海容传达了毛泽东审阅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几点指示:“一、原来的公报草案中南亚次大陆问题因现在情况变了,应该修改;二、上次基辛格说公报草案太长,并说尼克松飞行12000多里到中国来听‘训’,会弄得他很难堪;三、美国希望同我们做生意,也可下点毛毛雨。”^③

1月2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外交部起草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设想(修改稿)。周恩来提出:“草案关于台湾的措词不能变,对国际部分可提出不同意见。”^④1月3日,外交部根据会议商讨情况提出两种修改草案(对国际部分大改和小改的两种方案),供最高决策层选择。1月4日,黑格到京后同周恩来举行政治会谈,转达了尼克松、基辛格的口信,并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美方对拟议中的中美联合公报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这是基辛格1971年10月访华没有来得及解决的主要问题。会见后,周恩来委托熊向晖主持起草了《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并将稿件修改后报送毛泽东批阅。

毛泽东于1月4日和6日,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当周恩来谈到黑格说到美国当前的政策是要赢得时间、增强巴基斯坦的自卫力量时,毛泽东说:“这倒也好。印巴问题就说明全世界都在动乱。”周恩来汇报黑格说苏联战略改变,要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并表示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他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他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南朝鲜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最后,周恩来请示,联合公报草案,除台湾问题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毛泽东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就愈要提。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啰!”^⑤毛

泽东的最后一段话，阐明了中美接近的实质，是双方都需要进行战略收缩，以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之敌。

1月6日晚11点半，周恩来在和基辛格举行第二次会谈中，向他讲明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方答复口信。其要点是：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不断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应有准备。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的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五、中美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会谈中，周恩来还对黑格当天转达的基辛格口信作了评论，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③

在这种背景下，1971年12月2日，中方确定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接待工作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④

1972年2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提交国会的第三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提出，美国同中国的任务是“寻求开始减少美中分歧的途径”，“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报告重申对台湾和盟国承担的义务，并声称不会因此而损害和日本的关系。此外，报告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示美国的政策“不是针对莫斯科的”。^⑤

经过上述充分准备，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终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

这次的中美会谈分为几个层次：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谈讨论战略问题，并为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确定基调；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会谈讨论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中国外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以及章文

晋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讨论起草中美联合公报。在此期间,中方的所有重要决策均请示,并经过毛泽东批准。

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尼克松的会谈中强调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国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就说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才发现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⑤

这番话寓意深刻,意在表明中美之间现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应当努力寻求改善两国间关系的途径。毛泽东同尼克松历时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实际上把此次中美最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⑥

周恩来和尼克松及基辛格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先后进行了5次“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其中北京4次,上海1次。总共的会谈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姬鹏飞和罗杰斯的会谈也进行了5次,其中北京4次,上海1次;关于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会谈则主要在乔冠华、章文晋和基辛格之间进行,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总共用去22个小时,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和上海。在杭州和上海,周恩来随时打长途电话向中方最高决策人毛泽东汇报中美会谈情况。

尼克松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阐明了美方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1.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2. 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3. 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支持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4. 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5. 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⑦但尼克松表示,政治方面有困难,还不能马上丢掉台湾,希望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⑧对此,周恩来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掉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两方面的事。”^⑨

虽然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双方都谨慎地注意,不让这些分

歧危害中美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新关系。这样，中美双方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终于在2月27日下午，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最后文本达成协议。关于台湾问题，公报指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④

周恩来事后谈道：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词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⑤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正式发表第一个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由于公报是在上海签署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中美《上海公报》）。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果。而且，公报的意义还不仅仅限于它的文字，中美双方都不只是为了解决双边问题才签署这个公报的。公报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中美之间由此产生的一种默契，那就是双方都明白，在国际战略的新格局中，中国和美国都获得了新的活动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启动，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确定对外战略的首要因素。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共中央对中美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并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以此为契机，中国外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仍然坚持原则；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灵活性”。这种积极的趋向，是在党内务实力量迅速聚集的情况下形成的，同时又反过

来,进一步巩固了务实力量在党内和对美外交中的地位。

1972年3月3日,周恩来向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讲解了中美《联合公报》,并着重论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他说:“尼克松访华前十七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十一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④

随后,周恩来于1972年3月5日,将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馆的通报稿^⑤上报毛泽东审批。这份通报稿要求驻外使馆:“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中国方面之所以确定这样的方针,一是由于协议还有待于实践,不宜“张扬”^⑥;二是要尽量低调,防止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攻击尼克松让步太多,破坏中美会谈的成果。毛泽东阅后认为:“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⑦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72年3月7日发出内部“通知”(发至省军级),对中美上海公报以及新的对美策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通知”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提醒中共高级干部要注意中美上海公报中一些重要问题提法的差异。例如,在公报中有关双方共同点,在文字表达上大都采用了“应该”、“准备”、“希望”这类字眼,这是中国方面坚持的,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双方根本立场有原则区别。通知认为:“双方协议的十一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此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四点共同申明;反对互相勾结和划分利益范围〕还未成为现实,美方能否履行和履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其行动。”又如,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声明部分说到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撤军”。“通知”认为,这里“地区”不是仅指台湾,而是指整个远东地区。中国方面所要申明的是,“中国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缓和远东

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坚持不渝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各项主张，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远东局势就和缓不下来，中国方面就继续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打下去，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也就要受到影响”。关于以后中美双方在各个领域里的具体关系如何恢复与发展，“通知”指出：“公报关于两国人员来往、贸易等，只是从原则上作了规定。今后民间人员来往会逐步增加，不仅美国人来，我们的人员也要去美。双方民间贸易界也会有些接触。”^④

这份“通知”的内容表明，首先，中共中央认定，缓和中美关系起到了利用美苏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作用；其次，对中美最高级会晤取得的成果，更注重今后是否能够落实；第三，指出了中美之间仍有台湾、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待解决；第四，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通知”对于中共高级干部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贯彻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此，中国有关方面调整了相关的政策，着手恢复和发展与美国官方以及民间的交流和往来，美国方面亦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由此推动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最先取得积极进展的是中美在巴黎的正式接触。1972年3月13日，中美双方原来的“巴黎秘密渠道”^④正式改为公开渠道。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与美国驻法大使阿瑟·沃森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是中美最高级会晤所产生的第一个具体的成果。巴黎公开渠道后来一直持续到1973年2月。在此期间，双方的联系共有53次。^⑤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在巴黎的大使馆进行会晤，使两国的磋商和接触制度化，并且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贸易和互访，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在巴黎定期举行大使级会晤之外，中美两国还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接触和战略对话。其中，最重要的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华^⑤，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中美两国通过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的接触^⑥也更加频繁。这种沟通和磋商机制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在中美大力开展官方接触的同时，民间的交往也开始活跃起来。1972年4月12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进行两个星期的访问。在此之后，中国医学代表团和科学家代表团、中国沈阳杂技团等也相继访问了美国。

值得指出的是,中方这些代表团出访虽然是民间交流,但都体现着中国领导人开展对美外交的意图。例如,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代表团,中国领导人极为重视,周恩来亲自提议由在乒乓外交中有突出表现的庄则栋(曾三次获得世界冠军)任团长^⑤,并在该团出访前接见了全体成员,鼓励他们在增进中美之间相互了解方面发挥作用。这些代表团在美国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尼克松总统亲自分别接见了他们,这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

另一方面,数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1972年4月和6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先后访华的美国参议院两党的领袖,众议院两党的领袖,他们分别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美国全国医学协会的一批医生和一个电子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也于1972年的夏天和秋天访问了中国。此外,还有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一个代表团也加入了访华的热潮。1972年7月29日,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和美联社达成一项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首次建立正式的新闻和图片交换渠道。

在此期间,中美贸易也有了较大的起色^⑥,其增长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1972年9月,美国农业部宣布向中国出售40万吨粮食。与此同时,中国宣布购买十架美国波音707型飞机,价值达1.5亿美元(其中,5架1973年交货,另5架1974年交货)。据美方统计,197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总共不过490万美元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几乎是零。而到了1972年,双方的贸易额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230万美元的货物,美国向中国出口了6020万美元的货物,从而使两国的贸易额跃增到大约9250万美元左右。^⑦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双方的限制放宽之后,有些美国实业家参加了在中国广州举行的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一些著名商界人士在取得美国国务院的支持后,还于1973年3月22日,发起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虽然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并不算大,而且对两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但中国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进行大量贸易的国家,所以中美日益增长的贸易的实际意义是在于,它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出批示

在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党内的务实力量进一步聚集起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孤掌难鸣，身体欠佳^⑤，因此急需一位运筹帷幄的领军人物。而当时能担负起这一重任的非邓小平莫属。正因如此，周恩来等一些老同志开始为邓小平复出，奔走呼号。

1972年1月24日，周恩来在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有意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他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⑥4月18日，周恩来在阅改《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稿时，批示：“请考虑加一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4月24日这篇根据周恩来意见起草的社论发表，其中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⑦

1972年“五一”节前后，先期由江西返回北京的王震将军接见了邓小平的子女毛毛，并且说：“毛主席说你父亲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⑧他还要毛毛赶快回江西，把这些情况告诉邓小平。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不失时机地于1972年8月3日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解释了一些问题，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他写道：“在去年（1971）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⑨

邓小平的这封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很快有了下落。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

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⑥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⑦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虽然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并不符合事实，但他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一些功绩，这实际上等于对邓小平的重新出山开了绿灯。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主席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于8月1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他的身边协助工作。

江西省委接到中央通知后，立即派黄知真前往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向邓小平当面转达了中央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的通知。这时邓小平才正式摘掉了戴了六年之久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变成了“革命同志”。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此后，江西省委安排邓小平夫妇参观了革命圣地井冈山，重访了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脏瑞金，以及瓷都景德镇等地。

虽然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的复出道路依然很不平坦。主要是当时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批极左的做法进行抵制。这不能不影响到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一晃，毛泽东批示的时间已过去四个多月了，邓小平的复出还没有着落。

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1972年12月18日，他借毛泽东谈到谭震林问题，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请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信中写道：“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

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⑥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并提及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来加重分量。随后周恩来又同纪登奎、汪东兴当面讨论了这件大事。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将谭震林调北京安排工作。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⑥此时，周恩来已确认得了不治之症，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持下去，形成权力真空。因此，他急于让邓小平尽快复出发挥更大的作用。所幸的是，邓小平的复出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1973年2月，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回京。离别之际，68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⑥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⑥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三年零四个月的漫长岁月，乘火车由赣返京。等待他的的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把美国列入“一条线”反霸统一战线

此时，中美关系正沿着中美《上海公报》所确立的方向行进。1973年1月，由于美国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意味着美国已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出去，从而消除了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障碍^⑥。至于中美关系继续改善的第二个障碍台湾问题，尼克松曾许诺在他第二任期内解决^⑥。1973年，尼克松开始总统第二任期后不久，就准备派基辛格访华，提出更为具体的方案。

1973年1月23日，中方接到美方关于基辛格再次访华的口信（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在东南亚政策和世界形势等问题），周恩来代外交部起草了复美方口信电稿，表示欢迎。^⑥这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2月15日再度访问了中国。

1973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美方在中美

关系上准备采取两项步骤：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liaison office）；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实现这两项步骤。对此，周恩来表示：“在实现这项步骤的过程中，我们互相还会商量，或者提前，或者推迟。”^①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为此目的，中美双方约定“要扩大在各方面的接触”^②，并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最重要的是，双方商定了互设联络处的问题。^③这种联络处的规格很高，虽然不是外交代表机构，但作为默契，双方将互相给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权。这是中美双方朝着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迈进的一个重大的正式步骤。因为，随着双边关系的不断扩大，联络处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外交作用，直至升格为大使馆为止。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中苏关系却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上不断增兵（已从1969年的21个师、1971年的33个师增加到1973年的45个师）。^④此时，毛泽东对如何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思考也日渐深入。他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准备进一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来对抗苏联。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他在提到中美相互接近时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 - IN - HAND（手携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用如此坦率的语言来阐明两国关系的实质，既反映了毛泽东特有的风格，也表明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劝美国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他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国帝国主义”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意见日趋一致，随着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对日本的想法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

日俱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毛泽东对基辛格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⑭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宏大战略构想，具有深刻意义和实际影响。

“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时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的批评^⑮，但更强调“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是苏修”。197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同苏修的斗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和美国就能够形成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新型关系。《外交通报》对中国在未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之前，就同意中美互设联络处做了必要的说明。认为这不会影响中方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因为“目前形势已与两年前大不相同”，中国已在外交上取得了进入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以及中日、中国西德建交等一系列重大胜利，而“蒋帮却已反转过来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将“有助于扩大我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⑯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两国已从恢复历史性的联系，努力消除两国间的障碍的阶段，进入到力争加强战略协作并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阶段。1973年3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5月1日美国将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为联络处主任。在此之前，中方已获悉这一消息。为了与美国方面的这一任命相呼应，周恩来于1973年3月4日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拟关于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人选的口信稿，并致信毛泽东提出：“美现派高级外交官来担任驻京联络处主任，我拟相应派黄镇大使^⑰去任驻华盛顿我联络处主任。以利推动工作开展。”毛泽东阅批：“照发。”^⑱

随后，中方加快了筹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并于3月29日通过新华社正式宣布，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将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⑲将担任副主任。这样，以黄镇、韩叙出使华盛顿，再加上已在纽约的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黄华，就形成了中国在国外外交规格最高，并且最强的布局。这说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视。在黄镇赴任前夕，毛泽东接见了，并耐人寻味地问道：“你这次由驻法大使调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是升了，还是降了？”见黄镇笑而未答，毛泽东又说：“驻美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我看是升了。”^⑳由此可以看出驻美联络处在毛泽东心

目中的地位。

由于中美两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接下来的筹建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1973年4月5日,由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詹金斯率领的第一批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先期到达北京。以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为首的第一批中国驻美联络处人员也于4月18日飞抵华盛顿。在此前一天,美国国会于4月17日通过一项给中国驻美联络处以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法案。4月21日,尼克松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5月1日,中美双方互设的联络处正式开始工作。1973年5月1日,中美双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了联络处,黄镇和布鲁斯分别担任中美两国联络处首任主任。5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敦促美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他指出:“中美上海公报是费了工夫才形成的,对其中的共同点,应该加快实行。”^⑧

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开始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使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相互隔绝的状态,并且能够在较高的级别上保持直接的联系和接触,这是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随着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和加强,一个新的世界地缘政治图的轮廓开始形成了。

邓小平在外交场合正式复出

邓小平自江西回京后不久,1972年3月9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⑨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⑩

随后,中共中央于3月10日,正式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

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决定》还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⑧

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了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⑨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⑩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⑪

这一步骤，标志邓小平又重返中共高层，大大加强了中共高层中的健康力量，并为邓小平日后发挥更大作用铺平了道路。

1973年4月1日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⑫4月9日，周恩来利用在玉泉山检查治病的机会，找邓小平进行了长谈。此后，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有力副手。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周恩来总理主持宴会，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已在政坛消失了几年的邓小平，突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外宾的盛大宴会上。这件事立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介的广泛关注，各国争相报道了这一新闻。虽然邓小平的公开身份只是“国务院副总理”，但外国记者却认为，“在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一位外国记者事后曾这样写道：“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只身孤

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⑧的确,邓小平的复出意味着一场新的斗争的开始。西方一家杂志称邓小平是“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⑨

同年5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5月20日,周恩来将名单报送毛泽东,并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特别提到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他指出:“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⑩

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以其杰出的才干再次获得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拥护,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十大开过之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此时,由于周恩来已身患重病,毛泽东也正在考虑让邓小平逐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为了坚决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和邓小平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建议。

在12月12日的会上,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还要求“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他批评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且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接着,毛泽东提议,陈锡联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跟曾思玉对调,许世友跟丁盛对调,韩先楚跟皮定

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

事隔两天，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的谈话中，对邓小平的工作安排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指示：“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以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并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他指出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并说：“人家（指苏联——笔者注）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毛泽东又说：“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泽东指出：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300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接着，毛泽东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各位将军宣布了对邓小平的新任命，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同志）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为鼓励邓小平大胆工作，毛泽东又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同朱德同志握手时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毛泽东对朱德同志又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

毛泽东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

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总理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毛泽东明确表态:“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毛泽东恳切地表示:“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还谈到了国际战略态势的问题。他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他还提到:“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⑩这表明虽然苏联此时向中国做出了某种姿态,但毛泽东对此并不信任,并且仍然坚持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在毛泽东的这几次重要谈话之后,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这一提议很快得到毛泽东首肯。

这样,邓小平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之后,又重新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层,由此极大地增强了党内务实力量,并为国内政治的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美会谈风波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态

本来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已使党内的政治格局得到较大的改善,然而,正当邓小平在国务院迅速进入角色,协助周恩来处理千头万绪的繁重工作之时,1973年6月和11月发生的两件事情,却使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事情的起因与中央高层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和中美关系有直接关联。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在中美关系呈现出良好趋势的同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取得了一定进展。1973年6月，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并且同尼克松签署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关系在表面上已有所缓和。

这一新情况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在这种背景下，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召集张再（时任美大司一处副处长）和田曾佩（时任苏欧司一处副处长）共同讨论，并由张再执笔写成一篇调研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文章提出，美苏会谈所表现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认为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并指示外交部《外交通报》稿子也应照着改。

但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却有不同看法。1973年6月5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⑧

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7月3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⑨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再次批评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在毛泽东看来，美苏表面上的合作，掩盖不住美苏关系实质仍然是以相互争夺为主，而且美国的战略重点没有东移，仍是在欧洲，美国最近从越南撤军就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毛泽东说：“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指阿尔巴尼亚——笔者注），说是

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毛泽东又说:“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毛泽东又批评了那种革命不能有妥协的说法,并且为中美接近辩护。毛泽东说:“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⑤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⑥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显示出,要推进不仅对美国,并且要把欧洲和日本也包括在内的“全面外交”这样一种战略。他说:“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⑦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毛泽东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⑧

按着毛泽东的这种分析,中国仍能够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并取得周旋的余地。

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⑨7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一问题,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作了初步检讨并承担了责任。随后,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开会,研究起草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于7月15日报送毛泽东,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⑩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

1973年9月22日,曾经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基辛格博士取代了罗杰斯,宣誓就任美国第56届国务卿。尼克松总统在基辛格就职仪式上说,基辛格是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时刻,执掌这个部门的工作的,基辛格也是第一个在任命前就访问过北京和莫斯科的国务卿。尼克松的这番话说明了基辛格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而言,其决策固然是尼克松总统主持的,但在设计与制定,并且把蓝图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基辛格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在这一时

期的美国全球战略中,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基辛格的“均势”思想。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重新组合,这种带有“均势”色彩的美国全球战略的轮廓,也开始日渐明朗化了。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后,把重点移向西欧,可以抵挡苏联向西推进。与中国改善关系则可以牵制苏联对亚洲的扩张,并与西欧形成犄角之势。这是美国由于争霸世界的实力不够,无法单独抗拒苏联的必然结果。

1973年11月10日,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这是基辛格第六次访问中国,但以国务卿的身份出现在北京还是第一次。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就国际问题连续举行系统而广泛的会谈。这已成了中美会谈的一种惯例,当两国关系还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协议,而是通过对世界大势达成的共识建立起来的。这也使中美会谈具有从长远考虑问题的特点。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谈竟成了周恩来挨批的导火线。

11月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⑩对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拖延态度,对基辛格过分渲染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来掩盖美苏争夺,也需要中国帮助这一重要事实,毛泽东感到有些不满。

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介绍了美国的对苏战略,并含蓄地回答了中国对缓和提出的批评。他说,美国毫不怀疑苏联力图利用紧张局势的缓和来涣散西方的团结,削弱西方的防务。但他认为,时间对美国有利。美国能够比苏联更好地承受紧张局势缓和的考验。基辛格说:在出现侵略行为时,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必要时还要采取残酷的行动,但我们需要事先证明是别人在向我们挑衅。我认为,我们在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⑩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基辛格说:“我们曾告诉你们,而且总统也向你们重申,我们准备在本届政府内,即1976年以前实现中美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但困难在于,在这中间一段时期,如何处理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如果在任何时候中方认为上海公报的措词,或稍加修改可以提供中美间完全的外交承认的基础,美方准备在此基础上前进。”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似有后退的打算,周恩来十分谨慎地提出:“博士提到要使《上海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有所前进,我们在公报稿上加上一句‘美国方面表示不支持不利于中国统一的任何企图’,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加这一句。”基辛格未表示同意,只说将“谋求加速正常化”。^⑪后来中国方面提议在公报中写进这样一句话:“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周恩来着重谈到了重大的国际问题。他指出:“世界上扩张主义都是要失败的。”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把手伸得太长了,花了很多钱,付出了很大的力量,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在不收缩一下不行了。周恩来还认为,苏联和老的扩张主义争斗,你们收缩一下,这不是孤立主义政策,而是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基辛格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判进行得很艰苦。11月13日晚,基辛格临时要求讨论一下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周恩来连夜与他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对美方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提议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后,再作答复。但当周恩来当晚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已经睡下了,因此周恩来没有打搅他。11月14日,在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

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11月14日，中美发表的公报上有这样一段话：“双方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经常接触，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在不代表第三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具体磋商。”^⑪这份公报是经过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过这份公报的草稿。

但后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没有及时向他报告，并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因此于11月17日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他的住处开会，着重谈了对这次中美会谈的一些意见，并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⑫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要受美国人的骗。美国人向中国捞稻草，救它的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基本上一切不要，所谓基本上，就是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那一套。现在做生意买得也太多。我是点了头的，罪魁祸首是我。这回勾结美国，罪魁祸首又是我。^⑬再次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⑭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在同邓小平的谈话中，提到周恩来同基辛格的这次会谈说：就是保护伞，借一个伞给我们。^⑮

11月17日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忍无可忍，起之与江青争辩。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并且指出：“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并检讨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⑯

在此事之前，江青已经想插手外事工作，增加其一伙在外事工作方面的影响，并寻机向周恩来等党内务实力量发难。1973年11月13日，江青提出要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增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周恩来批示外交部：“请从今日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⑰

11月18日，江青又借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一事提出：“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还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

泛滥”活动,致使这次访华演出被迫取消。^⑫

这次中美会谈引起的风波,使党内务实力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错误”。在会上,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江青等人趁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上纲上线,说周恩来在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右倾投降主义”。江青和姚文元还借题发挥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江青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彻底扳倒周恩来。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⑬

但毛泽东并没有提升江青的意思,他在对周恩来不满的同时,把希望寄托到了邓小平身上。因此,会议期间,他十分关注邓小平的态度。他曾向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询问邓小平发言了没有。邓小平当时虽然恢复了工作,但还不是政治局成员,因此是列席会议。一开始,他保持沉默,没有发言,直到与会的所有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的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发言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几句话之后,他就将重点转移,开始谈怎么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战略态势,分析了中美、中苏、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讲到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的形势。他认为,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如果真打起仗来也不可怕,以前用小米加步枪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邓小平从战略高度讲的这番宏论,其实已大大超越了这次会议的主旨。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报告了邓小平的发言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发言的,不用交代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小平找来,但这一事情,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进行认真观察。而观察的目的,是他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⑭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一方面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另一方面又认为江青做得太过分,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⑮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⑯11月25日,毛泽东批示将一

封批评江青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⑩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⑪至此，周恩来渡过了危机。在此之后，中央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终于结束了。

从上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次分歧来看，笔者认为，在第一次的问题上，毛泽东对美苏关系和美国战略重点的判断比周恩来更为准确。毛泽东的见解构成了中国对美缓和的政策基础。在第二次的问题上，则是毛泽东的失误。他误解了周恩来，才导致了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但即使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也从未想要从根本上打倒周恩来，而只是要批评周恩来的所谓“错误”。正因如此，当江青趁机向周恩来发难搞得过分时，毛泽东又出面解脱了周恩来。而且，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把权交给江青的意思，相反倒是邓小平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冲破阻力，率团参加特别联大，并与基辛格会谈

在周恩来挨批之后，江青一伙更加有恃无恐，开始向党内的务实力量反击。不久，他们又借“蜗牛事件”发难，要跟美国人斗，企图在外事口打开一个缺口。

1973年底，四机部根据中央的决定，为了发展中国的电视机制造业，派了一个代表团赴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准备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美国康宁公司赠送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造型工艺品作为纪念。在美国，蜗牛工艺品象征幸福、吉祥，常常作为礼品赠送，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可是，1974年2月，四机部某设计院的一个青年干部，写信向江青反映考察团接受美方“蜗牛”礼品。

江青接信后，决定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其实她本人也在文件上签字同意）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崇洋媚外”。2月10日，她到第四机械工业部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要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抗议”，并提出要退回礼品，中断项目。周恩来得知

此事后,为了避免无端地造成一场国际纠纷,立即组织外事部门查清了事情真相,并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使江青的阴谋败露。他于2月18和19日两次指示外交部对此事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定夺。2月21日,外交部上呈《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认为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议对此礼品不必退回和交涉。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并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召开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⑭

在这之后,由于周恩来重病在身,外事工作,特别是对美外交,逐渐转由邓小平主持处理。这是一直试图干预外事工作的江青集团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1974年3月再次挑起事端,竭力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定于4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⑮

中国方面对此次大会十分重视。原因之一是由于这次特别大会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并且是由发展中国家倡导召开的。而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外,在大会召开的前两个月,毛泽东于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⑯这一重要的论点需要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向国际社会加以宣传。^⑰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⑱显然,在周恩来病情渐渐加重的情况下,毛泽东是想用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

在此背景下,外交部于3月22日向周恩来上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理由,反对由邓小平率团前去。24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报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⑲毛泽东当日圈阅同意。

但江青阅后坚决反对,并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钓鱼台

十号楼，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外交部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试图阻止邓小平率团出席会议。王海容向江青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特别联大，已有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而且外交部的请示报告已经周总理批准和毛主席圈阅同意，外交部无权收回报告。3月25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威逼要外交部马上撤回请示报告，王海容每次都阐述了不能撤回的理由，并且说：“我只是负责主管礼宾的，凡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报告，都不能撤回。”在遭到拒绝后，江青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王海容：“你昏了头，脑子僵化。”王海容意识到江青可能还要继续纠缠，于是向毛泽东报告了关于江青四次电话威逼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的情况。^⑮

毛泽东托王海容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将此意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⑯周恩来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

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第二，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第三，开创外交工作的新格局。周恩来还说：“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要开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在政治局会议进行过程中，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前来列席。王海容、唐闻生刚进入会场，江青就质问王海容说：邓小平去联合国，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外交部的意见？王海容答：请示报告是外交部写的，已经周总理批呈毛主席圈阅同意。主席今天中午还说，小平同志出国是他的意见。休息时，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会场旁边的小房间里，再次施加压力，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还说什么国外的事情相对次要，邓小平要留在国内，等等。王海容、唐闻生对江青的纠缠和压力不予置理。回到会场后，江又大吵大闹，蛮横训斥王海容、唐闻生。王海容当场同江青顶撞起来。^⑰

当时，除江青以外，与会者的绝大多数都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为此，江青继续纠缠，搅闹政治局，声称对邓小平出国一事“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并试图要周恩来在报告中写上她的保留意见。周恩来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了解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十分生气，致信江青，口气严厉地指出：“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

要反对我的提议。”^⑫

当晚，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主管批林批孔的七人小组会议。会上，江青被迫表态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⑬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邓小平开始筹备率团参加特别联大的工作，而江青由于受到毛泽东的警告不得不暂时保留意见。赴联大的第一次筹备会在邓小平的住处花园村举行。外交部长乔冠华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邓小平指出：“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为此，他集中精力组织联大会议的发言稿的起草工作。他反复强调，要根据毛主席历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来写发言，要把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作详尽的阐述。邓小平和外交部的“笔杆子”们在一起，对讲话草稿反复讨论修改。一次开会，在讨论到讲话稿的结束语时，邓小平思考着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作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篇讲演稿起草好之后，上报中央政治局通过，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阅后在稿件上批示“好，赞同”。^⑭毛泽东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

1974年4月6日，当邓小平一行启程之际，为了突出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意义，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四千多名各界群众一起到机场送行。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尽地阐述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

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作超级大国。”^⑩中国方面的新颖论点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反响和广泛关注。由于邓小平的这个著名发言,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开始闻名天下。

毛泽东把苏联和美国并列称之为第一世界不仅仅是由于这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他们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不过,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反对美苏争霸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国由于过去伸手过长,实力相对削弱,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处于进取的地位,对中国和世界人民来说,苏联的扩张更为危险。所以,中国当时的重点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毛泽东一贯重视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因此,他在划分三个世界时,把处于美苏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称之为第二世界,并把他们看做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7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毛泽东首创,但在以往的第三世界的定义中,第三世界往往仅被看做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力量,而毛泽东则赋予第三世界以新的更多的积极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虽然较穷,经济不够发达,但并不是一种可以任人宰割的力量,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的主力军。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政策而确立的。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苏联霸权主义已经取代美国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因此,应当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在当时不仅对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保卫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发展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首先,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之敌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已被认为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虽然对美国仍有批评)。^⑪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最后,毛泽东发展和充实了第三世界的内涵,为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此确定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其论点和论据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中国决策层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不管怎样,在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有利于扭转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在这次重要会议上,还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全面提出了中国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主张,他郑重指出: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的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个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

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付息，甚至减免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邓小平的重要发言实际上提出了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张，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这表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取得了共识。

邓小平的讲演十分精彩，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之时，会场更是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中国代表席位前顿时排起了长队，几十个国家的大使向邓小平表示热烈的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更少出现中断的场面。现在由于邓小平的发言出现这种盛况，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⑬许多国家的代表拥上前来同邓小平热烈握手。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电视台对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对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对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对中国要求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张，以及代表中国发言的邓小平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报道。一些报道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言人”。^⑭邓小平由此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和外交活动家。

1974年5月4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闭幕。由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大会正式通过了77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份文件充分反映了邓小平代表中国提出的主张，表达了发展中国家要求维护自己正当政治经济权益，改变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正义呼声。

邓小平赴美除了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之外，还肩负着与美方谈判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当时，美方已有倒退的迹象。但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在总体上仍然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尽量拉住美国以对付苏联，并试图防止美方从中美已达成的原则立场上倒退；同时也有意采取了一些冷淡措施，以表明对美方的不满。对此，美方也很着急，一方面让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返华，催促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返美^⑮；另一方面要求与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话。面对这种情况，中方决定邓小平不

去华盛顿,只在纽约见基辛格。^⑬

1974年4月14日,邓小平同基辛格在纽约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都在思考我们在北京签署的最后一份公报措辞。我们可以通过黄镇大使讨论公报的意思,或今年的晚些时候和你面谈,如果我履行我一年一度的北京之行的话。邓小平问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做什么。基辛格说,正如我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们正在继续裁减我们在那里的驻军。我们正在研究怎样使最后一个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实现的办法,但尚未形成整体的想法来。基辛格的这番话显然是搪塞之词。对此,参加会谈的中国副外长乔冠华指出: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定了它的语言。其主要意思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那些。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方式为基础。其他方式都不可能。所以,我还可以说,关于我们两国关系的现状,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关系应该前进,而不应该后退。最后,邓小平表态,关于这个问题(指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两点。第一,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是,第二,我们对这个问题也不着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向你们提起过的。^⑭

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回国后,开始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74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⑮由此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和重视。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年9月18日。

②《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日。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④吴德:《庐山会议与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7页。

⑥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11页。

⑦1968年春,在外交部和陈毅外长受到极左势力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外交部91位干部联名写了一张保护陈毅的大字报。当时被称为“九十一人大字报”。

⑧符浩:《风雨沧桑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⑨指王力、关锋、戚本禹。

⑩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的讲话,1971年11月4日。

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2页。

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 ⑬引自张茜回忆整理的《记毛主席的谈话》。
- 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8页。
- 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4页。
- 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3页。
- 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
- ⑱《人民日报》，1971年10月5日。
- ⑲魏史言：《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 ⑳魏史言：《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67页。
- ㉑《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 ㉒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610页。
- ㉓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3年9月16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4页。
- ㉔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续），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
- ㉕《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3页。
- ㉖宫力：《毛泽东与中美外交风云》，红旗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
- ㉗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续），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
- 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5页。
- 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5页。
- ㉚宫力：《毛泽东与美国——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 ㉛参见魏史言：《黑格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2页。
- 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505页。
- ㉝参见魏史言：《黑格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8—79页。
- 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506—507页。
- ㉟周恩来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1971年12月2日。
- ㊱Richard M. Nixon, 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G.P.O., 1972), Vol.3, pp.26-37, pp.35-36.
- ㊲《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
- ㊳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 ㊴王永钦：《打破坚冰的岁月》（六），《党史纵横》，1997年第8期。
- ㊵Allen S. Whiting: Taiwan: Trends and Prospect, Asian Society, March, 1978, p.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513页。
- ㊶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 ㊷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
- ㊸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 ㊹详见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9页。
- ㊺外交部的通报稿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

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注释1。

④⑥ 1972年3月6日,毛泽东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四个单位拟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似可不必这样编发,近似张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92页。

④⑦《对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通报稿的批语》,1972年3月6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91页。

④⑧《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1972年3月7日。

④⑨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开辟了巴黎秘密渠道作为中美进行联系的新地点。当时,中方担负这项秘密使命的是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美方的联系人是美国驻法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A. Walters)。利用这条渠道,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谈。在此期间,基辛格曾利用参加巴黎和谈的机会,与黄镇进行三次秘密会谈。

⑤⑩在此之后,中美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取代了中美巴黎公开渠道。

⑤⑪ 1972年6月19日,基辛格第四次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美苏最高级会晤和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

⑤⑫中美在纽约的接触始于1971年11月。当时,基辛格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会见,开辟了纽约渠道。有关情况详见William Burr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48-57.

⑤⑬原来中国有关部门曾拟定由李梦华担任团长,上报周恩来后,改为庄则栋任团长。

⑤⑭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详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⑤⑮有关数字转引自尼克松总统致送国会的报告:《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1973年5月3日,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106页。

⑤⑯ 1972年5月18日,经过专家会诊,正式确认周恩来患了膀胱癌。

⑤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4页。

⑤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0—521页。

⑤⑲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25页。

⑥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235页。

⑥②“邓、毛、谢、古”,即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⑥③这个批语曾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转发,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⑥④转引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1页。

⑥⑤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8—569页。

⑥⑥《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⑥《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⑦在1971—1972年间,中国曾把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视为同美国改善关系的首要障碍,而把台湾问题当作第二位的障碍。毛泽东当时曾说:“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⑧《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的四次限制性会谈记录》,1972年2月22—2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7页。

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页。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

⑪《公报》,1973年2月22日,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9页。

⑫实际上,中国方面早在1971年5月就设想过,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能完全满足中方条件,“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

⑬中方对苏联增兵的估计,见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⑭《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⑮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73年2月17日和基辛格的谈话中曾经说:“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⑯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⑰当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不仅参加过长征,当过将军,而且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少有的中共中央委员。

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2页。

⑲当时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也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后来曾于1985至1989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⑳耿飚、姬鹏飞、王幼平、韩念龙:《怀念老战友黄镇同志》,《人民日报》,1990年5月3日。

㉑王永钦编:《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大事记》(四),《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5页。

㉒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2页。

㉓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

㉔官力、周敬青、张曙:《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2页。

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2页。

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

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3页。

㉙[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㉚官力、周敬青、张曙:《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㉛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页。

⑨②上述毛泽东的讲话详见《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1973年12月，以及《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1973年12月21日。

⑨③毛泽东同黎笋、范文同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6页。

⑨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357页注释1。

⑨⑤指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

⑨⑥指他与尼克松的会见。

⑨⑦指中国与西德建交事宜。

⑨⑧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的意见，详见《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1973年7月4日。

⑨⑨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6页。

⑩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357页注释1。

⑩⑪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2年11月12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9页。

⑩⑫参见基辛格著，刘丽媛等译：《动乱年代》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5章。

⑩⑬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368页。

⑩⑭周恩来同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0页。

⑩⑮《人民日报》，1973年11月15日。

⑩⑯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⑩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1973年11月17日。

⑩⑱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0页。

⑩⑲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11月28日，引自李捷：《从解冻到建交：1969—1979年中国政局变化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年1月，北京。

⑩⑳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3年11月18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⑩㉑周恩来对《外事活动简报》的批语，1973年11月13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⑩㉒李捷：《从解冻到建交：1969—1979年中国政局变化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年1月，北京。

⑩㉓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⑩㉔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289页。

⑩㉕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分三批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唐闻生和王海容讲了上述内容。

⑩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635页。

⑪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1973年11月2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67页。

⑫毛泽东同比兰德拉等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页。

⑬史实：《“蜗牛事件”始末》；《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18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0页。

⑭早在1974年1月底，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以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出召开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这个建议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响应。这样，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同年4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⑮《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

⑯由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对于中国外交的走向和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考虑派遣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讲台上阐述中国的外交纲领和方针政策。

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9页。

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页。

⑲刘华秋：《正义战胜邪恶——记围绕邓小平同志出国的一场斗争》，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8页。

㉑刘华秋：《正义战胜邪恶——记围绕邓小平同志出国的一场斗争》，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㉒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74年3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㉓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8页。

㉔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㉕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详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出版，第135—140页。

㉖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曾对美国总统卡特明确指出：“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见《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

㉗吴妙发：《外交独白——联合国纪事》，载符浩、李同成主编：《经天纬地——外交官在联合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㉘转引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304页。

㉙当时，布鲁斯和黄镇均不在对方首都。

㉚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㉛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353页。

㉜毛泽东同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9页。

第三章

主持对美外交谈判

邓小平是在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与曲折的复杂局面的背景下,介入并逐渐接替周恩来主持中美谈判的。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势头从1973年下半年之后,出现了削弱的迹象。这首先是由于美国国内出现的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的政治地位,使其很难在美中关系上有所突破。在此前后,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逆转,批林批孔恶化了国内的政治气氛,由于“四人帮”把邓小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以及党内高层的政治民主生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邓小平的处境十分艰难,发挥空间很小。此外,由于美国热衷于对苏实行缓和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批评也增加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仍然竭尽全力,排除干扰,坚持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坚持按美国曾经承诺过的“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同时着眼于世界格局,确保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坚持“日本方式”:反对美方“倒联络处”的方案

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面临着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由于“四人帮”在党内高层仍占据重要位置,并与邓小平形成尖锐对立,因此邓小平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与其周旋。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排除干扰,以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关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邓小平1974年5月14日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kiifar Al. Bhutto)谈话时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天下大乱’,

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都可以来，多做工作，表示欢迎。”^⑥

此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1974年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时，对一年前中国政府提出的“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方针涵义重新做出解释。他说：“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如果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和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要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的一套马上搬过去。”^⑦

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George Bush）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⑧

11月2日，邓小平会见布什，有针对性地指出：“双方肯定的是，要沿着上海公报的路线发展，肯定了这一点，有些问题总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办法的，一时条件还不成熟，可以慢慢来。我们注意到福特总统曾强调在对华政策上的连续性。”^⑨

福特政府上台之初，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他于1974年10月25日签署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利”。^⑩但在此之后，就不再有大的举动。福特此时对中国的战略动向不太摸底，希望了解中国的想法，因此他决定派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七次访华。

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就基辛格访华向毛泽东请示。邓小平告诉毛泽东，现在世界舆论都说中美关系冷淡了，这一次基辛格要得一个“中美关系不错”的印象，他要做的文章主要还是台湾问题。毛泽东表示：台湾现在不要好。他要我们不用武力，我们不干。相反，它欠我们的账。美蒋条约让它在那里，等待世界有个大变化，到那时候才能解决。^⑪

11月17日，外交部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中说：“美出于同苏争霸的全局，在战略上有求于我，所以，福特急于在今年内让基再来一趟，以保持中美关系的势头。”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提出：“我应邀请

美国防部长来访。”^⑫

但在实际上,中美关系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仅需要“世界有个大变化”,而且需要中美双方都“有个大变化”。

1974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度访华,但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周恩来此时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11月25日,邓小平陪同他在医院会见基辛格博士及其夫人和子女。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这次由邓小平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跟你们谈判,就给我一个休息的机会。^⑬他提醒基辛格说:“我们有条共同的战线,就是对付‘北极熊’。”“‘北极熊’主要是对你们的,不像你们所估计的。”对此,基辛格表示:“当然最终来说,它显然是针对我们的,但它的中间的步骤将如何,还得留待观察。”^⑭

11月26日至28日,邓小平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连续同基辛格举行了五次会谈。在会谈开始时,基辛格曾试图缓和一下气氛,他指着摆在他面前的三本厚厚的提要手册对邓小平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向你念一遍。”邓小平机敏地问:“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基辛格说:“有好几吨重。而且我另外还有一些。这仅仅是我们的开场白。”邓小平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对基辛格说:“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⑮

可是,随着会谈的深入,双方的态度都变得真的严峻起来。当谈到外界有很多看法,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冷淡了,而且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速度也已慢下来了时,邓小平说:当你们把一位大使派往台湾,当他们在美国又建立起几个领事馆的时候,有些猜测和说法是很自然的。对此,基辛格解释说:尤其是你绝不相信我们的一些行为是愚蠢和毫无计划的结果时,是这样的。领事馆的事也是过后我才知道。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说:就我们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看法而言,我相信博士和其他美国朋友对这个问题是熟悉的,这就是“日本方式”,在这方面,你们已经表达出由我们方面提出具体怎样做的方式的愿望。但实际上,我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已表明了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日本方式。我们方面也希望你们能向前迈出几步来。基辛格辩解说:我们有很多日本人所没有的具体情况。在我们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寻求同你们的原则相一致,同时考虑对我们自己也有必要的方法。^⑯

为了说明美方的论点,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

内存在着有一股亲台势力。因此,基辛格表示: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明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①7}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①8}

在谈到国际局势时,邓小平强调指出:苏联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它还针对日本和你们的第七舰队,针对你们的海空力量。如果他们打算进攻中国,正如毛主席和你所谈,想只用100万军队就占领中国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再增加100万,甚至这样也不够,因为如果他们下决心同中国打仗,那他们必须决心打20年。邓小平说:这就是中苏关系的秩序。至于苏联的战备重点,我们认为是“声东击西”——目标是进攻欧洲。我们有分歧也不要紧,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基辛格说:我想,战略形势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进攻东方,对西方也是威胁,如果他们进攻西方,对东方也是威胁。但邓小平认为:这个战略估计有它实际的一面,尤其是对西欧国家来说。基辛格表示:我相信,欧洲不会漠视发生在东方的进攻,你们也不会漠视发生在西方的进攻。邓小平说:任何地区发生的进攻,对其他地区也是重要的。但建立战略观点并做好战略准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你们的欧洲盟友而言。因为没有(这样的准备),他们就要受罪。我们说进攻重点是西方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略我们自己的防卫。^{①9}

在讨论双边关系时,基辛格认为:“首先要使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冷淡,而且比以前热烈。这样做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他进而提议,如中国认为可取,美方可考虑接受一项关于福特总统访华的邀请,美国设想福特明年下半年访问。对此,邓小平表示:“如果福特总统有愿望来中国访问,我们表示欢迎,对中方来说,任何时间都合适。”^{②0}于是,双方达成此次中美会谈的唯一成果:即美国总统福特于1975年12月访华。

当时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水门事件刚过,共和党的伤痛未消,福特政府处于弱势地位,

政治基础不稳固,而美国国内亲台的保守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福特不愿过分得罪他们。此外,197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福特为实现连任的目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从国际因素看,一方面,随着1973年1月巴黎协定的签字,美国已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不再求助于中国;另一方面,以美苏于1972年签订了反导条约为标志,美苏关系有所缓和,美国外交的重点是谋求美苏继续缓和,由此减弱了美国对尽早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兴趣。因此,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当时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一个令中方失望的事实。

1974年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中美关系作了回顾,并再次重申了中美建交的基本条件。他认为:“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近三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正常的。当然,步子迈得不大,主要原因是台湾问题。上次基辛格博士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不能考虑任何别的方式。‘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就我们来说,都不能接受。我们对自己的安全并不担心,当然,讲原子弹,我们有一点,但那个东西不顶事,甚至将来,我们也不会同美国、苏联两家比,不会进行竞赛。”^④这番话表明了中国的鲜明立场: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如果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基本条件,中国宁愿等待,但绝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

排除“四人帮”的干扰：“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以及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建树,打乱了江青企图“组阁”的部署,由此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和恐慌。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院治疗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有恃无恐,经常私下串联,在政治局一哄而起向邓小平发难,把党内生活搞得乌烟瘴气。江青一伙的专横跋扈,以及不正常的宗派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众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江青

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说道: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毛泽东紧叮了一句:当众说的!江青发誓说:说了算。毛泽东说:孔老二讲的,言必信,信必果。接着,毛泽东特意对政治局的同志说:听到没有?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江青说:不大好就改。毛泽东对江青心中有数,说:你也是难改呢。江青说: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毛泽东说:不要就好。毛泽东指着江青说:此人一触即跳。江青为自己辩解说:没有跳。毛泽东说:我讲你的脾气。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时,江青狡辩说: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毛泽东马上警觉起来,说: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②

这是毛泽东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青搞上海帮,即“四人帮”的问题。这番讲话,对于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一个鼓舞,增加了他们抵制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信心。

江青一伙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并未收敛,他们阳奉阴违,继续把邓小平当作由他们“组阁”的巨大障碍,必欲早日除掉而后快。随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开始提上中央的工作日程,他们自认为有机可乘,加紧地下活动,企图实现由他们进行“组阁”。由此引发了一场党内高层的激烈斗争。

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短兵相接已是不可避免。

1974年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要告诉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住院的情况下,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的重要构想之一。当时,王洪文在北京做了电话记录,马上通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

江青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因为如果邓小平当上第一副总理,实际上就等于是名正言顺地确立了今后主持政府工作的地位。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10月6日晚,她不顾周恩来的病情,跑到北京三〇五医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一谈就是整整两个钟头。③六年后,王洪文在法庭上提到这件事时回忆说:“政治局开会之后(1974年10月6日),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

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⑳

正当江青一伙频繁串联,密谋对策之时,中共中央于1974年10月11日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㉑江青集团心急如焚,更有了紧迫感,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们决定利用“风庆轮”事件发难。

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1974年5月首次远航欧洲,并于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当江青从10月13日的新华社内刊《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并且得知:受交通部派遣、在风庆轮协助工作的副政委李国堂和政治干事顾文广,拒绝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之后,就蓄意扩大事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邓小平。

1974年10月14日,江青在一份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杀气腾腾地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她蛮横地要求“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示,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而邓小平只在上面画了个圈,周恩来也仅仅批了“已阅”二字。^㉒

10月1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拿出“风庆轮”的材料,质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冷淡地表示:我已圈阅过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江青又质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忍无可忍,对江青说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一帮人一听就恼了,一拥而上围攻邓小平。会议已无法正常进行,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

当晚,江青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她的住地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江青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分析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张春桥还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江青等人密谋的结果是,由王洪文出面,马上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

的状,其目的是,在毛泽东面前搞臭邓小平,使他不能工作,更不能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18日,江青又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同志说,主席不久将在外地会见外宾,你们也要去参加有关工作,所以找你们来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江青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为了进一步达到恶人先告状的目的,江青还造谣说,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等等。她耸人听闻地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²⁷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悄悄乘专机飞到长沙。下午,王洪文按照他们4人密谋的意图,向毛泽东诬告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说,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又着力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企图实现由他们“组阁”的目的。然而,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并不轻信,反而对他和江青一伙的非组织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毛泽东当即警告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小平同志会打仗,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²⁸

王洪文在长沙告状碰壁,当天下午返回北京,但他并未听从毛泽东的告诫,与江青脱钩,而是更加紧密地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加紧策划篡党夺权。

当天晚上,这四个人再次汇集在江青住处,并把将要和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去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企图让王、唐继王洪文之后再赴长沙向

毛泽东状告邓小平。张春桥居心险恶地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开支和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搞“崇洋媚外”造成的。^②他还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抗争比作“二月逆流”。

10月19日,江青又要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一次“二月逆流”。王海容、唐闻生去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表示,他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这件事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问题。^③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如实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对江青的行为表示愤慨,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问题,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毛泽东指示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④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⑤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王洪文的告状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表示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⑥

11月6日,负责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并且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看信后批示:“同意。”^⑦至此,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

“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⑤

然而，江青一伙仍不甘休。1974年11月12日，江青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建议由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这封信更加暴露了江青企图“组阁”的野心。

当天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⑥

同一天，毛泽东还在长沙接见了邓小平，对他表示了支持。毛泽东在问起10月17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时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毛泽东对此表示肯定，说：“好！”邓小平解释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明确表态：“我赞成你！”邓小平汇报说：“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他们（用手指王海容和唐闻生）都不高兴。”邓小平进一步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邓小平谈到对他的工作安排，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表示：“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了。”^⑦

面对这种局面，江青还是不死心。1974年11月19日，她又给毛泽东写信说“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并伸手要官，说什么“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地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⑧

第二天，毛泽东复信给她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⑨

江青见自己要官不成，又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建议要王洪文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识破了江青的用意，当即指出：“江青

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决心已定,坚决不让江青染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让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他由周恩来主持安排。^⑩

由于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继续朝着有利于党内健康力量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带病主持了人事安排工作。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⑪

江青一伙“组阁”受挫,又极力要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插到文化、教育、体委等部门的领导位置上去。但这也不能完全由着他们。周恩来、邓小平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教育部位置重要,不能用江青等人提名的迟群,遂决定提名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长。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在会见外宾结束后,邓小平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の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⑫

1974年12月23日,在叶剑英的周密安排下,周恩来抱病飞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到达。

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再次批评了江青一伙的宗派活动。他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要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王洪文十分尴尬,涨红着脸,点头说:“以后不搞了。”当谈到小平同志时,毛泽东称赞说:“他(指邓小平)政治思想强, POLITICAL (政治) 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接着,毛泽东再次提议说:“我看让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写到此处,总理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泽东就把笔放下了。毛泽东还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又不告诉我。”^{④3}

12月24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冷淡地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两本。我也是啊。”^{④4}

周恩来回到北京之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其中提到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是讲缓和越要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④5}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④6}

1975年1月1日,邓小平到医院与周恩来进行了单独会谈,并一同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在12名副总理中名列第一位。此外,还通过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周恩来在10日的会上讲话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④

在毛泽东确立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政治基调下,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于1月13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⑤的宏伟目标。关于中美关系,报告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⑥

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⑦

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2月1日举行的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

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同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⑤会上，邓小平也讲了话。

2月2日，周恩来就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致信毛泽东，其中提到“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⑥

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从而确立了邓小平主持国务院领导机构日常工作的地位。

江青眼看邓小平脱颖而出，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地位变得比文革前还高，权力比文革前还大，一时气急败坏。四届人大开过不久，她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大骂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⑦

江青果然于心不甘，也并不认输，她变换策略，又提出要批判“经验主义”，借此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借讲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现在，“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同一天姚文元也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歪曲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初，江青一再宣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中旬，江青又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讨论，并主张“交锋”。^⑧

邓小平看穿了他们的用心，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于4月18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动向，并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的看法。毛泽东还在会见金日成时指着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

们要他。”^⑤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⑥这个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一伙大反“经验主义”的不满和对邓小平的支持。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4月27日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批评了江青、张春桥一伙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以及“四人帮”宗派活动的事实,提出质问。会后,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以汇报为名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前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⑦

江青还亲自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⑧

这表明对立双方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5月3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⑨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下写出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他接下来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在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后,他说:“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⑥

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了长达两个小时时间,再次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遏制了江青等人的发难,这对邓小平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邓小平访法,着眼于国际反霸格局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之后,法国的动向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1974年5月,德斯坦在竞选中获胜出任法国总统后,提出“世界主义”的外交思想,更加强调欧洲的联合,对苏联实行“防务加缓和等于安全”的政策。他认为中国是平衡美苏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法中关系有利于增强法国在对美对苏关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牵制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因此,他上台后频频向中国发出了友好的信号。

1974年10月1日,德斯坦打破法国外交礼宾惯例,亲自出马参加中国驻法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法方还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了希望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法国的意愿。

中国方面注意到了法方的信号,并且认为,法国在西欧影响较大,为了鼓励西欧联合反霸,可以接受法国的邀请。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同意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法国。

1975年5月中旬,邓小平正式访问法国。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贯彻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首次出访西欧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国方面对邓小平访法十分重视,接待规格很高。按法国礼宾惯例,只有国家元首访法才在抵达机场时发表讲话,但法国总理希拉克亲自出马前往机场迎接并发表欢迎词,还请邓小平致答词。法方原来安排邓小平副总理一行下榻坐落在协和广场的克里翁饭店,后来总统办公室主任告知中方:“由于德斯坦总统对中法关系的关心和对邓副总理本人重要性的重视,总统个人邀请邓副总理和他的亲密助手下榻马丽尼国宾馆。”这是通常只有国家元首正式访法才有资格下榻的国宾馆。法方还安排邓小平与德斯坦总统正式会谈两次,与希拉克总理正式会谈一次。这主要是出于对中法关系和邓小平本人的重视。^⑥

邓小平与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总理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了国际重大问题和双边关系。关于世界局势和欧洲问题。法方表示,法国的欧洲政策是,首先推动政治统一,然后搞军事统一,长远目标是建设独立于超级大国的、拥有自己防务手段的欧洲。在实现防务联合之前,法国要加强本身独立的防务。邓小平向法方指出:美苏要称霸世界,不争夺欧洲不行。欧洲自己要团结强大起来,这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欧美应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只有平等的关系才是可靠的。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德斯坦表示支持在国

际上建立新的经济平衡,并倡议召开三方能源会议,但遭美国反对,希望中国支持。邓小平表示,中国支持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经济秩序,建立一个合乎现在实际的新经济秩序,支持法国的主张,采取对话方式解决能源和原料问题,赞赏法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关于双边关系,希拉克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突出两国关系,以使法国摆脱一点美苏,并借助中国发展同第三世界关系。邓小平代表周恩来总理邀请法国总统、总理、外长访华。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今后根据需要进行不定期会晤。^②

在会谈中,邓小平没有用稿子,完全是即席发挥,不仅论述深刻,而且针对性强,常常使法方人员频频点头,表示赞叹。例如,德斯坦认为,现在美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战略平衡,但在军事手段方面,美国仍比苏联强些。邓小平针对这一观点,以美苏1963年7月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1972年第二个核协定(即《海参崴协定》),每次苏联都利用机会从劣势达到了相对接近美国的水平为例,指出,美苏之间的核竞赛究竟是向上平衡还是向下平衡?德斯坦听后说:当然是向上平衡。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苏联不是为了在全球有朝一日有所企图,为什么除了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军队人数也在成百万地增加!有那么多武器,总有一天手要发痒的。谈到美欧关系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告诉美国人,我们不喜欢“保护”两个字,究竟是美国保护人家还是美国也需要人家保护?究竟欧洲需要美国,还是美国也需要欧洲?如果是互有需要,美国就应平等待人,只有平等伙伴关系才可靠。这段话引出了德斯坦的内心话。他说:美国还是以超级大国自居,总要替别人作出决定……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平等伙伴关系。谈到美国的战略时,邓小平形象地说,美国是用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顾此失彼。妙语解颐,法方人员发出会意的笑声。这句话在访问过程中多次为法方人员引用。德斯坦还抱怨美国不理睬他关于召开三能源会议的倡议,挖苦地说,基辛格可能是很好的外长,但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邓小平说,像这样的问题不是能从外交家的角度解决的,甚至不能从经济角度解决,要从政治角度来解决,好的外交家必须是好的政治家。德斯坦频频颌首称是。法方高度评价邓小平这次访法及其会谈成果。希拉克总理说,德斯坦总统认为邓小平同他的会谈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邓小平介绍了中方对苏联的看法,总统对此很重视。^③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停滞的情况下,邓小平对法国的成功访问,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外交在西欧的局面,增加了中国在对付苏联威胁方面的

回旋余地。

在邓小平访法期间,中央政治局于5月13日召开会议,王洪文正式通知政治局,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的全体会议,待邓小平访法回国后再择日举行。这预示着邓小平的地位还要进一步上升。

果然,邓小平回国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在此背景下,5月27日,根据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4月27日批评“四人帮”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6月3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④在会上,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一些检讨。王洪文说:“去年十一月份,江、王、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江青则表示:“二十七日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⑤

6月7日,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情况。

毛泽东肯定政治局会议“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邓小平反映:“他们最后否认有‘四人帮’。”毛泽东说:“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毛泽东认为“风

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邓小平说:“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毛泽东表示:“没有大问题。”^⑥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⑦

不久,邓小平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应对 1975 年的中美外交僵局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所要面对的不仅有国内的一大堆难题,在对美关系方面更是困难重重。此时,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陷入了停滞的局面。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危机加重,右派势力抬头,福特政府处境更加困难,他在一些势力的压力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台关系。

进入 1975 年,中美关系即便在一些美国高层人物看来也是进展得太慢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 1975 年 2 月访华之后警告说,美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和防务关系是有缺陷的。他向美国参议院汇报说:“在对待亚洲局势的一个基本现实方面,我们落在一百个国家的后头。我们仍然同一种正在迅速成为历史的过去保持着联系,而这种过去同美国当代的需要几乎是毫不相干的。”^⑧

曼斯菲尔德认为,美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两者兼得。我们不能在加强和台湾自封的中国政府的联系的同时,指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新的关系。‘上海公报’是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安排而设计出来的;它并没有说我们的对华政策可以一直是双重性的、爱恶并存的”。^⑨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击中了福特对华政策的要害。福特政府企图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不偏不倚,同时修好,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气氛。

不仅如此,由于美国方面屡次违反上海公报的原则,从而使中美之间在 1975 年产生了一连串的纠纷。其中第一起大的纠纷是由于美方无理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而引起的。

根据中美双方商定的计划,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定派出中国艺术团赴美访问演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接待。事先中国艺术团将演出的节目单、预备曲目以及剧照等陆续提供给美方接待单位,并预定于1975年3月29日启程赴美。然而就在中国艺术团准备就绪即将动身之际,美国国务院做出决定,要求中国方面取消艺术团预备曲目中的一首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声称美方不能同意将提及解放台湾的歌曲列入节目中去,并限期中方给予答复,否则就通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的访问演出。客观地说,在中美关系由于台湾问题陷入停滞的时刻,中方列入这首歌的确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但这毕竟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方面没有理由指手画脚,而且美国方面所采取的那种不容商议的强硬态度也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3月27日,美中关系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该委员会人士说:据信基辛格做出了这项决定。

3月28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就此事给基辛格写了抗议信,并要求基辛格重新邀请中国艺术团访美,但没有结果。4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谈话指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对我们是个原则问题。美方的要求与这一原则是不相容的,中方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美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如果不是从上海公报后退,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国艺术团把这首歌列入预备曲目。由于美方坚持其违背上海公报精神的无理主张,中方只能同意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的访美。^①

更令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快的是,美国一方面对中国艺术团问题采取强硬立场,不惜取消预定的交流计划;另一方面却对来自台湾以及美国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妥协退让,小心翼翼。

1975年4月5日,台湾当局领导人蒋介石在台北逝世,终年87岁。美国方面原来打算派农业部长巴茨前往出席葬礼。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一场争论。台湾当局表示,任何在级别上低于副总统洛克菲勒或国务卿基辛格的人出席葬礼都是对蒋介石的侮辱。他们还特别指出,在两周前,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曾参加过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的葬礼。^②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等右翼势力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福特改派洛克菲勒率领一个九人代表团赴台湾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这是个重大的妥协,因为这样一来,洛克菲勒就成为自从70年代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以来,以政治身份去台北的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

这也是美国向台湾所作的一种姿态,用以在台湾逐渐对美国失去信心的时候,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抛弃它。

1975年5月6日,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保证,他将信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并特意提到台湾。他说:“对台湾的义务——包括规定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岛屿的安全条约——是有利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②这番表白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却使台湾当局备感欣慰,台湾当局的发言人说这种“及时的保证证明,美国并未忽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③

福特政府的上述立场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暗淡。因为,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极为敏感的。任何旨在加强同台湾联系的举动都必将被视为是制造“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

1975年6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表明了中方的强硬态度,他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要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废约、断交,其他方式,我们不能考虑。‘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也知道,有人有这么一种设想,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不管以任何形式要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不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不能采取别的立场,不能从上海公报的立场后退。中国统一的问题,解放台湾的问题,我们也是尽力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至于用什么方式,和平的或非和平的,那是中国的内政。”^④

1975年9月,中美之间又起波澜。根据中美双方商定的双边交流计划,美国市长代表团原定于9月份来华访问,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接待。在获悉美方提出的代表团正式名单中包括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后,中国方面感到为难。因为,圣胡安市市长赞成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又一个州,而中国方面如果默许圣胡安市市长包括在美国市长访华团之内,就意味着中国对这个问题表了态。于是,中方本着协商的精神向美方提出,由于波多黎各的特殊情况,圣胡安市市长参加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是不合适的,中方不便接待,请美方改换他人。本来中国方面对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是抱有诚意的,希望用换人的办法绕开这一难题,使访问如期成行。但是,美方不仅顽固坚

持自己的主张,还要把中方不能接受的立场强加于中方。

9月8日,美方发表公报指责中方把代表团访问同波多黎各的地位问题联系起来,把政治因素引入了交流等,并且片面宣布取消这一访问。9月16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就此发表评论,驳斥了美国方面的立场,评论指出:“姑且不论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本身就是一项有政治含义的行动,把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列入代表团名单,挑起这场政治争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方自己。”评论认为,至于说什么中方干涉美方选择代表团成员人选的权利,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方总应清楚,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人员交往,一方提出人选理应征得对方同意。如果认为只要一方提出人选,另一方就必须接受,这是强加于人。评论进而指出:“在中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坚持这种主张,显然是不适宜的,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⑤

除了上述极为不友好的行为之外,美国政府还纵容和支持西藏外逃人员在美活动。其中有一个设在美国纽约的所谓“西藏办事处”,已根据美国“外国代表机构登记法”进行了登记,同时其“新闻公报”也在美国司法部注了册。这个由西藏外逃人员组成的所谓“西藏办事处”利用美国政府的纵容及其提供的“合法”地位,不断散发新闻公报,对中国进行种种诬蔑和攻击。早在1974年7月30日,中国驻美联络处曾就此事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要求美国政府做出解释并取缔这个所谓“西藏办事处”。但美方却以要进行调查为名,拖而未复。

在这之后不久,又有消息说,一个所谓“西藏歌舞团”将要到美国访问演出。1975年8月8日,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向美国国务院指出,美方这样做是违背《上海公报》精神的,重申要美国取缔“西藏办事处”,并采取措施制止“西藏歌舞团”去美活动。但是,美国方面却不肯改弦更张。9月24日,美国国务院在答复中方时声称,西藏外逃人员的这些活动都是符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的。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美国方面这样做是公然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原则,是露骨地干涉中国的内政。^⑥

上述事件对于本来已有所冷淡的中美关系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种种迹象表明,促使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似乎正在减少。曾经一度蓬勃发展的中美贸易也从1974年的97880万美元(贸易总额)减至1975年的46190万美元,1976年又减至33600万美元。其中中国大幅度减少了从美国的进口,而转向其他国家。这除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由于中国没有享受最惠国的待遇,美国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通常要比对日本、南朝鲜、

台湾或香港的同类产品高出一至五倍。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美国扩大贸易的积极性。

面对美方的倒退行为,1975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万斯为团长、罗森为副团长的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时,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缓慢表示不满。他指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之间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上海公报签订以后,确实我们的关系有了发展,除了贸易还有一些文化交流,但从上海公报签订后的前进步伐来看,进展是不大的,当然我们也有某种共同语言。在谈到日美安全条约时,他指出,我们是两条:第一条,从总的原则上说,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在外国建立自己的基地;第二条,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尊重现实,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我们理解。这些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的。^⑦

福特虽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迈出更大的步伐,但他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和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争取选票,仍想借助中国压苏联让步,以此打开美苏战略谈判僵局,实现美苏缓和。为此,他派基辛格于1975年月10月来北京,为其访华做准备。对此,毛泽东认为:福特、基辛格妄图否认苏联进攻重点在欧洲,渲染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目前的对华政策是以苏联的威胁吓唬中国,用一些先进技术和军事援助为诱饵,套住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因此福特决定按照计划在1975年访华。但他担心无功而返,反而会失掉资本,所以派基辛格第八次访华,为其访华做准备,争取在维持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下,在贸易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做些表面文章,发表一个可供渲染的公报。因此,毛泽东决定,仍利用美苏矛盾,贯彻“一条线”的战略,着重指出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对福特访问仍持你要来我欢迎,谈得拢可以、谈不拢也可以的高姿态,拒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重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原则。^⑧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75年10月20—22日在北京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四次会谈,着重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和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双边关系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策略上是多种多样的,那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

战略的。你们强调的是灵活态度。如果我们要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我们的态度从不僵硬。但我们认为,灵活是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我们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至于中国,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无求于人。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人很怕俄国人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⑨

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应该依靠我们自己独立的力量来对付苏联,我们从未对这个问题抱有任何幻想。我们把这一观点告诉了博士,也告诉了来访的美国朋友们。我们不依靠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核保护。我们依靠两件事:第一是几亿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如果苏联想进攻中国,那它必须做好打20年仗的准备。我们主要依靠小米加步枪。当然,这种小米加步枪与我们曾经在延安时代的小米加步枪是不同的。^⑩

基辛格听到邓小平的这番话感到相当悲伤而委屈。他特别提到,要不是因为水门事件,美国政府会推行尼克松将要推行的政策。接着,他为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作了详尽的辩护,并且争辩说:你们能够对我们的目标形成正确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认为我们采取的是一种不足道的善于机变的策略,那么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遗憾。你们不请求帮助,我们也不请求帮助。制定出正确的政策的基础就是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准确认识和双方都尊重对方国家的利益。^⑪

由于邓小平与基辛格的观点有所不同,10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半开玩笑地说:你已经和他(指邓小平)吵过了。基辛格连忙说:只是关于实现共同利益所采取的方式。^⑫

毛泽东批评基辛格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来北京,我们又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基辛格忙说:“我们来北京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手,也因为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的意见我们都同意。”毛泽东此时将了美国一军说:“靠不住!”“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我们是第五(指美国在美、苏、西欧和日本等国的战略地位中把中国排在最后一位)。”基辛格解释说:“我们在莫斯科得不到任何东西。”毛

泽东借机提出台湾问题说：“在中国可以得到台湾。”基辛格表示：“这个问题会在我们之间得到解决。”基辛格随后提出，美方准备在军事上对中国提供帮助。对此，毛泽东表示，军事方面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⁸⁸

由于美方不肯在台湾问题上迈出新的步伐，因此，邓小平在22日的会谈中表示，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比较适当的。对于中美会谈中的交锋，美国国务院官员后来评论说，中国“想使我们处于一种心理压力之下，即设法使我们想和他们建立关系比他们想和我们建立关系更迫切”。⁸⁹

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把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虽然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但双方出于各自内政外交的需要，都仍然希望保全中美之间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待将来条件成熟，最终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于是，便有了1975年12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中国之行。

从美国方面来看，一个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和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的中国的存在，仍然是美国世界战略特别是对苏进行牵制方面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美国认为，与美苏缓和取得的进展相比，美中关系有陷于停滞的趋向，这有可能对美国的“均势”战略产生不利的影晌。所以，即便是为了增强美国对苏谈判的地位，也必须进一步加强美中首脑接触。

对中国来说，为了抗衡苏联的威胁（此时中国对于爆发战争的估计有些偏高），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美国在中国“一条线”反霸战略中处于重要的位置。虽然中国对美国推行的“缓和”政策不满，但仍然希望通过中美高级会晤规劝美国放弃对苏联的幻想。

此外，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可能不会一步到位，但可以通过会谈进一步探索解决办法，以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可以说，福特总统的这次访问是建立在两国对外战略上极为冷静而透彻的设想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中美双方对于这次访问都是非常重视的。

为迎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邓小平于11月12日向毛泽东请示。邓小平告诉毛泽东，现在世界舆论都说中美关系冷淡了，这一次基辛格要得一个“中美关系不错”的印象，他要做的文章主要还是台湾问题。毛泽东表示：台

湾现在不要好。他要我们不用武力,我们不干。相反,它欠我们的账。美蒋条约让它在那里,等待世界有个大变化,到那时候才能解决。^⑤

1975年11月24日,在福特总统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底特律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着类似的关切,即世界将不受军事力量或威吓——我们的许多联合公报称之为‘霸权’的支配。我们已申明,我们两国中无论哪一国都不应谋求霸权,每一国将反对其他国家要谋求霸权的尝试。我们坚持这项政策的决心不会改变。”但是,他又为美国的“缓和”政策辩护说:“我们也将避免不必要的对抗。我们不会改变我们要同潜在的对手们改善关系和缔造一种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努力。”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说道:我们对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异议——这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的一项原则。要解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剩下的分歧意见可能还得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政策的方向是明确的。基辛格表示,美国准备使中美关系变为“世界舞台上的一种长期的和建设性的关系”。^⑥

为了进一步强调中美之间发展关系的共同基础,1975年11月29日,美国总统福特在来华途中飞抵阿拉斯加停留时发表讲话说:美中两国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是我们找到了有着共同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对亚洲和平做出的保证也是基本的。我们将谋求加强这些谅解,并且进一步促进在互相尊重和互相和解基础上的关系。^⑦

福特正是以中美两国所具有的“共同点”作为他这次对华外交活动的后盾,踏上前往北京的途程的。这将是将近四年以来一位美国总统同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

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将如何接待福特是非常关切的,福特的助手们甚至把一年来哪一位中国官员到机场去迎接哪一位外国首脑列了一张单子。国务院的研究人员经过分析认为,凡是由中国负责日常领导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去迎接的外国首脑都是受到中国重视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表现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这位外国客人,能否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据此,美国方面是按照福特总统将由邓小平副总理来迎接做准备的。如果主要欢迎者的地位低于邓小平,那将意味着一种外交上的故意冷落。不过美国人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或许要算是世界上最精明的外交家了。因为中国的惯例是,事先决不宣布将以谁为首去机场迎接客人,也不事先透露谁将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一次福特总统来访也不例外。

1975年12月1日下午,美国总统福特的专机在几乎看不到蓝天的灰蒙蒙的天空下抵达北京机场。总统、总统夫人以及国务卿基辛格走出机舱,他们欣慰地看到中国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资深的副总理李先念和外交部长乔冠华已经在停机坪旁迎候。欢迎仪式同1972年2月迎接尼克松到达仪式一样的恰如其分,由于中美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机场上没有出现通常接待外国首脑的那种宏大规模。

当天晚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举行宴会欢迎福特总统。双方都利用这一公开场合强调了1972年上海公报所确立的反对霸权主义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向的重大意义,并重申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由于前一阶段美国方面迈出的步子不大,引起了种种猜测,福特总统特意说:“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正常化。”

然而,当邓小平谈到国际形势以及“缓和”政策的危险性的时候,场上的气氛有些紧张起来。邓小平以他特有的直率指出:当前,摆在中美两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国际形势。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邓小平认为:“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正是和平经念得最起劲的那个国家。”这显然是指苏联。接着邓小平着重点明中国对美苏缓和的不满。他警告说:“缓和”的辞藻掩盖不住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邓小平指出:山雨欲来风满楼,风刮得越来越急了,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关键在于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我们认为,指出战争的根源和危险,消除和平幻想,充分动员人民,做好一切准备,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霸权主义并不可怕,它本质虚弱,欺软怕硬,它到处扩张就孕育着失败。^⑧

邓小平的讲话显然是在呼吁美国要正确地理解形势,丢掉对“缓和”的幻想,同中国一起对付苏联的扩张。而且他还认为,苏联霸权主义外强中干,是可以被遏制住的。

福特在邓小平抨击“缓和”的时候,板着脸专心地谛听。^⑨他在邓小平讲话开始前一小时才拿到这篇口气强硬的讲话副本,但他决定不改动他自己准备好的那份相对温和的讲话。他在答辞中试图正面解释美国的政策,他说:世界使我们大家面临危险,但是也提供了机会。美国将既努力减少危险,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机会,而不抱有幻想。当前的形势要求力量、警惕和坚定性。但是,在我们继续决心反抗任何威胁别人的独立和幸福的行动

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实现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

邓小平和福特的讲话表明,中美在“缓和”问题上分歧较大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保持中美上海公报确定的方向,特别是在反对霸权或通过军事力量对邻国进行控制等方面也有共同点。事后,基辛格在谈到邓小平措词强硬的讲话时说:他们关于缓和问题的讲话是预料中的。^⑩福特总统也认为邓小平的讲话是可以接受的。^⑪

12月2日,毛泽东在他摆满书籍的书房中接见了福特和他一行的九名成员。在把全部美国客人介绍给毛泽东之后,基辛格、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洛德随同福特留下来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从而使福特此行得到了他所期望得到的接待。毛泽东就国际形势与战略问题发表了意见,进一步批评美方的倒退。福特提出:“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回答:“就是,君子协定。”^⑫事后,福特称这是“有意义的交谈。这次交谈既讨论了我们双边关系问题,也讨论了非常广泛的国际局势问题”。^⑬

此外,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于12月2—4日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

关于国际战略问题,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邓小平指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当然有双边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但第一还是国际问题。现在摆在世界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特别是战争危险问题。坦率地说,就是面临苏联扩张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对付扩张主义讲究策略是必要的,应该有一系列的策略、正确的策略。但策略是受战略指导的,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的正确策略应是灵活的、多方面的,策略超过某种限度会影响到战略本身。”^⑭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理解总统说在大选期间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新行动。我们多次谈过,我们有耐心,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一直是把国际问题摆在第一位,台湾问题是第二位。”福特表示:“我感谢你们对我们美国国内的政局表示理解,但我仍要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的义务。为了记录在案,我重申一下尼克松总统1972年来访时就这个问题所表示的五点。……我正在执行尼克松总统承担的义务。对中国的耐心,我是理解的,并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我还表示,在明年大选以后我们将处于朝着仿照日本的安排更具体地朝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行动的地位。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对此,邓小平说:

“我们注意到总统说在适当条件下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意表示。这也就是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要实现我们所说的‘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按照‘日本方式’,也意味着以往的经济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的内部问题解决。”但福特强调:“我们期待着你们政府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将会通过和平方式。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演变以外的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应当继续并加强,在文化、教育等交流方面应开展广泛活动。这有利于改善我们两国总的关系方面获得人民的支持。”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不让步,他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由中国决定。”^⑤

由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仍不愿意有所前进,中方也没有确定的时间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程继续拖了下来。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两国的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⑥

12月5日,美国总统福特结束了在中国为期5天的访问,从北京飞往雅加达。这次中美最高级会晤,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成就,但中美之间加深了相互了解。两国现存的关系将得到保持,并有所前进,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意义。虽然福特并没有同意中国对缓和的意见,但他在告别宴会上再次强调了中美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上的共同认识 and 共同利益,并且认为“这反映了作为我们关系的一个特点的现实主义”。^⑦可以说,美国总统的这次访华是旨在以积累的方式进一步改进两国关系。

福特总统在结束了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之后,到达美国的第50个州夏威夷。12月7日,福特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项政策纲领,称之为“新太平洋主义”。福特认为,世界大国在安全方面关切的问题在亚洲交叉在一起。美、苏、中、日是太平洋国家。西欧同亚洲有历史的和经济上的联系。太平洋的力量平衡对美国和对太平洋其他国家都是至为重要的。

据此,福特提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实行“新太平洋主义”的六个基本原则。其要点是:一、美国的实力是太平洋任何稳定均势的基础。二、同日本

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战略的一个支柱。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加强美国同这个代表着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伟大国家的新联系。四、美国继续与东南亚的稳定与安全有着利害关系。五、美国相信亚洲的和平取决于解决悬而未决的政治冲突。六、亚洲的和平需要一个反映这一地区各国人民愿望的经济合作结构。

这是美国总统根据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的新形势,首次明确地阐明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其主要目标是,在亚洲维持美、苏、中、日的力量平衡,反对特定的一国的“霸权”,不破坏均势。在美国的这个“新太平洋主义”政策中,加强同日本、中国的关系被赋予重要意义,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有利的。福特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存在着看法上的分歧,但是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有共同的关切和一致的意见。他还重申了美国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并且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成为国际政治形势中的“一个永久的特点”。福特认为,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这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各国人民”^⑧。此外,福特还重申美国在亚太以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反对霸权的立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认为美国对苏实行“绥靖”主义的疑虑。

正是本着长远的观点,着眼于大局,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仍然把对两国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对两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福特总统访华结束不久,1975年底,中国政坛风云突变,政治形势急剧向左转,再次出现动荡。进入1976年,先是1月周恩来逝世,接着4月,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始遭到公开批判。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在甚嚣尘上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改进中美关系已被放在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大批“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复辟”、“回潮”,等等。在美国方面,1976年2月中旬,福特总统在芝加哥公开表示,美国打算采用“日本方式”解决台北——北京问题。但是,福特的这一设想由于他在同年11月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失利而被耽搁下来。由于新政府上台后须熟悉一下过去的情况,因此,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基本上是维持原状,处在一种过渡性的阶段。

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威胁方面仍有共同点。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苏联一方面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由《真理报》出面发表文章,呼吁改善中苏关系,表示苏联在领土等问题上不对中国抱有野心;^⑨另一

方面又对中国进行露骨的威胁。10月14日,有特殊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在巴黎发表文章说,除非中国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更为和解的政策,否则将迫使苏联领导人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⑩对此,美国立即做出反应。10月15日,基辛格就此评论说,如果中国“受到外部一个大国的威胁”,美国认为那将是“严重的事件”。^⑪在另外一次谈话中,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对于任何通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来打乱世界格局的企图,美国不会不予以认真的对待”。^⑫这说明,中美两国业已建立,并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的战略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②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③美新处华盛顿1974年8月9日电。

④《福特总统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8月12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⑤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⑥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成员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1974年8月2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页。

⑦杨亲华:《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台工作》,《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2期,第21—22页。

⑧法新社北京1974年10月21日电,《参考消息》,1974年10月23日。

⑨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⑩这项法案解除了美国国会1955年1月通过的关于防卫台湾的决议案,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⑪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谈话,1974年11月12日。

⑫对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的批语,1974年11月2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⑬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3页。

⑭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⑮美联社北京11月26日电,见《参考消息》,1974年11月28日。

⑯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7页。

⑰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的方案。

⑱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⑲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6页。

- ⑲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 ⑳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 ㉑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的谈话，1974年7月17日。
- ㉒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8页。
- ㉓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一审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0页。
- ㉔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出版，第190页。
- 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9页。
- ㉖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0月18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4页。
- 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 ㉘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后果是，1975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仅为1.2%，而197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 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680页。
- 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0页。
- ㉛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的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5页。
- 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5页。
- 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2页。
- ㉞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6页。
- ㉟毛泽东关于不要江青组阁的批语，1974年11月12日。
- ㊱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1974年11月12日。
- ㊲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7页。
- ㊳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1974年11月20日。
- 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3页。
- ㊵事隔多年，邓小平回忆这段往事，还十分感慨。他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详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 ㊶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0页。
- ㊷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1974年12月23日。
- ㊸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2页。
- ㊹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毛泽东谈话要点，1974年末至1975年初。
- 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2页。
- 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90页。

- ④⑧《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
- ④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出版，第203页。
- ⑤⑩《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 ⑤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2页。
- ⑤⑫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1975年2月2日。
- ⑤⑬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据王、唐写的追记材料，1976年10月17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7页。
- ⑤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9页。
- ⑤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
- ⑤⑯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75年4月23日。
- ⑤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0—1171页。
- ⑤⑱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 ⑤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 ⑤⑳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1733页。
- ⑥①韦东：《邓小平副总理访法追记》，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 ⑥②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 ⑥③韦东：《邓小平副总理访法追记》，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3页。
- ⑥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5—1737页。
- ⑥⑤中央政治局批评“四人帮”的两次会议记录，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 ⑥⑥毛泽东同邓小平关于批评“四人帮”的一次谈话，1975年6月。
- ⑥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7页。
- ⑥⑧《华盛顿邮报》，2月4日，见《参考消息》，1975年2月21日。
- ⑥⑨曼斯菲尔德访华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见1975年5月4日《参考消息》。
- ⑥⑩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 ⑥⑪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 ⑥⑫美新处华盛顿1975年5月6日电，《参考消息》，1975年5月10日。
- ⑥⑬美新处华盛顿1975年5月6日电，《参考消息》，1975年5月10日。
- ⑥⑭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32页。
- ⑥⑮香港《大公报》，1975年9月17日，见1975年9月19日《参考消息》。
- ⑥⑯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 ⑥⑰邓小平会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时的谈话，1975年10月11日。
- ⑥⑱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 页。
- ⑧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3 页。
- ⑨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5—499 页。
- ⑩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3 页。
- ⑪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1 页。
- ⑫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16 页。
- ⑬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1975 年 11 月 12 日。
- ⑭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4—115 页。
- ⑮美联社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 11 月 29 日电，见 1975 年 12 月 1 日《参考消息》。
- ⑯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6—27 页。
- ⑰路透社北京 1975 年 12 月 1 日电，见《参考消息》，1975 年 12 月 5 日的报道。
- ⑱合众国际社北京 1975 年 12 月 1 日电。
- ⑲美联社北京 1975 年 12 月 1 日电。
- ⑳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2 页。
- ㉑美联社北京 1975 年 12 月 3 日电。
- ㉒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2 页。
- ㉓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2 页。
- 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 页。
- ㉕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9 页。
- ㉖福特关于“新太平洋主义”的讲话。详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7—130 页。
- ㉗苏联《真理报》，1976 年 10 月 1 日。
- ㉘ Victor Louis, “Moscow Is Waiting for Gesture from Peking”, France-Soir(Paris), Oct. 14, 1976.
- ㉙ “Secretary Kissinger's News Conference at Harvard, October 15”, State Bulletin, Vol. 75(November 8, 1976), p.579.
- ㉚ “Secretary Kissinger Interviewed on ‘Face the Nation’”, October 24, State Bulletin, Vol. 75(November 15, 1976), pp. 608–609.

第四章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思考与决策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发生巨变,中国共产党党内健康力量一举粉碎“四人帮”,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结束。在党内外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邓小平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并且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这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些深刻变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了新的动力。美国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重点和最大的对外开放的对象。这时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思考,既有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下,利用美苏矛盾,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方面;也有借助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几乎是同步,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再次复出,成为对美外交的主要决策者

“四人帮”垮台后,百废待兴。邓小平作为受“四人帮”迫害,并与“四人帮”进行过坚决斗争的主要代表,理应尽快出来工作,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

要负责人却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①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延续下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消极抵制。因此,邓小平的再次复出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得知“四人帮”覆灭的消息后,即致信汪东兴并转华国锋和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在信的最后,他用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②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二是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不容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解决这两件大事,中国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可是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却受到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压制和阻挠。于是引发出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在粉碎了“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强烈要求。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1976年10月26日,中央宣传部门在传达华国锋的指示时讲道: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③这个指示无疑给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然而,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压制不下去的。1977年1月,北京长安街和南京、广州等地相继出现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尽快复出。在此期间,党内高层一些老革命家也在积极活动,争取邓小平尽快复出。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李先念等曾多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尽早让邓小平出来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但华国锋态度消极,能拖就拖。

1976年12月10日,邓小平因病住进301医院。按当时的规定是要“保密”,但过了不久,消息还是不脛而走,引来不少老干部前来探望,反映出党心民心所向。他们都热切盼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并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住进了西山。叶剑英交代王守江同志(原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定期给邓小平送中央文件看。为了让邓小平早日复出,叶剑英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邓小平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

握在一起。^④

叶剑英还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⑤

随后，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叶剑英的建议得到李先念的有力支持。他说：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⑥但是，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却不表态。其实，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如果说华国锋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话，那么，当时与华国锋配合默契的汪东兴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旗帜鲜明地讲出了华国锋心里的话。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⑦

中央高层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巨大分歧表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是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终于引发成一场正面交锋。

为了控制局面，华国锋在会前曾向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企图回避让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但在起草报告时，叶剑英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予以尽快平反。

于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华国锋在会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为说明“批邓”是“必要”的，华国锋印发了一个“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

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国锋还说: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又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以种种理由拖延、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讲话引起不少与会者的不满。其中,一些老革命家挺身而出,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王震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邓小平。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⑧

陈云和王震坚持原则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共鸣,但由于陈云、王震的发言与华国锋和汪东兴格格不入,华国锋等人为了防止扩散,竟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会议简报。^⑨

不过,历史的潮流终究是阻挡不住的。由于邓小平复出已是人心所向,来自党内外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的华国锋已找不到理由继续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但他要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前按一个钉子。1977年4月7日,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写个说明,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坚决不肯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⑩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应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还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恰当,请将我的信转发全党。

邓小平的信,得到了党内多数同志的肯定和支持。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这是邓小平即将再次复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样,在经历了长达9个月的激烈斗争之后,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

面对全党同志的重托,73岁的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⑪这是邓小平一番交心的话,也是邓小平复出的宣言。

果然,邓小平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义无反顾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艰巨任务也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他此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中国的对美外交由此发生重要转变。

倡导对外开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动力

邓小平复出后,十分关注世界发展的大趋向,着眼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观察,尤其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和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路。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基本国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⑫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

谈会,并且表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⑬9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成果。”^⑭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进一步指出:“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指示被‘四人帮’歪曲了,他们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蠢的。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⑮9月29日,邓小平在同邓颖超一起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回顾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表达了急起直追的愿望。他说:“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1964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集中的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但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邓小平说:“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⑯

其次,邓小平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打开国门,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而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思想相互呼应,终于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重要基础。早在1977年5月,当时邓小平还未正式复出之前,他就告诫人们虚心记取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教训。他指出:“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⑰1978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他还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⑱此时,打开封闭的国门,实行对外开放

以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思路已日趋明确。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和走出国门的尝试。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余秋里为组长,顾明为副组长。同时,一批国务院高级官员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年5月2日至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在谷牧出访前夕,邓小平向他提出:要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①谷牧回国以后,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里谈到,西欧各国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②在谷牧访欧期间,当时联邦德国的两个州曾当场允诺向中国提供150亿—200亿马克贷款。^③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谷牧的访欧情况汇报。^④据统计,仅1978年,即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到达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8个国家。^⑤

随着对国外情况调研的深入,邓小平深切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已经大大落后了,其差距至少在15年至20年之间。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他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⑥的确,中国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因此,中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必要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所以,邓小平坚决主张:“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

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说:“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⑤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中国打开巨大的市场。从1974年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社会呈“滞胀”状态。^⑥为此,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为闲置资本寻找出路。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这就为中国吸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号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终于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上印发了谷牧出访西欧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注意。据于光远回忆说:“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⑦李先念在总结讲话里提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起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⑧

同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⑨这种转变的实质,是使中国的发展融入国际社会。

同年11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国际形势的发展,也要求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现在……第二世界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多做生意……甚至美国也要求同我们发展关系,多做买卖。西欧、日本和北美的资本家,看到我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都抢着和我们做买卖。像这样的大好形势,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要善于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⑩

在上述背景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开始了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有利局面的形成,也得力于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缓和所造

就的良好国际环境,它不仅使中国争取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友好相处的有利局面,改善了由于中苏对抗所带来的不利态势,同时也在开放意识、在现代化等方面,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在获得了较好的外部国际环境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同时也开辟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向万斯阐明中美建交的原则立场,批评美方“倒退”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思考,除了在经济上中国要加快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因素之外,还有从国际战略方面着眼的因素。他考虑的重点是国际政治力量的划分,以及如何制衡霸权、护卫国家安全等等。在中苏关系方面,自毛泽东逝世之后,苏联屡次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呼吁,但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诚意,相反,却通过其盟友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张并在中国边境制造事端,因此中国仍然把苏联看成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主要是出于对苏战略的考虑,邓小平强调在战略层次上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认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新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概括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定。”^④这个新的战略规定实际上就是指联美抗苏的“一条线”的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国需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

此时,美国政界发生较大变化。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虽然执政党变了,但在对华政策方面仍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它的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认为:“惟一障碍是我们不愿意放弃对在台湾居住的中国人民和平生活所承担的义务。”^⑤不过,卡特又认为,美国以前的对华政策受美苏对抗的心理支配太多,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动机除了牵制苏联外,还应包括加强西太平洋的政治和军事稳定。

在中国问题上,卡特多少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已意识到加强中美关系将有利于远东地区的稳定,并将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放弃美国对台湾所承担的“义务”,同时也

不愿意过分地刺激苏联。美国此时仍然热衷于推进同苏联的缓和。所以，上任伊始他的注意力首先被美苏关系以及恢复中东和巴拿马谈判的势头所吸引。在对华政策方面，卡特打算先熟悉和研究一下前任政府同中国对话的详细情况，然后再下最后的决心。

1977年2月8日，卡特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并且表示：“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③对此，黄镇表示，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只要美国准备执行几年前达成的协议，中国很愿意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当卡特提出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黄镇指出，只要华盛顿还有台湾的大使，这件事就没有可能，因为中国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美国必须做到断交、撤军、废约。^④

但在实际上，卡特政府在其执政的初期，没有把美中关系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考虑，而是把美苏关系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1977年4月15日，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卡特，阐明了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本看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主要条件，是中国人相信：本届政府对世界形势和战略均势的看法是成熟的、现实的。我们需要表示有决心保持强大，有决心对付苏联。还要使中国人知道：我们并不认为美中关系只有一个方向（即对付苏联），我们也要把美中关系放在重要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之中来看待。就正常化本身而论，我不认为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就非得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和安全。我们也不应该给自己规定人为的最后期限。^⑤在卡特政府执政的头一年里，万斯的对华主张比布热津斯基的主张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1977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阐述美国对外政策时，声称“已摆脱了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担心”，“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威胁已不那么尖锐”。^⑥因此，卡特认为美国与苏联要扩大合作面、缩小竞争面。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卡特重申了继续走向正常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是重要的。我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并且认为中国是保持全球和平的一支关键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紧密合作。我们希望找出一种能够弥合我们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的某些分歧的方案。^⑦

卡特总统虽然不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紧迫性，但他觉得有必要在大力推进美苏缓和的同时，继续探索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解决台湾问

题的新途径。同年6月30日,卡特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维持和平生活”。^⑧

卡特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是有其背景的。由于台湾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同美国有密切交往,美国有不少人对台湾有好感,尤其是在国会内,台湾有较大影响。台湾院外活动集团在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决策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卡特不敢轻易地得罪他们。这种顾虑使得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依然是举棋不定。

此时,中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底线,是坚守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1977年7月4日,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时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必须做到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缺一不可”。^⑨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⑩这时,他虽然准备接受中方关于建交的三项基本原则,但仍然坚持除非美国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美方单方面发表一个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他决不会答应实现与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⑪

在这种背景下,1977年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⑫

在邓小平看来,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

为了明确表达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会见了万斯,并且与他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

邓小平认为:“美国第十号总统备忘录就是美国绥靖主义的表现。尽管在美国哪怕只是少部分人有第十号备忘录思想的倾向,但打起仗来,把西德三分之一的领土让出去,实际上等于把巴尔干让给苏联,整个南欧将受到很

大威胁。”^④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自己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邓小平说:“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⑤

邓小平还告诫美国说:“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在那里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要看民族感情。”^⑥

由于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着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激烈辩论,万斯担心如果按照中国的条件建交势必会在国内引起争议,从而使卡特政府承担更大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最大限度地坚持美国提出的建交设想,不对中国做出本来可以做出的让步,也没有把美国方面原已准备好的承认公报草稿拿出来进行讨论。这样就错过了一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会。

8月25日,万斯国务卿在北京举行告别宴会。为了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变,万斯着重指出:在本届美国政府同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全面磋商中,我已经清楚地说明,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我们继续信守上海公报并承诺朝向关系完全正常化的目标前进。万斯还表示:我期待着在今后的岁月中进一步就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讨论。黄华外长在答辞中说,我们之间自然存在着原则分歧,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两国面临共同关切的问题,也有不少共同点。我们认为,只要双方都能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

做出真诚的努力,中美关系就一定会像两国人民共同希望的那样不断向前发展。^⑭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万斯离开北京之后,一些新闻记者发表了一些不甚准确的报道,说白宫认为万斯发现中国在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方面表现出了“灵活性”,并认为万斯的访问取得了“进展”。^⑮例如,法新社报道说,此间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中国人在同万斯先生会谈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他们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们理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万斯先生出访北京的目的已全部达到。重要的事情是使会谈的进程在经过两年的裹足不前之后重新动起来。^⑯还有一位名叫约翰·沃拉的外交记者在华盛顿写文章说,向总统诵读万斯关于中国之行报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看到了“进展”的迹象。

这些误传引起邓小平的严重关切,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不愿意被人指责在原则问题上丧失立场。于是,邓小平很快做出反应。1977年9月6日,他在会见美联社访华团时,坚决否认万斯访华使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实际上美国在关系正常化方面退步了。4天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再次指出:“万斯访问是一个退步,美国在玩弄中国和台湾两张牌,这是中国不能容忍的。”^⑰

1977年9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再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你们在政治上总想利用谈判来缓和局势。这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苏美有过三个核协议。第一次是1963年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核试条约,苏联利用这个机会跑了一步。那时他们同你们的差距相当大。第二次是1972年签订的第二个核协定。那时美苏还有相当差距。苏联利用这个协议又向前赶。第三次就是1974年海参崴协议,这时他们已经同你们接近了。这个协议不是什么限制核武器,其本身标准就很高,还要继续发展,继续竞赛。”关于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可以快一点。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来往。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我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

一点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⑤1}

1977年10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在接见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时指出,美国或其他国家在关系正常化之后仍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还说,如果美国发表声明,问题必须和平解决,那末我们也要发表声明,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外国无权干涉。^{⑤2}

李先念的讲话表明,中国方面对卡特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已产生了疑问。

1977年底,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约见中国外长黄华,对万斯的方案做了解释,黄华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后表示,待美方有了新方案时再谈。^{⑤3}

在这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一方面,美国国内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辩论一直拖而不决,美国政府倾其全力争取必要的最后几票;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同苏联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卡特政府没有余力再增加处理一个有很大争议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看,对卡特政府也还没有建立起完全的信任。邓小平希望卡特政府能够像尼克松政府那样,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来考虑中美关系,从而采取果断的行动。但到那时为止,卡特政府没有做出多少能让中国满意的事情。因此中国方面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继续采取强硬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⑤4}

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口信做出积极回应

直到1978年春,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苏联的扩张出现了新的势头。苏联利用“缓和”的烟雾稳定了西线,又开始向非洲渗透,对美国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继安哥拉事件之后,1977年苏联通过古巴策划建立“红海邦联”,

受到抵制。苏联于心不甘又利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问题上的争端,推行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的政策。直至出钱、出枪支持埃对索作战,终于迫使索马里军队于1978年3月从欧加登地区撤退。从此,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自己的阵地。1978年4月,阿富汗又发生亲苏政变,苏联趁机派军事顾问进行干涉。这就向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利用第三世界的地区纠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与美国所指望的固定世界现状的缓和原则是相容的吗?对此,卡特总统也认为苏联做得过分,他接连发表讲话,猛烈抨击苏联的扩张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苏联这几年核力量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而在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却没有体现出诚意,致使美苏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压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地区争夺中让步,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

此外,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开始强调扩大对外贸易、对外开放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中国优先同已建交的国家发展贸易,并与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签订了贸易协定,这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赖斯顿于1978年撰文披露:“在共和党内有着一种悄悄的然而却是强大的力量,反对把这个问题(指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党派斗争的问题。事实上,总统在这个时候做出决定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开始同日本、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进行大量贸易之后,许多美国大企业家,其中大多数是共和党人,极力要求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使美国有较好的机会及早进入中国市场。”^⑤

事实表明,日本和欧洲共同体在对华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已经捷足先登,美国如再不采取行动,就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据美国报刊统计,仅1978年上半年,欧共体向中国出口就比美国多3倍。面对这种局面,为求得及早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政治中一贯的两党斗争都得以消弭,美国方面决心通过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在美国方面,有两个人物对影响卡特下决心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话,无疑会使美国丧失交涉的立场。因为,美国承认中国方面的立场即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中国对中国所主张的一个省保证不行使武力,这既不合逻辑也没有可能实现。1978年2月,伍德科克回国述职曾向卡特总统和国务院指出了这一点。伍德科克还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美汽车劳动工会一次大会上,公开阐明了他对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伍德科克认为,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虚构基础上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伍德科克主张美国应该纠正这个错误。^⑧

伍德科克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在头版刊出,全国的电视新闻也同样作了报道。当时美国参院正因巴拿马条约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美国国务院坚持说伍德科克所发表的谈话只不过是个人见解,应该发表订正声明。过了几天,伍德科克去见总统,原以为会受到责备。没想到卡特总统却说,我已阅读了你有关台湾的全部谈话内容,我也赞同你的意见。在这之后,伍德科克与总统讨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采取的途径,并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长时间的商量。卡特总统要伍德科克回北京与中国进行直接交涉。^⑨

1978年4月11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当有记者问,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排除在无期限的未来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这是否构成美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中国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时,卡特明确地说:“我不想承认存在着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卡特进而指出,在实现上海公报中表明的那些目标时,美国承认这个为台湾和大陆所共有的概念,即只有一个中国。卡特表示,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美国希望经过若干月的一段时期,将“完全实现上海公报所表达的那些希望”。^⑩

到了4月底,卡特总统已决定要使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富有意义,以便将改善中美关系的进程推向前去。为此,他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私下的长谈。进入5月,布热津斯基已经做好去北京的准备工作。卡特告诉布热津斯基,此行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探究美中关系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达成任何最后协议。

1978年5月16日,卡特总统召集布热津斯基、布朗、万斯、蒙代尔、乔丹开会,商讨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并决定在年内就正常化采取行动。他们一致认为,最好的时机是在11月的国会选举后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同中国

改善关系会有助于和苏联就限制武器会谈达成协定。^①

5月17日,卡特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主要谈了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关系和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②

关于第一问题,布热津斯基将奉命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把对华关系看做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美中有某些共同利益,双方都有并行不悖的长期战略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或地区称霸。所以这次访华不是策略性的;它表达了美国对于美中合作关系的战略兴趣,这种兴趣既是根本性的又是持久的。这份总统指示还要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强调,美国已下决心要断然对付苏联在全世界的军事集结和代理人的扩张主义。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总统给布热津斯基的指令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你应当明确表示: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的决心已下”,美国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总统还指示布热津斯基“不妨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明,美国正在打算在今年进一步减弱它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扩大对中国作商业性技术转让的机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在定期甚至安排好日程的基础上增加直接接触,并邀请中国贸易及军事代表团访美。这些拟议中的步骤反映了我们推进正常化过程的诚意。”最为重要的是,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以前声明的五点(1977年初布热津斯基曾敦促卡特加以重申的正是这五点,当时没有结果),但总统又认为,接受中国的三项基本条件并不妨碍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将保留向台湾提供武器的权利。所以总统指示布热津斯基应当向中国方面重申,美国将坚持这些条件,并探讨若干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③

由于有了卡特总统的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布热津斯基的这次访问就从原来设想的一般磋商性的任务,而演变成一项性质真正重要的使命。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一行10人抵达北京,受到中国外长黄华及其夫人和其他中国官员的欢迎。这些肩负重要使命的美国人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就在猜测讲究礼仪的中国人会给他们什么样的礼遇。现在有外交部长出场,这是一个受到重视的信号。

当天晚上,中国外长黄华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客人。双方在祝酒词中都

表示他们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中美在暗指苏联时通常使用的名词,也是中美重新接近的共同基础。黄华指出:在各个地区的变化、动乱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影。它打着“缓和”、“合作”、“裁军”的幌子,疯狂扩军备战,到处进行扩张侵略,其目的就是要夺取世界霸权。黄华认为,面对这一现实,各国人民有必要联合起来,切实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为和平幻想所麻痹;要反对绥靖政策,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打乱霸权主义者的战略部署。这样做将会有助于推迟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国方面的讲话,不再片面地强调战争不可避免,而是认为,如果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共同努力,战争也有可能被推迟。这是一个更加全面而符合实际的新的论断。当然,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布热津斯基在致答辞时说:我们认识到中国决心抵抗任何国家寻求建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我们也有这种决心。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指出,我们抱有历史的信念:在这样的世界上建立霸权的任何努力都是不能得逞的。我们的力量 and 我们的决心也为这种信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布热津斯基又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贡献给和平的”,只有那些想支配别的人才会害怕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黄华外长强调,只要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布热津斯基针对中国方面早些时候的指责,着意指出美国的诚意和决心。他说:上海公报反映了我国要同中国友好的承诺,是基于共同关心的事项,而且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的。美国并不把它同中国的关系看做策略的权宜之计。布热津斯基强调指出:“美国总统希望同强大的中国有友好的关系。他决心同你们一道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按上海公报完全正常化的剩余的障碍。”说到这里,他似乎还嫌这话不够明白,又加上了关键性的一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④

与前几次美国高级官员访华时的讲话相比,布热津斯基的讲话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反霸权问题上语气转硬不再为美苏“缓和”辩解,并且表示了要与中国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二是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几年来没有过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态度。布热津斯基和黄华外长的讲话表明,中美在重大的国际战略问题上看法比较合拍,在改善和加强中美关系问题上抱有诚意,这就为这次中美高级会谈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首先同黄华外长举行会谈。他知道在他与邓小

平副总理或华国锋主席会面之前,发言记录将得到研究,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美国赞成什么,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么。布热津斯基指出:当代主要特征之一是苏联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特征促使我们团结起来。接着,他概述了苏联的战略企图,即取得战略优势、在西欧赢得政治优势、促使中东激进化、扰乱南亚的稳定、渗透印度洋地区以及包围中国等。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布热津斯基决定不说任何太具体的建议。因为,他知道黄华外长在这个问题上授权有限,不如先就战略问题达成若干一致意见,再和最高领导人私下处理此事。

5月21日,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并与他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只有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黄华和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等。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布热津斯基答道: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随后,他便直奔双方共同关心的主题——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布热津斯基的发言是经过反复推敲的,一方面他要表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和诚意,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让有决策权的邓小平体谅美国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困难。布热津斯基说:在私下谈论以及在这个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国内的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总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美国是可以信任的,尽管我们正要继续并加紧从台湾作军事撤退,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将以不致造成我们共同的敌手可能加以利用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在解决正常化问题以及在规定我们与台湾人民在此历史转折时期的全面关系时,都必须将这一情况牢记在心。在阐明了美国的基本态度之后,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

说：我授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話，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但布热津斯基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⑥

邓小平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⑥

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的讨论持续到很晚，气氛坦率、无拘无束。布热津斯基认为邓小平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与邓小平对话之后，他更加理解邓小平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挫折，邓小平的目的感和干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布热津斯基认为邓小平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由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中美双方商定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⑥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邓小平在考虑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已把经济互利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并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来吸引美国。1978年5月22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客人谈到中美关系时，明确指出：中美“两国贸易方面、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展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⑥此外，邓小平关心的是

国际战略局势的问题。在此前后,中苏边界正发生多次冲突,中国拒绝了苏联关于边界谈判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视察苏联远东地区,提出加强远东中苏边境的军事力量。^⑥这不能不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加速。

5月23日,布热津斯基一行圆满结束了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三天会谈,取道东京回国。这次访问由于卡特和邓小平都有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因而为导致两国正式建交的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此外,中美双方在国际战略方面达成的共识,也增加了两国相互间的信任。而这一点对于解决中美建交谈判中的难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这次访问的巨大成功,法国《世界报》称此行是“中美关系史上决定性的里程碑”^⑦。

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一波三折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一方面,美国的对苏政策日趋强硬;另一方面,中国逐步降低了批评美国对外政策的调子。双方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的共同点促进了中美之间接近的势头。

1978年5月28日,布热津斯基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向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谴责苏联的扩张政策。他说,美国必须表现出决心要对付苏联包围中东和在非洲煽动种族纠纷的活动。他还指责苏联在东欧大规模增加常规部队,加强集结在中国边境附近的军队,对美国展开猛烈的宣传攻击,并表现出要设法更直接地进入印度洋的迹象。布热津斯基指出“我认为这种行为方式同过去所谓缓和准则是不相容的”。谈到中美关系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有着并行不悖的利益。根据这些并行不悖的利益,我们确实采取了某些行动。”如果我们彼此增进了了解,这件事本身就是有巨大意义的。^⑧

美国总统卡特也于6月7日在安纳波利斯发表讲话,警告苏联说,“要么选择对抗,要么选择合作”,它将发现美国已准备好应付其中任何一种挑战。^⑨卡特的这个讲话被认为是他担任总统以来发表的最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这篇讲话使美国的对苏政策有了改变,即从对苏联大搞缓和的政策转为奉行警惕的平衡政策。中国方面对卡特的讲话给予好评,并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这篇演说。这种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上述背景下,卡特总统6月20日召集布热津斯基、万斯、布朗、乔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得出以下结论:

美中:

(一)必须十分机密。

(二)中国急于改善关系。已在兹比格^⑭访华前做到了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三)暂定12月15日(为正常化日期)。但只能让很少的人知道。我们的确想改善关系并正常化。

(四)在国会里,中国问题应摆在批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条约之前。

(五)残留关系:最好不要通过私人组织,应有其他办法解决。贸易代表团?武装出售代表团?由万斯做出法律估计。

(六)由伍德科克进行谈判。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就谈判问题进行准备。伍德科克(向对方)询问日期,从而开始讨论。具体指示随后发出。

(七)由伍德科克采取行动,每十天提议会谈一次,议程可为:1. 陈述立场;2.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3. 美台贸易;4. 公报与方式。

(八)下周初提出关于陈述立场的指示草案。

(九)伍德科克应探索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期前一年通知“中华民国”的可能性,作为摆脱困境的办法。^⑮

至此美方的战略已经确立,正常化的日期也有了。美国之所以决定谈判应秘密进行,主要是担心引起活动能量很大的台湾支持者们的群起反对,同时,也是为了不至于产生过高的期望以免给谈判带来沉重的压力。美国的谈判策略是,由伍德科克逐渐表明美国的立场,先解决一些大概不会成为重大障碍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

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他过问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对中方的谈判方针和策略做出具体指示。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从1978年7月起在北京举行。在7月5日的首次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四个要讨论的议题:1. 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形式和性质;2. 实现正常化之际美方的声明,强调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待;3. 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商务关系;4. 建交公报和建交的具体形式。^⑯美方建议每两周谈一次,一次谈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达成谅解后,再谈下一个问题,并要求保密。黄华提出,美方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条件。美国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7月14日举行的

第二次谈判中,黄华对美方提出的四项议程做出答复,提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做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⑥

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有相当的距离,在此之后举行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谈,进展不大。这时中方的意图主要是摸清美方的底牌,然后再作决策。中美之间除了在北京的秘密谈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美台关系问题。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直到中美谈判建交,美国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仅在台湾大量驻军,还对台湾提供了高达59.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42.2亿美元是军事援助,17.6亿美元是经济援助。^⑦由此,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事业,而且造成中美之间的严重对立。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中方在谈判中提出:1.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2. 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3. 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同台湾之间还可以继续保持民间来往,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4. 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⑧

美方则在售台武器的“终止”而不是“废约”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几点上讨价还价。美方陆续提出,接受中国关于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要求”,但在此基础上坚持要中国保证以下三条:一、美国在正常化时刻发表关于台湾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二、美国将在非官方基础上保留与台湾的全部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三、美国可以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售台武器问题最初是在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之间的特别渠道间进行的,而在主要的谈判中没有涉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些主要的“谈判不受不愉快问题的干扰”。^⑨

黄华外长和伍德科克第一回合的谈判从7月5日起到9月上旬共进行了五次,双方的立场逐渐清楚了。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在此期间,双方对三件相关的事情都很敏感,那就是双方同越南的关系,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双方国内局势的发展。8月中旬以后,布热津斯基和柴泽民也进行了多次会晤。

在此期间,邓小平打出经济牌,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6日,他在会见奥地利客人谈到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提到美国说:“当然我们也跟美国

人讲清楚,因为双方关系没有正常化,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技术,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加以比较。”^④

美国总统卡特对中美建交谈判进程也很关注。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作为总统采取的唯一完全从白宫办公室发出指示的外交行动。我直接向我们在中国的代表发出指示。当时我们的谈判代表是伍德科克,对他的所有的指示都是我亲自起草并从白宫发出的。我决心尽可能迅速地进行这项工作,实现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相互承认这一目标。”^⑤

9月19日,卡特在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表示:“现在已接近完成”讨论时刻,美国“愿意履行”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点。如美在正常化以后继续向台湾“有限度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和美在正常化时发表“期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这两个问题“满意地解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就不会有其他障碍”。^⑥

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卡特总统在谈到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坚持发表一个不受中方反驳的,大意是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声明的重要性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⑦

在此前后,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姿态,卡特下令采取措施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转告其西欧盟国,他们是否愿意销售军事装备给中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可能干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万斯和霍尔布鲁克主张同时承认中国和越南。10月中旬,卡特总统做出两点重要决策:一、考虑到中国对美越关系的敏感,决定推迟美国同越南关系正常化(布热津斯基曾向总统进言:在中美关系没有正常化之前,热衷于推进美越关系将会被中国理解为“亲苏反华行动”,而影响中美建交谈判);二、正式向中国提交一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公报草稿以表示美国方面确实具有诚意,准备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布热津斯基建议把1979年1月15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的日期写在公报上,卡特总统亲自把这个日期提前为1979年1月1日)。^⑧

1978年10月,久拖不决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取得突破,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与福田首相的会谈中,谈到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

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⑤

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回答记者提问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时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向美国指出了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⑥

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等多久。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如中美关系发生“决定性和建设性进展”,今年12月和明年1月将是“历史性的重要机遇”,希望双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⑦否则,由于美苏核条约或其他问题先列入议程,中美关系问题将会被推迟到1979年秋后,如果时机不当,可能会出现困难。

另据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召见了,说现在是解决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机。如果现在不解决,到明年秋季国会开会,就会着重讨论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事情就可能拖延下去,拖延到1979年秋季以后。我把这个意见告诉国内,报告可能使国内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⑧

随后,在11月2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⑨

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他还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作了指示。同时,外交部建议同美方

举行第六次会谈,拿出中方方案。因黄华外长生病,由韩念龙代外长主谈。并建议在这次会谈后,请邓小平约见伍德科克,表明中方立场,提出明年1月1日建交,以加快谈判进程。由韩念龙代外长在会谈时提出约见时间。^⑩

针对美国要求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邓小平在11月2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再次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⑪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都有了新的发展,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另一方面,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为随即召开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至此,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已经巩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资金,^⑫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因此,邓小平这时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⑬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2月1日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

在这种背景下,伍德科克被告知邓小平副总理不久将与他会见。这表明,中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建交谈判已到了最后的关头。

在此之前,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发出了中国准备尽快同美国建交的信号。他说,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这件事(中美关系正常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邓小平又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美国也有院外集团。像日本的台湾帮一样。但是,在发表上海公报时,院外集团就没有办法了。我说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

秒钟就能完成。邓小平认为,要像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④

12月4日,韩念龙在中美建交第六次谈判中提出中方的六点方案:1.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是欠了中国的债,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债,“解铃还需系铃人”;2. 欢迎卡特总统在9月19日会见柴泽民主任时的正式表示,美国愿意履行中国政府表明的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这应在联合公报中得到反映;3. 同意干脆一揽子解决,不同意搞“中间阶段”,确定在一个时限内完成断交、撤军、废约三点后,才能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4. 正常化以后,美国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可以按照“日本方式”处理;5. 美方提出在正常化以后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已明确表示这是不能同意的;6. 中国人民何时、用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讨论的问题。美方可以发表期望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亦发表声明。对此,伍德科克表达了美方的积极态度,但在售台武器方面仍提出,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美方表态的要点是:一、公报发表后,美国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在台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以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由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中方表示将研究美方的表态,同时通知美方,邓小平副总理将亲自会见伍德科克大使。^⑤

卡特总统在获悉邓小平准备会见伍德科克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亲自审核和批准了伍德科克将要呈送给邓小平的一份经过修改的美中正常化草案。这份新草案充分考虑了中国方面的意见。他还派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转达了美国总统希望邓小平在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后,尽快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

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四次会谈。

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表示:1.美方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公报发表后,美国立即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四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和设施,并立即通知台湾终止防御条约;^⑥3.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非官方关系;4.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商务和文化联系;5.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予反对。^⑦他还递交了按上述意图重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并提议双方确定1979年1月1日发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美方希望双方能够商定美方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时间。

邓小平表示:一、基本同意美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二、同意1979年1月1日发表公报和声明;三、美方在声明中不要讲“一年后技术上终止”美蒋条约。^⑧

然而,正在中美建交谈判就要大功告成之时,中美在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是否仍售台武器的问题上又出现严重的纷争。据美方霍尔德里奇回忆:“在正常化的磋商中,中国要求停止出售武器,我们拒绝了。我们的谈判曾经因这个问题几乎失败。”^⑨

12月14日,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时提出,为了减少泄密的机会,美方建议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议邓小平1979年1月29日、30日和31日开始访美。邓小平表示赞成,同意于1979年1月29日访美。当天晚9时,伍德科克又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答复中方13日提出的问题: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反霸条款;同意声明中不写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事。

12月15日,伍德科克又求见邓小平,要求澄清美方能否在记者问到时说1979年后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对此,邓小平回答: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⑩伍德科克答应立即报告美国政府。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⑪

最后,中美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下列协议:一、美国承认中

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⑩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商定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5日)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第一,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⑪不过,中方在许多场合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⑫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⑬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中方的角度讲,邓小平的最后决断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含义

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提前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从而结束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

家将近 30 年的关系不正常状态。关于这一点,后来,美国国务卿万斯在介绍美中建交背景时说:“互不承认的关系——我们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状况中,在《上海公报》发表后的六年中同北京打交道——每天都产生一些实际问题。虽然双方都作了巨大的努力使这些限制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这些限制所起的妨碍作用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不设法向前迈进就会冒向后倒退的风险——而在中美关系上向后倒退就会给我们的全球地位造成严重的损害。”^⑩而中美建交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棘手的难题。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这是美国方面多年来第一次公开宣布在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在 1972 年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曾采取一种含糊的说法,仅仅是“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八年过后现在美国政府终于面对现实,承认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⑪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美双方共同确认的这些原则说明,两国在双边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存在共同点,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是中美关系能够改善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⑫

同一天,中美两国还分别就两国建交发表政府声明。

美国政府的声明正式宣布,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一再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条件,这是值得欢迎的。但美国政府声明,它将“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⑩这又为其以后再度插手台湾问题留下了一个伏笔。不过,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这一声明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声明中对此做出了回答。

中国政府的声明认为,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声明指出:“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⑪这段话既肯定了中美两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又针对美方声明“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恰当的回答。

中美两国领导人极为重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为此,中国方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大型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自1965年9月以来,相隔13年的第一次(当时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从美国归来,陈毅外长举行了有300名中外记者出席的招待会)。美国总统卡特也在当日观众最多的黄金时间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卡特称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他指出:我们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是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承认一个简单的现实。但是这个决定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对一个事实的承认。卡特认为,中美建交“将对美中两国人民——而且我相信对世界各国人民——都会有长远的重大好处”。卡特又说,我特别注意确保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将不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卡特认为,中美建交的“这些决定和行动不但在美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事务中揭开了新的重要的一章”。^⑫

有意思的是,卡特总统在发表完正式讲话之后,不知道麦克风还没有关机,又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时候全美国一定是都在鼓掌。”当这句话从电视

上传出来时,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卡特总统为他和中国领导人一起,亲手完成了这项历史性的伟业所充满的自豪感。

由于中美建交谈判一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走漏,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突然公布使整个世界大吃一惊。

首先感到吃惊的当然是台湾。美国为了防止台湾当局从中捣乱,直到建交公报正式宣布前几小时才由美国驻台“大使”昂格尔向蒋经国通报。这时已是16日凌晨3点钟了。蒋经国十分恼怒,向昂格尔提出强烈抗议,并立即召开有国民党所有高级领导人参加的政府紧急会议商量对策。随后台湾当局下令军警全体进入充分戒备状态,并宣布“不定期推迟”选举和禁止一切竞选活动。其“外交部长”沈昌焕也引咎辞职。最后,蒋经国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然而又无可奈何的声明,指责美国背信弃义,并声称“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⑩

卡特总统在接到昂格尔向蒋经国通报的情况汇报后,向蒋经国发出一份安慰电,表示:“昂格尔大使已将阁下早些时候的谈话报告本人。本人对于阁下此时的感受自然能够理解。本人愿重申:美国在为维持台湾居民的和平、繁荣和福祉而建立新安排方面将随时准备进行充分的合作。”^⑪

苏联受到的震动也不亚于台湾。公布消息的前几小时,布热津斯基邀请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到他的办公室。起初,多勃雷宁兴致很高与布热津斯基愉快地交谈。然而,当布热津斯基突然通知他说,美国将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时,多勃雷宁顿时目瞪口呆,面如土色,耷拉着下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过,除了台湾当局和苏联集团之外,世界范围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日本政府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比预料的时期还要早”。由于日本政府为促进关系正常化向美、中两国做了工作,因而对此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又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可能激化中苏在亚洲的对立而有所担心。日本财界则对日、美、中三国关系在世界外交中的比重的提高予以高度评价。^⑫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都纷纷发表声明,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并认为中美建交对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对这个消息感到最兴奋的还是中美两国人民。在北京,《人民日报》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发行的100万份套红《号外》,被激动的人群一抢而空。人们急于看到这个等待了将近30年的喜讯。许多人在街头读完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后连声说，“很好”，“太好了”，“真想不到”。人们对在确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感到满意。在美国，卡特总统原以为，这个消息会引起全国各地以及国会内部一些亲台湾分子的强烈抗议，但这没有出现。相反，却出现了一片赞扬声，各大报刊对此事的报道也持赞赏的态度。由于中美宣布建交，有关中国的印刷品成了美国人争相购买的热门货。尤其是一本名叫《邓小平——政治传记》的书更是供不应求。人们希望了解这个个性鲜明并将于下月在华盛顿同卡特总统举行会谈的中国领导人。美国《时代》杂志还将邓小平选为“本年度新闻人物”，把他的照片登载在封面上，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

1979年1月1日，当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根据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有关规定，中美两国正式建立起全面的大使级外交关系。^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华盛顿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的升旗仪式中升起；与此同时，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也在北京美国驻华联络处举行的升旗仪式中升起，从而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起全面的外交关系。在此前一天，台湾当局的“国旗”在数百名面色阴沉的观众面前从台湾“驻美使馆”最后一次降落。台湾当局宣布与美国“断交”。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国14个城市中的“领事馆”也都悄然关闭。美台双边事务改由美方的“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台湾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这两个非官方机构来处理。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就此结束。

1979年2月1日，依据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柴泽民，在白宫向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递交了国书。

1979年3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伍德科克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至此，中美两国实现了互换大使并在双方首都建立大使馆的夙愿。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中美建交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的外交基础更加巩固，这对于遏制当时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美建交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美双边关系从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

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此,“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⑩

注释:

①“两个凡是”的方针首次公开见诸于1977年2月7日由《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②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4页。

③宫力、周敬青、张曙:《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242页。

④范硕:《叶剑英在1976年》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531页。

⑤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编:《细说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57页。

⑥张湛彬:《划时代的会议》,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⑦张湛彬:《划时代的会议》,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⑧华国锋以及陈云、王震等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详见张湛彬:《划时代的会议》,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5页。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0页。

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⑬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7页。

⑲谷牧的回忆。参见《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⑳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著:《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㉑邓力群:《讲讲我的学习体会》,1978年10月2日,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

㉒参见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著:《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187页。

㉓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

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3页。

㉖宦乡:《关于当前世界形势的几个问题——1978年9月13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报告》,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

- ⑳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 ㉑《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 ㉒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5—606页。
- ㉓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10日。
- 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 ㉕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President*(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p.190.
- ㉖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 ㉗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13页。
- ㉘Cyrus Vance, *Hard Choice: 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76.
- ㉙Edward W. Chester, *The Scope and Variety of U.S. Diplomacy History: Readings Since 1900*, Vol. 2, New Jersey 1990.
- ㉚美新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5月22日电,见1977年5月25日《参考消息》。
- ㉛《参考消息》,1977年7月2日。
- ㉜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 ㉝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建议,把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的访华计划从11月提前到8月。这预示着卡特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 ㉞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 61, no1 Fall 1982, p.182.
- ㉟Cyrus Vance, *Hard Choice: 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82-82.
- ㊱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 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7页。
- ㊳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 ㊴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 ㊵197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 ㊶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4.
- ㊷法新社华盛顿1977年8月26日电。
- ㊸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 ㊹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 ㊺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298页。
- ㊻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页。
- ㊼《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 ㊽张海涛:《吉米·卡特在白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8—379页。

- ⑤6 官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
- ⑤7 官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 ⑤8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决策人访问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文丛书系列第80册,第35页。
- ⑤9 官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301页。
- ⑥0 国际交流驻华盛顿4月11日电,见1978年4月14日《参考消息》。
- ⑥1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pp.194-195.
- ⑥2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pp.207-209, Appendix 1.
- ⑥3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9页
- ⑥4 《人民日报》,1978年5月21日。
- ⑥5 *Power and Principle*, pp.211-212; 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28页。
- ⑥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 ⑥7 1978年11月下旬,黄华外长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韩念龙为代理外交部长与美方进行谈判。
- ⑥8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 ⑥9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页。
- ⑦0 官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
- ⑦1 美联社华盛顿5月28日电,见1978年5月30日《参考消息》。
- ⑦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1978, I*, p.1057.
- ⑦3 即布热津斯基。
- ⑦4 官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页。
- ⑦5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
- ⑦6 王立:《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 ⑦7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 Oversea Loans and Grants And Assistance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83.
- ⑦8 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 ⑦9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p.229.
- ⑧0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78页。
- ⑧1 《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1日。
- ⑧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 ⑧3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p.229.
- ⑧4 官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 ⑧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 ⑧6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 ⑧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p.231.
- ⑧8 《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页。

⑧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8页。

⑨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⑪在中美关系正常之前，中国就邀请一些美国大公司来华为自然资源的开发、重工业建设以及石油开采等领域提出建议。

⑫《邓小平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谈话》，1978年12月1日。

⑬时事社东京11月29日电，见1978年12月1日《参考消息》。

⑭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379页。

⑮从技术上讲，一年后终止，实际上条约已无效。废除条约须国会批准，终止则可以由总统决定，所以美方采取这一做法。

⑯王立：《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⑰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⑱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⑲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9—380页；另据朱启桢回忆：“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美国要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详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著：《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

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㉑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78年12月16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㉓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的谈话中提到这一问题，他说：“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详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35页。

㉔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顾问奥科森伯格后来这样概括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立场：“谈判记录是清楚的，在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在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推迟了在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分歧。中国人保留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国官员则表示他们相信建交后的时期将逐步提供一个更好的讨论这一问题的环境。美国绝对没有在这些销售上做出任何时间的限制，或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销售。尽管如此，美国暗含的立场是，（对台湾武器）销售的数量和质量将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联系起来。”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 61, no1 Fall 1982, p.188.

㉕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㉖此处中文稿用的是“承认”，英文稿在美方的坚持下，用的是“acknowledge”即“认知”的意思。后来美国有些人借此大做文章，说认知不等于承认中国的立场。

⑩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10 页。

⑪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7 页。

⑫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7 页。

⑬卡特总统的讲话详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8—140 页。

⑭中央新台北 12 月 16 日电，见 1978 年 12 月 17 日《参考消息》。

⑮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0 页。

⑯《参考消息》，1978 年 2 月 18 日。

⑰美国总统卡特于中美建交的当天，宣布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同年 4 月美国撤回了全部驻台美军，1980 年 1 月 1 日美国正式终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⑱《邓小平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1979 年 1 月 29 日，人民出版社编：《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副总理访美》（资料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4 页。

第五章

全面发展中美关系的举措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际局势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其中包括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都要求中美两国的政治家求同存异,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当时苏联霸权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力量大幅度增长,并且从非洲、红海、中东到东南亚无休止地策动动乱,明显表现出要称霸全球的意向,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对世界和平和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不能不引起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严重关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特别强调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从中美两国在国际战略格局方面的共同利益出发,进一步加强了同美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的协调。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协调固然有苏联因素在起作用,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有自身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从中国方面来看,与西方的头号强国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有助于中国恢复和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正因如此,邓小平积极、迅速提出了推动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举措,并着重解决了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中美贸易、科技、文化以及军方交流与合作等问题,不仅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
⋮
⋮
⋮
⋮

第五章 全面发展中美关系的举措

出访美国,推进中美关系

邓小平关于中美建交的决策,不仅仅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同时也建立在对世界格局高瞻远瞩的政治观点的基础之上。1979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出席了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举行的招待会,并且从开阔的视野出发,阐明了对中美建交的看法。他认为,“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他特别指出:“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①

中美建交对中美两国的经济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在中美建交之际来华采访的美国记者时,强调了中美经济合作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义。当记者问中国打算以何种方式来支持引进美国和日本科学技术时,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愿意同科学技术、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愿意采取多种方式,同他们进行合作,其中包括银行贷款、补偿贸易,也包括其他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认为,美国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欢迎美国像西欧和日本一样,参与这个竞争。”^②

美国国务卿万斯也认为,我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将得到一些经济利益。“这些好处包括我们会成为一个向中国提供农产品的正常供应者、美国的出口者将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其他供应者进行竞争以及与中国恢复海运、航空、银行和其他正常的经济关系。”^③

根据中美建交谈判时达成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 and 了解,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④陪同邓小平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部长黄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特别助理凌云、浦寿昌、邓副总理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新闻助理彭迪、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国家科委局长吴明瑜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意义重大,由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已有1000多名各国记者云集华盛顿等待采访这一盛事。

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卡特于1月25日在华盛顿接见了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并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邓小平访美发表了谈话。卡特认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卡特说,在两国人民长期疏远以后,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十分愉快的机会来加强两国人民所长期盼望的友好联系。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两国领导人进行政治会谈、增进文化交流、改善贸易关系和科学交往的机会,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在谈到中美关系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时,卡特总统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一些动乱的地区,那里的人民是不安宁的。我们有必要对那些动乱地区施加有益的影响。他说,由于中国和美国现在有了新的关系,“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来影响那些动乱地区,使它们能更加和平地生活下去,并防止暴力扩展到毗邻地区,使人民彼此和睦共处”。卡特总统还说,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将向全世界表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对于我们是重要的,今后将越来越重要”。^⑤

卡特的这番话并非是夸张之辞。由于苏联战略力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其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加剧,引起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关切,已使邓小平这次
访问的含义超出了一般性的外交礼仪,从而成为中美之间的一次重要的具
有战略意义的对话。此外,由于即将来访的邓小平传奇般的个性以及美国
人对中国传统的兴趣,再加上对中美贸易的企盼,已使美国上下形成了高涨
的“中国热”。

在访美前夕,邓小平接见了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
杂志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阐明了他这次美国之行的目的和意义。邓小平
着重强调的中心论点是,在日益增长的来自苏联的危险面前,应当加强中美
关系,结成统一战线来对付苏联。

邓小平说: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议论很多,但是不能低估这件事情
的意义。两国关系的发展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还是全球战略问题。
邓小平认为,对于苏联称霸的野心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这方面中美和
其他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命运,他指出:苏联的核武器和他们战略武器的不断
发展意味着,可以说,苏联已同美国不相上下。苏联的军事预算约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20%。要这些来干什么?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它已把它的常备
军在3年内从300万人增到了400万人。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邓小平进一
步说:我们看到,去年南也门被苏联拿去了,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得势了。再
往东有阿富汗,现在还有伊朗,那里的动乱似乎没完没了,接着是巴基斯坦。

再往东,越南用军事手段控制了老挝,越南人以超出十多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柬埔寨。再往东,我们看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呢?至少,它的海空力量是加强了。苏联远东舰队的力量现在已经同苏联大西洋舰队的力量相当。这一切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切,它们应该严肃对待。

邓小平接着阐明了中国方面对于霸权主义的看法。他说:我们把想搞全球霸权的看做大霸权主义,把只谋求地区霸权的看做小霸权主义。至于全球霸权,今天只有美苏两家可以搞,但是我们一直认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苏联是进攻的,而美国处于防御地位^⑥,全球霸权就是控制全世界,会毫无顾忌地用战争作为达到霸权的一个步骤。但是,它首先是设法用干涉、分化达到目的,或者正如他们在欧洲所讲的,通过逐步实现芬兰化来达到目的。因此,邓小平说,我们认为,目前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

邓小平还指出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他说:1972年尼克松来访问,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的。这是根据我们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的全球战略提出的。根据我们关于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包括美国和苏联,但是我们从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出发,建立了一条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统一战线,而这条统一战线包括美国在内。邓小平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时间。^⑦而这恰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邓小平正是本着这样的一个信念踏上美国国土的。

北京时间1月29日凌晨4时30分(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3时30分),邓小平一行抵达美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揭开了这次访问的序幕。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卡特政府的其他官员以及一些国会议员到机场迎接,还有华侨代表200多人列队欢迎。从候机大楼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两侧的路灯杆上同时飘扬着中美两国国旗。这在华盛顿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当地时间),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并鸣礼炮十九响,这是对政府首脑的礼遇。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如此隆重的仪式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都没有对卡特的这一姿态感到惊奇。因为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实际上起着

举足轻重作用的杰出领导人,而且在世界上也具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大的影响。而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邓小平曾在周恩来病重之后主持过同基辛格的谈判,他还是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时的主要对话者,而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谈判中,邓小平的决断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由他而不是由其他中国领导人前往美国同卡特总统会谈是公正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美国方面对于邓小平的隆重接待也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邓小平这次访问所寄予的深切期望。

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着重阐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意义及其影响。卡特总统说: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分享着从和解和对一个共同旅程的期待而产生的希望。卡特总统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大的利益。我们期望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制造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各国人民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将会得到增强。卡特总统表示:我们期望,正常化将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我们两国人民间相互隔绝的时间已经太长了,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贸易、思想和人员的新的交往。^⑧

邓小平在致答辞中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强调了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他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的国家发展友好的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战争因素在显著增长。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⑨

欢迎仪式过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开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实质性的会谈。^⑩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方毅、黄华、柴泽民、章文晋、浦寿昌、彭迪、卫永清、朱启祯、冀朝铸;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奥克森伯格。

在1月29日上午和下午举行的两次中美会谈中,双方主要就国际形势

交换了意见。卡特在会谈中指出,有两件事是美国特别关心的:其一是东南亚地区连同印度洋北部一带直至非洲大陆的不稳定局势,以及某些外来的势力乘机加以利用的倾向;其二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①卡特总统的这两点忧虑,反映出美国对苏联肆无忌惮地扩张行为已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看法。邓小平认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險,主要危險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应做的工作。”卡特承认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他也同意中美应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但是,他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许多困难,在国际上处境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问题。邓小平表示希望美国扎扎实实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基斯坦感到孤立,走上依靠苏联的道路;在中东帮助萨达特,对以色列施加恰当的压力,以免苏联钻空子,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更加靠近苏联;在南朝鲜撤出全部美军,为恢复朝鲜南北谈判创造条件。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不相信它会约束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②

在会谈中,美方还介绍了苏军的情况。布热津斯基向中方全面谈了苏联军力部署情况,特别是中苏边界的情况。讲到苏联导弹发展时,他提出由于伊朗的政局变动,美国失去了在伊朗监听苏联导弹能力的条件,计划在巴基斯坦再搞一处,“但最好再东一点”。中方对此未表态。^③

在1月30日举行的第三次中美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中美双边关系问题。双方同意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签订中美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关于大气层核试验问题,邓小平表示:“我们不能承担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义务,美苏进行了那么多次大气层核试验,而我们只进行了有限的几次。”关于台湾

问题,邓小平在会谈中指出:“我重申我们将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耐心的,但耐心也不是无边无际的,中国有两只手,同美国一样,都有两只手。”^⑭

此后,在许多不同场合,邓小平反复阐明中国的愿望是力求和平解决。1月30日,他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提醒美国议员注意:“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⑮但邓小平声明中国决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他强调,如果我们束缚自己的手脚,反而会不利于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邓小平希望美国不要做使台湾当局翘尾巴的事。

中美双方还谈到其他问题,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问题上,卡特表示今后将放松些。在中美资产问题上,双方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不影响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双方还同意互派留学生、互派常驻记者、增加高层政府官员互访等。^⑯

中美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接近,特别是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方面具有共同点。而这恰好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以及在世界政治中的出发点不同,中美两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包括对苏联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又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是正常的,对此,中美双方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所阐明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合情合理,解除了一些美国人对所谓中国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疑虑,同时也剥夺了亲台势力对此大做文章的借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然,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还有分歧,要使美国真正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斗争。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涉及。

1月29日晚,卡特总统在华盛顿举行正式国宴,欢迎邓小平访美。为了体现对中国客人的重视,特地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了1500株山茶花,把宴会厅装点得生机勃勃。美国方面的细致和周到,由此可见一斑。卡特在致辞中认为,邓小平的这次访问是中美发展友好关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成为今后的和平合作的先例。”卡特还借此机会重申了美国政府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他说:“我们进入这种新关系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我们对一个由多样化的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负有长期的义务。我们相信,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国将在这个共同体中起一种合作的作用。我们的新关系特别能对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①7}

邓小平在致答辞中,引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来比喻中美关系的新进展。他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邓小平坦诚地指出:“我们两国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做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①8}这番话既肯定了中美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的进展,同时也坦率地指出了中美两国的区别,又从全局战略的高度点明了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

席间,双方进行了愉快地交谈。邓小平展示了一个大国领袖的风度。卡特认为邓小平是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①9}邓小平还同应邀参加宴会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互致问候,进行了私下的交谈。中国方面不忘老朋友的做法,给卡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月30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邓小平,与会者达800多名。邓小平在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②0}

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1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邓小平在签字后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

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开展。今天所签订的协定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但是,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②1}

卡特总统说:过去三年中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规,不再是头条新闻或者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中美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我们签署这些协定正是开始做了一点。”^{②2}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方毅副总理、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与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国务卿万斯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几天来的会谈与磋商,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肯定了中美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公报指出“双方的会谈是友好诚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作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双方决心为此努力,并且深信,这种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②3}

这份公报由于出现了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这样的特别字句,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其中“霸权”一词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写上的。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语汇中,这个词成了中国指责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代名词,美国同意在公报中使用这个高度敏感的词,说明了美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与中国是有共同利益的。而“支配”一词是应美国方面的要求插到这句话里面的,这个词与“霸权”平行,就把这句话的范围扩大到了指任何有侵略扩张意图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公报发表以后,敏感的新闻记者问白宫,把“霸权—支配”合在一起使用

是否远不止是指苏联,而是还适用于其军队侵入柬埔寨的越南时,美国白宫官员巧妙地答道:“我要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又有人问起莫斯科是否可能对邓小平的访问做出不利的反应时,白宫官员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对外政策,如果情况是那种样子,那么其结果保险是灾难性的。”^⑳

为了促进中美之间的了解,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参观了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并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发表讲话,以直观有效的方式,阐明了中国对重大国际事务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作为战略家的风度和政治魅力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陶森说,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华盛顿的一个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和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㉑1月31日下午,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向邓小平提问,中美两国间“继续这种愉快的蜜月时期会有什么主要危险”时,邓小平幽默地答道:“我看不到危险。蜜月将继续存在。”^㉒从而表现出他对中美关系前景胸有成竹般地自信。2月4日,邓小平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卡尔森和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威尔逊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这也是我们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我们亲自来看了看,感到很有收获。我们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存在着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㉓

邓小平以其充沛的精力所开展的这些旋风般的外交活动,增进了两国政界人士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到了国会山的时候,美国参议院设午餐会,众议院设茶会欢迎邓小平。在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几乎都到场了。平时一贯矜持的国会议员们排着队请邓小平签名,甚至一些原来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抱有疑虑的议员也开始为邓小平得体的讲话和政治魅力所吸引。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解、可亲。”^㉔有影响的保守派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说:“总的来说,他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也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而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则据此预言,参议院将会批准“可以使我国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法律。^㉕邓小平在会见参议员杰克逊时,杰克逊提到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主要是对付苏联限制移民自由外出的。邓小

平说：“至于我们，如果你们要，我们可送你们一千万。”“如果中国人真的像潮水一样涌到美国，你们也不会同意。”^⑩

最令人感动的一幕还是发生在为欢迎邓小平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一次盛大的演出结束之后的那一刻。当时邓小平和卡特以及他们的夫人走上舞台跟演员们见面。邓小平动情地抱住唱了一支中国歌的孩子们，并亲吻了他们。这时，场上所体现出的中美友好的热烈气氛使很多观众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据说为欢迎外宾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晚会在美国还是第一次。中美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他们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世代友好相处下去，而永远不要重蹈过去近30年来敌对和隔绝的覆辙。随后，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全场2000多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站到舞台中央紧紧握手，耀眼的弧光灯照着这一动人的场面，他们久久地、久久地互不松手。这时，通过越过大洋的电视转播，整个中国和整个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看到和感受到了以两国领导人紧紧握手为象征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邓小平的魅力很快风靡美国，许多报纸都出了专刊，传媒报道也很快捷。电视台每半小时就有一次电视新闻，据统计美国两亿人中差不多有上亿人看了有关邓小平访美的电视新闻。邓小平车队经过的地方，常有很多美国人在路口等着招手致意。这股邓小平的旋风影响十分巨大。据美国负责安全的官员说，这种热烈的场面对他们来说也是空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接待英国首相丘吉尔那一次以来再没有过的，是战后第一次。^⑪

总而言之，邓小平的这次历史性的美国之行，不仅大大增进了两国政界人士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并且使中美关系迅速超过了仅仅是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从而形成了一种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大方面展开友好合作的新格局。两国领导人在利害相关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世界战略问题上疏通了彼此的想法，在发展两国间科技、文化、贸易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推动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

从战略全局出发，“教训越南”

在国际格局的战略态势中，大国的力量对比固然是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有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小国的因素也不可小视。在20世纪70年代中

美苏三角关系变化过程中,越南因素就曾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曾把美国从越南撤军作为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⑳尽管中国在对美谈判中充分考虑了越南的利益,但中美关系缓和仍然对中越关系造成较大的冲击,这也许是中国为了实现当时的主要目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然策略运用得当可以尽量减少代价)。早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结束,中美双方发表会谈公告之时,越南《人民报》就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周恩来曾就此批告当时主管宣传的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周恩来指出:“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㉑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越南并未理解中国的苦心,对此始终耿耿于怀。

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越南改变了过去采取的“团结中苏”,“保持中立”的方针,开始逐渐向苏联方面倾斜,由此增加了苏联在大国关系角逐中的砝码。同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苏,苏越发表“越苏宣言”确定两国、两党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当年,越南在中越边境制造挑衅事件达439次。^㉒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㉓致使中越边界冲突不断。

1978年11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在双方中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㉔至此,越南全身心地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㉕这样,苏联就如愿以偿地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所留下的真空地带,并且迫使中国面对来自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不断升级,1978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108次之多。^㉖

此外,越南还制造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诬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⑨,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⑩至1978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28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还于1978年12月公开出兵侵略柬埔寨。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严重关切。

而在美国方面,由于苏联明显的扩张行为,使卡特总统最终决定弱化对苏“缓和政策”,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由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在东亚形成了中美联合对付苏越同盟的战略态势。中美两国领导人开始酝酿建立军方的关系。中美建交之后,这一考虑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在瓜德罗普与英、德、法首脑举行非正式会谈时,表示美国不反对西方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限度地“教训”一下越南,遏制其扩张势头。^⑪由于越南的后台老板是苏联,因此,教训越南也是对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打击。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新闻记者共进午餐时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⑫当记者问到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时,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取得的条约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⑬

教训越南与美国的利益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苏联利用越南所进行的扩张,已经摆出了与美国在亚太地区 and 印度洋地区争夺的态势,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特别是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苏联随即进入金兰湾的前美国军事基地,建立种种军事设施,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穿越印度洋到红海中苏联控制的索科特拉岛这条线上航行的苏联军舰提供停靠和加油的据点。苏联“熊”式远程侦察机也以金兰湾为基地,最后,苏联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中队的苏联米格-21战斗机和用以跟踪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行动的其他装置。^⑭美国对此也是十分关注的。正因如此,在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越南侵柬问题也是中美会谈的一个重点。

邓小平对卡特指出:越南侵柬,“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有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一头是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马

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做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④5}对此,卡特总统表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想同自己的顾问们研讨后再说。^{④6}

此时,中国已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部队准备对越作战,为防范苏联做出过激反应,在“三北”地区的中国部分作战师也进入了待机地域,准备反击苏军可能的军事攻击和军事牵制行动。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④7}

1979年2月17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出击,对越南在中越边境用以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各种军事据点实施粉碎性的打击。当天,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历数越南当局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并且指出:如果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不予制止,无疑也将危及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愿意打仗。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肆意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④8}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国际舆论迅速作出反应,从总体上看是有益于中国的。除了苏联东欧集团气急败坏地大骂之外,大多数国家表示中立和主张谈判解决,其中不少的国家是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偏向和同情中国方面,同时也担心苏联介入,使冲突扩大。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是中美苏三方的微妙关系。

美国实际上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已得到中国要“教训”越南的通报,因此已早有准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自邓小平访美结束就开始考虑美国的对策。为了避免出现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局面,布热津斯基想出了一个点子,即:美国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

动,同时也谴责越南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由于估计越南和苏联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此计在外交上可给中国打掩护而又不牵连美国。中越之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卡特马上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进行磋商,并且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方案,即: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应该同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挂钩;同时向苏联发一信息,敦促他们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更严重的行动,特别是不要采取调兵遣将或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布热津斯基在会上还力主在信息中增加一句话,表示美国也准备采取类似的克制态度,他解释说,必须使苏联意识到这里是对等的(这句话秘而不宣地包含着如果苏联动手的话,美国也要做出军事反应的意思)。^④

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这次会议商定的“指导美国政府的原则”是:“美不会直接卷入共产党国家之间在亚洲的武装冲突;美眼前利益、亚洲盟国安全并未受到这场冲突的威胁,但冲突如果扩大则是危险的;美将运用它能采取的一切手段,鼓励采取克制态度,并防止战争扩大到把苏联也卷入其中;美不会由于这场冲突而改变同中国的关系。”^⑤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越之战的总体态度是,不直接卷入,同时敦促苏联不介入,力争冲突不扩大,并确保中美关系不因此受影响。在公开表态中,美国对中国形式是有批评,既谴责越侵柬,也谴责中国对越还击,但实际上是帮忙,要求中、越从越柬“双撤军”,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整个印度支那形势,以此来压越南和苏联。

在此期间,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传送给卡特总统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但卡特总统丝毫不为来信所动,命令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继续按规定方针办。卡特还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重新估价其在远东的安全地位,并在军事上作出反应”。^⑥

不过,卡特政府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特别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有人提出应取消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预定将要进行的访华之行,以表示美国不赞成中国的军事行动。针对这种情况,布热津斯基在2月19日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上建议首先对总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即:不要让中越之间的危机影响美国分别同苏、中的双边关系。结果这个意见获得一致赞成。这样,当布卢门撒尔访华案再次提出来时,布热津斯基名正言顺地指出,取消此行不符合大家都赞成的原则,即不要让美国同这两个主要强国分别保持的双边关系受到影响。同时他还请到会的人注意英国首相卡拉汉的一封电报,内称英国工业大臣将于当天启程前往中国,卡拉汉决定不取消此

行,因为那样做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会后,布热津斯基把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的书面报告呈送总统决断,卡特在上面果断地批示道:“布卢门撒尔应该去。”⁵²

结果,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夫人于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在中越之战的炮声中实现了对华访问。这也是中美建交之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意义非同一般。苏联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时刻如期访华十分恼火,攻击西方对中国搞“绥靖”,并指责美国纵容和默许中国“侵越”。苏联此时对中国也是无计可施,暴露出色厉内荏的本质。苏联政府曾于2月18日发表声明,说中国“侵略”越南和推行“霸权主义”,声称苏将根据苏越同盟条约履行其“义务”。⁵³但其语气含混,并没有多少实际步骤,除了派遣一些舰只到南中国海游弋和空运一些物资外,在中苏边境没有轻举妄动。

这充分说明,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也好,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也好,都是欺软怕硬,对它们决不能采取“绥靖主义”,只要敢于和善于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就一定能遏制住它们的扩张势头。可以说,中国正是着眼于中美以及其他国家同苏联及其盟友的扩张尖锐对立这样一个格局而采取行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对越反击战敢于摸老虎屁股,对一切受到大小霸权主义威胁的国家和人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鼓舞。

中国边防部队为反击越南,虽付出一定代价和牺牲,但从1979年2月27日起,连续攻克谅山、同登、禄平、高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和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老街、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楼、郭参、封土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给予越南以沉重的打击,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1979年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从上述地区撤出。为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⁵⁴

到3月16日为止,中国边防部队已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就此发表谈话指出:“我们信守自己的诺言,撤回了全部边防部队。事实揭穿了苏、越当局散布的所谓中国‘侵略’、‘扩张’的谰言。”黄华接着说: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正是越南在苏联的怂恿和支持下,派遣了十几万军队占领了柬埔寨,至今还赖在那里不走。越南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粗暴地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他强调说:“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走其侵略军,这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越南当局必须做出回答。”^⑤

至此,中国对越反击战结束,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秉承苏联全球霸权主义意旨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气焰由此遭受沉重的打击。越南被迫从柬埔寨调回一些部队,柬埔寨局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解决印度支那局势的方案,要求越南从柬撤军,中国从越撤军。由于中国说话算数,教训完越南,已从越南撤回,而越南却赖在柬不走,孰是孰非,已大白于天下,越南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事实证明,越南靠苏联是靠不住的,而邓小平访美后迅速发展的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倒是在炮火硝烟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1979年4月16日,邓小平表示:“在我们教训越南时,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就是提出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是对这个态度我们满意。只要美国在道义上、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这个立场,这就是美国对柬埔寨的支持。”^⑥

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教训越南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⑦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⑧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时从苏联的全球战略谈到苏联利用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扩张问题,他指出:“由于印支问题,它同亚洲战略相连,这是迂回战略,从两翼夺取欧洲,从阿富汗这一翼,南下印度洋实际上是夺取中东。一旦苏联南下印度洋,控制波斯湾,控制中东,欧洲怎么办?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屈服,再一个就是干。与其那时再选择,不如现在做选择。现在做选择就是把我们的前线放在阿富汗,放在柬埔寨。在这两点拖住苏联,拖它几年,情况总会好些。”^⑨

从教训越南的结果来看,中国方面在美国的配合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一仗有效地打乱了大小霸权主义的扩张部署,有力地维护了亚太地区的稳定,苏联未敢做出激烈反应。而且通过这一战略行动,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重新呈现出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苏联的倾斜。特别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主要是出于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考虑,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除了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裁苏联之外,开始重新考虑美国对苏战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⑩。

突出经济因素,促进中美贸易

经济贸易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70年代之初,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主要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逐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虽然开始提上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⑪但受历史条件所限,当时两国的贸易额很小,对中美关系大局也没有多少影响力。

而在中美建交前后,情况已有很大不同。从中国方面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进行,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⑫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是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出发,把美国看做是实现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贸易的重点对象。而美国也越来越看好中国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美国也有意通过两国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这样,中美建交伊始,邓小平就开始为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合作,并克服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1979

年1月2日,他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指出:“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⑤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同国内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⑥随后,他在对美国广播电视界谈到访问美国的三个使命时,指出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邓小平还说:“我们期望发展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能有广阔的前景。”^⑦这番话说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之间的确有一种有机的联系。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⑧,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⑨这番话点明了最惠国待遇问题是发展中美贸易亟待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此外,邓小平极为关心吸引美国投资的问题。从1979年开始,他曾先后5次接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由此促成了新时期中国最大的利用外资项目:中美双方合作开发位于平(鲁)朔(县)地区的安太堡露天煤矿,揭开了中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序幕。^⑩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邓小平于2月27日与他进行了会谈。中美双方就遗留的资产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协议,中方同意支付美国有关人员8050万美元,美方解冻中国在美资产价值8000万美元。^⑪中美双方从3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

1979年3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议员代表团时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是两国发展贸易关系的新开始,今后我们在政治、文化和贸易等领域有许多具体事情要做。”^⑫同年4月1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率领的美国众议院议员团,并且指出:“中美

两国需要相互合作的事情很多。要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增进互相了解。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只是我们内部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发展同友好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①

但是,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两头都要照顾,都应该给予最惠国待遇。万斯等人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怕得罪苏联。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议院必将拒绝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年4月,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1979年5月6日至15日率团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在开始谈判时,双方存在着不少分歧,但通过共同的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5月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②

在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正式签署了30年前遗留下来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和互办贸易展览的协议;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大气、海洋和渔业、计量和标准、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等四项科技合作议定书;两国有关人员就海运和航空协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为签订这两项协定做了必要的准备;两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也开始了有益的接触。克雷普斯到达北京时曾说,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发展美中经济关系,扩大两国科技合作和建立两国企业管理专家之间的联系。现在这位美国部长的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邓小平于5月10日会见了克雷普斯部长,并就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向美国客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调整,不会影响对外招商引资。他说:“经济调整本身是为了发展得更快,更好地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外国资金。还有一个要利用好的,就是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这方面也是我们的缺口。这些都是属于调整范围,否则引进没有用。调整不影响我们大量的而不是少量的吸收国际资金及引进先进技术及

设备。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各行各业都伸手,这就要权衡一下,分轻、重、缓、急,看哪些先哪些后。每个具体引进项目都要考虑支付能力。”^{②3}双方表示要为保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势头做出努力。

在此之前,中国副总理余秋里也于5月9日会见了克雷普斯。余秋里对克雷普斯说:“中美两国政府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发展我们两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这样做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美国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关系。”^{②4}余秋里还向美国客人介绍了中美在经济贸易方面可以进行合作的广阔领域。

1979年6月5日,邓小平会见以萨里为团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并且提出:“中美双方要多找一些门路来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目前,中国在同美国贸易中出现的很大逆差的状况应该改变。美方应该允许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②5}

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草签,最终解决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几年来,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势头。而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一问题已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

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然而好事多磨,中美刚刚签订贸易协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就主张把这个协定推迟到美国同苏联关系走上正轨时再提交国会批准,以免中美苏三角关系失衡。这种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美国对苏关系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争论。美国政府中的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苏联拒绝对苏联的移民入境作出保证之后,推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因为苏联顽固而去惩罚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卡特总统经过慎重考虑于7月27日决定,在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参议院一有进展便采取行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还接受了蒙代尔副总统的建议,即在各种双边问题上都把中国与苏联明确区分开来。随后,经蒙代尔亲自向国务卿万斯呼吁,万斯应允

宣布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并允诺在1979年底以前建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华时,将这一基本决定告诉了中国方面。

此时,邓小平也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的进展。1979年8月24日,他在会见正在访华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事后,杰克逊在北京对报界说,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推迟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⑥

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终于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并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卡特总统正式宣布,中美贸易协定已提交美国国会要求批准。她还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贸易关系协定包括双边贸易的条款,其中也有为两国进出口贸易提供不歧视的互惠待遇,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美国国会议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讨论的要点涉及以下内容:(一)国会的议员,特别是来自产棉区的议员,对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纺织品表示出强烈不满。他们出于地区保护主义的心理,要求美国政府在同中国签订有关纺织品协议之前同中国签订中美贸易协定;(二)一些国会议员对是否使中国在苏联之前获得最惠国待遇持有异议。持此种意见的包括“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提案人之一瓦尼克。然而,另一个提案人杰克逊却赞成中国应优先于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三)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依然对中国移民政策表示怀疑。小组审议结束后,国会转入大会辩论阶段。此时,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成为国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大会辩论的议题主要是三个:第一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新形势下,美国对华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第二是中国对美出口是否会影响美国市场的问题;第三是中国的移民政策问题。最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1980年1月24日表决时,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⑦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美关系的转折点”。^⑧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协定规定:缔约双方认定政府贸

易机构对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起重要作用。双方同意对这些机构的贸易促进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并根据各自的实际可能对这些机构的业务活动提供尽可能有利的便利。这个协定有效期为三年。协定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如未在有效期满前至少 30 天将终止本协定的意愿通知对方,则本协定有效期延长三年,此后仍可依此方法延长。^⑨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和正式生效,中美之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国的 10 类出口商品在美国的进口关税平均从 24% 下降到 5.5%。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1980 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 40.8 亿多美元,相当于中美建交前 1978 年四倍多。其中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 38.3 亿多美元,输入产品主要以农产品为主,包括谷物、棉花、大豆,此外还有合成纤维、化工产品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为 9.8 亿多美元,输出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物原料等。这种状况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经济需求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经过 10 年文革尚未恢复元气,需要进口一些农产品以解燃眉之急;而美国自 60 年代后期纺织业逐渐萎缩,不得不从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地大量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纺织品打入美国之后立即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引进外资的工作也提上工作日程。^⑩ 1980 年 4 月,美国对华投资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政府批准美国沈伊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由此开创了中美合资举办企业的先河。^⑪ 1980 年 4 月 24 日,中国银行与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以及华润公司签订协议,成立全资财务公司,营业范围以东南亚为主,遍及世界各地。公司在香港注册,实收资本 1000 万港元,三家银行各占 30%,华润 10%。同年 6 月,美国大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及中信公司在纽约组织大型贸易研讨会,三百家美国大企业的领导人参加,讨论中美贸易有关问题。^⑫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8 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率领中国机器制造业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长达四周的考察活动。在此期间,薄一波以副总理身份主持了 9 月 12 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方主席的身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9 月 17 日,薄一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玫瑰园正式签署了

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

这三项协定和一个条约的签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协定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结束三十多年来没有例行定期直航班机的历史；海运协定将使美国的港口向中国的商船开放，而美国船只也将能够进入中国的停靠港口，从而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商业机会；纺织品协议将允许中国的纺织品更加有秩序地在美国推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也有利于美国的零售商和消费者；领事条约阐明了领事官员为两国公民提供服务的职责，将确保在对方国土上的本国公民的权益。

以上的这些协定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过非常艰辛的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巨大成果。当然，“两国的行动并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于各自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它们将有助于推进邓小平所倡导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同时也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美国来说，正如卡特总统所说，意味着“美国工商业有了机会”。^⑧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回访中国

中美建交之后，两国政府在构筑双边关系的战略支柱方面是有进展的，但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中美关系，保证中美建交以来签订的协议得到充分的履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于1979年8月25日至9月1日，应邀对中国进行一周的访问。这次访华也是对邓小平副总理年初访问美国的回访，美国方面对此做了精心的准备。

临行前，蒙代尔对记者阐明他此行的目的，是要确切找出和解决到目前为止一直妨碍中美在贸易和文化方面进行充分交流的一些困难，并为80年代建立具有丰硕成果的友谊奠定基础。在飞往中国的途中，蒙代尔又在机舱对记者们说，打开中美关系的门户是卡特政府的重大成就之一，而保证协议得到充分履行是“当务之急”。^⑨蒙代尔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出访中国的。

蒙代尔到达北京受到邓小平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很重视蒙代尔的这次来访，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与美方领导人一起回顾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共同讨论双方在各个领域中加强联系和交流的可能性，并就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而这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谅解，加速

中美建交以来签订的各项协议的履行是十分必要的。

8月26日,邓小平有意识地针对中美之间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障碍指出:“只要我们双方严格执行中美建交协议的各项原则,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处理中美间的具体问题,并且从世界的全局着眼,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着眼,看待和处理我们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那么,两国关系将肯定会取得不断的发展。”^⑤邓小平还谈到了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的工作方针,并且说:“在实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同外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这不但为中国人民所需要,也将对同我们交往的各国人民带来好处。”^⑥邓小平表示相信,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是有广阔的前途的。

蒙代尔副总统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就是要确保我们在八十年代的关系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我这次访问的目的。”他认为:“如果我们加强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两国就都能在经济上取得戏剧性的进展,我们就都能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而“持久的中美关系尤其有助于促进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双方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来解决我们国内遇到的各种挑战,处理我们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蒙代尔说:“通过四个现代化,你们也决心为自己达到同样的目标。美国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将来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能够比今天的中国对创建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说:“我们认为,在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将成为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一个主要堡垒。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希望和你们一起扩大我们就世界事务进行的磋商,而且只要可能,就设法通过各自的行动达到共同的目的。”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为了巩固我们的友谊,我们必须扩大和加深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八十年代在贸易、文化、科技方面建立欣欣向荣的关系,将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多么重视我们的共同目标,即: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保持平衡的、和平的世界”。^⑦

邓小平和蒙代尔的讲话表明,中美两国政府着眼于未来,在扩大和加强中美关系问题上是有诚意的。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副总理和蒙代尔副总统在人民大会堂,就两国的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民航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蒙代尔向中方通报了美方为推动中美经济关系正在采取的若干重要步骤:第一,卡特总统将在今年年底以前把中美签订的贸易协定提交美国国会审批。贸易协定规定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向国会提交这个协定与任何其他问题毫无联系;第二,美方要签订一项关于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展水力发电事业的协定。现在美国政府机构准备用补偿安排的方式,协助中国发展水力发电;第三,在具体项目上美国准备让出口进口银行在五年内按逐项确定的办法向中国提供总数为20亿美元的贷款。如中国建设速度需要的话,美国准备考虑增加这种信贷;第四,卡特政府将在今年内寻求国会授权他通过提供私人海外投资公司的担保和保险的办法,以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⑧

8月27日下午,蒙代尔副总统访问北京大学,并且发表了演讲,全面阐述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立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重要演讲。

蒙代尔在论及中美关系的意义时说:对于我这一代的美国人说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摸到了现代政治历史的脉搏。我们两国分隔了近30年,但是自古以来互相交往的渴望把人类团结起来。它促使我们再一次寻找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接着蒙代尔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诗表达美国对加强中美关系的渴望,他说:“一千多年以前贵国的一位诗人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现在正在一起更上一层楼。”

蒙代尔还阐述了美国主张应该有一个多样化世界的观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作用和影响,他说:就中美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尊重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两国关系所作的特殊贡献。尽管我们两国的制度之间有时产生深刻的分歧,我们决心同你们一道发展我们在战略和双边关系方面的许多平行的利益。因此,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你们,它的这种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因此,美国实现了同贵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我们一定要努力扩大和加强我们之间的新的友好关系。

蒙代尔认为: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就是在为我们关系的前途进行投资。我们议程上的各项任务完成得愈有效,我们就会在双方之间建立愈多的纽带,我们也就愈加相信,我们的关系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因此我们今天做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十年奠定基础。在八十年代,我们将要彼此合作,同时也同其他国家合作,以解决世界性的问题。繁荣全球的经济,限制国际的冲突,保护各国的独立——这些目标也应从我们双边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追求。我们的双边关系越深,我们这种全球性的努力就越能取得成功。蒙代尔指出:这就是卡特总统要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讨论的议程上的问题。这就是卡特总统要我带给你们的主要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后共同面临的议程上的问题。^⑨

蒙代尔的长篇讲话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送,转达了美国政府对加强对华关系具有强烈兴趣的重要信息,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特别是蒙代尔所说任何国家想要削弱或孤立中国,这种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的这句话,富有新意,表明了对中国的全力支持,而作为对立面提出的所谓“任何国家”被不少敏感的记者认为是暗指苏联及其盟国,由此反映出美国对华对苏关系的不同立场。此外,蒙代尔允诺美国将在年底之前向国会提出审批中美贸易协定和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为推动中美经济关系所宣布采取的几项重大步骤,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反映了美国要大力推进中美关系的决心。

8月28日下午,邓小平副总理和蒙代尔副总统在北京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中美两国政府水力发电与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1980年和1981年中美之间在文化艺术、教育、广播、图书资料、园林和建筑、文化考察、体育、社会科学、翻译出版等方面的交流项目,以及财务规定。水力发电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规定: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促进和建立双方在水力发电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领域内的合作活动,并对具体合作活动做出适当安排,予以鼓励和提供方便。根据议定书,合作活动包括双方交换和提供情报,共同从事试验和研究,互派专家和培训技术人员,以及提供规划、工程设计、技术问题的咨询和施工管理等。

这两个重要协议的签订,是中美建交以来,两国进行文化和科技合作的又一项新的成就。协议的贯彻和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之间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邓小平副总理在签字仪式上致辞说:“蒙代尔副总统这次来访,又使中美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对此,中美两国人民肯定是会感到高兴的。”^⑨蒙代尔副总统说,这两个协议将使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新的推动力。他说,这两个协议将加强美中之间的纽带并有助于使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⑩

蒙代尔副总统这次访问,以及邓小平与他的会见,由于中美双方都有扩大和加深中美关系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扫除了一些障碍,把1979年1月中美双方所勾画出的议程大都圆满地解决了。中美双方由此增加了相互间的信任与了解,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促成中美两国建立军事关系

中美建交前,中美两军曾长期处于对抗的状态。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军队将防御的重点转向北方,中美两军的关系得到缓和,但由于中美没有正式建交,两国军队也没有深入的交往。随着中美建交谈判取得进展,从1978年起,主要是出于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考虑,中美两国领导人开始酝酿建立军方的联系。在这之后,随着苏联对阿富汗、南也门和印度支那的一系列干涉行动的升级,促使中美加快了步伐。

1979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军委会议员团,并且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要求我们中美两国加强交往与合作。我们双方都要以世界局势这个大局为重,改善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②

1979年5月初,美苏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建议,应该把握时机,由高级领导人出来表明美国将积极考虑逐步扩大美中安全方面联系的问题。卡特总统接受了这个意见,并且约见中国大使柴泽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提出了美国方面的一些建议。随后,卡特总统向美国国防部长布朗通报了与柴泽民的谈话。

也是在这年5月,美国国防部的一些专家向布朗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增强中国对付苏联的军事能力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在此基础上,布朗向卡特总统建议放宽对华出口具有军事用途高技术产品的限制,甚至不排除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这一主张得到卡特政府审慎考察后的同意。^③

蒙代尔1979年8月访华期间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布朗访华问题,邓小平予以同意并提出了邀请。由于苏联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邓小平认为,中美之间应密切磋商。1979年9月18日,他在北京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并就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今年以来,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应该从全球战略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世界发生的所有问题。”^④

1979年9月,美国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访华,与中方军事专家就美国向中国转让两用技术和军用物资销售问题进行了专业性磋商。回国后,佩里在其报告中建议向中国提供军事硬件,如地对空导弹和反潜设备等。10月3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它已批准了美国公司提出的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运输直升机和电子检测设备在内的20个出口许可证。^⑤

此后,由于美国国内围绕此行的实质性内容仍有争论,布朗的行程一

拖再拖,直至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时,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加强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对于抗衡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是必要的和有效的。1980年1月布朗的使命也因此增加了内容。启程前,卡特总统要布朗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政府愿意在逐项审议的基础上来考虑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军事装备,诸如卡车、雷达以及通信和指挥、控制设备。^⑤布热津斯基也表示,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赋予布朗的使命以“新的含义”,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安全关系是美国能够对苏联行为作出反应的“主要办法”^⑥。这表明,布朗访华的目的就在于,要为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进行更为积极的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应付苏联的挑战。这样一来,中美之间新的安全关系开始出现了。

1980年1月5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到达北京,标志着中美军方关系的建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有40多名美国记者采访布朗访华,世界各大报刊也用了大量篇幅报道这一消息和评论,这表明布朗此行的确是举世瞩目的一次访问。

1月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同布朗部长进行会谈,并谴责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当天晚上,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一行。徐向前认为,布朗部长来中国访问“使我们两国国防方面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有机会相互结识并且就各自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这对增进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加强我们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将会是很有益的”。

布朗部长在讲话中说:“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国防部长,我意识到我们两国共同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并相信,假如我们进行密切的协商,对危险保持警惕并壮大我们的力量,就能遏制引起全球冲突的侵略。”

徐向前副总理和布朗部长都认为,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是一起影响全局的严重事件。徐向前副总理指出:“苏联这一霸权主义行径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严重警觉和广泛谴责。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苏联的侵略与扩张是使世界和平和各国独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根源。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要联合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懈。”徐向前副总理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和平,中国需要加强防务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不威胁任何人。中国人民希望有一个长期的和平

国际环境,集中力量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反对侵略战争,希望在各自的独立主权受到充分尊重的和平环境中幸福地生活。他说:“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现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东、南亚、东南亚,以至非洲和加勒比海等地正在增长中的动荡不安局势,影响和威胁着世界整体的和平与稳定。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十分关切。”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徐向前副总理说:“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政治信仰各异,但是,只要我们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中美两国就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双方各方面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为此作出共同的努力。”

布朗部长在讲话中指出:“在西南亚,苏联侵占一个不结盟的邻国,企图征服阿富汗穆斯林人民。苏联是通过处决该国总统及其家属来表示它的友谊的。在其他地区,苏联正在加剧当地的紧张局势,并谋求利用这种局势为其战略利益服务。上述局势的发展,是对所有致力于维护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国家的决心的考验。”布朗部长还说:“我们是在那些确保独立国家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遭到严重挑战的时刻举行会晤的。”在提到了伊朗绑架者扣留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为人质、越南凭恃苏联的支持入侵柬埔寨和苏联侵占阿富汗等问题时,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美中两国的合作可以成为保持世界安宁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素。”他指出:“中国和美国之间改善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其他国家的行动将会对我们的友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他说:“在过去的八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觉得我们两国没有理由成为敌人,而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朋友。”“现在美国认识到了一个安全、强大、和平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攸关。同时,我们相信,中国也认识到它可以从一个强大、具有信心和与全球有关的美国所能得到的益处。”他说,我们双方都在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小国和弱国也不再担心其他国家会在“和平和友谊”的幌子下,用武力侵略和控制他们。出于这种考虑,“我来到了中国,以扩大我们两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对话,并就将来如何在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交换看法。”“我们已开始意识到两国防务机构之间进行接触的益处。我将准备讨论安排扩大这种专业性接触和交流”。他说:“所有这些方面的合作对双方是有益的,无害于第三者。但它将提醒其他人,假如他们对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进行威胁,我们能在防务和外交方面用相互补充的行动做出回答。这将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固,并捍卫我们各自的重大利益。”^⑧

徐向前和布朗的讲话表明,中美两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有着广泛的共同点,特别是双方都认为,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是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的主要危险。基于这样的分析,双方都表示要加强防务力量,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调行动。就布朗的讲话而言,比去年蒙代尔访华时的讲话更进了一步。蒙代尔去年曾宣布,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布朗则明确警告苏联说,如果美中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我们能在防务和外交方面用相互补充的行动作出回答”,此外,布朗还强调美中要“密切的协商”,并进行两国防务机构的“专业性接触和交流”,等等。这表明,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已加快转向同中国合作的速度。

1月8日上午,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同布朗部长举行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耿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总参谋长助理刘华清、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等。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副国防部长科默、助理国防部长麦吉弗特、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等。

邓小平对布朗指出:“对全球战略问题,中国的看法是一贯的,国际局势的动荡,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和全球扩张主义政策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发生任何变化。大家要联合起来,认真对待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政策。”^⑨邓小平还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虽在西方,但它现在同亚洲、太平洋的战略连在一起了,变化就在这里。去年访美时,我向卡特总统强调,从东面算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这样一个局势,当然也包括这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我在华盛顿访问时也多次说,我们不反对谈判,也不反对签订这样那样的协议,但这样做约束不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我们需要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⑩布朗部长说,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中两国需要协调彼此的政策。布朗部长表示美国打算加强防务力量。宾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自从一九七二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保持了发展的势头。”他认为,布朗先生作为美国国防部长这次来中国访问的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布朗部长说:“我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来中国的,我认为我的访问是有成果的。”^⑪

布朗在华期间还同耿飏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举行了会谈。双方谈论的范围很广泛,其中包括全球局势,阿富汗形势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所带来的影

响,鼓励和扩大两国防务机构之间接触的途径等。中美双方在回顾全球局势时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动荡,苏联的行径直接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挑战。因此,抵制和反对苏联的军事侵略和扩张野心在当前更具有紧迫性。耿飚副总理和布朗部长根据各自政府业已表明立场,就阿富汗形势,包括苏联侵略的性质及其严重性,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双方决定,将就苏联在这一地区行动的后果继续讨论,并就应做出的适当反应进一步磋商。

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会谈之后,布朗认为,美中双方的会谈是坦率的和富有成果的,美中之间有共同战略目标的领域越来越多。^⑩他在访华期间答应向中国提供可能用于军事的地球资源卫星。^⑪

中美军方借布朗部长的这次访华为契机,初步建立起包括三个方面的军事合作与交流的机制。一是确立了两国高级国防领导人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目的是促进对彼此间的政策与利益的了解,从而能在双方认为利益一致时采取平行的行动。二是开始了一项双方国防机构之间在双方共同商定的各个工作领域进行互访的计划。其中包括军事教育与训练、后勤和军事医疗等。三是美国愿意在防务技术发展的某些方面同中国进行合作。这就为中美之间在防务领域的全面交往与合作铺平了道路,两国军方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当时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有共同点。邓小平指出:“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⑫

布朗访华之后,美国国防部于1980年1月24日宣布,美国准备在逐项处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向中国出售某些辅助性军事装备。1980年4月25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把中国单列为出口管制组别中的T组,在逐项审查的基础上开始向中国出售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⑬1980年4月,美国国防部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远程通信设备和军用直升机等辅助性军用设备,并根据1979年达成的协议,在中国新疆建立了两个监测站,由美方提供

设备,中方人员进行操作,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⑩

中美之间军事人员的友好交往也逐步增多,这种接触既是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对全球霸权主义的有力遏制。为此,中美互派了各类军事代表团。1980年5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应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的邀请率代表团访美。1980年5月25日至6月6日,中国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飚率中国军事代表团抵达美国进行访问。这也是对布朗部长访华的回访。访问期间,耿飚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同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布朗部长就战略问题以及美方出售装备、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会谈。中美两国防务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邓小平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美国领导对此亦有同感,这是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时指出:“现在爆发的热点比过去多得多。中东是第一个,还有印支、东南亚,甚至还有其他地方的看法。我们多年来阐述这个观点,即打世界大战只有两家有资格,美国和苏联。战后,特别经过朝鲜战争、印支战争,美国力量有很大削弱。所以,美国处于防守的地位,苏联处于进攻的地位。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不是美国。美国怕,而且美国的制度使得它要下决心都不容易。苏联方便得很,开个会就决定了。比如说,进攻阿富汗,事先谁知道?那不是政治局做个决议就算了。热点尽管多,但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点我看形势不会变化。因为称霸世界不夺取欧洲不行。占领了中国也不能称霸。因为欧洲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分量很重,军事力量也不很弱。夺取欧洲才能称霸世界。我们历来认为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包括中东、北非、地中海,甚至于苏联南下印度洋的政策也是欧洲战略的一部分。当然,由于印支问题,它同亚洲战略相连,这是迂回战略,从两翼夺取欧洲,从阿富汗这一翼,南下印度洋实际上是夺取中东。一旦苏联南下印度洋,控制波斯湾,控制中东,欧洲怎么办?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屈服,再一个就是干。与其那时再选择,不如现在做选择。现在做选择就是把我们的前线放在阿富汗,放在柬埔寨。在这两点拖住苏联,拖它几年,情况总会好些。”^⑪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与技术转让,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82年1月,美国把对中国出口从“Y”类调整为“P”类,以视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区别,放宽了对

中国出口商品的范围,允许中国购买运输机、远程通信装备乃至军用运输机等。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据美国解密的档案材料透露,美国在1982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⑩中国还从美国得到了诸如炮弹、水雷、炮兵雷达等常规武器,以及获准由美方提供技术,改装中国空军的歼-8战斗机。^⑪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②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③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④邓小平在中美建交时表示说:“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友好联系与合作。”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⑤《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

⑥美国《时代》杂志在报道邓小平谈话时,把这句话说成是“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处于战略退却”。邓小平访美期间就此对记者作了订正,这里采用邓小平订正过的话,后面的一句:目前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也是采用邓小平访美期间订正过的话。

⑦见美国《时代》杂志报道邓小平副总理会见记,载1979年1月31日、2月1日《参考消息》。

⑧卡特总统在白宫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仪式上的讲话,载《历史性的重大——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

⑨邓小平副总理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讲话,载《历史性的重大——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⑩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的会谈共进行了三次,即1月29日上午、下午和30日上午。

⑪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3页。

⑫《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29日。

⑬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⑭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⑯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⑰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⑱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1页。

⑲参见吉米·卡特:《保持信心》(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

⑳《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㉑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⑳卡特总统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载《历史性的大事——美建交和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7 页。

㉑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 页。

㉒国际交流署华盛顿 1979 年 2 月 2 日电。

㉓新华社西雅图 1979 年 2 月 5 日电。

㉔《世界知识》,1979 年第 5 期。

㉕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5 页。

㉖新华社西雅图 1979 年 2 月 5 日电。

㉗美联社华盛顿 1 月 31 日电,见《参考消息》,1979 年 2 月 2 日。

㉘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4 页。

㉙凌云: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编委会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7 页。

㉚《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 年 5 月 29 日。

㉛《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69—470 页。

㉜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中越关系大事记》,1980 年 3 月,第 105 页。

㉝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8 页。

㉞黄文欢:《越中友好与黎笋的背叛》,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 页。

㉟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p.282.

㊱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中越关系大事记》,1980 年 3 月,第 122 页。

㊲《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18 页。

㊳郭明、罗方明、李白茵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下,时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74 页。

㊴中国和越南曾经有过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中,中国曾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给予越南大量的、无私的援助。毛泽东主席曾经郑重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不仅如此,对于援越抗美,中国方面从来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也从未要求得到任何的补偿,而是充分体现了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然而,越南领导人却在抗美救国结束后利令智昏,向外扩张领土,并把中国当作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

㊵《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2 日。

㊶《新华月报》,1979 年 3 月,第 155 页。

㊷约翰·H. 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林均红译:《1945 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3 页。

㊸《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 年 1 月。

㊹参见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5 页。

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㊻《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8 日。

㊼参见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6—467 页。

㊽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⑤1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22 页。

⑤2 参见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9 页。

⑤3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 页。

⑤4 《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6 日。

⑤5 《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17 日。

⑤6 《邓小平在会见以普赖斯为团长的美国众院军委会会议员团时的谈话》，1979 年 4 月 16 日。

⑤7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79 年 4 月 19 日。

⑤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7 页。

⑤9 《新华月报》，1980 年 11 月，第 5—6 页。

⑥0 Jimmy Carter,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23,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 16 (January 28, 1980), p.197.

⑥1 中美上海公报曾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此后，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1973 年 5 月 31 日在华盛顿还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但总的来说，直至 1978 年底，由于中美尚未建交，中美之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得不到解决，发展中美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双方的贸易额同两个大国的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

⑥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9 页。

⑥3 《邓小平副总理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79 年 1 月 2 日。

⑥4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6 页。

⑥5 《世界知识》，1979 年第 5 期。

⑥6 中美之间的资产冻结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四类：一类是两国政府各自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对对方的财产采取了冻结、没收或其他敌对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 1950 年 12 月 16 日，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的干涉”为由，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管区的一切财产进行管制和冻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同年 12 月 28 日，颁布《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对美国企业分别实行了代管、征购和管制。第二类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外资破产或濒临倒闭，将厂房和机器予以转让。第三类是中国国内建设的需要，对一些影响国计民生的外国企业宣布代管或国营，如某些外国电车或电灯公司。第四类是一些个人由于本人离华未委托合法代理人，未按照新中国有关法规进行产权登记而被收为国有的财产等。见石志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4—355 页。

⑥7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 页。

⑥8 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访美期间结识了哈默，并欢迎他到中国来。1981 年 7 月，哈默第三次访问中国时，向邓小平表示准备拿 3 亿美元开发安太堡煤矿，希望中国能像列宁那样重视对外合作。邓小平向他承诺，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邓小平指示煤炭部部长高扬文等有关人员说：“哈默愿意帮助我们开发平朔煤矿，两年能出 1200 万吨，4 年能达到 1500 万吨，就是 4 年，也比我们不晓得快多少。我们过去搞 800 万吨的煤矿，大体上 10 年建成，时间很长，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非常热情的态度。”随后，他又批示：“像这样的项目，应当作为专题拍板，不要一家一家汇报，转圈圈。”1982 年 3 月，中美双方签署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1987 年 9 月，年产 1535 万吨煤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建成投产，使中国煤矿工业一步跨越了与发达国家之间 30 年的差距。详见巨文辉：《邓

小平与平朔煤矿》，《史志研究》，2003年第2期。

⑥梅仁毅：《70年代的中美贸易与香港的作用》，载顾云深、石源华、金光耀主编：《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⑦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⑧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⑨《人民日报》，1979年5月15日。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9页。

⑪《人民日报》，1979年5月10日。

⑫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⑬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⑭Tan Qing-Sha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2, pp.70-72.

⑮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⑯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⑰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详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⑱陈继勇：《论8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及其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1期，第18页。

⑲梅仁毅：《70年代的中美贸易与香港的作用》，载顾云深、石源华、金光耀主编：《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⑳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㉑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㉒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4页。

㉓《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

㉔《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

㉕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1981年7月），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㉖蒙代尔副总统的演讲全文，详见197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㉗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㉘《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

㉙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㉚张清敏：《美国对华“双轨”军售的技术转让政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载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另据布热津斯基回忆：布朗提出向中国转让五个项目，万斯表示不同意见。最后布热津斯基、布朗和万斯达成折中方案，决定向中国提供某些

民用的先进的成像系统,以及配有先进导航仪器的小型喷气飞机。

⑨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5 页。

⑩张清敏:《美国对华“双轨”军售的技术转让政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载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2 页。

⑪《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论文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2 页。

⑫ Richard Burt, “US, Look to China for Aid to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80.

⑬徐向前和布朗的讲话全文详见《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 7 日。

⑭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1 页。

⑮《邓小平和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的谈话》,1980 年 1 月 8 日。

⑯《人民日报》,1980 年 1 月 9 日。

⑰布朗 1 月 9 日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⑱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p.149–150.

⑲《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9—240 页。

⑳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 页。

㉑张静怡:《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回顾与展望》,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业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42 页。

㉒《新华月报》,1980 年 11 月,第 5—6 页。

㉓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Alfred A Knopf, Inc. 1998. p.140.

㉔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Alfred A Knopf, Inc. 1998. p.140.

第六章

应对台湾问题引起的风波与 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一方面积极促进中美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军事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倒退行为进行了严正交涉与斗争，并制定了周密的应对措施。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美国基本上承认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三项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实现的。但是，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这一内政问题的干预，而是指望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避开它来发展中美关系。特别是1981年美国共和党新总统里根上台，使中美关系面临着真正的考验。里根是美国共和党内著名的保守派，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反共意识强，主张亲台湾的谋士。在竞选期间，里根说了不少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尽管当选后，里根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但他在对台关系上，特别是对台销售武器方面显然要准备比卡特走得更远一些。不过，里根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制约。在同苏联争霸的斗争中，美国感到力不从心，需要借重中国的力量，需要推进同中国的关系，这就使里根政府在处理对台关系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要积极推进美台关系，必将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定会影响中美关系，这一点里根在竞选期间也已有所领教。但要疏远台湾，里根又于心不甘。面对这样一个两难抉择的问题，里根政府初期的对华政策举步维艰，呈现出左右摇摆、蹒跚而行的特点。这种复杂的情况给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驾驭中美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了防止美国从原有的立场上倒退，邓小平从大局出发，努力控制局面，抓住美国对台军售这一主要矛盾，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了

中国对美谈判,最终达成了中美“八一七”公报,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阐述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批评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在中美建交之时,虽然美国在对台出售武器等遗留问题上,尚未满足中方的要求,但毕竟在总体上达到了中国所长期坚持的建交底线,即三项基本条件(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美蒋条约),这就为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中美建交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表明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灵活姿态;^①另一方面坚持中国决心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的原则立场。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一个访华团时指出:中美建交后,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我们对统一祖国采取现实态度。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允许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商务、投资等关系。但“中华民国”的旗子是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在谈到反对中美建交的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时,邓小平表示:“如果他来,我们会高兴地会见他,并从从容容地进行讨论,不会吵架。”^②这番和解又富有新意的话给在座的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③这里已包含有“一国两制”的某种含义,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最大诚意。

同一天,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27位美国记者时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邓小平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

的法律。”^⑨

实际上,在卡特总统发出的备忘录和向国会提交的《与台湾关系法》草案中,已包含有某些违背中美建交协议的内容。如美国声称的与台湾的现有的国际协议“继续有效”,涉及外国或类似实体的法律、法规,在解释那些名词和执行这些法律、规章和命令时都应包括台湾在内等,都把台湾当作类似国家的“实体”。但在美国国会两院讨论这一草案的过程中,一些人攻击卡特的民主党政府在中美建交时“让步太多”,提出了更多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条款,从而使台湾问题再次成为美国政治辩论中的焦点。

在卡特总统向国会提交的《与台湾关系法》草案中,没有关于终止《共同防御条约》后所谓“保证台湾安全”的问题。不少议员认为,这是个“大缺陷”,甚至参议院外委会丘奇和小肯尼迪这样积极支持中美建交的议员也认为,美国“应该重视台湾人民的未来安全和福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于1979年2月5日到外交委员会作证试图说服这些议员,他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但国会议员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从“最好的情况”出发,未能估计到“最糟糕的情况”。^⑩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在《与台湾关系法》中规定一些所谓“保证台湾安全”的条款,有些人要求把原来《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某些条款搬进《与台湾关系法》。几位议员甚至试图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与北京保证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挂起钩来,并以撤销承认相威胁。^⑪

在关于美台互设办事机构的性质问题上,卡特总统提交的草案,表示以后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为此将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处理有关事务,这个机构在法律上是民间性质的团体,台湾将在美国设立类似的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但不少议员却主张给予这些机构以官方的或半官方的性质。

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一份议案,内容主要关于美中建交后美国以何种方式处理与台湾关系。围绕该议案在参院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国会指责国务院提案内容“令人遗憾的不妥当”,扬言如果中国不做出放弃武力的承诺将竭尽全力把美中关系正常化所达成的协议“推倒重来”,甚至把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视为“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⑫

美国国会两院在讨论《与台湾关系法》草案过程中的这些情况说明,虽然中美已正式建交,但由于美国同台湾当局过去有过长期密切的关系和战

略上的利益,以及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制约,再加上亲台湾帮的院外活动等等因素,主张保持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实质性关系的方案仍有很大的市场。

美国国会的这场辩论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1979年3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向美国国务卿万斯转达口信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制定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但对涉及中国领土台湾的任何立法,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表示关注:美台未来关系的安排应该根据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中国方面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性质以及变相地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立法条款;中国方面注意到卡特总统已表示不能接受同美国已向中国作出保证相抵触的任何决议或修正案,希望美国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万斯对黄华表示,美国政府将设法影响美国国会,但不能控制它。^⑬

万斯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实情。美国国会提出的修正案有明显要恢复美台防御条约的措词,还有主张设“倒联络处”^⑭的条款,这两点由于卡特威胁要实行否决权,而被顶了回去,但修正案中仍有许多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措词和条款被保留下来。1979年3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0票对6票表决通过修正过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与台湾关系法》。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45票对55票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美国国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将设法弥合这两个法案之间的差异之处。

1979年3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3月13日分别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多处违反中美建交协议,表明了中国方面的态度。黄华指出:“中美建交时,美方明确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同时,美方还承认,解决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可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却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如果这个立法议案按照目前的措词获得最后通过,并经签署生效,这对中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黄华最后表示:“美国政府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上不出现任何

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⑮

但美国国会还是一意孤行。1979年3月20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就统一两院通过的议案的文本问题达成协议,3月28日和2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339票对50票和85票对4票正式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他在签署该法时,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保留,同时发表声明说:“我今天签署众议院决议第二四七九号,即与台湾关系法,使之成为法律。这项立法将帮助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在没有官方的政府代表和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该法包含我所要求的一切授权,以帮助我们同台湾人民保持这种官方关系。它授权美国在台湾协会——按照哥伦比亚特区法律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处理关系”。他认为这项立法“与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系正常化时达成的谅解是一致的。它反映我们承认该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他同时又称:“国会在这个立法的若干部分明智地给予总统以斟酌的余地。在所有情况下,我将以同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幸福的关心相一致的方式,以同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时达成的谅解——1979年1月1日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表达了这种谅解相一致的方式行使这种斟酌权。”^⑯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同台湾关系的“秘密指导方针”和规则:同台湾进行有限的军事合作;将军级军官不准访台;禁止同台湾当局进行官方接触或参加官方活动;赴美训练的台湾军事人员必须是少校以下军官。^⑰

那么这个最终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究竟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该法开宗明义地声称:“本法是为了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并通过授权继续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为了其他目的”。^⑱这里引人注目地把中美建交公报中的“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的关键词“非官方”的提法去掉了,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疏漏。纵观该法,有许多规定都直接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和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反映出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中美建交的情况下,仍然企图保持对台湾的控制,并想利用《与台湾关系法》来作为美国继续介入台湾问题的法律依据。

例如,《与台湾关系法》公然规定:“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

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愿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使美国保持能力,以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总统把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的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按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样危险的适当行动”,等等。这些文字已使《与台湾关系法》在相当程度上变相恢复了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宣布将予终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因此,有的国际法专家甚至说,《与台湾关系法》比1954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还要周到。^①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局外人的美国对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台湾省的所谓“安全”等问题,再表示“严重关切”,显然违背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主权国家,中国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使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或其他任何外国都不应干涉。

更为严重的是,《与台湾关系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够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以此试图把向台湾出售武器,进行军事干预合法化。这是对国际法准则的践踏。根据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有关规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完全破坏一个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都不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每一个国家有责任不组织、煽动、资助或参与另一个国家的内争。”^②美国曾经是这个宣言的提案国,却公然规定要提供“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去支持和参与另一个国家的地方当局来反对美国所承认的这个国家的中央合法政府,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各国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所不允许的。

在涉及美台关系性质的问题上,《与台湾关系法》中的一些规定,实际上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企图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的色彩。该法规定:“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或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该法虽然规定今后美台关系应通过“非政府性实体”去处理,但又说“美国在台湾协会”同台湾当局或它所设立的机构之间所达成的协定或交易,“需遵守同样的向国会报告、由国会审

查和批准的规定和程序”，如同这些协定或交易是美国政府机构自己所达成的一样。该法规定美台之间所互设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享有“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②该法还规定，美台之间在1978年底以前有效的“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该法认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台湾当局于中美建交前在美国所拥有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产”。^③这些规定说明美国实际上是要把台湾当局继续当作一个“政府”来打交道，以保证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在形式上发生变化而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维持下去。这是中国方面不能答应的。还应指出的是，《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通过的一项国内法律，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和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一国的法律不能凌驾于国家之间的协议和国际法之上。一国的法律，如果与此国所签订的国家间协议相抵触，就失去其效力。因此，《与台湾关系法》中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规定应该说对中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邓小平对于这个《与台湾关系法》，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979年4月16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众院军委会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对美国会最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涉及台湾问题的行动当然有意见。希望今后逐步消除这些分歧。像这样问题，美国情况我不很了解，就中国人民来说，是相当敏感的问题。^④

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丘奇率领的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⑤邓小平还说，我们注意到卡特总统在签署这个法案时说，在执行法案时他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我们以后要看实际行动。^⑥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交部于4月28日，就此问题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郑重指出：中美建交协议是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准则。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⑦

面对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美国方面于7月6日复照称:美国将“遵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然而,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总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的。美国政府一直努力确保该法的措词不损害我们同贵国政府达成的谅解,或迫使我国政府采取背离这种谅解的行动。”^{②0}

美国方面还针对中方照会的指责,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些条款进行了解释:(1)《与台湾关系法》“并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而且事实上提到同台湾当局的政府间的关系已告结束”。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而《与台湾关系法》“没有一处与以上事实相矛盾”。(2)关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条约和协定,《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是:“除了‘共同防御条约’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在做出取代性的安排以前将继续有效。”这只是“把我们在关系正常化时说过的话付诸实施。”(3)《与台湾关系法》“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表示的期望”也是同美中建交声明“相一致的”。该法“根本没有使美国承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4)关于对台军售,美国的立场是“在‘共同防御条约’于1979年12月31日期满后,我们将向台湾出售经过仔细选择的、数量有限的防御性武器”。(5)关于财产问题,“根据美国法律,财产所有权只能由法院解决”。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当局前大使馆的财产要求是有根据的”,美国国务院还可向法院提供其“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证明。关于此问题,卡特总统具体表示:“他不同意这项法案对外交财产问题的处理方法,并申明他签署这项法案无损于今后对这些财产的法律地位的任何裁决。”^{②1}

在此之后,卡特政府在执行该法的过程中,的确使用了总统酌情处理的权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冷淡对台关系,以防止中美关系倒退,但这并不能保证美国的每一届总统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与台湾关系法》越来越成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隐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片阴云。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与台湾关系法》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危机,美国必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②2}

密切关注美国恢复售台武器

邓小平一直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时,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美方代表在谈判的最后关头,向邓小平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仍将有选择地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邓小平一方面表示了坚决反对;另一方面,为了不影响中美建交的大局,决定暂时搁置这一分歧,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后,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时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③

1978年12月16日,在中美建交公报公布的当天,中国政府又公开宣布:“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④

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政府1979年暂时停止了对台湾承担新的武器销售。1979年2月5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向美国参议院解释了为何同意中方提出的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行将终止的一年内,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原因:(1)美国政府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是出于“以抵消和北京的正常化关系”的目的;(2)美国政府正在等待“建立将来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新的法律基础”,同时建立“与我们同台湾人民保持的非官方关系相适应”的武器“销售的程序”。“美国不是在‘抛弃’台湾。我们将继续关心这个岛屿人民今后的安全和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⑤这就为后来美国恢复售台武器埋下伏笔。

此时,中国正在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新的探索。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

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③

但是,就在美国政府暂停对台湾武器销售一年期限行将结束的时候,台湾当局又向美国提交包括 18 个项目的武器求购清单,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卡特政府担心台湾在被美国抛弃后因绝望而倒向苏联,因而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④但总统为了不危及与中国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只同意了台湾求购清单上的 6 种,^⑤决定恢复按新货单向台湾销售武器。

1980 年 1 月 2 日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美国政府决定向台湾有选择性的出售一批价值达 2.8 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隼式”(I-Hawk)防空导弹,改进型的“海榭树”(Sea Chapparral)舰载防空导弹,“陶式”(TOW)反坦克导弹,76 毫米的速射火炮,以及改进型的电子识别与控制系统。^⑥

台湾当局认为,“此项宣布确是一项好消息”,但由于此军售没有包括台湾当局“多年来所要求购买的 F-16 及 F-18 等新型战机,未免又令人感到失望”。^⑦

1 月 3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了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由此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宣布售台武器“这一官方行动是在终止美台一切官方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已于 1980 年 1 月 1 日废除情况下采取的”,“中国政府反对美政府的这一立场。”^⑧

同年 6 月,美国政府又决定允许美国飞机公司同台湾讨论出售新型的 FX 中程战斗机问题。6 月 1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洲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透露,美国政府还打算同意两家美国公司向台湾出售新式的 FX 中程战斗机。据说,这种新研制的飞机将取代台湾现有的 F-5 战斗机。霍尔布鲁克又说,这个问题还有待作出最后决定。但是,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斯通 6 月 12 日透露,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允许美国公司同台湾讨论出售 FX 飞机的问题。斯通还说,美国国务院还改变了过去禁止印有“中华民国”或“R、O、C”(“中华民国”的英文缩写)字样标志的商品进口的规定,允许台湾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台湾制造”的标志。^⑨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过反对美国政府采取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的立场。在中美建交之后一年,美国又重新恢复对台湾当局出售武器,

尤其是声称要出售像FX中程战斗机这样的武器装备,既有损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又势必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危害台湾回归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对此,中国政府感到愤慨。值得指出的是,中美建交之时,美方曾经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⑩而向台湾当局提供武器与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正常的商务关系完全是两回事。不管美国政府用什么理由进行辩解,都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这些事态的发展,中国方面显然不能置之不理。198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日报》以《不要做有损于中美关系的事》为题发表新华社评论员文章,谴责美国政府违背中美建交协议的原则,不断扩大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口头声称,他们不会阻碍中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和解的进程”,但在行动上却又把大批军火输往台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是违背国际信义的。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人民立志要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在美国却有那么一些人,总想在这个问题上插手,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他们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文章最后说:“中国人民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他们正密切注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其他问题上将走多远。”^⑪

1980年7月6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应中国人大常委会邀请访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赵紫阳分别会见了伯德一行。

赵紫阳副总理在同伯德的谈话中再次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赵紫阳指出,中美关系一年多来的发展是好的,总的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在美国政府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上,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向台湾供应武器的问题上,中国人民的反应很大。美国政府的上述行动,不符合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我们不得不对此作出公开反应。赵紫阳还说,当前国际局势要求中美加强合作,不要再出现任何有损于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行动。他希望美国国会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⑫

7月8日,伯德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试图平息中国方面的愤怒。他强调美中友好合作关系进程是不可改变的。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据报美国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问题时,伯德说,美国还没有作出向台湾出售这种飞机

的决定。他说,事实上,据我所知,将来是否制造这种飞机,还没有作出决定。即使有朝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国会不仅有责任研究这样的建议,而且有权否决任何这样的交易。伯德说,我要把中国方面对这件事的关注转达给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④

后来,卡特政府综合考虑中国方面的反应和台湾方面的所谓需要,除了1980年7月批准对台销售50门8英寸自行榴弹炮之外,没有向台湾当局出售“足够的能够使之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的武器”,同时也使中国大陆“不对台湾构成心理上的威胁。”^⑤美国对台出售FX战斗机的事情也暂时搁置。

但在此之后,美国对台销售武器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继续在台湾海峡两岸之间搞平衡,从而使这一问题日益复杂化,并且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爆炸性的威胁。美国之所以坚持这种政策,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把对台军售当作其外交政策的工具,“军售乃外交政策之本身的最大体现”。^⑥此外,美国也从对台军售中捞取经济上的好处,“军售不仅被认为是获取外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而且被认为是为军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的手段。”^⑦因此,中美之间就这一问题还将进行长期、复杂的斗争。

美台互相给予非官方代表外交特权引起风波

中美建交后,美国和台湾本应保持非官方的关系,但是,1980年10月2日,“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台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双方派驻对方的机构和人员享受外交特权和豁免权。这是美国方面搞出的又一起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事件。

“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美国和台湾在中美建交以后互相在对方设立的非官方机构,用以处理贸易、商业等民间关系。这项协议的签订,实际上使这两个机构的人员成了正式的外交人员,只是没有这样的名义而已。更为严重的,这项协议显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当新华社记者向美国国务院询问此事时,美国国务院负责官员回答说,美国政府“很清楚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协议”,它“对此没有表示反对”。^⑧

美国政府在中美建交前夕,曾于1978年12月15日发表声明,承诺“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⑨中美建交后,美国于1979年1月16日,

正式宣布“美国在台湾协会”已经成立,并认为“这是从同台湾的正式关系走向非正式关系过程中的下一个步骤。”^④随后,台湾当局在美国成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按照对等的原则,也只具有非官方的民间机构的性质。而到1980年,美国政府却支持这两个机构签订协议,使这两个机构实际上具有某种官方的色彩,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美国方面在为这个协议的“合法性”辩解时,搬出了《与台湾关系法》作为依据,但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与台湾关系法》本身就是违反中美建交公报的产物,中国政府早已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且它是美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法律根据。

按照国际法的准则,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国与国政府间关系中官方代表机构和人员所享有的一种权利,任何非官方的民间机构和人员都无权享用这一特权。过去美国也从未给予什么非官方的民间机构以这种特权,现在却对台湾驻美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情有独钟,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一位美国观察家在评论这项协议时指出:“从理论上说,美国 and 台湾只有非政府级的联系,但实际上,正式外交关系的各种标志现在几乎全都存在。”^⑤表面上是非官方机构,实际上具有官方色彩,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在中国方面就此事提出批评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于1980年10月6日表示“拒绝”中方的“指责”,声称这是一件“小事”,并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特拉特纳还说,美台之间的特权和豁免协定是一个“民间协定”,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毫无变化”,“《与台湾关系法》授权在互利的基础上提供为使台湾机构及其人员有效地进行工作所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⑥

但是,美国这位发言人的辩解并不能解除中国方面心头的疑虑。1980年10月9日,《人民日报》以《不明智的行动》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美国无视国际法准则和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行为。文章指出:中国人民对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重视的。但是,中国人民决不会牺牲原则,容忍美国任何方面搞“两个中国”的活动。必须指出,发展中美关系,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不单是符合中国一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一方的利益。美国不少政界人士就一再指出,破坏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见,是使中美关系的发展继续前进还是发生逆转,这是摆在美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目前,美国政府支持使美台关系具有官方性质的这种做法,背弃了自己承诺的义务,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这种不明智的行动已经使中国人民的

感情受到伤害,无疑将会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⑳

1980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北京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就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和台湾的两个非官方机构签订互给对方以外交特权与豁免协议一事,向美方正式递交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

10月16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处发言人特拉特纳再次就美台互相给予非官方代表外交特权协定进行解释。他说:“我们保证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和不派政府代表的实际关系,虽然美中一致同意这一原则,但我们有时在什么构成官方性质问题上有分歧。这次显然属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个协定决不构成美台关系的升格,也没有同我们做出的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保证相矛盾。”^㉑

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些一连串的不明智的行为,逐渐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美台关系发展的警觉。

对里根上台前后对华政策做出反应

在卡特总统任职期间,虽然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引起了种种纠纷,但由于卡特谋求与中国发展一种战略性的关系,因而他对于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是比较重视的,在处理对台关系方面也还是有所克制的。由于卡特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过程中,运用“斟酌权”有意冷落美台关系,甚至不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办公室会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从而引起了美国政界与台湾关系较深的保守势力的不满。他们利用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攻击卡特的对华政策,掀起了一股逆流,企图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与台湾重新建立“官方关系”。

尤其引起人们关切的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其发表的竞选演说中语出惊人,他除了嘲讽卡特政府所谓“以水对火”的对苏政策外,还公开引用美国同时承认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例,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个国家两个政府”。^㉒他几次提到他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与卡特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并公开把台湾称作“中华民国”,放言说,如果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将支持重新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使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大为惊慌^㉓。因为这将意味着美台关系升格。

里根采取这种态度并非偶然。里根属共和党保守派,自从他1971年10月访问台湾以来,就一直是“台湾的坚决支持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里根曾以州长身份受尼克松委托前往台北安抚蒋介石。1978年12月26日,当卡特总统宣布美国同台湾关系降为“非官方”的第二天,里根就通过他的两名高级助手迈克·迪弗和彼得·汉纳福德发表一项声明,说这是“公然背叛”台湾。另有美国报纸报道说,据美国司法部外国间谍登记科的档案记录,里根的两名高级助手迈克·迪弗和彼得·汉纳福德主持的事务所,在1977年11月18日受聘于台湾,“担任顾问和协助撰写社论”,“目前每月得款五千元”。^⑤

据汉纳福德说,自从里根去年冬天宣布作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虽然不再是这个事务所的当事人,但是,汉纳福德和迪弗仍然同里根和他的竞选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事务所在接受台湾大笔款项的同时,继续为里根准备发言稿、新闻稿、报纸消息和其他公开讲话,包括一些支持台湾而反对美国 and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关系的讲话。可见里根和他周围的谋士们与台湾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里根等人的这些言论,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因为这些主张一旦在里根上台后实施,将从根本上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并且危害亚太地区 and 世界反霸统一战线格局。198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美国政界和舆论界一些人在中美关系上接二连三发出这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企图重新制造“两个中国”的开倒车的言论。

评论指出:人所共知,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以及中美合作的不断发展,是建立在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基础上的。为此,美国政府承担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的义务。这是经双方代表庄严签署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明文规定的。如果按照里根声称的政策,美国 and 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被彻底破坏,中美关系将倒退到两国人民都不愿看到的状态。至于那种主张恢复美国在台湾的驻军、恢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荒谬言论,那更是对中国内政明目张胆的干涉。评论还指出:“当前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十分动荡。霸权主义正在把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到这里。从阿富汗到柬埔寨,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到处都可以看到苏联加紧推行全球战略的步伐。在这种形势下,凡是有现实感的人都懂得,一切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和行动,究竟对谁有利。”^⑥

里根的言论也引起了卡特政府以及其他有识之士的普遍忧虑。1980年6月1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评论里根的主张时说:美国如果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这将破坏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将是非常危险的。^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指出,如果改变美中实现正常化的方针的话,“那将是我们要仔细考虑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认为,重新把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升格到“官方”级,将被看成是“美国领导人决定要使中美关系整个正常化的基础倒退”,“那将使中美关系立即陷于停顿,也许在一段时间以后甚至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⑦专栏作家布兰登发表文章说:“里根关于恢复对台湾官方承认的言论,不仅会给中美关系带来灾难,而且会把美国远东政策整个打乱。”他说,“里根的极端鹰派立场也许只使某些人发愁,但他对外事的无知,将使每个人担忧”。^⑧

面对中外舆论的批评,里根的外交政策顾问们也担心这种立场会使人们对里根在外交方面的判断能力和中美关系的前途产生怀疑,于是他们商讨对策,由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人里根的总统竞选外交政策主要协调人理查德·艾伦出面,于1980年6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为里根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辩解。

艾伦说:里根只是“认为美国和台湾之间最起码也应该保持一些正式的关系。……应把形势倒转过来,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北设立联络处”。艾伦还说:“里根州长既没有讲过、也不持有同台湾重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想法。但是他曾说过,他想研究一下使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具有一种官方性质的可能性。”艾伦接着说:“(里根)州长没有预料对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现状做出任何改变。我认为,里根承认存在一种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是符合世界和平最大利益的,因此他对保持这种关系极感兴趣。”艾伦还否认里根的言论是一种“倒退”,他说:“里根州长和他的班子承认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不想采取将会损害这种关系的行动。”^⑨

但是,艾伦无法解释把美国现在台北的“美国在台湾协会”升格为官方机构“联络处”,怎么不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又怎么不同他所说的“不想采取”损害中美关系的行动的诺言自相矛盾。事实上,艾伦说的这个“倒联络处”的方案,早在中美建交谈判时就为中方所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也已放弃了这种方案。在中美建交一年之后,里根等人

又把这个实质上是主张“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方案重新拾起,显然严重违反中美建交时关于美国政府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的协议,这当然是一种“倒退”,而且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倒退”,由此不能不损害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客观地说,里根作为一个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的鹰派,并不否认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但他试图在不“放弃”台湾的情况下来发展中美关系,这就不可能不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他的主张一再遭到中国方面的批评,但他并不死心,还是想进一步试探中国方面对他们对华政策的容忍限度。为此,他决定派他的竞选伙伴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1980年8月16日,里根在洛杉矶为布什送行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他过去的一些讲话曾被误解为主张同台湾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其实,他是赞成建立“官方的联络处”,而这并不意味着关闭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布什启程前向记者表示,里根的对台湾政策大概不会是他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主题,讨论的重点将是全世界的安全和贸易问题。里根和布什的讲话说明,这时他们不但没有放弃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立场,而且还想在与台湾修好的同时来发展中美关系。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对此,中国方面当然不能答应。1980年8月19日,《人民日报》以《不要错打算盘》为题发表短评指出:里根在谈话中力图使人相信,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是可以与“继续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并行不悖的。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人们知道,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原则基础的。在中美建交后的今天,如果美国同台湾恢复所谓“官方关系”,实际上就是使早已破产的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复活,这就根本破坏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必然要影响到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显而易见的。^⑧

《人民日报》的这个短评实际上反映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和态度,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注意。美国的三大电视台都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人民日报》批评里根的话。8月20日,美国各大报都刊登了它们驻北京或东京记者关于布什先生东亚之行的报道,并在标题中突出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新闻界对《人民日报》这篇评论的重视,反映了美国公众希望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沿着中美建交协议的轨道顺利发展的愿望。

美国的政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批评里根的讲话。美国助理国务卿霍

尔布鲁克8月20日指出,如果美国在台湾设立联络处,那就会在这个地区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伯德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可能在维持同台湾有‘官方关系’的同时,继续同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并建立牢固的联系”。伯德还说:“我不相信这个国家(美国)会赞同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上倒拨时钟。”^⑦

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约斯特8月20日对中国记者说:主张使两国关系严重倒退的人在美国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反对里根的主张。他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8月19日对中国记者说:“要使美中两国关系倒退,不用说美国人民通不过,就是国会也通不过。一年多来的情况表明,国会议员中大多数主张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关系。”^⑧

邓小平于8月22日会见了布什一行,并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尖锐地批评了里根有关台湾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纲领。他指出:“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因此,他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四点正式立场:“(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一九八〇年大选后哪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条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⑨邓小平认为:“我们不相信破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人会有一个明智的对外政策,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战略观点。”关于台湾问题,他说:“对台湾,我们在保留武力解放权利的同时,力求和平解决。要真正加强中美关系,《与台湾关系法》必须去掉,因

为它已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⑥

邓小平在与布什的会谈中还表示,中国理解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中国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1979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现在又重新起来了。中国方面请布什先生向里根先生转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很清楚的立场。^⑦

布什8月24日回国后,向里根详细汇报了邓小平所要求转达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他所了解的情况。8月25日,美国共和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里根和布什在洛杉矶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全面阐明他们的对华政策:(1)“美中关系无论对中国的利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全球性的和战略性的。”因此,他愿意“寻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2)“保证同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台湾合作,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努力”。(3)“同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合作和磋商,共同坚决对付威胁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侵略和谋求霸权的行径”。(4)“使美国同台湾的关系依照我国的法律,即《与台湾关系法》得到发展”。(5)“不允许任何外国在我们保护美国利益和执行我国法律时进行干预”。^⑧里根还指责卡特接受了中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项条件,并主张应该“在台湾保留一个联络处,其地位相当于我们当初设在北京的联络处”。里根在声明中闭口不谈中美关系的基础——中美建交公报,却大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对于确保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提供了官方及充分的基础”,并声称“我保证要执行这个法案”。他还表示“要革除卡特政府的小人作风,这种贬抑我们在台湾的中国友人的做法至为不当”。^⑨

鉴于里根的这个声明重弹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老调,又是在布什访华之后,对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并且带回了邓小平的信息之后发表的。这就更加使中国方面产生怀疑,里根到底想把中美关系引向何处。

1980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批评里根的讲话。文章指出:事实上,里根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张,已经比《与台湾关系法》走得更远。里根坚持要恢复美国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允许台湾“官员”可以在美国政府机构内同美国当局进行官方接触。这决不是什么“语义学”的问题,而是公开鼓吹搞“两个中国”。里根的错误主张如果付诸实施,必然导

致中美关系的大倒退。文章强调中国对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重视的,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受到损害。这不仅是从中国本国的利益出发,而更重要的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大局出发。事实已经证明,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因此,中国评价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也把它对中国的政策作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行动,都会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⑫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于8月28日在北京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先生最近关于美台关系的言论是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的。这种言论是鼓吹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还指出:“中国同美国发展关系不仅仅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全球战略出发的。他说,处理中美关系必须以中美建交公报为依据,而不应该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李先念表示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更不应该倒退,而应该继续发展。^⑬

里根的讲话也引起了卡特政府的不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8月26日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重申,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美国同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非官方的、非政府的”关系。他说,里根的建议将会使目前已存在的关系复杂化。国务院发言人援引美中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反驳里根提出的要同台湾保持“官方、政府”关系的要求;中美联合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他还援引美国政府当时单方面发表的声明反驳里根的立场。美国政府这项声明当时曾说,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⑭

面对中外舆论一片反对的声浪,里根虽然对台湾有较深的感情,但他个人也无力阻挡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对中国的忍耐限度进行了一系列不成功的试探之后,里根逐渐对他们对华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正,并且开始降低了对台湾的调门。1980年11月,里根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在这之后,他对中美关系的讲话态度比以前审慎了一些,有了某些变化。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此时也认识到,在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双方为了

拉选票所宣布的国际国内政策,往往同上台后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对里根也采取了向前看的政策。

11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有影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表示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并强调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当费尔问到里根先生就任美国总统后,你是否期待他到中国来访问时,邓小平在回答他的提问时就发展中美关系阐明了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当然欢迎。这取决于里根先生的考虑和他的时间。因为中美关系是共和党执政时尼克松先生开始恢复接触的,又是共和党福特总统发展的,后来民主党卡特总统又发展了这些关系。多次听到,发展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政策。希望里根执政后不要使这种关系停滞,更不要倒退,需要继续发展两国的关系,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这是一个最富和一个最穷的国家打交道。中国虽仍然是个穷国,但从战略上讲,还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这番话指明了发展中美关系对于中美两国都具有战略意义,反驳了一些美国人所谈,好像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有求于美国的论调。在谈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时,邓小平说:“里根先生会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们对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真正造成中美关系危机的是对台湾关系法。一句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要发展,不要停滞,倒退。我相信美国人民的大多数会理解这一点。”邓小平还认为:“双方领导人进行接触总是有益的。”^⑮

1980年11月24日,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对外政策顾问艾伦试图从正面阐明里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兴趣。艾伦说,通过贸易、文化交流等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是符合美中共同利益的。当美国同中国的目标一致时,美国应允许进行某些可供军用的高级技术项目(如雷达等)的贸易。美中在防止苏联独霸亚洲方面有共同利益。艾伦又说,目前这并不等于是一个联盟。美中联盟目前是不能实现的。^⑯

不过在里根的过渡班子内部,顽固坚持亲台湾立场的人还是大有人在。1980年11月28日至30日,里根的亚洲政策顾问雷·克莱因到台湾访问,会见了蒋经国、孙运璿、朱抚松等台湾高级官员。在此之间,他于11月26日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然提出中国应“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的政策”,并“要求中国恢复文明的行为准则”。11月28日,他又在台湾对记者信口开河,说什么“里根新政府已保证充分地、公正地实施《与台湾关系法》”,而在保持同北京关系方面将是“谨慎的”。^⑰

克莱因的讲话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关切。1980年11月29日,新华社以《堂堂美国“战略家”竟弄不清谁干涉了谁的内政》为题发表记者述评,逐条批驳了克莱因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1980年12月1日,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过渡班子办公室发言人出面澄清事实,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克莱因东南亚之行是一次“私人访问”,他不代表里根,也不代表过渡班子讲话。这表明,里根此时已不愿因台湾问题过分得罪中国政府。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外长时谈到中美关系,指出:“里根的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一看,现在多说无益。我们跟布什,也通过布什向里根讲清楚了,我们不相信搞中美关系倒退的人能在全球战略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政策,在全球战略中,把中国的作用估计得很低,是缺乏战略观点、没有远见的体现。”^⑧

由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坚决斗争,随着里根正式上台日期的临近,里根的对华言行愈加谨慎,1981年1月,里根在回答记者就中美关系提出的一些问题时,一方面说:“我相信应保持和发展那些关系”,“我们应该前进”;另一方面又说“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抛开台湾——一个长期的朋友和盟友”。^⑨在这里他虽然仍坚持不抛弃老朋友,但已不再明确提出要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

全面阐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中美关系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中国实际上是把美国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成员加以对待的。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需要同美国建立更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上,中国会因此做出无原则的让步。在美国一再出现违反中美建交原则的言论和行为的情况下,邓小平觉得有必要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有针对性地就中美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直率地指出: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

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我们请布什先生向里根先生转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很清楚的立场。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邓小平说,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前年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当时人们判断中国惹不起苏联。我说,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有风险中国独立承担。结果我们还是做了。据此,邓小平认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的议论。邓小平指出,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邓小平说,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因此邓小平警告美国,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

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少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是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邓小平指出,最近荷兰发生了一件事,说是荷兰的公司搞的,准备同台湾签订合同,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荷兰政府当然干预了这件事。其实荷兰政府搞这笔交易是得到某些人支持的。我们正在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当然,我们还会做一点工作,希望荷兰改变它的立场,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议会是以微弱多数通过这个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笔交易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做了工作以后不行,那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希望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么,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使之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认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①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情况进行认真观察和缜密的思考,总结出的结论。它表明,中国方面对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的倒行逆施的严重程度已有充分的估计,尽管中国政府愿意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但也决不会拿原则作

交易,更不会吞下有损于民族利益的苦果,只有中美双方共同遵守中美建交协议的各项原则,中美关系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对于这一点中国方面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一立场是郑重的,不容忽视的。

在里根入主白宫前夕,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委员会曾邀请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彥士出席里根的总统就职典礼。这是里根政府企图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由此引起了中方的关注。据外电报道,里根政府还将允许台湾在美国增设办事机构,美国还在酝酿向台湾出售FX新型战斗机。而在这之前,由于受美国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的大气候影响,荷兰已于1980年11月决定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方面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势必会在国际上引起连锁反应。

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发出指示,对美国的倒退行为要坚决顶回,否则美国以为中国人可欺,问题肯定会层出不穷,官司会打不完。要经过曲折斗争之后,争取保住原来的中美关系。^⑧

据此,中国外交部就美国邀请台湾派代表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的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由于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终于迫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1月19日正式宣布,美国官方只正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当被问到是否有任何来自台湾的中国人受到美国官方的邀请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时,这位发言人说:“作为中国的大使,柴泽民阁下已经受到美国官方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除柴大使的夫人外,没有其他中国人受到官方的邀请出席典礼。”这位发言人还说:“任何来自台湾的人士出席典礼将只能作为个人参加,没有任何官方或代表的资格。”^⑨

1981年1月20日,中国大使柴泽民应邀出席了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而台湾当局的代表蒋彥士此时虽然已经到达了华盛顿,不想美国改了主意,不让他露面,只好由台湾中央社宣称,原拟参加里根总统就职典礼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彥士赴美后因“患重感冒住院治疗”,而未出席典礼。^⑩

为了抗议荷兰决定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一事,中国外交部下令召回了中国驻荷兰大使,并宣布如果荷兰方面坚持错误,中方将不惜使外交关系降格。

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两场前哨战,只是揭开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斗

争的序幕,后来的较量还将更加激烈和错综复杂。对此,中国方面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美方对邓小平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回应

面对邓小平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售台武器的批评,以及中国方面采取的一些强硬措施。里根班子内部的有识之士也觉得美国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由此将严重损害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他们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美国不宜因为台湾问题而在同苏联的战略对抗中“失去中国”。^⑧

这时,坚决主张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的美国新任国务卿黑格出面向里根总统进言:“台湾在经过卡特时期的冰封之后,感觉到较为友好的气氛,便想通过增加接近政府官员的机会寻求象征性的利益,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能允许的。消除这种非官方的掩饰可能严重地、也许是无可挽回地恶化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本人对此表示关注并曾提到中美关系破裂的可能性。中国人是很认真的,他们直言不讳,并不装腔作势。”^⑨

在经过前一阶段对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忍耐限度的种种试探之后,里根这时也担心,如此下去会危及美国与中国在遏制苏联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里根觉得应该做出一些姿态来稳定中美关系。

1981年2月6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美国将遵守美中关系正常化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美国应承担的庄严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威廉·戴斯在2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时说:“1979年1月1日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取代了上海公报,它是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基础。这一公报确定了美国的庄严责任,我们当然将遵守这些责任。”他表示,我不能说,美国对“它同中国的关系或同台湾人民的关系所进行的检查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我可以说,我们将遵守我们认为是庄严义务的那些责任”。他还说,美中关系联合公报“是一项国际承诺,是一项前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将遵守它”。^⑩

2月10日,戴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有责任遵守”美中建交联合公报中规定的“庄严义务”,但他又说,美国认为履行美中建交公报与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没有矛盾”。这里戴斯虽然仍表示美国将执行在很多方面

违反中美建交协议的《与台湾关系法》，但其调门已大大降低，并且不再公然鼓吹要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

1981年3月2日，里根总统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将致力于在中美建交公报的基础上加强两国之间重要的战略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好和互利的文化和经济关系。^⑧这是对中国领导人致里根总统贺电中提出的，希望中美关系“将在双方恪守中美建交公报各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设想的一种积极的呼应。

随后，美国发表国务卿黑格同记者的谈话，意在进一步澄清里根政府的对华政策。黑格说，里根“设想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这是一个基本的战略现实，也是战略上的必需。这对于维护国际局势的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还设想要遵守有关同北京签订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定的公报。他设想在遵守美国对台关系法的基础上，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的关系。”^⑨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谈话不仅着重强调了中美关系战略意义，而且还以明确的语言宣布了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里根竞选时许诺的美台关系升级的提法。这说明，里根政府对华政策中现实主义成分在增加。

在这之后，黑格趁热打铁建议美国把中国贸易地位改至友好但非盟国一类，以区别于苏联东欧集团。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向中国转让一些先进技术，其中包括一些既可供民用也可供军用的技术，并允许中国提出要求向美国商人购买美国武器，包括防御性武器在内。当然，中国购买武器的申请还将由美国政府协同国会逐案审查，如同对待美国的其他友好国家一样。^⑩黑格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但是，美国仅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做出姿态是不够的，因为中美之间还有更敏感的问题。1981年4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中美关系变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中国和日本建交、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关键是这个问题，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也是这个问题。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后，一般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正常的，但新问题还是台湾问题。我们也跟里根政府的一些领导人说清楚，中国不会由于美国对苏联强硬，所以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怎样处置我们都可以吞下去，这样不行。”^⑪

为进一步沟通中美双方的想法，1981年6月初，邓小平致电美国国务卿黑格，表示希望黑格不久能访问中国。这将是里根新政府的高级官员首次

同中国领导人会谈。里根总统指示黑格转告中国方面,第一,美国正遵循一项全面的政策以对抗苏联及其代理人的扩张主义,并强调美国在亚洲存在的永久性。第二,把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的决定强调了中美关系的新概念基础,这种关系是以美中两国的战略联系以及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共同目标为基础的。此外,黑格还受命探讨在台湾问题上谋求暂时解决方案的问题,包括非官方关系和武器销售的限度。^①

在宣布黑格访华之后,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向华盛顿的记者们介绍情况时再次强调了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他说,美中关系是以“三个支柱”为基础的,即对全球战略形势持相似的观点,关心亚洲的稳定和进步,密切美中之间的贸易和交往关系将给双方带来好处。这位官员还说,黑格访华同中国的讨论将“集中在战略方面”,黑格将“谋求扩大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以“澄清”里根政府执政初期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气氛”。^②

在中美关系处在微妙的时刻,黑格一行于1981年6月14日抵达北京。这次来访和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高级会谈,对加深里根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在欢迎黑格的宴会上,第一次对里根上台后为稳定中美关系多次表示要尊重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并重视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的言论表示了赞赏。他还阐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他指出:我们重视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尽管双方的政策和观点有不少分歧,但同时双方也有许多共同和相近的观点。我们相信,只要双方都从战略全局着眼,确信加强彼此合作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同时又能审慎而恰当地处理分歧问题,困难是能够克服的。^③

黑格在讲话时说,在我们面临和平与安宁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合作在今天尤为重要。里根总统已经保证美国将同它的盟国与友邦一道,勇敢而一致地抵御侵略。在作出这一努力的过程中,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亲密而珍贵的朋友。我们两国的民族利益,在许多方面是并行不悖的。我们的政策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强大、安全和繁荣对于全球的平衡具有根本的意义。黑格说,美国总统已经承担了不断加强两国关系的义务。因此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同黄华副总理一道,探讨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④

6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黑格一行,他说:我不讲外交辞令,有话直截了当地说。随后邓小平与黑格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坦率地指责美国未能

履行卡特政府任内所作出的承诺。1979年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曾同意提供20亿美元的进出口银行信用贷款,并在技术转让方面提出较通融的政策,但中国始终未收到这笔贷款,而且甚至连最简单的技术或军事设备都得不到。对此,黑格告诉邓小平,在以往的承诺方面他将得到里根政府的充分支持,包括那笔20亿美元的贷款,而且给予中国新的贸易地位就是旨在缓和与技术转让以及军火销售有关的问题,但是修改法律或者拨款都必须有国会的批准和行动。^⑤邓小平指出:“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年看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如果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又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我们贸易关系有发展,中美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调了行动。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发展。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仍采取敌对国的态度来处理同中国的贸易、商业、技术转让等问题。当然,摆在我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现在台湾海峡形势很平静,有什么必要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要统一祖国,使台湾回归祖国。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但不要停止在现阶段的水平上,而且要发展,这对全球战略有益。但现在这样的意愿还不是很稳定,还经常有那么一些事情或因素干扰这种意愿。我们希望干扰的事情尽量减少,没有更好,至少应该尽量减少。我讲这个是因为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⑥

同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会见了黑格。此前,黄华和黑格于6月14日和6月15日就中美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和中美双边关系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在连续三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坦率地阐明了各自对全球局势和国际重大问题的观点,尽管双方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和相近之处。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负有重大责任;双方都强调,中美两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采取行动时,有必要加强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国家的磋商和协调。在中美双边问题上,双方回顾了两国关系已有的发展,并对在各个领域进一步发展互利合

作进行了探讨。黑格向中国领导人保证,里根政府打算根据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来发展两国的关系;美台之间的来往将在“非官方的”的前提下继续下去。这就使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若干进展,但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仍有较大的分歧(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作进一步的探讨)。在中美会谈中,黑格还向中国领导人转交了里根总统的信件,并代表美国总统邀请赵紫阳总理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访问美国。赵紫阳总理接受了这一邀请,同时代表中国政府邀请里根总统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⑦

为了进一步扩大中美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双方商定,以中国副总理薄一波和美国财政部长甘里为首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将于秋季在中国举行第二次会议;中美两国将成立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两国防务机构之间的交流应继续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将于8月率团访问美国。中美双方就各增设三个总领事馆的换文达成了协议。这些都是黑格此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黑格在访华期间还告诉中国领导人,里根总统确信,美国对华政策应反映出我们关系的友好合作性质,为此,美政府拟在三个方面采取切实可行和富有意义的主动行动:第一,总统将发布一项指令,大幅度增加按常规批准向中国出售的技术水平,这反映出我们打算把中国当成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来对待。第二,总统将下令暂停实行体现在我们的武器控制法律中的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允许逐项考虑关于向中国出口武器许可单上开列项目的申请,这是一个对所有友好国家都遵循的程序。第三,总统将建议国会修改把中国与苏联同等对待的法律,以清楚表明,美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潜在的敌国,并且为将来双方进一步合作消除法律上的障碍。^⑧

6月16日黑格在北京正式宣布,美国将取消向中国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并在技术转让中把中国列入友好的不结盟国家。

本来黑格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然而,就在黑格访华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天,又出现了一种不和谐的音符。里根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他又说:“我们有一个法,这个法叫《与台湾关系法》。该法规定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装备,还规定了双方关系的其他问题。我们应履行《与台湾关系法》。”^⑨这番出格的话,反映出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中的自相矛盾,从而给中美刚刚创造出的良好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对台销售武器问题再起波澜

由于里根上台之后逐步放弃了要使美台之间恢复官方关系的打算,从而使中美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有所缓解,但在对台销售武器方面,美国非但没有多少收敛,反而不断传出这样的说法:美国政府愿意把性能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中国对此没有“否决权”。这就使中美建交谈判时没有解决的美国对台销售武器的问题,显得愈加突出,引起了人们的更大关注。

对台销售武器直接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此是十分敏感的。他曾多次表示,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做得过分,两国关系不仅会停滞,甚至会倒退。但美国方面仍想试探一下美国对台销售武器所能达到的极限。

1981年3月,美国前总统福特曾提出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里根政府就此作出了训令):美既向台湾供应新式武器,又允许对中国大陆的武器出售。^⑩显然,美国是想用拟议中的允许中国购买美国的武器和防御技术来换取中国对美国进行新一轮的武器出售的默认。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连美国的媒体也批评美国政府:“通过卖武器而赢得朋友的思想反映了(美国)国际交往中可悲的思维贫乏。”^⑪

1981年6月1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这一问题发表谈话,警告说“如美竟然不顾我一再坚决反对,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我势必作出强烈反应”。^⑫

1981年6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黑格到达北京,与中国方面就这一问题进行会谈。此时美国方面对中方立场估计不足,以为中国面临北方威胁,如开始把中国称作“友好的非盟国”并允许放松对华技术转让,包括部分军事用品,中国就会容忍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这只是美方的一厢情愿。当黑格说美方拟向中国转让高级技术和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时,中国外长黄华明确表示:“中国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强调,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中方将作出强烈反应。^⑬

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黑格表示,他认识到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将非常谨慎和克制地对待这个问题。但他仍坚持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仍要向台湾提供一些经过仔细选择的、性能适度的防御性武器”。对此,邓小平在会见黑格时极其严肃地指出:我们对美售台武器上容忍有限度,干

扰太厉害会使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希望美国政府从更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黑格仍然说,美国会十分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⑨

就在黑格访华前后,美国朝野人士又发表了一些要充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言论。由此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批评。

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为题,发表新华社记者述评指出:在发展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一个关键的环节,或者说障碍,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文章认为美国的做法不能不使人感到美国朝野始终有一些人谋求使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取得国际地位,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十亿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允许的。^⑩

在这之后,美国的戈德华特、麦克卢尔和赫尔姆斯等数十名参议员又写信给里根总统,表示支持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美国众院外委会主席扎布洛基也跑到台湾,信口开河,说美国政府愿意把先进武器卖给台湾,而且估计在明年初就将作出向台湾出售包括FX战斗机在内的先进武器的决定。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中国方面当然不能保持沉默。《人民日报》又陆续刊载一些文章和报道,继续抨击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这时的中美关系又笼罩上了一层阴云。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推迟访美,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中美关系的波动引起了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敦促里根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1981年8月10日,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并不是虚张声势》的文章说,如果中美关系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发展,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战略性的决定。文章说:“在华盛顿,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是在吓唬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会容忍我们就台湾采取的一切行动,因为他们害怕莫斯科,而且别无其他依靠。这种信念看来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在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以后的十年中,中国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都没有改变它对台湾的立场。而且连续四位美国总统,其中包括里根,都接受或承认了这种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能采取一些对这个长期坚持的立场有任何疑问的行动,除非我们想冒很大的风险。”^⑪

为了打破在台湾问题上的僵局,1981年9月30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台湾和祖国大陆实现和

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共提出了九条具体的方针政策:

(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到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⑧

后来,邓小平指出,这“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这实际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⑨这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力争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诚意。

1981年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时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统一大业的事情。叶剑英委员长最近阐述的九条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回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⑩

这就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了新的形势,在客观上为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彻底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隐患,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1981年10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协会访华团时再次谈到台湾问

题。他指出：“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⑩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对台政策方面做出的上述阐述，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方面用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继续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介入中国内政问题，只能使解决台湾问题复杂化。

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与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

由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中美之间激烈的争执，已使邓小平下了这样的决心，这一问题如果美方不加以稳妥地解决，中方将有可能不惜降低中美关系的规格。1981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时坦率地指出：“对台湾的局势，蒋经国能够控制。在叶剑英委员长的几点声明发表以后，美国没有理由向台湾提供武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的确存在着中美关系停滞或倒退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十分强烈。”^⑪邓小平破釜沉舟的决心对美方构成了相当的压力，因为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对美国是有其战略利益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双方领导人开始寻求对话，以期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981年10月21日，在墨西哥坎昆出席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10月22日至23日）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应邀与美国总统里根会晤并共进午餐。见面时，赵紫阳先开了一个有关“北极熊”的玩笑，使里根为之展颜。借此机会，赵紫阳总理、黄华副总理兼外长直接向里根总统、黑格国务卿提出台湾问题。事后，黑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国领导人就全球战略交换了意见，

并直接讨论有关台湾的敏感问题,听取了中方提出的“九点计划”,会谈“非常有成果”。^⑩

在此之后,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于10月28日至30日访问美国,继续就这一问题与美国方面进行磋商。在会谈中,中方指出:中国历来反对任何外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因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在叶剑英委员长1981年9月30日宣布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后,外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就更没有必要、更没有道理了。这样做只能增加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⑪中方要求美国方面承诺:一、在规定的期限内,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方面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二、在规定的同样期限内,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至最后完全停止。美方表示:它不能接受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要求;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美国将继续执行“谨慎、克制、有选择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美国预期此后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都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对台湾飞机的更换也将如此处理。美方还表示愿意继续就此问题同中方进行会谈,在此期间美方将谨慎行事,但“它仍要做它必须做的事”。^⑫

中美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有较大的差异,一时很难弥合,但双方都想避免关系破裂,因此,都同意就此问题在北京举行正式谈判。显然这将是一场异常艰巨的唇枪舌战。

1981年11月2日,邓小平阐明了中国的对台政策,表达了对美国售台武器的关切。他指出:“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美国国务卿黑格六月来访时,我同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中美关系可能停滞或者后退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停滞或者后退,那不是中国干的事。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至于台湾问题,我相信美国,还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来推动谈判。就美国来说,促进这个谈判,至少是推动接触,实际上就是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而出卖武器、装备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

至少是一个损伤。”^⑮他还说：“我们同美国关系中主要存在一个台湾问题。美国有什么必要卖武器给台湾？我们希望进一步和美国交谈。”^⑯

此后，邓小平又在11月22日与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的谈话中再次强调：“台湾问题只有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作出正确的答案，才能处理得比较好。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感情问题。如果领导人违背人民的意志，即使不打倒，也应引咎辞职。”^⑰

黑格也对中美因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引起的争执感到担忧。1981年11月26日，他就美国售台飞机问题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并提出了若干建议。他认为，“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危急关头’。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如果我们想避免出现可能严重危害我们全球战略方针的挫折的话，小心谨慎地行事是必不可少的。造成对华关系危机的起因之一是我们在竞选期间的豪言壮语和后来的举动，这种言论和行动给北京留下了我们想要使正常关系逆转、采取‘两个中国’政策的印象。有鉴于此，本来可能是容易处理的替换飞机问题变成了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正如我们决不能认为北京可以任意指使的一样，如果我们任人摆布的话也是不可能同中国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的。但是，为了解除北京的猜疑，使美中关系重新走上轨道，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就大陆的能力和意图而言，不需要美国把出售武器的水平提高到卡特政府最后一年的水平以上，那一年规定的最高限额已经非常之高。只要北京还奉行和平的对台政策，我们就可以同意停留在这个水平以内。我们对更换飞机的问题也能参照这一情况来作决定。其次，虽然我们具体确定何时停止出售武器，但是我们可以研究出把我们今后行动与和平统一的真正进展程度联系在一起的方案来。就和平统一问题，应由总统出面在不对台北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公开说明你认为北京的努力是一个意味着台湾问题最终能够取得和平解决的建设性的和有希望的迹象”。黑格还指出：“北京对于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在技术转让方面和经济现代化方面没有给中国带来具体的好处感到失望，并且认为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一样，口头上说想推进正常化进程，实际上却仍然把中国当作对手看待。施政机构正在执行你6月4日的指示方针方面的怠慢与疏忽在这一方面一直给我们造成破坏。总统最好重申你决心把中国作为友好国家看待，这在对付继续把中国当作对手看待的那些地位牢固的官僚方面将大有裨益。为了

同中国建立长期的战略关系,增加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一支力量的价值,我们必须向北京提供它为了开发能源和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技术。”他认为,“中国人将采取强硬态度,直到我们在尊重他们的立场方面作出某种可信的姿态;他们并不想同我们决裂,而愿意妥协。我要求给予时间,我已经指示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新的一年里同中国人举行谈判,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中美关系很快就会改善。”^⑩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根据黄华副总理兼外长和黑格国务卿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从1981年12月4日开始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举行正式会谈。

在谈判中,中国方面表明的基本立场是,要求美国方面在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并要采取措施,逐步减少直至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方面在谈判中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同意今后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但不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只表示将逐步减少,最终解决这一困难问题。此外,美国仍坚持要把逐渐减少售台武器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⑪

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同意的。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如何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宣布准备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商谈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但中国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美国一方面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妨碍中国人民力争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另一方面又以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来作为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借口。这是没有道理的。中方坚决反对把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美国停止售台武器挂钩。

在谈判中,中方多次指出:1. 中美双方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即要不要在两国关系中切实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已严重威胁中美关系,而解决的关键在于美国切实表现出尊重中国主权,逐步减少以至最后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心。2. 中国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是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要求,而且已在主权范围内对美国作了极大的照顾;考虑到美国售台武器是一历史遗留的问题,只要美国表示出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的决心,中国可以再给美国一些时间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3. 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自己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

干涉；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争端，是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美国硬要把前者作为解决后者的前提条件，实际上是要让美国一方面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阻挠中国人民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为借口，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⑩

这说明中国方面在如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既是坚持原则的，又是通情达理的。中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所要求于美国的，只是要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

随着双方谈判的全面展开，对台军售问题再次成为热点并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有关中美关系的辩论。

美国报刊和一些著名人士纷纷发表各自的看法。有的指出向台湾卖武器既无必要，又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危险做法，必须停止。有的强调中美关系事关大局，对卖武器需要慎重考虑。有的则主张美国只管自行其是，不必理会中国的反对。也有的美国报纸发表文章，公开宣传“北京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无权否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有的人甚至蛮横地叫嚷制定对台湾问题的“外交政策的地方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涉及中国主权的事中国管不着，这种说法使不少美国人士也认为过于霸道。在中美建交前曾任美国驻台湾“大使”的昂格尔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写道，根据这些论点，中国也可以说，“美国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无权干预外国在夏威夷的活动”。美国一些知名人士指出，如果美国坚持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向台湾出售武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菲利浦斯写道：“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倒退到1979年两国建交之前的那种紧张的棘手的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给贸易和重要的战略关系带来各种消极的影响。”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纳特指出，这种影响将不限于两国关系，“甚至其最初的冲击波将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应，特别是美国那些亲密的盟国会就此对美国处理复杂微妙的外交政策问题的能力提出疑问”。还有一些美国人士指出，更重要的是，这会使美国的战略地位更加困难。因此，杰克逊参议员警告说：“美国政府所奉行的任何将导致改变同中国的战略关系的政策，都是在玩火，同时也是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⑪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里根的外交政策的毛病出在哪里？》一文中指出，目前在国际上美国正面临多事之秋，里根政府面前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如果政府同时破坏了我们同中国的新关系，中东、中欧和中美洲这三个地缘政治危机的前景就会更加暗淡。我们同中国的新关系不

仅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美苏建立均势也有明确的有益效果。”布热津斯基进而指出,里根总统应该向中国方面保证,“美国并不通过不必要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经由后门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¹²²

正当中美谈判紧张进行之际,里根政府在1981年12月11日非正式地通知国会说,它打算向台湾出售一批武装零件。1981年12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费希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美国可能从明年2月或3月开始,向台湾运交一批替换零件。他拒绝说明这些零件的用途和这笔交易的确切数额,只是说,数额超过2500万美元,因此美国政府要通知国会。他声称这是一笔“例行的交易”,“从军事技术上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笔大的交易。”当记者问:“它对于是否向台湾出售战斗机有什么影响或关系吗?”费希尔回答:“没有。出售战斗机的事甚至在原则上也没有决定。”费希尔还说,美国政府事先没有把向台湾出售零件的决定通知中国政府。他声称,美国“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打算继续以谨慎的方式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¹²³

这一消息在新闻界披露后,不能不使中国方面怀疑美国政府对于谈判是否真有诚意。1981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这一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他说,对美国向台湾出售零配件一事,我们正在要求美国政府澄清。¹²⁴

对此,美国方面一再向中国方面作出三点解释:一是这批零配件是在去年10月坎昆和华盛顿中美高级会晤之前向台湾承诺的,是在中美双方决定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举行会谈之前的定货,而不是新的出售;二是此次出售仅仅涉及零配件,并无武器供应;三是在双方继续就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商谈过程中,美国将不考虑对台湾的军事转让问题,即在中美就此问题进行会谈期间,美国将不向台湾出售武器。¹²⁵

鉴于美方作出了这三点具有约束性的解释和保证,中国方面从大局考虑,采取下不为例、以观后效的态度,继续同美国谈判以期彻底解决售台武器问题。

1982年1月10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到达北京,并于1月11日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举行会谈。

霍尔德里奇带来美国方面的最新信息,通知中国方面说,里根总统已决定不向台湾出售FX飞机(一种性能先进的新型战斗机),但将在1983年合

约期满后继续与台湾合作生产 F-5E 飞机。霍尔德里奇还向中国方面递交了一份清单,列举了美国方面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几条原则。从霍尔德里奇带来的信息来看,虽然美国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方面确定了一定的限度(例如拒绝出售台湾一直希望得到的 FX 飞机),^⑭但它仍坚持向台湾继续出售其他“防御性”的武器。

这表明,美国一方面从战略的角度出发表示要同中国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谈判陷入僵局的症结所在。

就在中美双方正在会谈期间,美国国务院于 1982 年 1 月 11 日,发表关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声明,一方面表示:“本政府非常重视执行美国政府长期来关于向台湾提供为了使它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所必需的那种防御物资的政策”^⑮;另一方面也表示,将不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战斗机。声明说:“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许多个月来一直在研究台湾防务需要的问题,并且仔细地考虑了同那些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必须作出的判断有关的许多因素。根据这种研究,政府已采取措施向台湾出售自卫所必须的项目。我们预期还要进一步采取这种措施。美有关机构也已就向台湾出售替换飞机问题作出了判断。它们的结论是,不需要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战斗机,因为在军事上不需要这种飞机。台湾的防务需要现在和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通过类似的飞机更换台湾现有的陈旧的飞机,以及通过延长在台湾的 F-5E 飞机的共同生产线期限来予以满足。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尚未制订出来,但是总统已批准了这些建议。”^⑯

对于美方的这一举动,中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1982 年 1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问题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飞机的问题,现在正由中国政府同专程来京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进行商谈。在双方正在会谈期间,美国政府宣布拟向台湾出售飞机的决定,对此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整个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必须由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商谈才能取得解决,美国政府任何单方面的决定,中国政府决不接受。”^⑰

在这之后,由于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陷入僵局,邓小平再次发出警告:中美关系面临“倒退”的危险。1982 年 2 月 25 日,他在会见摩洛哥首相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从全球战略考虑,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个台湾问题,美国人自己也说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个

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倒退。”^⑩ 3月26日,邓小平再次指出:“只有一个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同这一政策相抵触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我希望中美关系不会恶化,不会影响双方的经济关系。”^⑪

1982年2月27日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纪念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北京回应中方说,美国不准备让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十年以中美关系倒退而告终。^⑫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里根于1982年4月5日致函邓小平,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决遵守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所商定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不会允许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削弱我们对这项原则所承担的义务”,但在售台武器问题上,里根仍坚持与所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相联系,他说:“我完全理解并尊重贵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如你所知,在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已经申明了对我们这一问题的立场,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里根指出:“我们充分认识到1981年9月30日的九点建议和贵国政府早在1979年1月1日提出的方针的意义。1982年1月11日根据我的指示向贵国政府转达的决定和原则,反映了我们欣赏这些发展所开创的新局面。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愿意继续努力解决我们的分歧,并创造一个合作的、持久的双边战略关系。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它们注定要通过合作变得更加强大,而不通过分歧而遭到削弱。”因此,里根提出:“本着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了解的精神,我愿提请你注意,副总统布什将于4月底到东亚访问。副总统认识你,钦佩你。他也完全了解我对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重要性的想法。如能有益,我将很高兴让副总统访问北京,作为他亚洲之行的一部分,以便同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重要领导人直接和当面讨论这些问题。”^⑬

美国国务卿黑格在向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转交这封信时,还透露美国保证不向台提供数量、质量超过现有武器的军事装备,他强调美国重视中美战略关系,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⑭

1982年4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就美国售台武器零部件问题,重申美方于1981年12月曾向中方通报的三点内容:这笔交易不涉及任何武器;这笔交易是早在坎昆会议以前就达成的一项长期安排的一部分;在中美谈判期间,美不打算就出售武器问题作出任何新的决定。^⑮

4月13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美国国会,向台湾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

的与军事有关的零配件。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向记者宣读的一项公告说,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是“台湾为维修其从美国购买的飞机所需要的零件”。^⑫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对外军事销售额超过5000万美元需经国会批准。如果国会在接到政府正式通知后30天内不表示反对,就算通过。

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在1983年财政年度安全援助计划内,对台湾军售总额估计为2.5亿美元,其中商业销售为7500万美元。美方的这一举动背弃了它曾说过的“在双方继续就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商谈过程中,美国不考虑对台湾的军事转让问题”的保证,明显破坏了谈判的气氛。

1982年4月14日,中国外交部就此问题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与军事有关的零配件一事,早在1981年12月美国政府非正式通知美国国会的时候,中国政府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交涉过程中,美方向中方一再解释:这批零配件是在坎昆和华盛顿中美高级会晤前向台湾承诺的,不是新的武器出售;这次只是涉及零配件,没有武器供应;在中美双方继续就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商谈过程中,美国不考虑对台湾的军事转让问题。中国政府曾表示注意到美方的上述三点解释和保证。目前中美双方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商谈尚在进行。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无视中国的主权,背弃上述对中方的保证,它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⑬

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为了谋求突破僵局,并摸中方的底牌,由副总统布什受里根委托,于1982年5月7日到达北京,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讨论售台武器问题。

邓小平于5月8日上午会见布什。双方就中美关系问题,特别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了坦率而又深入的交谈。在会见开始时,邓小平对布什说:“你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你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们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布什则表示说:“我们感到美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里根总统对此有强烈的表示。我希望在我离开贵国时,我们双方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根本性质。”^⑭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布什解释说,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停止售台武器的日期,并不意味着它要求今后无限期地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邓小平则表示:“中美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售台武器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里根政府多次声称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

因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⑬

邓小平还指出:“在讨论中,你们要求把售台武器问题与台湾海峡局势联系起来,我在访美时曾对众议员和卡特总统讲过,虽然我们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制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⑭双方同意两国代表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以消除中美两国关系中现存的严重障碍。

布什访华过后不久,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小霍华德·贝克又接踵而来,向邓小平转达了里根和尼克松的口信,并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讨论解决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2年6月1日与贝克的会谈中,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并希望里根政府能够采取明智的立场,尽早地处理好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有中美双方本着既维护自身国家的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所面临的问题,两国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继续得到发展,而不受到损害。”^⑮

布什和贝克的相继来访,使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有机会面对面地交换了看法,由此增进了彼此对解决这一问题立场的了解。中国方面在会谈中明确表示: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中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因为这不单单是卖武器,而是涉及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⑯中方的这一坚定立场,对于在一定程度上打消美方谋求中方有更大让步的幻想,脚踏实地地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有好处的。

美国国务卿黑格于1982年6月25日辞职,他在离任前仍于6月29日向里根进言,提出关于同中国达成何种协议的两项方案。第一项方案是美国申明最终将停止对台军售;第二项是美国坚持目前的方针,冒与中国关系出现危机的风险。里根没有选择第一项方案,他声称不愿意改变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⑰美方经过慎重讨论和思考,决定由里根总统致信邓小平,陈述美国的立场。

1982年7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向邓小平转交了里根总统的信件和口信,以及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新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要承诺限期

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极其困难,但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说,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出售武器,以便最终导致最后解决。美方据此修改了其公报草案,写入里根保证的“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这两句话,并表示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便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⑭

此后,中国方面在对台问题上进一步表示出和平解决的诚意。1982年7月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呼吁共同推进和平统一大业。信中说:“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地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之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⑮

这时,中美双方的立场虽已逐步接近,但此后的谈判仍然进行得十分艰苦,讨论的重点是公报内容及如何行文和措词,双方逐句逐字的讨价还价。主要争执集中在以下内容:一、公报草案中双方已同意“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除此之外中方还要求写上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同意这一条可作为美方应履行的口头承诺,但不愿明确写出。经过争论,美方表示可在公报内写上“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二、美方要将售台武器的解决与中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挂钩,遭到中方拒绝。但中方同意单写一段中方重申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美方在另一段表示欣赏这一政策,并说“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美方不同意“限期停售”,但同意写“逐步减少”,“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四、

为了监督美国是否履行协议,中方建议列入双方为售台武器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的条款。美方害怕监督,反对这一要求。五、美方要求在公报中列入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看法”。中方强调突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少谈其他问题。最后双方在第四、五条上互作妥协,写上“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双方一致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⑭

此时,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也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压力。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强烈批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并且警告说:“中国因担心能否抵御苏联,可能抛开美国与苏联达成交易。”^⑮

这样又经过反复讨论,中美双方最后终于在1982年8月15日达成协议,并商定在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因公报在8月17日发表故简称为《八一七公报》。

至此,历时10个多月的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画上了句号。谈判结果表明,虽然双方仍存在分歧,但也切实克服了不少严重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方面同意在公报中作出三点承诺:一是它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二是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三是经过一段时间使这一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此外美国还表示,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而中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美国最终必须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从美方的上述承诺来看,虽然还没有完全满足中国方面的要求,规定一个停止售台武器的明确日期,但毕竟是做出了想要解决问题的积极姿态,承担了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直至最后解决这一问题的诺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向里根总统转达口信,阐明“八一七”公报的含义

在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前夕,为了防止美方对公报做出与中方不同的解释,邓小平觉得有必要对公报本身的确切含义做出几点说明。

1982年8月17日上午,邓小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并且指出:“我们很高兴公报的发表。有人把它称为第二个‘上海公报’,这说明它是一

个重要的声明,有极大的可能带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但在执行这一公报中如果出现新的阴影,就会旧话重提。双方都已确定发表这个声明,在声明即将发表时,有些话说一说有好处。希望双方都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因此,他请恒安石转达致里根总统的口信,^⑭并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但为了郑重其事,这次外交部还是给我写了这么一个稿子,是我的意思就是了。我想讲三点:一、公报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重要的还要看今后美国的实际行动。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售台武器能够逐步地但是明显地减少,能够尽早地停止,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都将有直接关系。二、关于台湾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公报里,中国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意味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也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三、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⑮

恒安石大使对邓小平的说明未提出任何异议,他代表美国政府表示,公报是持久的,美方将“完全、忠实地履行公报”,“总统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时将不违背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过了不久,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于1983年2月访华时还说,总统要他向中方表示,美方将“心口如一地履行公报协议,包括达成《八一七公报》的口头承诺”。^⑯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关于公报的一番说明并不是多余的。美国方面不仅在解释公报时,在一些字句上做文章,把美国减少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与台湾问题是否和平解决联系起来,而且在公报公布之前就于7月14日向台湾当局作出过六点保证:一、美方未同意对台军售上,设定结束期限;二、美方未接受在武器售台前与中国政府相商的要求;三、美方无意扮演任何在大陆与台湾间进行调解的角色;四、美方不拟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五、美方未改变其对台湾主权的一贯立场;六、美方无意施加压力,促使台湾与大陆进行谈判。^⑰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这份公报在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根本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公报中说的所有方面,显然包括美国售台武器等问题在内,关于这一点,中方曾在谈判中要求将此作为双方一致的认识记录在案,美方未持异议。这就意味着,今后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应该以这些原则为依据。从这一根本指导思想出发,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9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

美国政府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这段文字比中美前两个公报又前进了一步。美方还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公报指出: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台湾当局在公报宣布后三小时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在公报中的承诺违背了《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对此“深感遗憾”并声称双方达成的任何涉及台湾的协议“一律无效”。4月18日,台湾当局再次指责美国犯了“严重错误”。^⑩

美国总统里根17日就美中联合公报发表声明说:“美中联合公报体现了一种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历史造成的问题的办法。”里根认为,这个文件“维护了双方的原则”,并说,它“将促进美中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它还将有助于进一步缓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助于这一地区的持久和平”。里根说,“同中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一直是连续四届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这种关系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他把这种关系叫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的战略关系”,并且声称,有了这项公报将有可能在符合美国“对台湾人民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实现美国的这种国家利益。但里根再次强调他同台湾人民的“长期的个人友谊”,表明他“对他们福利的深切关怀,是坚定不移的”。他表

示,他将保持和发展“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与我们的非官方关系一致的各种接触——文化的、商务的和人民对人民的接触”,“并将以适合于老朋友的庄重体面的方式进行”。里根谈到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同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联在一起,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继续根据这一法律进行”。里根在谈到中国争取和平统一祖国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时说,他“充分希望”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将继续是和平的。并且声称:“我们今后在采取行动时将充分考虑到这种和平政策。”但是他又说:“台湾问题是应该由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来解决的事情。我们不会干涉这件事情,也不会妨碍台湾人民在这件事上的自由选择,或在这件事上对他们施加压力。”¹⁵³

8月17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就公报的有关条款发表谈话说:“在事实和法律上,我们在对台出售武器方面的任何调整,都必须与中国继续执行和平政策为前提。因此,我们坚持在第六段,我们的政策声明之前加上一句话,把这个声明与中国继续采取和平方针联系起来。中国人最后也同意这种意见。这就是我们在那一段里的声明之前加上的‘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这几个字的由来和用意。因此我们的政策是以中国在第四段里对和平方针的承诺和我们在第五段里对这一方针的承认为前提的。”¹⁵⁴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售台武器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由于考虑到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分步骤予以解决。美国方面承诺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两国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最后解决,其含义当然是指美国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必须完全停止。也只有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排除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声明说,中国方面在公报中提及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我国政府和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不容许有任何曲解或外来干涉。声明指出,本公报是以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的,与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毫无关系。《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是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的。任何试图把本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

尽管中美双方对于“八一七”公报的解释不尽一致,这个公报也未能彻

底解决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但是它毕竟以两政府的名义规定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公报本身也具有相当的约束力,这就为日后中方就这一问题提出交涉,要求美方切实履行协议,直至最终解决这一难题创造了条件。“八一七”公报由此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一道,成为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方曾于中美谈判开始之前,制定了高低两个方案,谈判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中方“限期停售”高方案的要求,却也达到了中方低方案的要求,使美国售台武器受到了限制。^⑤此外,由于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打开了两国因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形成的僵局,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双方之间当时的紧张关系,避免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为后来中美关系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平稳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这对于维护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美围绕美国售台武器展开的斗争说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曾经低估了中国方面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出大的让步。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方面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她决不可能容忍台湾永久地分裂于祖国大家庭之外。应该说,在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过程中,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感情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近百年来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负的深恶痛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别国染指中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心理状态。认清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注释:

① 1979年1月1日,中国方面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在此前一天,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已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

② 《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委员会访华团时的讲话》,1979年1月2日。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9页。

⑤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⑥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384页。

⑦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 ⑧ Hungdah Chiu, *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 Praeger, 1979, p.264.
- ⑨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7 页。
- ⑩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 页。
- ⑪ Cecil V. Crabb, Jr. *Invitation to Struggle: Congress, the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89. p.236.
- ⑫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9 年 2 月 19 日。
- ⑬ 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2 页。
- ⑭ 即主张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
- ⑮ 《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24 日;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6 页。
- ⑯ 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9—210 页。
- ⑰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 ⑱ 《与台湾关系法》全文详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年 7 月—1981 年 7 月),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2—174 页。
- ⑲ 《远见杂志》,1987 年 10 月 1 日。
- ⑳ 《联合国年鉴》,1970 年,第 790 页。
- ㉑ 根据后来“美国在台湾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签订的《特权和豁免协定》,这些特权和豁免几乎包括了全部外交特权和豁免。
- ㉒ 卡特总统在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时,对这一款作了某种保留,说“对属于中国的外交财产问题,本来以作出另一种处理为好”。
- ㉓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众院军委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79 年 4 月 16 日。
- ㉔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7—118 页。
- ㉕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79 年 4 月 19 日。
- ㉖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6 页。
- ㉗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6—387 页。
- ㉘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43—1044 页。
- ㉙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5 页。
- ㉚ 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0 页。
- ㉛ 《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17 日。
- ㉜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22 页。
- ㉝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0 页。
- ㉞ U.S. congress, Senate, Taiwan,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 *American and Is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s., Stephen P. Gibert and William M. Carpenter, Lanham, New York,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215.
- ㉟ 对于台湾方面提出的为提高已经老化的军事装备而要求的几种先进装备,卡特总统分别给予拒绝或推迟。Robert L. Downen, *The Tattered China Card: Reality or Illusion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1984, pp.75—76.

⑳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96th Cong., 2nd sess., 1980, pp.28-29.

㉑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0—211 页。

㉒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㉓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1 页。

㉔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年 7 月—1981 年 7 月),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 页。

㉕ 《人民日报》,1980 年 6 月 21 日。

㉖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2 页。

㉗ 《人民日报》,1980 年 7 月 9 日。

㉘ Andrew J. Pierr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rms Sal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

㉙ Andrew J. Pierr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rms Sal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

㉚ Andrew J. Pierr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rms Sal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4.

㉛ 新华社华盛顿 1980 年 10 月 3 日电。

㉜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年 7 月—1981 年 7 月),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7 页。

㉝ 法新社 1979 年 1 月 16 日电,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3 页。

㉞ 新华社华盛顿 1980 年 10 月 3 日电。

㉟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 页。

㊱ 《人民日报》,1980 年 10 月 9 日。

㊲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第 32 页。

㊳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2 页。

㊴ Record of the NSC, Oksenberg Papers, The Carter Library;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1999, p.290.

㊵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6 页。

㊶ 《人民日报》,1980 年 6 月 14 日。

㊷ 《人民日报》,1980 年 6 月 14 日。

㊸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年 7 月—1981 年 7 月),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3 页。

㊹ 《人民日报》,1980 年 6 月 14 日。

㊺ 《华盛顿明星报》,1980 年 6 月 12 日。

㊻ 《人民日报》,1980 年 6 月 30 日。

㊼ 《人民日报》,1980 年 8 月 19 日。

㊽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年 7 月—1981 年 7 月),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6 页。

㊾ 《人民日报》,1980 年 8 月 22 日。

㊿ 《人民日报》,1980 年 8 月 22 日。

⑥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⑥8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⑥9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9页。

⑦0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197页。

⑦1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⑦2《人民日报》，1980年8月28日。

⑦3《人民日报》，1980年8月29日。

⑦4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14页。

⑦5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⑦6《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0年11月24日。

⑦7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5页。

⑦8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⑦9《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1年1月19日。

⑧0邓小平的讲话全文详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9—612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378页。

⑧1王立：《中美8.17大较量：限制售台武器》，《文汇报》，2002年8月17日。

⑧2新华社华盛顿1981年1月19日电，1981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⑧3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1981年7月），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19—320页

⑧4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⑧5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黑格回忆录》，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⑧6新华社华盛顿1981年2月6日电。

⑧7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⑧8美国《时代》周刊，1981年3月16日。

⑧9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黑格回忆录》（中译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⑨0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

⑨1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黑格回忆录》（中译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⑨2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1981年7月），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⑨3《人民日报》，1981年6月15日。

⑨4《人民日报》，1981年6月15日。

⑨5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黑格回忆录》（中译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7—98页。

⑨6《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2页。

⑨7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⑨8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⑨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7 页。

⑩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李向前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77 页。

⑪ Flora Lewis, “Friends by Sale of Arm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81, Section A, p.17.

⑫《人民日报》，1981 年 6 月 11 日。

⑬王立：《中美 8·17 大较量：限制售台武器》，文汇报，2002 年 8 月 17 日。

⑭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7—388 页。

⑮《人民日报》，1981 年 6 月 19 日。

⑯《华尔街日报》，1981 年 8 月 10 日。

⑰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13 页。

⑱邓小平 1982 年 1 月 11 日同美国华人协会主席节耀滋的谈话，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9 页。

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5 页。

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3—204 页。

㉑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0—251 页。

㉒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0 页。

㉓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8 页。

㉔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6 页。

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7—188 页。

㉖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2 页。

㉗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4 页。

㉘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8—219 页。

㉙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8—389 页。

㉚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9 页。

㉛《人民日报》，1981 年 12 月 18 日。

㉜《人民日报》，1981 年 12 月 22 日。

㉝《人民日报》，1981 年 12 月 30 日。

㉞《人民日报》，1981 年 12 月 30 日。

㉟官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3 页。

㊱台湾当局的“外交部”发言人于 1982 年 1 月 12 日发表一项声明，反对美国不向台湾出售高性能的战斗机的决定。

㊲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7 页。

㊳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0 页。

㊴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 页。

⑬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7 页。

⑭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5 页。

⑮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黑格回忆录》，时事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2 页。

⑯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十年》，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6 页；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3—224 页。

⑰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7 页。

⑱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7 页。

⑲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5 页。

⑳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 页。

㉑《人民日报》，1982 年 5 月 9 日。

㉒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7 页。

㉓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0—191 页。

㉔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1 页。

㉕周慈朴：《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在哪里？》，《半月谈》杂志，1982 年第 13 期。

㉖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22 页。

㉗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2 页；王立：《中美 8·17 大较量：限制售台武器》，《文汇报》，2002 年 8 月 17 日。

㉘廖承志：《致蒋经国信》，《人民日报》，1982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编：《中共三代领导人谈台湾问题》，2001 年 9 月，第 487—489 页。

㉙王立：《中美 8·17 大较量：限制售台武器》，《文汇报》，2002 年 8 月 17 日。

㉚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Taiwan Arms Sales Criticized”,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9, 1982, Section A, p.18.

㉛邓小平的口信要点如下：一、中美“八一七”公报已正式达成协议，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公报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这一规定在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中国不希望看到由于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公报中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三、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无可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参见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

外交》，第 238—239 页。

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8—229 页。

⑮王立：《中美 8·17 大较量：限制售台武器》，《文汇报》，2002 年 8 月 17 日。

⑯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中美关系报告 1981—1983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印，第 100 页。

⑰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9 页。

⑱新华社华盛顿 1982 年 8 月 17 日电。

⑲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9 页。

⑳王立：《中美 8·17 大较量：限制售台武器》，《文汇报》，2002 年 8 月 17 日。

第七章

适时调整对美政策： 拉开距离，不结盟、不打牌

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但两国之间在经历了这样一些风风雨雨之后，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和评判对方，不能不对双方的关系的价值进行一番新的估价。这时，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重要转变。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所调整，中美之间出现了一些困难和摩擦。

在中国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之后，邓小平仍然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虽然此时中美关系的基础已不再是共同对付苏联，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有尖锐的矛盾，但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在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两国经济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因此，在中美关系处在困难的时刻，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为使中美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美方进行了一番意志的较量和磨合，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恰当的措施，着手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

洞察国际局势的新变化

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由于在侵越战争中失利进行战略收缩，而当时处在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急剧地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在这种国际

局势下,中国政府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毅然决然地调整外交政策,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而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措施,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①

而进入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主的地位,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从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失去了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此时,邓小平对美苏争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已有所警觉。他指出:“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正在增长。美国干预这个地区的某些做法也不得人心。”^②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邓小平已把美国同苏联并列在一起加以批评,而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担心苏联的威胁。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台湾问题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对此,邓小平指出:“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③这番话点出了中美关系产生动荡的症结所在。

恰在此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这是苏联被迫进行战略调整的一个重大步骤。1982年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谈话,都强调苏“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改善关系。苏方还提到以科技交流、互派留学生和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等建议相配合。这是一种新的动向。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声称:“虽然中国现行政策中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苏联从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从未对中国有过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

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④

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虽然仍有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但他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在对华问题上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过去勃列日涅夫谈到中国都是以攻击为主，偶尔也顺带说一下苏联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显得毫无诚意。这次讲话则以强调同中国改善关系为主，侧重点与从前有所不同。

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并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提出要听其言，观其行。^⑤他在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⑥这个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预示着僵持已久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

1982年夏，邓小平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中开会。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至于传递信息的方式，邓小平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作为视察使馆工作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8月10日，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一字不差地背诵了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中方说帖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双方应当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8月20日，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⑦

由于苏联也提出“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相吻合，这表明苏方的反应是积极的。邓小平为此找钱其琛和于洪亮到家里，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⑧这样，中苏两

国以此为契机,商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中苏关系由长期紧张趋向缓和。

1982年10月5日,中苏第一轮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中方以钱其琛为中国政府特使,遵照邓小平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拟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针,即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起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1982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逝世,邓小平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外长启程后,邓小平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邓小平的意思,胡乔木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馆。黄华到达莫斯科后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联方面则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⑨

1982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与泰国总理的谈话中,阐明了中国和苏联磋商改善关系的原则。他说:“我们同苏联还在打交道,但是我们同苏联就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⑩

改变“一条线”的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微妙变化，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已显然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支持任何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更加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关系。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并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这样，美国就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邓小平还恢复了对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强调第三世界的作用。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关系决定的。”^①

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⑫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

随后,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而表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警惕。他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在80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⑬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接着,胡耀邦在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应该说,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⑭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胡耀邦认为,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发展了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胡耀邦认为产生

这种阴影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这是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胡耀邦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不久前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作出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将得到切实履行。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继续取得健康的发展。”^⑮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耀邦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阴影之后，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此举既可相对缓和与苏紧张关系又可牵制美国，是很高明的一步棋。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还表现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倾斜，他认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他指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⑯。

邓小平和胡耀邦的上述讲话表明，为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方针在十二大之后将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或结成战略关系。由此出发，今后同美国的关系将会拉开一定距离，不再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去对付苏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将发展经济建设作为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的基础，中国将避免同苏联的关系过分紧张和恶化。当然，在苏联把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变成行动之前，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等距离的（虽然胡耀邦在报告中把他们同称为“超级大国”），事实上，在强调“独立自主”的总前提下，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仍然甚于重视中苏关系，这除了中国此时仍对苏联怀有戒心之外，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当然也是一种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

根据邓小平的对外战略思想确立的中共十二大“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中得到确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部宪法的序言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

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⑮宪法中有关中国外交方面的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保持世界格局的战略平衡,更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做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在“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前提下处理中美关系

在中国调整对外政策,与美国适当拉开一定距离之后,邓小平仍然主张中美之间应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发展中美关系。1982年12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时指出:“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正如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合乎两国自身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维护和发展这种用十年时间建立的关系,关键是要互相信任。如果出现一些造成彼此不信任的事情,那就很难了。”^⑯

面对中美苏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一方面对中苏磋商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对中国恢复对美国搞霸权主义的批评感到不满。因此,自1982年下半年黑格国务卿辞职后,美国也开始考虑调整其对华政策,其侧重点是要把“中美关系放在更现实的基础上”。在经过了一番酝酿准备之后,美国新任国务卿舒尔茨于1983年2月访问中国,探索发展中美关系的新途径,并力图在中苏磋商过程中起到某种牵制作用。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会见了舒尔茨,并与他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谈到两国信任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深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的连贯性有很大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相互信任。”^⑰

在谈到中美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时,邓小平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⑱

舒尔茨的这次访问并不成功。虽然舒尔茨在会谈中说,美国政府和里

根总统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十分关注,他们充分准备信守 1982 年 8 月 17 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一切条款。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美国不仅没有严格恪守中美建交公报的规定,一些官方人士还对公报作了歪曲的解释,美国高级官员还出席台湾当局在美机构举行的伪“国庆”招待会,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波士顿增设办事处,美国提出的售台武器的限额也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部门自己公布的最高年度额。在会谈中,舒尔茨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符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中国方面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应予废除。双方立场的分歧显然较大。

此时,针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就正确处理对美、对苏关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明确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强调,对于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我们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是配合这一霸反对另一霸,也不是在两霸中搞平衡,搞等距离。^①

舒尔茨访华过后,美方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两国之间又连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这里固然有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和台湾当局积极活动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里根政府正在调整中的所谓“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并没有真正置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1983 年 3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旧金山的讲话和 1983 年 4 月 15 日,助理国务卿沃尔福茨在新加坡的讲话,标志着里根政府“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出台。舒尔茨不赞成从策略上利用中国来影响苏联的行为。他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亚洲大国,其作用主要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他强调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应以日本为重点,首先依靠与日本的联盟。^②

总之,“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特点是:一、有意低调评价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认为应更多从区域性的作用来看待中国,以便中国“发挥建设性的区域作用”,不再强调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的重要性。与此相适应的是,抬高日本的作用,认为日本不仅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而且还是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主要伙伴之一”。二、在双边关系上,力求在多样化中发展,同时强调保持对等的原则,要求互惠;在双方争论的问题上强调维

护自身利益,要求按照美国的法律和“价值观念”行事。三、在台湾问题上意欲保持现状,并力图以《与台湾关系法》和美方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解释来处理台湾问题。

里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之所以做出上述调整,主要是基于美国对国际战略局势的乐观估计,由于美国自认为,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也开始略占上风,因此不免有些看轻中国在平衡美苏关系中的作用,对来自中国方面的声言也不似以前那么重视。此外,美国还认为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点已在减少。当然,里根政府的“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那时还刚刚出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它又有了新的补充和调整。

此后,在邓小平战略指导下实施的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更加成熟。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由此展开的中美苏关系越来越走向不针对第三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

应对中美经贸纠纷

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中国的对美经济贸易,自中美建交以来,特别是中美贸易协定签订之后,曾经有较大的发展,与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日渐扩大。可是自1981年起,中美两国在政治关系上的阴影也多少影响到两国的经济贸易方面。就经济贸易本身来说,中美之间由于利益不同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中美贸易从1981年起开始呈下降趋势,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和纠纷也不断出现。

从中美贸易的比例来看,中方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地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物原料等,但总的局面是中国产品出口少,进口多。中美建交后,中国的纺织品输美有了一定的增长,这本是件好事,因为这有利于增加中国支付进口的能力,并逐步缩小中方的贸易逆差,使中美贸易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扩大。但美方以“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增加太快”为由,一再削减对中国纺织品的限额水平,扩大限制范围。甚至有些政府官员还声称: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中国实施单方面限

制。这从而使两国贸易关系紧张起来。

那么,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实,中国恢复对美纺织品贸易的时间并不长,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几年来经过艰苦的努力虽有增长,但在美国整个纺织品进口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1980年,中美之间曾签订了第一个纺织品贸易协议。尽管这个协议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当时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已经达到的水平,但中国仍严格履行协议规定,把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以1981年为例,中国对美的纺织品出口总金额,按中方统计为4.2亿美元,按美方统计为5.9亿美元,即便是按美方的统计,也仅占美国进口纺织品总额(近100亿美元)中的6%左右。如果与一些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主要供应者相比,差距也很大,不到其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坯布,供美印染、服装业做原料用,对美工业有益。如果只计算中国服装的对美出口,则其出口额在美纺织品总进口额中就只占3.1%左右。同时,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类别和产品范围也有限。1981年中国对美出口只有54个类别,只占美国全部进口类别的一半。^⑧在这种情况下,美方还要进一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对美出口,其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

值得指出的是,自1980年第一个中美纺织品贸易协议生效之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美方一再使用协商条款,扩大对中国纺织品向美出口的限制范围,压低限额水平。到1981年夏季,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品类已由原协定规定的8种增加到15种,另有4种正在谈判。在协商谈判中,美方又多次宣布单方面限制,甚至实行卡关,严重地损害了中方的经济利益。

为了妥善地解决中美关于纺织品问题的争端,经中美两国商定,1982年8月13日至16日,中美新的纺织品贸易协议第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由于这次谈判对中美贸易的发展关系重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贸易管理局副局长李登山提出:在纺织品贸易中,中国作为美国市场的新参加者,其应享受的公正待遇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中国对现行协议中受到的待遇有强烈的不满。他说,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不是按照贸易的实际需要与可能来发展,而是处于不公平的严格控制之下。现行协议的特定限额水平不但不能反映协议缔结时中国出口已达到的水平,反而低于这个水平。增长率也大大低于国际上公认的对新出口者应给予的合理增长率。在受配额限制的类别方面,中国对美纺织品的出口也失去了合理发展的可能性。在签订新协

议时,中国享受的待遇,应该有明显的改善。应该说中方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代表团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中方的合理要求,反而继续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采取歧视性的政策,提出要扩大对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限制范围,压低限额水平,取消某些灵活条款,并把年增长率降到平均不到1%,还要求修改协商条款,使美方拥有任意行动的自由。这些建议和要求显然违背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所规定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代表团所不能接受的。中国代表团认为,美方应当认真考虑中美贸易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并依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各项原则,给中国纺织品输美以公平合理的、不受歧视的待遇。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才能成功地进行下一轮的谈判。^⑤

从中美双方谈判的上述情况来,中方的建议和要求有其合理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美出口纺织品数量有限,出口是为了改善双边贸易中的不平衡状况,实际上并没有对美方造成什么损害,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始终不肯给予中国纺织品输美一个公平的待遇。更有甚者,就在中美关于新的纺织品协议的谈判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于1983年1月13日由发言人休斯宣布,由于第一个美中纺织品协议于1982年12月31日到期,新的协议谈判迄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单方面实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1983年1月19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贸管理局负责人正式宣布,鉴于美国决定对32类中国纺织品单方面实行进口限制,中国决定立即停止批准今年从美国进口棉花、化学纤维和大豆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其他农产品的计划。中美之间由此爆发了一场贸易战。其结果是1983年的中美贸易总额比1982年大幅度下降,从1982年的60亿美元下降到1983年的44亿美元。

这一时期,美方除了在中国纺织品输美问题上设置障碍之外,还迟迟不履行前任卡特政府所承诺的20亿美元的中美经济合作计划,直到1983年5月,才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5700万美元的贷款,与原来承诺的数字相比,大大地打了折扣。

在经济技术领域,里根政府从1982年起采取措施限制美国技术进入中国。据《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帮办德尼斯基曾对记者说,“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审查香港提出的(出口许可)申请,如果我们发现有公司有可能为中国所有,或者被中国所控制,或

者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就像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来对待这些公司。”美国商务部说,在过去六个月里,已经“发生过几起”拒绝给香港一些公司签发出口许可证的事情。德尼斯基还说,因为得到美国设备的这些香港公司同中国有密切联系,因此,在里根执政以前批准的一些出口许可证必须予以取消。^{②6}凡此种种,更使得已经不景气的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布满了乌云。

这一状况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在1983年2月5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把对华技术转让同台湾问题并列,作为衡量中美关系的标准,借此来推动美方放宽限制美国技术进入中国。他指出:“中美之间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技术转让的问题。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台湾是一个,技术转让是一个,都是衡量有无互相信任的标准。现在看来并未建立起这种互相信任。”^{②7}

处理“湖广铁路债券案”和胡娜事件

1982年9月1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政府偿还“湖广铁路债券案”原告本息并承担诉讼费,共计4300万美元。美方还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对判决置之不理,美国法院将依据原告的请求强制执行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由此把事情闹大,引起中美两国政府的又一场争端。

湖广铁路债券的来龙去脉要追溯到清朝末年。所谓湖广铁路是指中国粤汉、川汉两线的湖南、湖北境内的铁路段。湖广铁路债券是根据1911年5月20日英、德、法、美四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发行的,具有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性质。这笔为期40年、数额600万金英镑的借款自1936年起即无人支付利息。1951年本金到期时无人偿还,也无人过问。

可是,自1979年11月起,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起诉,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所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共2.2亿美元。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居然受理此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被告,并于1979年11月13日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传票送达后20天内

对原告起诉书做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判决”。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多次照会美国政府,声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主权豁免,不受外国法院的管辖。但美国政府以“三权分立”不能干涉司法判决为由,表示无能为力。1983年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就湖广铁路债券问题发表声明,称根据国际法,外国不享有绝对豁免权。^②

湖广铁路债券问题涉及中国旧政府所借外债的处理问题,也涉及国际法上国家豁免问题,在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刻,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就显得更加敏感。

邓小平在美国国务卿舒尔茨1983年2月访华期间,就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问题向美方指出:“湖广铁路债券问题,我们外长已交一份备忘录给你,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件事,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你们的法庭就要管着我们。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邓小平还说:“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③

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与舒尔茨进行了交涉,并就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控告中国的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缺席判决”一事,向他提出一项中国外交部备忘录,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备忘录指出:“美国地方法院这一行动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备忘录还指出:“如果美国地方法院无视国际法,强制执行上述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备忘录最后“希望美国切实负起责任,严格遵照国际法原则行事,采取积极步骤,制止事态发展,妥善处理此案,不使它给中美关系以及两国间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损害。”^④

在此之后,美国国务院于1983年2月10日就这一问题发表声明,一方面说美国的法律承认“在发生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诉讼时外国享有主权豁免权的概念”,但是另一方面又说“根据国际法,外国并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人们可以因为其商业方面的行为对其提出诉讼”。实际上美国政府在这里所说的“外国并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并没有被国际上的大多数国家所普遍接受,而中国外交部备忘录中所指出的“国家主权豁免”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其基本依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国务院“对这起诉讼的是非曲直没有表

态”，“从未直接卷入此类案件”，同时却又希望“中国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解决这一问题”。^③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实际上一方面是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是让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法院的裁决，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美国地方法院的“缺席判决”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不仅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和抗议，而且也招致了中国民众和舆论界的强烈批评。一时间，中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述评，介绍“湖广铁路债券案”，一些学者还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剖析这一案件，并对美国的一些论点一一批驳。

对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给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旧债务，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起历来主张予以废除，概不承认。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政府对于旧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全面继承”的问题。这笔借款已停止付息40多年，本金到期也近3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关系。况且湖广铁路债券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侵略和瓜分中国而借给旧政府的，属于“恶性债务”（根据国际法的基本观点，恶性债务是指被继承国为了实现与继承国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目的而承担的一切债务。恶性债务的特点是它的不可转移性）。对于这种“恶性债务”，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予继承的，因此，应该说中国政府对这类旧外债不予承认的立场是正当的，也是有充分的法理根据的。^④还应指出的是，根据国际间普遍承认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一个主权国家未经其同意，不受另一国法院的管辖；一国法院不得对外国国家的行为和财产行使管辖权。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准则，体现了联合国宪章中的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因此，美国地方法院的“缺席判决”是无效的也是违背国际法的。

由于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使得中美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湖广铁路债券案”尚未了结之时，美国司法部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于1983年4月4日公开宣布，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已经同意给予中国网球女运动员胡娜在美以“政治庇护”，并称此举是以1980年的移民法为根据的。这一事件不仅损害了中美文化和体育交流项目的正常进行，而且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关系，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严重关切。

胡娜是中国培养出的有希望的青年网球选手。1982年7月，她随中国网球队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国际网球比赛。7月20日她在一些人的引诱下离队出走，并于7月26日由别人出面宣布她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政治避难。整个过程是美国和有台湾背景的某些人一手策划的。

这一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1982年8月17日会见美国大使恒安石时特意提到胡娜事件,并敦促美国政府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认真解决这一问题,以堵塞中美关系中的“这些漏洞”。同年9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再次提起胡娜事件时说:最近我们有个网球队员留在美国。你们美国报纸也说,是美国人做了一些不干不净的手脚把她挖走了。像网球队员这样的事情不解决,我们的日子也能过。但是它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今后还敢派什么人去交流呢?³³

在这之后,中国政府还多次发表声明和交涉,希望美国政府能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以维护中美文化、体育交流和中美关系大局。但美国政府并没有认真考虑中国方面的合理要求,反而一再推说这是要按照美国法律程序作出的决定,他们的活动余地很小。但美国政府迎合亲台保守势力做出给予胡娜“政治庇护”的决定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决定而非法律决定。一般来说,外国人要求在美定居,美国当局都是作为个人问题来处理的,要他们按程序办理移民迁居手续。而且,美国法律本来也有许多其他的变通办法让胡娜留下来而不涉及政治,但这次美国对胡娜却偏偏使用极端的“政治庇护”的方式,其政治用心应该说是明显的。

事实上,胡娜不仅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迫害”,相反,她在国内处处受到重视和关怀,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自1979年起胡娜曾先后10次出国参加各种国际比赛(这在中国网球运动员中是不多见的),并被选为四川省新长征突击手、四川省妇联委员、成都市劳模、成都市青联委员等。甚至在胡娜滞留美国期间,中国网球协会在1983年1月31日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信中仍然表示,如果胡娜回国,仍将选派她出席同年7月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女子网球比赛。因此,说胡娜遭受“政治迫害”真可谓是天方夜谭。可是美方置这些事实于不顾,以根本不存在的胡娜受“迫害”为借口,做出损害中美关系的所谓“政治庇护”的决定,这是很不明智的。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再次谈到了胡娜事件的严重性。他说:“还有胡娜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是个危险的先例,此例一开,就会有连锁反应,最终会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³⁴

在此背景下,1983年4月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这一问题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4月5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方的这一行动必将损害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和体育交流,以至影响两国关系。中国政府将就此问题做出反应,并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⑤

4月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恒安石，向他递交了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强烈抗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所谓“政治庇护”。照会指出：1982年8月17日，中国领导人（指邓小平——笔者注）在会见美国大使恒安石时指出了胡娜事件的严重性，敦促美国政府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认真解决这一问题。此后，中国政府还多次向美方进行了交涉。但是，美国政府对中方的严正要求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美国政府曾一再声称希望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却又不断做出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对胡娜问题的无理决定就是这种行动的又一例证。中国政府重申，中国决不会为了与美国的关系而放弃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立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取决于美国是否在行动上真正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所规定的原则。^⑥

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丁谷在4月7日约见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傅立民时，又发表了中国文化部的口头声明。丁谷在口头声明中指出：“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文化协定》所确定的‘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更广泛的接触以利于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宗旨，破坏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正常气氛，在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中设置了障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郑重声明：自即日起中国政府停止执行根据中美文化协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982年和1983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⑦同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也发表谈话，决定停止中美1983年双边体育交往。

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所做出的上述反应，是在多次交涉得不到合理解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完全是被迫的，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理应由美国政府负责。但美国的一些官方人士却指责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反应过度”，并为美国的立场辩解说“美国政府无意制造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说什么“美国决定给予胡娜政治庇护是一个特定的事件应该在美中全面关系的范围内来看待这一事件”。^⑧

其实恰恰是美国没有从“美中全面关系”的大局着眼，一再做出不利合作、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才导致中美文化、体育交流的暂时中断。中

国政府所作出的反应并不“过度”，倒是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过分了一些。中国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但这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

1983年8月28日，邓小平再次就胡娜问题指出：像胡娜事件，也是观察中美关系的一个角度，这虽是个别问题，但要看得深些，其中有实质性的内容。^⑨这倒是值得美国政府认真思索的。

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与斗争

中美建交以来，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它就像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会引爆，引起中美关系的震荡。1982年中美签署了“八一七”公报，为分步骤直至最终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确定了正确方向，把两国关系从濒临降级的边缘中挽救过来。但是要真正落实公报精神却并非易事。对此，邓小平已有预感，早在1982年9月8日，邓小平就指出：“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⑩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再次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否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中美关系一谈互相信任就要接触这个问题。^⑪

但是“八一七”公报发表之后，美国的一些亲台势力却指责国务院让步太大，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而里根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为搞平衡，连续发表了一些曲解公报的言论，从而使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又突显了起来。

1983年2月21日，里根总统在接见保守派的《世事》周刊记者谈话时，把美国应该减少和逐步停止售台湾武器与中国是否和平统一台湾这一中国内政问题扯在一起，更引起了中国方面的警觉。里根说：“我们要履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如果有朝一日这双方（中国和台湾）认为能够以和平方式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国，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了。公报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更多的意思。我们不会说，我们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向

台湾出售的武器。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得到和平解决。”^④

这段话实际上是等于设定先决条件，从而把美国在“八一七”公报中所承诺的“逐步减少”乃至“经过一段时间使这一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责任和义务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段话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中美关系的前途纷纷猜测。

美国国务院为了平息中国方面的愤慨，向新华社记者提交了一份发言提纲，说“总统的对华政策并无改变”，还说总统对《世事》周刊的谈话是随口讲的，不能看做正式政策声明。^⑤以此作为搪塞的借口。可是实际上，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却仍是源源不绝，1983年财政年度的指标已达8亿美元之多。这不能不使中国方面怀疑美国是否真有认真履行“八一七”公报的诚意。

在这之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又分别收到两项由一些议员提出的“对台湾人民前途”表示“关注”的提案。

1983年2月23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关于台湾前途的第74号决议案，声称：“参议院的想法是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应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并符合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公报。”^⑥

3月1日，由共和党众议员索姆·利奇和民主党众议员斯蒂芬·索拉兹提出的提案说：“台湾的前途应该和平地、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以一种可以为台湾人民所接受并符合国会通过的法律以及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公报的方式加以解决。”^⑦

对于台湾这样一个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美国国会的一些人不仅表示“关注”，而且还要求以符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加以解决，这是荒谬的。对此，中国方面以《究竟要把中美关系推向何处》为题发表短评指出：“美国国内有那么一些死抱着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思想不放的人，他们要霸占台湾，仇恨中华人民共和国，力图阻挠台湾统一于祖国。另一些人既想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却又鼓吹不能‘放弃’台湾，实际上搞的是‘一中一台’。我们希望这些人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不要再做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事。至于那些妄想霸占台湾的人，中国人民将与他们斗争到底，绝不允许他们的任何阴谋得逞。”^⑧

这一事件还未了结，1983年3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又在有关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问题上再次扯出台湾问题。龙伯格在国务院新

闻发布会上就中国申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谈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资格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但他又表示“驱逐台湾将会对美国继续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和为这一银行提供资金产生严重的影响”。^④这实际上仍然是在搞“一中一台”的政策,并以此为亚洲开发银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成员国设置障碍。

中国方面当然不能听之任之。1983年3月29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表会上指出:既然在龙伯格表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资格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国,那么,以任何借口阻挠该行撤销台湾当局的成员资格是站不住脚的,是法理所不容的。美国应该做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⑤

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引起的种种不愉快的事实表明,“八一七”公报发表之后,两国关系并没有从此走上正常的轨道,其焦点所在,是美国政府没有真正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中美关系能够正常发展,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指出了中美关系的症结,另一方面一再呼吁美国政府不仅要在口头上,更要在实际行动上为克服两国间的障碍做出努力。

1983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时说:“当前两国之间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但消除障碍需要在行动。”^⑥他指出:“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的新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他希望:“美国朋友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坦率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⑦

1983年4月28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相樱内义雄的谈话。邓小平指出:“我们同除了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关系是良好的。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复杂,基本问题在于美国的现政权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的政策。中国绝不能接受美国推行的这项政策。我们今后仍将努力改善中美关系,但是单方面的努力是有局限性的,中美关系如何发

展,只能看今后。”^⑤

可是,里根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回应中国领导人的呼吁。因此,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引起的争端仍在继续。

1983年6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外交部5月20日照会所申述的立场,坚持批准泛美航空公司经营台湾航线,使泛美航空公司于1983年6月14日开航台北。为此,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祯6月16日约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傅立民,向他递交了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照会驳斥了美方所谓泛美开航台北纯系私人商业行为的说法。照会说,国际航空关系,尤其是开辟定期航班,必须经过有关国家政府的批准,绝非一般的商业行为。美国政府批准泛美航空公司飞行台湾航线,批准“中华航空公司”(台湾)增加在美通航点,也证明泛美和“华航”的这类行为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照会指出,美国政府企图缩小这种批准的政治意义并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徒劳的。照会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国同台湾发展航空关系,是涉及中国主权的大事。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批准泛美飞台,甚至不愿与中国主管当局进行磋商,这是明显地无视中国主权的表现。^⑥与此同时,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司司长李树藩也约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卜道维,向他递交了中国民用航空局的一封函件,表示中国民航决定停止给予泛美航空公司使用中国航路和机场的权利,要求美国政府另行指定一家不飞台湾的空运企业取代泛美航空公司飞往中国。^⑦

在此前后,台湾当局设在美国等国的机构直接受理、颁发前往所谓“中华民国”的签证一事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严重关切。中国外交部为此向美国等国的驻华领事馆进行了交涉,并于6月29日照会美国等国的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中国外交部照会指出:众所周知,颁发签证属一国政府性职能,是一项官方行为,在国外由一国的领事代表机关或外交代表机关行使,《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二、三、五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任何把台湾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活动。^⑧在允许台湾设立,甚至与之互设带有官方色彩的代表机构并行使领事职能方面,美国做得最为过分,因此,中国对美台之间的暧昧关系是十分恼火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驻外机构直接颁发签证的立场是合理合情的。

虽然中国方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中美三个公报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美方却想试探一下中国方面关于和平统一设想中的某些步骤的政策限度。1983年11月间又连续发生两起美方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

如上所述,早在1983年3月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对美国参众两院提出所谓“台湾人民前途决议案”进行过交涉,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1月9日听证会时,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布朗才出面代表政府说了几句,他表示此案“同美国的政策并不矛盾”,只是作“这种新的、不同的重述可能毫无必要,甚至可能毫无裨益”,“若被通过,就有可能使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产生一些纠纷”。由于美政府未采取有力的反对措施,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于11月15日通过此案。该案称:“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应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并符合国会通过的法律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公报。”美国的参院外委会就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台湾前途加以评论,并且要求要符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准则,而且违反了中美先后达成的三个公报所强调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精神。

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祜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就所谓关于“台湾前途”的决议案一事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向他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照会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统一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国参院外委会就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前途妄加评论,甚至通过所谓决议,这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践踏,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这个决议的实质是打着所谓台湾人民‘自决’的旗号,妄图永久地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同中美历次公报所申明的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照会还指出:“决议案所说台湾问题的解决要符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也就是说要符合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更是极端荒谬的。它只能给两国关系设置新的障碍,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损害。”因此“中国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期待美国政府就此作出明确的答复”^⑤。

然而,未等美国政府对此做出明确的答复,事隔几日,美国国会又有了新的举动。11月17日和18日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一项关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拨款法案,其中有一项条款称:“国会的意见是:中华民国台湾应继续成为亚

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并且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该行的问题如何处理,中华民国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中的这一地位应保持不变。”在这里,美国国会不仅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亚行后,把台湾继续留在亚行,而且公然把中国的领土台湾称为“中华民国”,这显然是“两个中国”的论调。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更大不满。

11月25日,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祯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就此事代表中国政府向他递交了抗议照会。照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任何政府间国际机构中,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代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有资格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这也是美国政府自己所确认的。但是,自从今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通知亚洲开发银行,决定申请加入该行以来,美国方面却力图在亚洲开发银行内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这次经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拨款法案所表示的国会意见,坚持台湾应继续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并公然称台湾为‘中华民国’。这是美国国会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一次新的升级行动。这不仅完全违背了美国政府在历次中美公报中所作出的承诺,而且践踏了中美建交的根本原则。”因此,“中国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采取实际步骤,制止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动。否则,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⑤

在中国政府做出上述交涉后,美国方面通过答复照会,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以及里根总统本人在签署拨款法案时发表的声明,做出了一定的反应,美方表示:(1)两案不反映里根总统及其政府的立场;(2)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3)美国政府对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案持反对态度;(4)关于亚行修正案,里根总统重申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表示签署法案并不反映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有任何改变,修正案的提法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国务院还表明,台湾参加亚行问题“可以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政策范围内得到解决”^⑥。

但美方在复照和领导人的声明中没有以明确的语言反对上述两案中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实质内容。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满意的。

正是由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使邓小平对国际战略态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有了新的认识。1983年11月29日,他对来访

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调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他说：“我们这样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六十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面对中国方面的严正交涉，美国政府自1983年夏季以后，在某些方面做出了一些姿态，使中美关系有所好转，但由于步子不大，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全球战略出发，提出发展中美关系必须解决信任问题

1981年之后中美之间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件，已使两国关系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然而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的发展都要求两国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上。早在1982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就指出：“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关心中美战略关系、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人，还要做许多工作。10年建立这种关系不容易。我们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国的关系。但问题是还要走着看。”^⑧

1982年12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施莱辛格和霍尔布鲁克时再次提出：“中美关系从战略出发，应该发展，但必须解决信任问题。”^⑨

此时，中美关系虽然由于双方签署了“八一七”公报而有所缓解，但紧张而又艰难的谈判过程已使两国关系降温，两国间的高层接触和交流也中断了一段时间。因此，消除疑虑，解决邓小平所说的“信任问题”，对发展中美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服从于其全球战略,并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实力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和补充的。如前所述,里根政府曾一度低调评价中国为“区域性国家”,并在对华关系方面,摆出一副无求于人的姿态。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毕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特别是从美苏对抗的军力对比和美国内外矛盾等因素看,美国在战略上仍需借助中国,在经济上则看重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这样,里根政府也不愿意把对华关系搞得太僵。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美国方面也发现,前一阶段的对华政策有很多漏洞,因此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偏差的任务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1983年2月2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在众议院指出:“发展牢固、稳定和持久的美中关系是里根总统对外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引人注目的历史原因,这个问题在连续四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占有中心地位。”他还提出了美方处理中美关系所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和现实情况:第一,由于中国不仅对区域性而且对全球问题十分关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亚洲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将来必然会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希望能够为了双方共同利益而同这个国家一道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性的努力。第二,美中两国在国际方面有某些共同的重要见解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发展中美关系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以及东亚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利益的。第三,中美关系可以在不牺牲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友邦和盟国的利益,不牺牲我们珍视的同台湾人民的商务、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情况下取得进展。^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于1983年2月访华,其目的是“把中美关系重新置于一种稳定的、现实的基础上,使建立信任和信赖的必不可少的进程继续下去”^⑪。在他访问期间,邓小平对他说,希望美方也作出这么一个努力来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分歧,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邓小平还告诉他说,我们派了一个外交部的章文晋副部长到美国当大使,这并不是降职,这是表示中国方面作出一种新的努力,这个努力的结果如何,我们要看事实。^⑫

1983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时,再次指出,“尽管这个时期,有好多不好的事情使我们感到迷惑。但是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力图排除这些障碍,使两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因为从战略利益来说,我们有不少共同点。”邓小平还回答了美方的疑问,即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把美国和苏联放在一起批评?邓小平说:“很简单,《与台湾关系法》就体现了这个问题的性质。《与台湾关系法》无论从内容来讲,还是从方式

来讲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⑤邓小平指出,中美双方都应认识到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当前两国之间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但消除障碍需要行动。希望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消除两国间的分歧、建立相互信任方面做出努力。^⑥

邓小平的这番话既坚持了原则,又表现出中国方面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给在座的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之后,美方做出了一些姿态。1983年5月26日,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在外国记者中心正式宣布:“美国同中国就技术转让问题举行的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可以期望美中两国科技界互相影响的程度会有很大的增加。由于技术从中国流往苏联的现象几乎不存在,美国在出口方面已把中国列为独特的一类,这使中国受到的待遇跟许多东方集团国家大不相同。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同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它将成为今后转让技术的基础。但是,我们不打算向中国出口我们所拥有的最现代化的技术。我们仍想保护我们的大部分在军事上重要的技术。这是在解决向中国转让技术方面迈出的一步。”^⑦

为了加快国内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党内进一步提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问题,由此为更好地吸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转让技术打好了基础。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他还明确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有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⑧

美国政界、经济界以及战略研究机构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一再呼吁里根政府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在对华关系中重建相互信任,这对里根政府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3年6月1日,有影响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今后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说,中美上海公报和两国去年签署的联合公报“文字和精

神都应该得到严格的遵守”。尼克松在谈到两国经济关系时说,美国“目前政策所作的限制是不必要的”,“中国应当获得和其他友好的非盟国一样的待遇”。他说,现在是美国一些机构改变“把中国作为对手对待”的时候了。他要求美国放松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他说,通过与中国增加贸易,美国人就会知道,对美国企业有好处的事同样对国家也有好处。中国驻美国大使章文晋在宴会上也讲了话。他赞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过去十年中所作的重要贡献。他希望该委员会在未来的十年中取得更大的成功。^⑥

1983年6月中旬,美国众议院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以个人名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要求里根政府“修补对华关系”。文章说,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重新建立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在苏联军队仍然待在阿富汗和越南继续占领柬埔寨的时候,不仅华盛顿和北京有着共同的重大战略利益,而且美国在亚洲的其他朋友们发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加强他们的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绝非仅仅是战略竞赛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美国同一个人口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从而可以通过商务、能源、农业、科学、文化和体育交流获得好处。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⑧

1983年9月,由美国重要的思想库之一“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所属的“对华政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来自美国政策机构、学术团体、企业、工会、军队等方面的51名知名人士组成的政策咨询机构)历时两年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起草的一份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报告《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公开发表,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份长达数十页的研究报告包括“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台湾问题”,“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相互关系”以及“政策建议”等8个部分。其中心思想是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同中国的多方面合作。这份报告认为,“一个经济上繁荣、稳定和安全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也符合我们的亚洲和欧洲朋友和盟国的利益”。在“政策建议”一章中,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在未来的10年中同中国发展稳固的、长期的合作关系,把双方的关系建立在加强经济、科学、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报告认为,未来的10年中,美国应首先在贸易、出口信贷、直接投资等方面同中国进行合作,积极促进对华技术转让;主张发展两国广泛的教育、科技交流,并建议美国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报告还认为,台湾问题必须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美国必须信守1982年8月17日的公报。报告认为美

国可向中国出售用于自卫的武器,但要避免引起苏联进一步加强它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事力量。^⑩

在上述背景下,到了1983年夏秋之交,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美国相继放宽高级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国家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并且同中国就悬而未决的中美纺织品的困难谈判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从而结束了一场贸易纠纷。1983年8月6日,美国总统里根就此发表讲话说,新达成的美国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协议是一项“严厉而公平的”协议。里根说,协议增加了中国纺织品的进口,但是也使美国农场主可以向中国卖更多的农产品。^⑪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做工作。

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说,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四年前中美关系走上坡路,后来走了些下坡路,有点曲折,现在关系开始好起来,看来两国关系有希望。当然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出大问题,出些小问题不要紧。我是热心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我们不希望两国吵架吵得不得了。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邓小平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⑫

在这之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于1983年9月25日抵达北京,向邓小平递交了里根总统的信件,并与中国方面讨论了美国对华“新的技术转让政策”。^⑬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温伯格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使冷却中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会谈的结果表明,虽然双方之间还存在许多障碍,但双方更存在需要改善关系的现实因素:美国方面想以与中国的合作牵制中苏接近,以加强对苏战略,中国方面则希望利用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速现代化的过程。正因如此,双方在会谈中,都表现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诚意。

中美双方在会谈中正式商定: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里根总统的邀请,将于1984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总统里根也将应赵紫阳总理的邀请,于1984年4月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1983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和美国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宣布了这一消息。斯皮克斯指出：“里根作出访问中国的决定，其意义在于他相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是本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目标，也是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利益。”^{②3}

当然，中美决定实现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最大的原则问题台湾问题得到了解决，因此，中美关系在温伯格访华之后，还将带着不稳定的因素向前发展。

1983年9月27日，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在美众议院阐明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技术转让政策。他指出：“我们以为中国是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如果我们不管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中国就可能转向我们的竞争者。这是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因此，他指出，总统认为，美国的技术转让应该是：

——支持中国的技术和经济的现代化；

——支持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帮助中国的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并且应该从这些角度加以审查。

其次，根据新的方针，作为发放许可证的指导原则将把技术分为三类。这就是：绿色类，中间类和红色类。^{②4}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应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邀请，于1983年10月10日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共举行了三轮会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在谈到双边关系时，双方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并认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关系近来出现了好转的征兆。赵紫阳总理和里根总统的互访将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双方希望两国政府首脑的互访将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外长吴学谦还谈到，要使中美关系健康顺利发展，还必须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即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但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还是没有切实履行中美三个公报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在吴学谦访美后仅仅一个多月，美国国会又制造了如前所述的所谓“台湾人民前途决议案”和在一项拨款法案中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事件，从而给即将到来的中美领导人的互访蒙上了一层阴云。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觉得有必要在中国总理访美之前，全面阐述一下中国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双边关系问题的总体看法。1984年1月3日，赵紫阳在北京会见美国记者时指出，“我们都知道不久前发生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件。里根总统对此作了一些澄清，这对我按照双方达成

的协定如期访美是必要的。至于美国总统和政府如何讲,中国才满意,你们都是清楚的。”赵紫阳说,我们希望美国领导人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做违反中美之间已经达成的三个公报中的原则的事,不说违反这三个公报的原则的话,不干涉、不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如果能做到这些,中美关系是可以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的。当一位美国记者问,里根总统多次谈到他与台湾人民的友谊,他本人有长期忠于台湾人民的历史,这是否影响两国关系真正取得进展时,赵紫阳回答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同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保持友谊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但是,不能因为这种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朋友关系而介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政,这是不允许的,也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当记者问及中国是否把美苏两国都看成是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把它们等同起来看待时,赵紫阳说,超级大国是不是实行霸权主义主要看行动。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任何一个大国,甚至一个地区的大国,只要实行霸权主义政策,我们都要反对。他说,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情况也是复杂的,我们不可能把两个国家等同起来看待,要进行具体分析。在阿富汗、柬埔寨问题上,我们并没有把美苏两国等同看待。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也不可能把美苏两国等同看待。他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既不依附于某一个大国,也不搞等距离外交,也不在国与国之间画等号。他表示,中国同美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或近似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在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和人民的愿望方面,我们出于原则立场不能不对美国持批评态度。谈到发展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的前景时,他说,两国间的经济贸易近年来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还有很大潜力。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大有可为,其意义远远超过双边关系,将会对世界局势产生影响。他接着说,在中美关系中,政治和经济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要想使中美经济合作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有良好的政治条件。他说,对于中美两国间已经发生的那些麻烦问题,我们认为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只要双方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平等互利、加强磋商、并按照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办事,而不是一方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强加于另一方,那么这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我这次到美国,4月份里根总统来中国,都将讨论这些问题。我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取得进展。^⑤

中国总理的这番话,点明了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与分歧,同时也指出

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并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以及对发展中中美经贸关系的兴趣。意在访美前夕提醒美国方面注意:要正视现实,以大局为重,排除干扰,在改善中美关系与发展中美经济合作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在中美因台湾问题多次引起纠纷之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仍然决定赵紫阳总理如期访问美国,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一是想通过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敦促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二是为了加强中美经济技术关系,而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是估计里根将连选连任美国总统。因此,要争取与其重建相互信任,并在里根和亲台势力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美国方面对中国总理此次访美十分重视,这将是自邓小平 1979 年 1 月访美之后,五年来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美,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进行一次至关重要会晤,它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为了迎接中国客人,白宫专门成立了以办公厅副主任迪弗为首的筹备班子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随着中国客人来访的日期日益迫近,美国朝野知名士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中国总理访美。美国总统里根对报界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扩大两国已经取得进展的关系领域。国防部长温伯格说,美国的目标是“同中国建立持久、友好的关系,一种既承认我们的共同利益,又承认我们的分歧的关系”^⑥。美国参议院、众议院也都在准备欢迎赵总理到国会同议员们会面和交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弗利说,有影响的众议员们“深知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贝克在外地指示他在国会的办公室认真准备好对中国总理的接待。他本人届时将从外地赶回华盛顿主持参议院对中国总理的欢迎仪式。许多热心发展美中关系的议员表示届时要中止在首都以外选区的活动或休假,赶回华盛顿同中国总理会面。工商界、科学文化界、友好人士和华人、华侨对于中国总理访美更是寄予厚望。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负责人兰普顿说,科技文化交流是美中关系的“中心一环”,他们要向中国总理介绍开展这方面工作的设想。东海岸的实业家和西海岸的商界人士则表示,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们有许多建议要向中国总理陈述。^⑦

在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于 1984 年 1 月 7 日从北京乘专机赴美。陪同出访的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对外经济贸易

部副部长贾石等。陪同访问的中国驻美国大使章文晋已在华盛顿。中国代表团一行在美国的檀香山和威廉斯堡两地作短暂停留之后,于1月9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1月10日上午,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南草坪为中国总理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五年前在同一地点,卡特总统曾为邓小平访美举行过同样的欢迎仪式。五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过高峰,也出现过曲折,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军事领域的往来与交流虽然因台湾问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但与中美建交前相比已有明显的扩大。现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为克服两国关系中的困难和障碍,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又再次走到了一起。这说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动力。在检阅仪仗队之后,里根总统和赵紫阳总理先后致辞。

里根总统在讲话中,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欢迎,可谓用心良苦。他认为,赵紫阳总理访美标志着美中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日益发展。里根总统说:“在我们方面,我们承认我们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准备培植、发展和指望在许多领域的一致来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他说,中国目前正在从事激动人心的试验,目的是使经济现代化。“我国人民了解和赞赏这种朝气和活力。我们欢迎在这个事业中有机会走在中国一方。”里根总统还说:“我们在双边性、地区性和全球性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务上,有许多可讨论的问题。我们有许多共同关切的事,特别在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领域。”^⑧

赵紫阳总理接着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首先阐述了这次访问的宗旨,“是谋求增进相互了解,稳定两国关系,促进中美友好,维护世界和平。”他强调说:“中国一向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得到发展。美国政府领导人也不止一次表示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够稳定和持久。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就需要我们双方互相尊重,都本着既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面临的问题。中美两国都严格遵守双方在历次公报中确定的原则,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中美关系就能够结束颠簸不定的状况,走上平坦的道路。”他特意提到,五年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这个讲台上说过:“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今天依然持有这一信念。目前,中美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用你们美国人常讲的话来说,就是既面临重大的挑战,也有着巨大的机会。我们应当勇敢地接受挑战,充分地利用机会。^⑨

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一结束，中美两国领导人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单独的小型会谈，然后又举行了扩大范围的会谈。会谈的内容涉及中美双边关系，台湾问题，中美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国际局势等重大问题。

关于中美双边关系，赵紫阳在会谈中说，中国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稳定、持久。记得总统去年给邓小平主任的信中提到中美两国注定要通过合作变得强大，而不是通过分歧遭到削弱。我们对这句话表示欣赏。这里我不得不首先提到前年的“八一七”公报。在公报中我们同意分步骤解决美售台武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美方同意数量上和质量上不超过建交后近年来的水平，并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我们已经向中国人民作了充分的解释工作。中国人民理解当然也期待，至晚在1984年将看到美方履行公报的实际行动。这对于建立相互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总的有发展，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我想问题不在于社会制度不同，也不在于双方对对方的外交政策的评论。中国同西欧、日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美关系能否稳定持久，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两国关系的根本障碍是你就任前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障碍不彻底排除，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能不受到影响，即使有所发展也是不巩固、不稳定的。如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遭到破坏。这是非常危险的。里根总统在会谈中表示，处理这些分歧的关键是遵守两国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但是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存在着分歧，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又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认真对待老朋友承担的义务问题，“我们不会回避那种义务。这就是整个问题的主导方面”。针对里根总统多次提到不能抛弃台湾这个老朋友以及期待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等说法，赵紫阳说，总统提到不忘台湾老朋友，希望指的是台湾人民，不是台湾当局，是指民间关系，而不是官方关系。总统知道，中国人一向讲信义，不忘老朋友。但是从来不因朋友关系介入别国的内政，也不把朋友关系置于国家关系之上。相信这也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念。要力争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这双方一致。但我们不能对外国承诺不采取其他方式，因为这是我们的内政。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我们确有诚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和祖国统一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对美国无其他要求，不要求美施加压力来促进台湾和我们统一，只希望美国不要干预，对统一造成什么障碍，不要做任何事情助长台湾拒绝和谈的立场。我们注意到总统几次谈到，台湾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不介入，不干预。

这很好。希望美方严格执行“八一七”公报。只要这样,就不会造成台湾回归祖国的障碍。关于中美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他说,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潜力很大,但远未发挥出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需要搞好交通、能源、水电等基础设施。中方有兴趣同美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如中国准备在长江三峡建设一个相当规模的大水电站,即一个1300万千瓦的水电站仅次于巴西。他希望美能像日本那样,向中国提供低息长期优惠贷款,欧洲对中国也采用这个形式,中美之间还没有。据说国务卿去年曾向国会提过修改美国国会的一个立法。美立法规定这种开发性的优惠贷款不能给共产主义国家。社会制度这个概念,如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反映两个国家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希望美国国会改变对中国带有歧视性的立法。如美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中美贸易、中美间技术合作将可以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无疑将增进中美整个国家关系及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相互信任。关于美国方面所关注的中国对苏的立场。他指出,苏在欧洲谋求优势的政策没有变,南下战略没有变。当然,中国现在也同苏对话,但看来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中苏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另外,美国朋友比较关心,中国是否把美苏两国同等看待。中国同美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点,另一些问题上分歧,有时我们不得不对美的政策有所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美苏同等看待。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涉及第三世界国家权益的问题上,中国不能不讲一些话。^①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谈进行得坦率而又务实,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存在分歧,但美方再次保证将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重要的是双方领导人都有发展中美关系的强烈愿望并且通过会谈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明确认清了避免中美关系发生倒退的限度,这对于发展健康和稳定的中美关系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从赵紫阳总理列举的清单来看,由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经济因素将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总理访美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扩大中美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1月12日,赵紫阳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里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它将由中美联合商务贸易委员会负责实施。中国总理和里根总统在签署协定前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美之间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他说:“协定的签订象征着我们两国关系中已有的成果要保持,新的领域要开辟。这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广阔的

前景。”他希望中美双方为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取得新的成功继续作出努力。里根说：“中国目前正执行一项宏伟的现代化计划，这项协定将进一步促进我们两国间的合作，特别是在和中国列为最优先项目的工业部门的合作。”^⑧同一天，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思和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赵东宛签署了一项中美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这项协定是1979年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继续，延长期为5年。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还和美国全国科学院主席弗兰克·普雷斯、美国工程科学院主席罗伯特·怀特共同签署了中国国家科委同美国两所科学院之间的应用科技合作计划谅解备忘录。这些协定的签订不仅有助于两国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合作，而且有助于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中国总理在美期间，三次横越美国大陆，行程数万里，访问了旧金山、纽约等重要城市，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并与他们共同探索发展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济技术合作的途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这体现出美国人民发出内心的对中国人民的使者的友好感情。这说明，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希望中美关系今后要发展和前进，而不是倒退。中美两国关系走上稳定发展之路的共同基础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深厚的。

中国总理的首次美国之行，应该说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中美双方借此机会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立场，同时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赵紫阳针对美国一些人对中国对台方针的误解，在许多场合阐明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式和政策。他指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利益。祖国统一以后，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台湾可以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有自己的充分自主权，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台湾可以实行单独的财政预算，大陆不向台湾征一分税，派一分款；欢迎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职务。^⑨这些宽厚的条件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希望合理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这对于促使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较为谨慎的立场是有作用的。

美方虽然只是重申了将信守中美三个公报的诺言，但如能见之于行动那将有助于结束近年来中美关系颠簸不定的状况。此外，通过两国政府首脑的直接会晤，双方对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深的认识。里根总统在会谈后表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良好的中美关系的

重要性；更加有决心要确保我们的关系处于稳定和持久的基础上”^⑧，有了这样的认识，将有助于消除里根总统上台以来两国间不断出现的种种困难。虽然中美两国关系不会再像中美建交前后那么融洽，但肯定会比1981年以来稳定，这将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更为现实的关系。

这次中美两国政府首脑会晤还完成了与探索新的中美关系相称的内容，即签署了中美工业技术和中美科学和技术合作两个协定；关于核能合作协定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这表明了中美两国在经济技术领域里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两国政府对于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合作具有浓厚的兴趣。里根总统表示，美国愿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同中国一起努力”，并重申愿意在经济关系方面把中国当作友好的非盟国对待。这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姿态和意向。赵紫阳总理也利用各种机会，多次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经济政策将长期不变，并且着重说明了中美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互惠性和巨大潜力，从而增强了美国各界人士同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信心。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改善和加强中美双边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与美国总统里根会谈，寻求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

中美政府首脑会晤之后，邓小平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作出努力。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要发展中美关系，首先要增进了解，我们要多了解美国。美国朋友要多了解中国。”他还说：“我是热心发展中美关系的，希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强。”^⑨

在此前后，美国政府也再次做出姿态，于1984年2月7日，要求国会修改援外法，作为取消对华歧视性立法的一项措施。接着，两国互派了军事技术工作小组进行访问，美方在军事技术转让上作了一些积极表示。在民用技术转让方面，在发放对华出口技术产品的许可证上也有一定松动。经过艰难的谈判，美方在核燃料的处理同意权问题上也作了某种让步，双方就两国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原则基本上达成了一致。

在作了上述铺垫之后，美国白宫于1984年3月21日正式宣布，里根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将于4月26日至5月1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既是对中国总理访美的一次回访，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中美关系

改善的势头而发起的第二个回合的攻势。

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高,美国越来越重视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总统里根在访华前夕曾对中国记者提到整个太平洋盆地将是世界的未来,这是一个发展最快的地区。^⑤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里根表示,他“这次访华要竭尽全力推销美国产品”,充当“推销员”的角色。^⑥这充分表露出经济目的在里根的访华计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推动美国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一。此外,美国想要取得对苏战略优势,需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线,因此在中美关系上不想后退。

就中国方面而言,欢迎里根总统访华,是想通过此举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寻求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争取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此外,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也想通过与美国领导人的再次会晤,探索解决分歧的新途径。在这方面双方及时沟通,即便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也会增加了解,并在实际行动上有所克制。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美双方都对里根访华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向驻华盛顿及洛杉矶的各国记者吹风时指出,里根总统这次访问有重大意义,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给予最优先考虑的一件事情。他还说,美中经济关系在加强两国政治关系方面以及中国实现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里根总统在北京会谈的中心议题。另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谈到中美贸易关系时说,美国政府对两国的贸易前景很有信心。他预计,1984年两国贸易额将达到自7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⑦

中国的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也于里根总统抵达北京的当天发表社论,热烈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984年4月26日,20多年来一直以反共著称的里根生平第一次抵达共产党国家的首都——北京,这是“务实主义对意识形态取得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胜利”。^⑧

中国方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里根总统。里根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他是中美建交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在职总统,因此具有重大意义。此次陪同里根总统及夫人来访的还有: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夫人,总统助理兼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等重要官员。

中国资深的领导人邓小平在里根访问期间,与他就国际局势、中美关系以及南北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要会谈。

关于国际局势。邓小平说,世界局势不稳定、不安宁,但争取和平的前景是良好的。一方面因为同苏联相对抗的力量在增强,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要求和平。对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近几年,美国对苏联的挑战作了最有力的回击,这种回击第一是必要的,第二在回击中也伤害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些行动并不是完全成功的。总之,第一,我们赞成你们对抗苏的进攻,即对抗它的强权政治;第二,美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和政策时,需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希望美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美如抓住四个航空母舰不放,将得罪世界上相当大一批人,同世界上十几亿人结成疙瘩,这不利。苏联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力量,如果美采取正确的政策,大家联合起来对付它,一定可以取胜。所谓取胜,就是遏制它,使它不要横行霸道,苏收敛起来,世界和平就有保证。我们始终认为,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但战争主要来源还是苏联。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判断。如果美政策不当,就会帮助它。比如拿亚洲来说,如果美对台湾、对南朝鲜问题采取更明智的政策,疙瘩一下子就能解开。

关于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我们是高兴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是在发展,前景是良好的,这是对的,但也还有障碍。当然中美关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技术转让,但不是我们关系中的主要障碍,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与台湾关系法》一下子要国会取消有困难,但如何执行这个法,总统是有权的。就中国本身而言,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我们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中国有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二是香港问题。香港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办法也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中国收回主权,香港高度自治。台湾也一样,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台湾可以继续搞资本主义。这样既解决了中国的统一,又对台湾采取现实的政策。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事情可做。并非无所作为。就是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这样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和平统一后,台湾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台湾可以继续维持其对外关系,主要是对美国、日本的关系不变。我们相信这个办法可以行得通。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疙瘩就解开了。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

湾问题,疙瘩就很难解开,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这对两国都不利。

在谈到两国经贸往来时,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就是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中美贸易只有五十多亿美元,小得很,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零点几。到本世纪末,中国的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达到一万亿美元后,中美贸易额不知要大多少。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各国重要的贸易对手,如果中国不发展,市场就只有那么大。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⑩

关于南北关系,邓小平认为:“处理好南北关系对世界经济、对西方都很重要。现在世界主要市场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贸易额很大,而中等以下的不发达国家市场很小,希望美国认真研究南北关系问题。”^⑪

里根总统在会谈时介绍了美国政府关于中美关系以及裁军、中东、南北关系等问题的立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里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的裂缝是个要由中国人来解决的问题,只是美国想让它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罢了”,里根还表示,对台湾的“任何军事企图都将无法挽回地损害我们两国的关系”。^⑫会谈结束后,里根总统在当晚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人们所关心的台湾问题发表谈话说:“我们不认为美国应该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我们也不认为,我们应该为了结识新朋友而抛弃长期的老朋友。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地解决问题。”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里根说:“我对此非常乐观。”^⑬

邓小平同里根总统的会谈,坦率、深入,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意义,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同美国总统里根举行了会谈,并就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在第一轮会谈中,谈到裁军问题时,赵紫阳希望美苏恢复谈判并就核裁军问题达成协议。里根则表示,美国希望苏联相信,达成裁减军备的协议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应该努力使裁减核军备的谈判继续下去。但是苏联人不愿意达成协议。关于中苏关系,赵紫阳说,中苏关系长期紧张对峙对两国不利,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没有好处。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并坚持要求苏联消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消除三大障碍。他说,中苏磋商已经进行了四次,迄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⑭

在第二轮会谈中,两国领导着重讨论了双边关系问题。赵紫阳说,总的

来说,中美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了改善,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他说,中美关系仍处于幼苗阶段,要使两国关系稳定、持久地发展,需要双方精心加以培育。赵紫阳强调指出,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会使中美关系遭受重大挫折的话,那就是台湾问题。他说,中美两国已经签订了三项公报,这是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政府也一再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目前美国仍有人在鼓吹“美台关系”升级甚至台湾“独立”。我们要警惕这种动向。我们希望在中美关系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里根总统访华之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以免使中美关系再次受到波折。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赵紫阳说,我们希望,美国售台武器不仅应有减少的趋向,而且应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并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在这方面有明显的进展,这对于中美两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对促进两国关系稳定,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里根表示,美国愿意恪守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问题是一个需要中国自己解决的问题,美国无意进行干涉,但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他说,美国珍惜同中国的关系,两国贸易关系中的有些障碍已经克服,双边贸易应当继续稳步发展。他指出,现在已有不少美国企业家来华投资,还有许多企业家对此感兴趣。随着美国对自己的出口政策继续进行修改,相信会有更多的企业家来中国投资。里根对双方在某些领域交流项目的会谈取得进展感到高兴。在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时,里根说,美国政府将继续为扩大这种合作作出努力。赵紫阳说,中国对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还存在障碍。例如有一些法案中还有歧视中国的条款,在技术转让上也还有许多限制。他说,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放宽对华转让技术的政策更具有实际意义。他说,两国互免双重税收协定即将签字。两国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协议谈得也很好,已经达成协议,可以草签。这是件好事。有关两国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还剩下少数问题有待解决,这项协定如能达成,对鼓励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将有促进作用。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这项协定早日达成协议。⁹⁹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里根。胡耀邦在会见时说,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长期不变的方针,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胡耀邦对里根说,我很愿意同阁下就中美两国长期友好相处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

里根说,我认为这样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期待着同中国领导人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会谈。^⑤

美国总统里根的这次来访,有着浓厚的经济意图。他在北京的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如何促进中美双边经济和商业关系而展开的。4月27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中国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学术界人士发表了长篇讲演。他用中国《汉书》中的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来形容他和南希对中国的感受。里根总统说,我们必须对两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抱现实主义的态度,坦率地承认两国社会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上都有根本的不同。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些区别,决不要低估这些区别,但是也不要被这些区别所左右。我来贵国,不是来宣传两国之间有哪些分歧,而是来扩大两国之间团结的基础。我来贵国,不是要谈过去怎样互不往来,而是要敦促美中两国人民向前看。里根总统说,我看到,美国和太平洋邻国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以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和更加安全的世界。美国和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可以扩大经济与科学合作,增强两国人之间的联系,向和平和更美好的生活迈出重要的一步。我们能够合作的范围很广泛。我们认为,我们在贸易、技术、投资和交流科学与管理技术这四方面特别有希望取得进展。扩大合作企业,也是一个大有发展希望的领域。美国公司在合资企业和中国近海石油勘探方面已经投资七亿多美元,从而使美国成了在中国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中国决心为外国实业界提供更方便的条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简化官方手续、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协定来为投资建立更可预测的体制,调整价格以利于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以及为外国实业界人士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工作所必需的办事处、住房和学校等等,这些将会促使更多的美国人前来投资。^⑥里根的这个讲话显示出美国对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浓厚兴趣,以及要进一步推进中美经济合作的积极意向。

对此,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也有浓厚的兴趣。4月29日,邓小平会见了由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美国基威特公司代表团,并且指出:“中国最近决定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美双方通过协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一件好事,你们带了个好头。”他还指出:“同中国进行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还能力的国家,而是潜力很大,只是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现在仍有些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的法律不完备,我们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我们的法制。”^⑦

里根这次访华,除了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会谈

之外,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4月30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里根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文化协定1984年和1985年执行计划》。同日,中国国家科委委员贾蔚文和专程来北京的美国无任所大使理查德·肯尼迪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赵东宛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莱昂内尔·奥尔默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情报合作议定书。中国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奥尔默签署了中美工业科技管理合作议定书。这些重要协定的签订,将使两国人民、两国经济界、文化界、科技界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还有几个重要协定正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之间进行商谈之中,这些协定将为中美贸易和投资提供方便,促进两国之间在人员和思想方面的交流,为合作发展中国的核能力扩大前景,并为满足中国在培养熟练的管理人员方面的迫切需要而提供帮助。

4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在北京的访问飞抵上海,并于当天下午在复旦大学发表重要讲演,着重阐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态度,并强调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把握中美合作历史机遇的重要意义。

里根总统说,美中两国政府之间的沉默状态已告结束。过去的12年里,两国人民重新相识。现在我们的关系日臻成熟,正是为持久友谊奠定基础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有许多因素自然而然地使我们之间产生距离。例如时间和空间、不同的语言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不承认这些差别是愚蠢的,为了友谊而掩盖真相也毫无意义,因为虚构的友谊经受不住这个世界的严峻考验。”他谈到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共同点。他说,美国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分处在地球的两边。两国都是朝气蓬勃、力量强大的国家。两国都在地球上自己的一边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里根总统说,美国和中国都反对武装侵略柬埔寨和阿富汗。在谈到两国相互合作的意义时他说:“美中两国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只要我们通力合作,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十二年来,美中两国领导人曾就一系列问题多次举行过会谈。我们常常达成一致意见,即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也能加深对彼此的认识,理解对方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他说,美中两国既不要忽视双方之间的问题,也不要夸大这些问题。里根总统说:“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讲话,在这个对两国都富有重要意

义的城市同大家见面,我感到十分高兴。上海是一个学术之城,一个知识之城。上海历来是你们通向西方之窗,也是我们两国发表公报、始建新友谊的地方。长江波浪滚滚,是世界的大河之一,它经上海流入东海,东海同太平洋汇合,太平洋的波涛汹涌,直达美国西海岸。”他说,历史是一条长河,它用波浪裹挟着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驾船航行,选择方向,同舟共济,风高潮急,一次富有成果的长途航行的机会正在等待着我们。里根总统最后说:“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我们将继续我们新的旅程,但愿我们一路顺风,永远生活在友谊与和平之中。”^⑧里根总统的讲演表明,通过将近一周的访问,他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有了更深的理解。

5月1日里根总统在结束在中国的行程返回美国阿拉斯加时说:“中国人民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的真诚愿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⑨可以说里根总统的这次对华访问是在“冷静的友好”气氛中结束的。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与里根总统的会谈中,没有掩饰他们之间的分歧点,而是立足于务实的立场,来寻求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经过一系列坦诚而又深入、广泛的交换意见,双方大大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由此进一步加强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里根总统也确定了美国政府的特定目标“是使美中关系有一个更稳定和越来越全面的基础,一种能避免敌对和怀疑这个极端,同时又不流于过分乐观和多情善感这另一个极端的基础。”^⑩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在访华期间仍然呼吁中国一起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则利用各种机会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在苏联的威胁逐渐减退的情况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打交道时将更多地注重经济的因素。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②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③《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④曲星:《8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载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

版社 1998 年版,第 70 页。

⑤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⑥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21 页。

⑦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⑧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 页。

⑨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20 页。

⑩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9 页。

⑪《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415—416 页。

⑫《人民日报》,1982 年 8 月 21 日。

⑬《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⑭《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8—49 页。

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 页。

⑯《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4 页。

⑰《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 页。

⑱《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2 页。

⑲《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7 页。

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8 页。

㉑转引自高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载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43 页。

㉒ Secretary of State Schultz, “The U.S. and East Asia: A Partnership for the Future,” Address before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San Francisco, on March 5, 1983, State Bulletin, Vol.83 (April 1983), pp.31-34.

㉓《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7 页。

㉔有关数字参见 1982 年 8 月 19 日《人民日报》。

㉕参见《人民日报》,1982 年 8 月 19 日。

㉖转引自《人民日报》,1982 年 7 月 9 日。

㉗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1 页。

㉘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8 页。

㉙《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8 页。

㉚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5 页。

㉛参见《人民日报》,1983 年 2 月 13 日。

㉜关于“恶债不予继承”的原则,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 31 届会议工作报告。

㉝《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1982 年 9 月 8 日。

㉞《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8 页。

㉟《人民日报》,1983 年 4 月 6 日。

- ⑩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 页。
- ⑪《人民日报》，1983 年 4 月 8 日。
- ⑫转引自《人民日报》，1983 年 4 月 9 日。
- ⑬《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的谈话》1983 年 8 月 28 日。
- ⑭《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2 页。
- ⑮《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7—248 页。
- ⑯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 235 页。
- ⑰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9 页。
- ⑱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3 页。
- ⑲转引自《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13 日。
- ⑳《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13 日。
- ㉑转引自《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24 日。
- ㉒《人民日报》，1983 年 3 月 30 日。
- ㉓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1—272 页。
- ㉔《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1 页。
- ㉕日本《朝日新闻》，1983 年 4 月 28 日。
- ㉖《人民日报》，1983 年 6 月 17 日。
- ㉗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2 页。
- ㉘《人民日报》，1983 年 7 月 6 日。
- ㉙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
- ㉚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 页。
- ㉛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9 页。
- ㉜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5 页。
- ㉝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0 页。
- ㉞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5—236 页。
- ㉟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6 页。
- ㊱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1 页。
- ㊲《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长奥尼尔时的谈话》，1983 年 4 月 13 日。
- ㊳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1—272 页。
- ㊴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8 页。
- 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 页。
- ㊶新华社华盛顿 1983 年 6 月 1 日电。
- ㊷新华社华盛顿 1983 年 6 月 17 日电。
- ㊸详见《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论文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㊹美联社北京 1983 年 8 月 6 日电。

- ⑦《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的谈话》，1983年8月27日。
- ⑧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 ⑨新华社华盛顿1983年9月29日电。
- ⑩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 ⑪《人民日报》，1984年1月4日。
- ⑫新华社华盛顿1984年1月6日电。
- ⑬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 ⑭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 ⑮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 ⑯《赵紫阳总理和里根总统的谈话》，1984年1月。
- ⑰《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4日。
- ⑱《人民日报》，1984年1月14日。
- ⑲《半月谈》，1984年第3期，第17—19页。
- ⑳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 ㉑《人民日报》，1984年4月18日。
- ㉒见日本《朝日新闻》1984年4月22日的报道。
- ㉓《人民日报》，1984年4月17日。
- ㉔《新的现实主义——里根背离了他的意识形态》，《华盛顿邮报》，1984年4月22日。
- ㉕《邓小平与美国总统里根的谈话》，1984年4月28日。
- ㉖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280页。
- ㉗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9页。
- ㉘《人民日报》，1984年4月29日。
- ㉙《人民日报》，1984年4月28日。
- ㉚《人民日报》，1984年4月28日。
- ㉛《人民日报》，1984年4月28日。
- ㉜《人民日报》，1984年4月28日。
- ㉝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 ㉞《人民日报》，1984年5月1日。
- ㉟路透社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1984年5月1日电。
- ㊱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第八章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发展中美关系

对于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世界局势终于透出了曙光,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当然,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各种因素仍未完全消失,但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过去中国曾一度认为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①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是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处理对美关系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中美关系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外,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里根政府经过几年来的相互适应,对彼此间的利益和分歧、决策的能力和限度都有了较为现实的理解。特别是随着国际局势的逐步缓和,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使中美之间的经济来往更加紧密,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战略支点。因此,从1984年起,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两国之间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以及社会文化交流日益扩大。

时代主题与中美关系

进入80年代之后,国际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虽然霸权主义和一些地区“热点”依然存在,但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制止战争威胁的力量和

因素也在增长。基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精辟论断。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②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公开对中国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作了修正,他说: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險。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又说:“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③

经过一系列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于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详尽地阐明了他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并就中国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提出了新的见解。

邓小平认为:“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險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

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国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他认为“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④。

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再次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独立政策,东欧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是国际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做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制约战争的最大力量是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有这么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險,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⑤

邓小平关于新的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分析 and 结论,为中国树立和平外交的新形象,并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他经过缜密的思考,又提出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命题。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

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的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⑦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⑧1987年5月11日,他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⑨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成为中国决策层认清世界大局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点,对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发展中美关系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东西问题,既然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就要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正常关系,努力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此出发,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理所当然

地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由于邓小平明确指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据此,中国在1985年主动裁军100万,并建议所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

其次,既然南北问题是核心,就要切实把发展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抓住不放。为此,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⑩,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努力沟通南北关系,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因为发展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世界就很难安宁,发展问题解决得越好,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

再次,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进一步增强世界和平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⑪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巩固中美高层磋商的机制

中美政府首脑1984年实现互访之后,邓小平一方面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表现出谨慎的欢迎,另一方面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继续敦促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智的立场。1984年5月23日,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美国把台湾变成其势力范围和军事基地,中国人能接受吗?所以台湾问题是中美间最大的疙瘩,可能今后还是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带来某种冲突都有可能。”^⑫

随着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期将尽,邓小平于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这几年的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做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工作的重点。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

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¹³

1984年11月12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也对四年来的中美关系作了小结。他说:在里根总统前四年的任期内,应该说,中美关系有所改善,这一点我们是满意的,但我们也有不满意的方面,正如参议员先生们所知道的,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障碍始终存在,所以我们是既满意又不满意。赵紫阳表示,如果说,美国现在根本废除“与台湾关系法”有困难的话,那么希望美国政府至少做到以下两点:一、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就是说如几个中美公报中申明的,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二、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按照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中规定的,数量上要有明显减少,性能上不能超出过去的水平。至于如何实现统一,正如我们多次宣布的,是中国的内政,相信中国人民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巩固中美高层磋商机制,1985年7月21日至31日,应里根总统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在访问了加拿大之后,对美国进行为期10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美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又一次重要接触,也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美国。

此时美国总统里根因患肿瘤刚动过手术,还处在康复时期,但他仍坚持按原计划接待李先念主席,这表明了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对中美关系的重视。里根总统指出:“双方都认识到双方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认识到友好相处对双方都大有裨益。”¹⁴这的确是道出了实情,这是中美关系经过一段坎坷之路之后,双方达成的共识。

李先念主席同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舒尔茨国务卿、温伯格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谈,深入地探讨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李先念希望在里根第二个任期内,中美两国关系能克服目前存在的某些障碍,加快步伐,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他指出,台湾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需要继续努力解决这一重大分歧。他介绍了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并表示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态度。李先念对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总的情况表示满意,同时也对美国国内日益加深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表示关切。他指出,美国对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的限制越来越多,长此下去,中国方面的贸易逆差

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不能不受到影响。里根总统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改善了两国的物质生活,加强了两国的安全。某些方面仍然有分歧,对这些分歧,既不应置之不理,也不能允许它们影响我们在许多利益一致的领域中进行合作。里根说:“我很高兴地指出,经过今天的会谈,我继续深信中美之间的合作事业会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发展和加强。”^⑮

在李先念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中美文化协定两年执行计划、中美教育交流议定书和中美渔业协定四个重要文件。其中和平利用核能协定经过一年多的拖延,终于正式签署,被认为是中美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新突破(这一协定在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时已经草签,但由于美国国会议员中有些人散布怀疑中国反对核扩散的政策,而拖延了下来)。这四个协定将使中美之间已经展开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同时也为中美新的合作领域打开了大门。李先念还广泛地接触了美国企业界、科技界和经济界的人士,参观了一些著名的科学、经济和文化设施,并向美国各界介绍了中国正在展开的经济改革的形势,以及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同时,李先念所到之处,也深切感受到美国各界人士渴望了解中国,希望中美关系深入发展的热切心情。这种直接的交流有助于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争取中美关系持久、稳定地向前发展。

在此之后,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于1985年10月13日访问中国。此时已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见了布什一行。

邓小平向布什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他说:“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革命。如果改革成功了,中国就会不仅在本世纪,而且在下个世纪长期、稳定、持续、均衡地发展。改革是一种试验,是新事物。由于它太复杂,同时我们还缺乏经验,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⑯双方还就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对布什指出:总的看来关系是正常的。中间曾有过一些风波,通过协商,彼此取得了一些谅解,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他指出,两国关系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顺利地发展。对此,布什说美国方面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是满意的,虽然还有些问题,但两国关系中有不少积极的因素。^⑰邓小平和布什还就中美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布什向中国领导人通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们已经同意,在办理对华贸易时将采用新的审批程序,大大放松了对华出口限制。新审批程序一旦实施,有待“巴统”审批的对华贸易的一多半项目就可以不经审批了,从

而为中国购买二十多种类型的高技术项目,其中包括两用电子计算机扫清了道路。这将有助于扩大中美贸易。

在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考虑进一步克服中苏关系中的障碍,以取得中美苏关系的平衡。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请他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克服中苏关系中的障碍,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的设想。

1985年11月6日,苏联答复说口信收到了。11月23日,苏联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⑨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谈到当前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政策时说,苏联将在1986年底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正在同蒙古讨论从蒙古撤出“相当大一部分苏军”;并表示与中国可以按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他还强调指出,苏联希望共同努力开发黑龙江资源以及边界地区扩大经济联系的可能性。并说,苏联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问题。^⑩这篇讲话有些值得重视的新意。特别是在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黑龙江边界线,以及从阿富汗、蒙古和中苏边界地区撤军问题上有所松动,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中国方面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审慎欢迎的态度,但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接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提法,同意恢复边界谈判。为此,8月13日,中国外长吴学谦约见了苏联驻大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

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②1}

1986年9月6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的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②2}

中国方面于9月7日正式对外发表了邓小平这一谈话,把中国的立场公之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做出了公开的答复。此后,为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的讲话基础上向前迈步,中国方面连续做了几件大事: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在其后举行的第十三轮中苏政治磋商中重点就越柬问题谈判。^{②3}由此,推进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使中国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改善了自身的地位。

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里根总统在1987年1月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谋求同中国建立一种密切的、友好的与合作的关系,但不缔结任何联盟,也不抱有一方是另一方的政治或战略‘牌’的任何幻想。简单地说,我们双方虽然承认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但都认识到许多意见一致的共同领域内一方对于另一方的重要性。”^{②4}这表明美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已逐步习惯于用正常的方式与中方打交道。

中美之间保持高层交流和政治磋商,对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避免因错误的判断导致失误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1987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国内学潮问题辞职,在国际上引起一些震动。一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改变?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搞运动?成为议论的话题。尤其是美国人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理解往往有片面性,他们经常把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不能统一。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87年3月3日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强调指出:“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有两条要证明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做是改革派,把别人看做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⑤他还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长期的事情。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能搞运动,我们的基本方法是进行教育。这些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这样讲,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实行了八年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为什么要变呢?舒尔茨对邓小平的介绍表示感谢。他说,美国重视同中国的关系。^⑥

舒尔茨访华刚刚结束,中美之间历时八年之久的一件争端——湖广铁路债券案最终了结。如前所述,1979年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在美国联邦阿拉巴马州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清朝政府1911年举借的湖广铁路债券。1982年,该法院曾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方偿还本息4130万美元。1983年,该法院重审此案,撤销了不利中方的缺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原告不服,上诉到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该巡回法院1986年7月25日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原告又于同年8月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复审此案。美国最高法院于1987年3月9日作出裁定,驳回原告复审要求,从而维持了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1986年7月25日作出的判决,致使湖广铁路债券案最终结案。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在法院审

理此案的过程中开始争取消极的“不介入”态度,后来认识到,该案涉及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家的重大利益,因而从中美两国关系出发,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均派了律师出庭。尽管美国法院在驳回原告诉讼的判决中并没有采纳中方的全部理由,但是,此案的最终结果中国方面还是满意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了欢迎。

1987年5月15日至27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为团长、国务委员方毅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式访问美国。在美期间,杨尚昆副主席同美国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会议员分别进行了会见或会谈。他们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彼此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里根总统向杨尚昆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作出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稳定的发展。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要按照美中历次联合公报的原则,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杨尚昆说,中美关系自1984年赵紫阳总理和里根总统互访以来没有发生大的波折,总的情况是良好的。两国在许多领域里取得了令人高兴的进展,但仍需要继续努力,使发展两国关系的潜力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杨尚昆表示,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从事本国的现代化建设,希望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他说,中国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平稳发展,希望中苏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同时也希望美苏关系缓和、东西欧关系缓和和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的关系缓和。裁减军备、消除地区热点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他还说,中国欢迎美、苏继续对话,达成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协议。^{②7}

杨尚昆和方毅副团长还同美国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内外政策。并特别针对前一段时间,美国朝野不少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政策产生的某些疑问,着重强调说明了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不会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变,与美国继续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不会变。

杨尚昆一行此次访美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继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之后第四个来访的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短短的8年时间,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有了巨大的发展,两国的年贸易额也已达到70多亿美元。中美关系的基础已比过去广泛得多,中美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而现实。这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有力保证。

阐明“一国两制”构想,敦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智的态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务实态度,在对美对台长期实践的不断探索中,逐步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一国两制”的构想后来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个富有创意的构想最初却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

早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邓小平就多次提出并阐述过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问题。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时明确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②这里已包含有“一国两制”的思路。

事隔不久,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又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时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是中国政治家或是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美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意义还要大。”他说:“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③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要素,这是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进展。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并且提议: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双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应当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④

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⑤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时,进一步

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是真心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 and 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什么谈判啊、“三通”啊，都谈不上。^⑳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于同年9月30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台湾和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以保留军队。^㉑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一个月后，杨力宇在纽约发表了这次谈话的要点。7月29日，中国方面也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邓小平和杨力宇的谈话内容，进一步表明了争取合理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邓小平在与杨力宇的谈话中，以他特有的风格，开门见山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这番话既坚持了祖国统一的原则，又充满了和解的新意。但邓小平不同意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他说：“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接着，邓小平详尽地提出了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的某些独有的权力。他表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

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表明中国方面在给予台湾自治方面跨出了很大的步伐。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邓小平告诫台湾当局“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这里邓小平所说的“外国插手”,显然是针对美国而言。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接着邓小平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他说:“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⑳从而表达了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

邓小平同杨力宇的谈话内容,是继1981年9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之后,中国方面对台方针政策最为明确具体的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过去中国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多次讲话相比,邓小平所阐述的对台政策显然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而且更具权威性,从而加强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号召力,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就此评论说,邓小平所阐述的实现统一的条件比过去要温和得多。^㉑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说,北京对台湾发出柔和的调子,并且对“台湾可能拥有的自治的具体内容谈得详细得多”。^㉒

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时再次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还是过去的几条,内容是一致的,只是更具体、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亮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要做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事。现在美国继续售台武器,卖得那么多,这就是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一种动作。美国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统一。现在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条件是有的。中国统一了,对世界和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太平洋会比较太平。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决策人曾一度说,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我们对这样的判断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了不起的力

量,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对国际安全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始终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湾当作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希望美国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战略利益,不仅是台湾问题,而且在处理其他问题上都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⑳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再次指出:“中国对全球战略看法的一些变化,主要来自美国的变化。来自美国的变化中最深刻的是台湾问题。《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不能低估的。美国应从南朝鲜、台湾、以色列、南非这四艘‘航空母舰’的圈子里走出来,否则,美国不可能在全球战略问题上取得主动。”^㉑他还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㉒

至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其要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可以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里根总统访华之后,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仍坚持所谓不会“抛弃老朋友”的论调,但在对外言辞及行动方面已比以前谨慎得多。^㉓为了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表示希望里根政府能够在第二任期内,排除台湾问题的障碍,在中国统一问题上有所作为。同时也对台湾当局的利益作了最大限度的照顾,并加大力度从正面阐述中国“一国两制”政策。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

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用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④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⑤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中华民族的心坎。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⑥

邓小平认为,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比香港的政策更宽,但中国决不能承诺放弃武力,这样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他还说:“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

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④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提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台湾跟香港不同，还可以保留军队。台湾当局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我们曾多次劝台湾当局，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他还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⑤

邓小平在1984年还托来华访问的撒切尔首相等外国政府首脑向里根总统传话，希望美国支持中国提出的用“一国两制”办法统一祖国的设想。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表示，已就台湾问题通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向美国总统里根转达了口信，但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表示强烈期望里根总统能做点什么。^⑥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发展中国与韩国的关系，间接推动中国统一的设想，逐渐打开了中韩关系的大门。1985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和韩国关系问题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1988年5月至9月期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几次谈到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问题。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在经济上，对双方发展有利；在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后，中国打破多年来的禁锢，松动了在多边国际活动中与韩国的关系。^④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⑤

1986年9月2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指出：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做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具体说来那就是“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在谈到台湾为什么要同大陆统一这一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

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④9}

邓小平的这段话讲得一针见血,但又合情合理,可以说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可行的方案。面对中国方面的几年来的一再呼吁,以及灵活的对台政策,美国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已开始有了某些变化。

原来美方对两岸关系采取“不介入,不当调停人,不提出特别方案”、“不鼓励,不阻挠”的态度。后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国务院官员李洁民、普拉特等人的态度趋向积极。他们就中国统一问题发表“政策性讲话”,主张台湾与大陆“直接打交道”,签署互不用武的和平协定,并从加强贸易开始,逐步实现两岸的“互谅共存”。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明确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可以遵循解决香港问题的模式。双方坐下来谈,美国应起到促进作用。^{⑤0}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3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期间,在上海发表讲话,除了重申美国政府关切中国统一的解决方式等方针外,明确表示美国“支持一个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持续的演变的过程”。美国方面“欢迎有助于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发展,包括间接贸易和日益频繁的民间交流在内”。“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寻求促进一种使这类发展能继续发生的环境”。^{⑤1}这段话表明美国政府在台海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已从过去强调所谓“不介入”,开始转向欢迎两岸的接触和交流。

时隔一个多月,美国助理国务卿西古尔又于4月22日以“中美关系的优先政策”为题,系统地阐述了舒尔茨的讲话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西古尔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说:“美国一定会在‘一个中国’的政策下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与过去美国只是消极地强调它无意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相比,显然要积极一些。西古尔还说,“台湾前途由海峡两岸中国人民决定,美国唯一的关切为此一问题应和平解决”;^{⑤2}并说美国正在寻求促进一种可由双方自行达成和平解决的演进过程的环境。^{⑤3}这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变化。这些言论有助于减少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引起的争端。但美国方面还是不肯就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表示明朗的态度,这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两面性,既想保留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又希望减少台湾问题对中美关

系的冲击。

在此之后,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新思路,并且认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对各方都是有利的。1987年4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⑤4}

邓小平还阐述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必要性。1987年4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说:“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⑤5}

至于如何实现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邓小平认为关键要看两条。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雅克什时说:“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⑤6}

进入90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亚洲的经济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

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联合国的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大陆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比如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六千万吨,还有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⑤

邓小平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台湾发出信息,解释中国对台政策。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说:“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⑥

综上所述,邓小平阐述的“一国两制”构想的基础是一个中国,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

益。”但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⑤而“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问题则是祖国统一,同时也要各方面的利益。邓小平说:实现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我们完成,后人会怀念我们,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要责备我们。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这个条件不苛刻。我们为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充分考虑台湾能接受的条件,不充分为对方着想,不考虑对方是不可能的。^⑥应当指出的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过香港、澳门实践证明了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

反击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

实际上,中国并不一概地反对人权和民主。邓小平在1985年曾指出:“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实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⑦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在中国逐步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视程度。

但自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在总体上保持继续发展势头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和关切。这主要是美国开始在对华政策中注入了所谓“人权”的因素,导致了中美之间的一些摩擦。

其实,早在7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注意人权因素在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特别是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务院新设“人权、人道事务局”,在其对外关系中,更加强调人权外交的意义。因为,“谈论人权是使美国重塑良好形象的一种途径。”^⑧卡特认为:“外交政策的标志应当是美德而不是实力,美国外交影响应该来源于其国家的作为善良和公正社会的国际地位。”^⑨

中美建交之时,美国国内就有些政客指责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是违背了美国国际人权政策。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曾提出要中国放宽移民限制,解除新闻封锁和旅行限制,不再监视外国留学生等问题。魏京生事件发生后,美国参议院曾举行共产党国家人权听证会,为其鸣冤叫屈。但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并没有多大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的争斗中不占优势,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可以说当时美国的人权外交主要是针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展开的。

其用意是用道义力量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对此,劳伦斯·肖普曾评论说:“人权运动给美国对外政策增添了道义方面的内容。这有助于树立一种为美国在越战后重建霸权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义的形象,有助于使美国卷入和平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斗争合法化。简言之,人权运动可以使美国摆脱越战后处于守势的地位,开始再次采取进攻性姿态。”^④

80年代中期之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开始认为“中国牌”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因素。1984年美国国会18名议员给中国国家主席写信,对“中国严重违反人权表示关切”,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此后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的事例开始增多,美国政府有很大的偏见。

1985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世界人权情况年度报告。报告称,北京政权“已经作出让人们更广泛参与政治进程的姿态,改变了文革的政策”,但仍对“言论、新闻、宗教、结社和旅游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和民权实行全面的限制”。对于美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月18日作出反应,他指出:“中国对美国政府在其人权报告中毫无根据地对国内政妄加评论的做法表示遗憾。”^⑤

1985年3月5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美国援助不得用于中国的人口活动以及援助中国人口活动的国际组织的修正案。5月21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又通过了停止对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拨款的提案。7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提出的修正案,指责中国在控制人口政策中“采用强制堕胎和绝育是对人类犯罪”,并宣布“任何经费都不得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计划”。^⑥

同年9月,美国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活动“支持或参与执行强制性堕胎或节制生育的计划”为由,从它应提供给联合国人口活动的基金中扣除1000万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接近人口活动基金援助中国计划的数目。1986年美国又以此为理由再次扣除2500万美元它应提供给该组织的资金。

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了美国一些政客对中国的攻击。他指出:“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⑦

但美国方面仍然就此问题向中国发难,并向联合国施加压力。1987年,美国通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说,由于联合国人口活动中心仍然支持中国的“强制性堕胎和非自愿性绝育”,它今年仍扣除原定应提供该组织的资金。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还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官员施加压力说,如果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活动和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有重大改变,它就考虑改变它扣除资金的做法。

面对美国方面对中国人口政策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活动的歪曲和攻击,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纳菲斯·萨迪克于1987年8月13日发表声明指出:“我们断然否认这种指责。而且,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对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活动,进行过两次彻底的调查,美国对它在1985年开始提出的这种说法也提不出任何证据。”萨迪克说:“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活动包括人口统计人员的训练,母婴保健,计划生育,避孕用具的生产以及有关的宣传教育等。这个5年(1985—1990)计划,当时是人口活动基金理事会成员国之一的美国也曾批准了的。”萨迪克说,美国拒绝提供1987年的资金款,将使人口活动基金不能扩大活动以满足占世界人口90%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援助要求。萨迪克表示该组织要继续与美国政策对话,希望它重新参加这一重要工作。^⑧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利用各种机会对外解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988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还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⑨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的一些政客除了非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外,还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在这方面美国国会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美国与中国发展关系是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但现实主义因素的增长并非意味着个别议员能够完全抛弃理想主义情结。美国外交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推行其制度和价值观念,国会往往是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急先锋。^⑩

1985年6月24日,美国国会91名众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北京和流亡中的达赖及西藏人的代表举行直接谈判,推动中国政府考虑达赖及其人民公正合理的要求。^⑪1987年6月,美国众议院在辩

论对国务院 1988—1989 年度的人权法案时,一些议员乘机提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两项修正案。这两项修正案以仲裁者的架势下断言说,中国宪法规定的保障言论、出版等自由“没有受到尊重”,公民在国内自由旅行、组织工会等权利“被严加限制”,还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政府迫害进行宗教活动的人。由众议员查利·罗斯等人提出的所谓“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不顾国际公认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军事力量对西藏强制实施统治”,并说西藏数以千计的寺庙被毁,政治不稳定,监禁和大规模饥荒使一百多万西藏人丧生。这个以“人权问题”为名的修正案,还公然说美国“期望在道义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②这已明显地超出了人权问题的范畴,而是在变相煽动中国人来反对中国的现存制度。

中国方面对美国国会出现的这种动向是十分关注的。早在罗斯正在考虑提出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修正案的时候,中国大使馆就向美国政府进行交涉,要求美国国务院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在罗斯提出该修正案后,唐树备临时代办又分别给 113 名众议员和 70 名参议员写了信,逐条批驳了修正案的内容,并呼吁他们对此采取公正和正义的立场。但美国政府和众议院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美国国会的法案和决议案只要一名议员提出,就可成立。先由众议院议长或参议院主持人交有关常设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对法案进行审改后提出报告交议院辩论和表决。在全院辩论审议法案时,议员可根据“乘客条款”,把一些与被审议法案无关的次要法案作为审议法案的修正案提出,随被审议法案一并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这两项修正案同另外几十项关于其他问题的修正案混在一起于 6 月 18 日同时付诸表决,结果获得通过。前一修正案称:中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步骤去建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一个实行保护所有在那个国家生活的人的基本人权的自由以及开放的政治体制的民主社会。后一修正案则称:美国应当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作出的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总统应当指示美国官员更加关注西藏人民的忧虑,以同所有关心西藏侵犯人权的人密切合作,以便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能为之效力的领域。^③

这两项提案通过后,当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1987 年 6 月 23

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唐树备约见美国代助理国务卿威廉·克拉克,对美众议院最近通过了两项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的修正案一事,表示极大的遗憾和强烈的反对,要求美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这两项修正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1987年6月25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答复记者的提问时说,“这两个修正案严重歪曲了中国的现状,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不满。”^④

美国一些政客就西藏问题对中国的攻击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并就西藏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拿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看待这样的问题要重于实质,而不是形式。”^⑤

的确,美国众议院就西藏问题对中国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所谓中国对西藏实行“军事占领”、“暴力统治”,拆毁寺庙,破坏西藏文化遗产等说法,不符合西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早在中国元朝时期(公元1271—1368年)西藏就已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改朝换代、制度更迭,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这个事实从未改变过。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在征得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同意的情况下,废除了真正违反人权的封建农奴制,使西藏人民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央政府每年给西藏巨额财政补贴,到1987年累计已达80多亿元,帮助西藏人民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以缩小西藏和内地的差别。西藏过去没有现代工业,到1987年已有300多个轻重工业企业。农牧业年产值比解放初期增加好几倍,1985年全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已由1983年的第28位上升到第20位。西藏人民的生活已有明显改善。

事实胜于雄辩,许多去过西藏的外国人士都可以看到,如今的西藏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同奴隶制度下的旧西藏有着天壤之别。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于西藏的毁坏佛教寺院的事件,这在当时是全国性的现象而并非西藏所独有。1979年以来

中央政府已拨出大量经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仅1980年到1985年,中央人民政府就拨出3000万元(约合1000万美元)给西藏自治区,用来修复寺庙。达赖喇嘛的冬宫和夏宫——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佛教黄教派创始人宗喀巴及其弟子五百年前在拉萨建造的三大名寺——噶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以及在西藏其他地区的170多座寺庙都已修复一新,教徒们随时可以自由地去诵经拜佛。1987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在访问西藏时就曾表示,他对宗教自由在西藏得到保证感到高兴。其实,只要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面对西藏今昔对比的历史事实是不难得出公正结论的。可是美国国会的一些人非要就西藏问题向中国发难,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质是以维护人权为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之后,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继续围绕所谓“西藏问题”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他们策动参、众两院通过欢迎达赖访美的决议,并且于9月21日为达赖举行招待会,帮助他散布“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支持达赖提出的关于“西藏地位”的“五点计划”。^⑥要求变西藏为所谓“和平区”,要求“放弃中国在西藏的人口迁移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和“放弃把西藏作为核武器的生产地和核废料的倾泻地”。1987年9月22日,佩尔等8名议员又联名给中国总理写信,公然支持达赖9月21日提出的旨在搞“西藏独立”的“五点计划”。

在此背景下,9月27日,西藏拉萨发生第一次骚乱。9月30日,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兰托斯、波特以及罗斯等人又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旨在鼓励西藏独立的联名信。10月1日,拉萨再次发生骚乱。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佩尔提出的一项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修正案无端指责中国“从1950年10月7日开始就以武力占领西藏”,“在1959年至1979年之间消灭了100多万藏民”,等等。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达赖不久前提出的所谓“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方案”,要求美国总统今后在批准向中国出售和转让军事装备时“必须断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并及时解决西藏的人权问题”;要求美国政府在今后两年中每年向达赖等人提供不少于20万美元的援助和其他资助。^⑦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人权小组专门委员会的几个议员在提出“西藏问题”修正案时,曾要求美国国务院提供一份有关西藏情况的调查报告作为“根据”。10月1日(即参议院通过该修正案的前5天),美国国务

院递交了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来往可追溯到公元二世纪（第4页）；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所有政治派别历史上都一直将西藏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从未正式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第13页）；中国政府1951年5月同阿沛·阿旺晋美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点协议”，达赖喇嘛后来接受了该项协议（第13页）；中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汉族的出生率降为2%，而少数民族的出生率却为3%（第11页）。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还列举了西藏目前的宗教、语言、教育、医疗、监狱等方面的状况。其数据都同国会5天后通过的修正案中引用的数据截然不同。譬如报告指出：“据流亡者方面的消息声称，西藏自治区内大约有200万汉人，该数字不可相信。……根据我们认为最可靠的情报，大约有7万汉人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加上几万汉族军人，我们认为汉族中国人不到自治区人口的10%。”（第15页）但美国国会少数人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中不利于该修正案的数据和结论不予理睬。

由于《大英百科全书》（T—258页）和《美国百科全书》（719页）中关于西藏的一些基本数据也和国会修正案引用的数据大不一样，“人权小组委员会”的那几位议员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对它们不屑一顾。不仅如此，他们在议案批准程序上也要花招。这几个议员唯恐这份修正案遭到反对，因此先设法绕过参议院中专门审批涉外提案的外交委员会，然后将修正案与另外几十份各类提案混在一起，挂到“国务院授权法”上，造成“一揽子”通过的既成事实。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该修正案的当天，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郑万珍参赞即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对美国国会又一次公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破坏西藏安定团结的局面，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表示极大的愤慨。这只能有损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郑万珍参赞强调：“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干涉。达赖妄图依靠外国人的支持来进行分裂主义的活动，再次暴露了他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危害藏族人民利益的真面目。这种企图是绝对不会得逞的。”^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雷德曼10月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美国政府的立场时说：“我想重申一遍，我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⑨这表明，连美国政府也觉得国会的这一举动走得太远，并且担心由此可能损害中美关系的大局。10月1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罗

伊在国会作证时表态说,美国国务院不支持达赖喇嘛前不久在美国访问时所提出的“五点计划”。但他又声称,美国政府支持改善人权的要求。罗伊说,美国仅仅同意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访美,这“绝不意味着承认达赖喇嘛声称的他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当他(达赖)亮出政治身份,为被我们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西藏提出政治纲领时,美国政府就不能支持他。”^⑩

1987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德国客人时,阐明了西藏的真相,并表达了对美国议员的不满。他指出:“西藏在内地的扶持和帮助下,现在经济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达赖喇嘛和少数美国议员给我们制造一点麻烦,不但影响不了我们总的好形势,相反却表现了那些美国议员的无知和狂妄,暴露了他们的本质。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过去,我看他们没这个本事。”^⑪

但是美国国会仍然一意孤行,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交涉和反对,于1987年12月15日和16日由众参两院分别正式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和另外200多项修正案一起附在“国务院授权法”后面。12月22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国务院授权法”。就美国国会的美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主要是制约或放宽总统的执法权限,向总统和外国“发出信号”这样几个方面。在1987年的一年中,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一再就西藏问题 and 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以此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不能不说是向美国总统和中国发出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对此,中国方面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以正视听,还事实的本来面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于1987年12月26日发表严正声明,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修正案逐条进行了详细而有力的批驳。声明指出:

一、美国国会的这项“修正案”肆意歪曲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污蔑和攻击。“修正案”打着维护“人权”的招牌,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并公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对美国国会这种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踏中美间历次联合公报原则的行为,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的抗议。

二、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公认的事实。有关西藏的任何

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无权进行干涉。今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了鼓吹“西藏独立”、阴谋分裂祖国的所谓“五点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修正案”公然要求中国政府同达赖就“西藏的前途”进行对话。这只能说明“修正案”的炮制者妄图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我们要正告这些人,任何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破坏藏族人民与中国其他民族和睦团结的企图,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三、“修正案”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胡说许多西藏人由于表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和处决,这完全是捏造和谎言。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黑暗的农奴制度下,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只是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以后,广大西藏人民才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今天广大西藏人民充分行使着当家作主的权利。西藏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尊重。西藏人民从未享受过像今天这样充分、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西藏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正在不断完善。在西藏根本不存在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到逮捕或处决的情况。今年10月西藏发生的骚乱完全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为了配合达赖集团在国外分裂祖国的活动而制造的政治事件。对这次事件中少数制造事端触犯刑律的人依法处理,正是为了保障广大西藏人民享受民主和自由、和平与安宁。今年9月24日有两名证据确凿的杀人犯被处死刑并予执行。这两个人当中,一个是为抢劫财物杀人,一个是同乡之间发生口角后故意杀人,而且被杀害的都是藏族同胞。美国国会的修正案竟然为之鸣冤叫屈,充分说明了他们所要维护的“人权”究竟是什么货色。藏族人民从奴隶到主人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修正案一方面提出所谓维护西藏的“人权”,一方面却又支持达赖集团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这究竟是什么逻辑?难道恢复农奴制度,倒是符合“人权”的原则?

四、“修正案”歪曲西藏人民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实际情况,耸人听闻地宣称在1959年间由于政治、饥荒的直接原因而“丧生的西藏人超过100万”。这更是不值一驳的。西藏和平解放前夕,人口仅约100万,现在西藏人口总数202万,其中藏族人口占95%以上。这一简单事实,就足以说明“修正案”炮制者编造的谎言是何等的荒唐。经过30多年的艰巨努力,西藏的工业、农业、交通、文教、卫生、科研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发展,藏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和提高。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五、“修正案”还污蔑中国“鼓励大批汉人涌入西藏”，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在目前西藏自治区 200 多万人口中，藏族人口占 95% 以上，汉族只占 3.5%。根本不存在“大批汉族涌入”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人到西藏帮助藏族同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在中国，各民族互相帮助、互助支援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条件。内地各兄弟民族和有关省市派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到西藏帮助西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欢迎和赞扬。“修正案”歪曲中国的民族政策，妄图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完全是徒劳的。

六、发展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理应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持郑重态度，多做有利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事。然而，令人遗憾和愤慨的是，美国国会却做出了这种干涉中国内政和恶意攻击中国的事，这只能伤害十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损害中美两国关系。这同样有悖于美国人民的意愿。我们强烈要求美国国会采取明智态度，正视现实，改正错误，并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②

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时候，出现于美国国会的这股逆流说明，美国政界确有一些人具有强烈的大国主义意识，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动辄就以仲裁者的面目出现，利用人权，随意向别国施加压力，干涉别国的内政。这些做法不能不使中美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中国方面对于中美关系中出现问题和摩擦是本着克制的态度的，也是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以讨论的，但中国方面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敏感问题上是有原则的。美国国会美国的国会，不是联合国，也不是中国的国会。它没有权力来管中国的事。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说明，学会相互尊重对于稳定两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扫除中美关系中“不好的气氛”

在中美之间因西藏等问题而一度出现不好气氛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官员的高层接触和政治磋商，对于缓解矛盾和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愈发显得重要。

1988年3月2日至9日,应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邀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正式访问美国。3月7日,吴学谦在华盛顿表示,中美两国关系既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存在着障碍和困难。他指出:“只要双方恪守中美间3个联合公报共同确立的指导原则,不断扩大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克服和消除消极因素,中美关系的航船就一定能够绕过暗礁险滩,持续向前行进。”^⑧

里根总统于3月8日会见了吴学谦,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交换了看法。里根总统表示,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中美关系。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坚定地基于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欢迎去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人员的往来,希望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他表示,美国政府将努力促成有利于上述趋势发展的环境。吴学谦外长向里根总统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⑨

吴学谦外长访美期间还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举行了两次会谈,通过讨论,加深了相互了解,基本上消除了1987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在会谈中,美国方面主动提出将恢复审议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的问题。美国有关方面还多次提出,愿意派一些志愿人员到中国来进行社会服务;美国一些主张中美发展友好关系的人,也愿意来中国从事英语教学。美方的这些姿态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为了使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吴学谦于3月9日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的讲演,向200多名新闻界人士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

吴学谦在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强调这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接着,吴学谦详细谈了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也是符合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切身利益的。吴学谦外长说,独立自主意味着我们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他说,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吴学谦外长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两国建交以来的关系发展基本上是平稳的。两国高级领导人保持了互访,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有了较大增长。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但是,他也指出,两国关系经历过曲折和起伏,至今还存在着困难和障碍。他认为,为了使中美关系在更加坚实的

基础上健康、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当前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中美共同发表的三个联合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奠定了指导原则。只要这些原则能够得到切实遵守,就可以避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遭受挫折。第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我们希望美国政界和企业界具有长远的观点,采取积极的措施,使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也希望和欢迎更多的美国企业界人士来华投资办厂。第三,中美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观点,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尤其是涉及第三世界权益的问题上也确实存在着分歧。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加强磋商,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吴学谦强调指出,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并不断取得进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我们欢迎美国各界朋友多去中国看看,加深对中国的了解。^⑤吴学谦外长演讲结束后回答了与会者有关西藏、台湾、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他的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吴学谦访美之后,应美国副总统布什的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于5月8—16日访问美国,继续保持中美高层对话与磋商,借以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美国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分别会见了田纪云副总理,并进行了有实质内容的会谈。

田纪云在与美方的会谈中指出: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继续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并把发展中美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位置,中美之间具有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巨大潜力。中美两国贸易有了显著发展,但这与中美两个大国的地位仍很不相称,希望美国工商企业界能到中国投资,积极参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⑥

美国方面在会谈中强调美国重视对华关系,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一致的政策,不管今后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都会继续得到发展。布什特别指出,中美关系已有牢固基础,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绝不会损及中美关系。美方强调,美国谋求与苏联缓和关系时,仍坚持在军控、人权、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四个方面向苏施加压力。美国方面认为中美之间加强建设性对话,共同约束苏联的行动,对美中双方的利益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美方也更多地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点。这

表明,美国既重视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也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继续对美方保持压力,并敦促美国在促进台湾海峡两岸交往实现“三通”和推动中国和平统一方面有所作为。里根再次声明美国政策的坚实基础是只有一个中国并重申美国欢迎去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大陆与台湾岛之间交往的新发展,希望这一进程能够继续下去,美国将努力促进这种发展的环境。^⑧

田纪云副总理访美期间还主持了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广泛接触了朝野各界人士,尤其是工商企业界人士,并主要介绍了中国七届人大后的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政策,以鼓励美国工商企业界与中国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吴学谦和田纪云的这两次访美,中美关系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

1988年7月1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并且对中美关系的现状表示满意。他说:“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比较稳定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既然是两个国家,存在一些分歧也是正常的。总而言之,中美是两个大国,而且都有发展余地。从世界和平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需要发展关系。”^⑨他还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⑩

这时美国官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也表示乐观,美国副国务卿阿马科斯特在1988年说:“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最困难的问题而不会引起严重对立,这充分表明我们关系的成熟,我们将继续合作,全面推进我们的关系。”^⑪

1988年12月,美国总统里根在提交给即将就任美国新总统布什的简报资料中指出:现行的中国政策非常成功,美国应维持现状。^⑫

198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迎来了建交公报发表1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十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高潮,也出现过一些波折,但总的来看是向前发展了。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乃至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两国高级领导人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也有很大增加。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美国总统里根互相致电函表示祝贺,并希望两国关系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

发展。李鹏总理在贺电中说,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具有重大国际意义,它不仅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十年来,由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懈努力,中美关系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他说,十年的历史证明,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只要双方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关系就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和障碍,健康地向前发展。^②

里根总统在贺信中认为,中美关系在建交后的十年中不断发展并日益成熟,并为今后更加牢固的关系打下了基础。他说,我特别引以为自豪的是,两国关系在我任总统的八年内成绩显著。在此期间,美中两国在重要国际问题上所保持的高层对话,不仅为美中两国,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一个更为安全和更加稳定的世界。里根希望扩大美中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并深信两国在这方面将能获得更大的成就。^③

当然,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两国关系中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障碍。除了台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之外,美国政界的一些人时常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也增加了中美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见解,这是正常的,也是能够通过协商求同存异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都是主权国家,应该在两国关系中遵守互相尊重、平等讨论的原则。只有如此,中美关系才能顺利发展。

发展有限度的中美军事关系

中美军方关系自 1983 年起又有了新的发展。1983 年 9 月 25 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抵达北京,受到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这是自前国防部长布朗 3 年多前访华以来,中国政府所接待的里根政府的第一位国防部长。温伯格是里根政府军事政策决策人之一,属对苏强硬派。他认为,去中国“这是推动两国改善军事关系进程的最好方式”。^④

1983 年 9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会见了温伯格一行,并且指出:“要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双方加强交往、增进相互了解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和实质性问题。中美之间有共同点,但也确实有必须解决的分歧。他指出:三年来,中美之间的

关系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核心问题还是个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就排除了,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⑤温伯格表示,他将把邓小平主席的谈话报告里根总统。他表示相信,他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有利于加深相互了解。^⑥温伯格还向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希望以负责的方式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如果中国认为这对他们有帮助的话,我们愿意批准中国购买美国某些防御武器和获得技术援助。^⑦

耐人寻味的是,温伯格在北京还重新向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同中国恢复战略对话并扩大军事合作。这表明,里根政府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有了较为现实的认识。但在回答中国是否有意同美国进行战略合作时,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大国集团。中国对待每一个国际问题,都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立场。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与温伯格会谈中还敦促美国切实履行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使中美关系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对此温伯格表示,里根总统愿意履行“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他认为一个在经济上、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是重要的。^⑧

温伯格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正式提出两国军事的三大支柱,即高层互访、功能性交流和对华出售防御性武器,由此恢复了中美军方的战略对话,并为加强中美军事交流和几项中美防务技术合作计划打下了基础。此时美国的目标是与中国“建立一种持久的防务关系,这种关系将以有节奏的步伐向前发展”。^⑨而中国方面的态度是,积极发展有限度的两军交流,坚持不结盟的立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根据美国军火出口控制法案3(a)(1)节规定,在政府层面上,美国同意对华进行防务出口方面的合作。同年6月,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回访美国,受到较高礼遇。由于当时美苏关系仍处在僵持状态,美方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仍谋求同中国发展事实上的“战略关系”,因而决定采取一个重大步骤,使中国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有资格享受美国政府对外军售的共产党国家。美方还答应向中国提供喷气截击机用的先进航空电子设备和在美国基地为中国训练驾驶员。^⑩美国政府官员一再表示:发展美中军事关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际评论认为,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美国结成战略上的联盟关系,但美国希望通过渲染双边军事关系的存在,给外界造成中美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低水平战略关系的印象。

对此,中国的态度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前提下,与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军事交流与合作。1985年1月,以刘华清为首的中国海军代表团访问美国。同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上将访问中国。两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也建立了联系。同年9月,中美双方第一次签订价值9800万美元的政府间武器销售协议,包括建造一个炮弹工厂的技术资料和咨询计划。此前,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价值1.5亿美元的24架“黑鹰”式直升机的民用型,5部M-2500燃汽轮机。^⑩

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伍绍祖相继访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陆军参谋长威克姆相继访华。同年11月,美国“里夫斯”号导弹巡洋舰、“奥尔登多夫”号驱逐舰和“伦兹”号导弹护卫舰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莱昂斯上将率领下访问了青岛,这是美国军舰首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还有中方的海军训练团、空军机场维修考察团先后访美;美空军训练代表团、国防部助理部长珀尔、国防大学校长劳伦斯等先后访华。这些访问和交流促进了两国军方关系发展。

1986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再次访华。邓小平与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且指出:中美关系总的来说是发展得好的。他对温伯格为推动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的发展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并请温伯格回国后转达他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问候。^⑪

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在规格上有所提高。1986年,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同意政府向中国出售价值为5.5亿美元的航空电子设备。这批航空电子设备将用于改进中国目前的歼8战斗机,使其接近和超过米格-23战斗机的性能。这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1987年8月,中美两国宣布美国格鲁曼航天公司作为主承包商将向中方提供55套火炮和航空电子设备^⑫。这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空军作战能力。

但在此之后,中美军方关系因美国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和中国向沙特出售中程导弹等问题遇到了困难。美方于1987年10月22日宣布,暂停审议放宽向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⑬中美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

1988年3月8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介绍里根总统会见中国外长吴学谦的情况时说,美国没有发现中国再向伊朗运送任何导弹这一情况,以及中国对两伊战争和联合国决议的总的态度,都是非常有望的迹

象。^⑩3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雷德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来访的中国外长已重申“中国保证要使蚕式导弹不致通过国际市场流入伊朗”,美国因此同意重新启动“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控制的过程”。^⑪

1988年9月5日至10日,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访问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其进行了重要谈话。他指出:“中国正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地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中国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我们欢迎谋求缓和的趋势,我们反对谋求霸权。最近几年的历史证明,所有谋求霸权的都遭到了失败或正在失败。”^⑫此外,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吴学谦也分别会见了卡卢奇。秦基伟与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在防止武器扩散和美转让高技术问题上达成谅解。会谈后,卡卢奇在北京表示“这次讨论是美中就此事磋商以来谈得最好的一次”,并认为“这件事可以过去了”。^⑬双方在会谈中还商讨了进一步展开中美军事技术合作的问题。

直到1989年上半年,中美军方关系仍在继续发展。这年4月,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舰首度访问美国,抵达夏威夷檀香山。同年5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蓝岭”号访问了上海。这一时期,中美两军通过彼此之间的互访与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争取了更多平等合作的机会,并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作出了贡献。

促进中美双边经济贸易的持续增长

邓小平一直把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作为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为中国争取了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促使美国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有所突破之后,邓小平于1981年11月17日,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就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希望中美双方很好合作,创造条件,使两国经济关系持久地发展下去。^⑭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随着邓小平提出的在20世纪末实现中国经济“翻两番”的战略设想逐步落实,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形势开始出现空前未有的机遇。邓小平多次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奋

斗前景和市场潜力,以争取更多的外国资金和贸易机会。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到中国的奋斗目标时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⑩这一设想对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外资的进入和中外贸易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合作基础。

而自1984年起,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也更加强调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和互利合作,这一方面是希望以经济贸易关系来推动双边政治关系,借以牵制中苏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也是看好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下的市场潜力。

里根访华之后,美政府在发展中美经贸方面做出新的姿态。陈慕华部长访美期间,双方签署了冶金、电子电讯领域加强合作的两个工作计划以及美方为中方四个技术改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供资助的协议。美方承诺加速对中方出口技术产品和转让技术许可证的审批,并表示,在1983年已公布的七类产品放宽限制的基础上,将考虑制定另外十类产品放宽限制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微波通讯、导航设备、激光、数控机床、非军用飞机等。

为促进两国贸易机会,美方于1984年7月下旬,派总统使命贸易代表团访华,着重探讨同中国发展航天航空领域内的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双方签署了在此领域工业技术合作的工作计划,美方还提出于1986年在中国举办航空展览。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国内外金融界、企业界领导人和著名专家、学者,并从宏观的角度阐明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呼吁发达国家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指出:“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⑪所以,他认为:“从世界的政治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有利,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利。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发展这种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这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要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步子放快

一点,胆子放大一点。中国说了话是算数的。合同规定了我们一定会遵守。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这叫‘自力更生’,但如果闭关自守,也不会成功,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中国发展。”他还特别针对一些外国工商业界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这个问题,强调说:“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政策,要变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⑬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党内高层进一步呼吁对外开放。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着,翻二番困难,翻二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自己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⑭

在这之后,中国经贸部部长郑拓彬于1985年5月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鲍德里奇举行谈判,讨论进一步发展中美两国在航空、电子、航天、电信、冶金等部门的投资、技术转让、技术产品贸易等事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年7月,中国国务委员方毅会见来访的美国卡伯特公司代表团,双方就中美

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会谈并达成部分协议。

吸引美国的资金,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82年12月中美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就与美国财政部部长里甘讨论制定两国投资条约问题,并且草签了关于投资条约要点的议定书。这是发展中美之间投资关系的重要一步。

在此之后,美国对华投资有了较大起色,到1985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合同协议总额达到21亿多美元。投资总额居西方发达国家之冠,仅次于香港地区。

1986年美商在华投资与中方签订新项目102个,合同金额5.27亿美元,历年累计项目总数为304项,投资合同协议金额27亿美元。投资者多数是美国的大企业,投资项目多为中国旅游等第三产业项目。同一年,美国政府还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简化了27类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审批手续。

自1987年起,美国许多中小型企业也开始加入对华投资,投资项目中生产型、出口型或先进技术型项目增多。1987年和1988年两年间,美商在华投资项目共计326项,投资总额为7亿美元。至此,美商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

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投资银行对于中国境外直接筹资业务开始介入,主要是参与中国境外发行债券业务。

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首批欧洲债券,美林集团参与了当年为中国银行发行1.5亿美元和1.5亿马克的长期债券,以及2亿美元的欧洲浮动利率融资券。1987年,美林集团又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行100亿日元的中期债券。1988年,美林又为中国银行发行了150亿日元的中期债券和2亿马克的中期浮动利率债券。除了美林外,这一时期介入中国境外直接筹资业务的另一家美国投资银行机构是高盛集团。中国第一家在美国公开发行债券的中国企业中信公司得到了高盛集团的帮助,高盛集团担任了发行2.5亿美元债券的主承销,并使中信取得了与中国政府同等的资信级别。除美林和高盛外,还有一些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美国机构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或关注中国在海外的直接筹资业务。^⑮

1985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在谈到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时说:“日本战后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为了掌握和发展技术。你们的这一宝贵经验我们还没学好。这与我们的教育

不发达有关系,现在我们是知识不够、人才不够。今后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并在这些合作中真正学到你们的经验。我们也要同欧洲、美国进行合作。在所有的合作中,都要学习这一点。”他还说:“平衡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这也是一种知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外资,包括借款。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欠了那么多外债,那条路我们是不能走的。希望日本朋友在合作时帮助我们出主意,帮助我们进行技术改造,使更多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合作才能够持久,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广阔的前景。现在世界上都注意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应当是有进有出的市场。确实,中国这个市场还有待开发。”^⑩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中国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比本国其他地方更加优惠的政策,在海南岛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中国加强了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公共服务和供应,制定了70多项涉外经济法律和法规。1986年10月,中国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随后又公布了13个具体实施细则。在保障外资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力,降低劳务和土地使用费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以及在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提供良好服务等方面的情况都有了积极的变化。中国还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外资企业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并采取措施解决它们在生产和经营中的实际困难。中国还将努力做到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中国办企业。中国在沿海地区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改造现有企业,即由中方出工厂、地皮、设备作投资,外方的投资用来增加企业技术改造需要的关键设备。这种合作方式投资少、周期短、收益快,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大吸引力。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一行,并且指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的这几年,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但规模还不够理想。可以设想,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到7万亿美元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规模是很大的。人们现在都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强大市场,我相信这一点,当然可能在下个世纪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在回答将来美国商业界在中国投资是否可以有直接的拥有权,是否可以同中国共享利润的问题时,他说:“合资也好,独资也好,都可以。既然合作,不分享怎么行。你们担心我们这方面的法律不完备,这可以逐步解决。现在我们确实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够。”^⑪

1987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时进一

步表示：“中国要更加开放，加快改革步子，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企业家同中国合作。”^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调查，提出了《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长篇报告，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符合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具体到出口管制方面，除了不能取消对中国出口的“巴统”审议之外，其他方面可以大步开放。这些观点和措施建议，成为美国国会出口管制问题的立法基础。^⑪美国的出口管制进一步放松。

中国在引进美国技术和资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1979年到1989年间，中国同美国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和协议814项，总金额达32.5亿美元，双方合作的领域包括：海上石油、露天煤矿、三峡工程、民用客机、吉普车和卡车、核能和发电设备等。著名的合作项目有中美合作生产麦道82型飞机、北京吉普、平朔煤矿、巴布科—威尔科克斯北京锅炉厂、湖北派克密封件厂、上海贵宝药厂、上海福克斯波罗仪器仪表厂等。这些项目由于采用先进技术，有的甚至可以打开某一领域的产品市场。如根据中美空间技术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从美国引进了价值近千万美元的卫星地面接收站设备，使中国卫星发射服务进入了美国市场。^⑫

中美贸易关系自1980年中美贸易协定签订以来有了较大的发展。1981年两国贸易额达到59亿美元，1982和1983年中美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影响到两国贸易，双边贸易额分别下降为1982年的52.8亿美元和1983年的40亿美元。1984年中美最高级互访之后，双边贸易额于当年回升到61亿美元。1985年中美贸易额升至73亿美元，美国总统里根于年底否决了国会两院通过的限制纺织品进口的议案。这一明智的举动有利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1986年中美贸易额达到73.36亿美元。到了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大关。这样，中美贸易在两国建交后的10年中翻了两番，即从1979年的24.51亿美元增长至1988年的100.11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1%。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外国贸易伙伴。

中美贸易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缺乏建设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但需要市场和较低的劳动费用。这说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双方合作的潜力很大。从这十年的中美贸易来看，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以纺织品、服装、石油以及农矿初级产品为主,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以木材、化工原料以及机械运输设备为主。从80年代后期起,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的五金机械制品出口和美国的机电仪表产品出口逐步增多。这是中美两国发挥各自优势的结果。

中美贸易虽取得了上述成就,但其发展的水平同中美两国的人口、资源、市场和总的生产力水平相比,还很不相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比例还不到1%;美国在华投资占美国在海外投资总额比例还不到0.3%。两国贸易关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如美国的一些过时的贸易立法尚未纠正,中国的出口商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配额、反倾销法的有关措施的限制,美国在高新技术对中国的出口和转让方面仍有限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曾使得中国方面在双边贸易中长期处在逆差的地位。

这种状况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在谈到中国外贸逆差时,他当即指出:“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⑪而美国方面也有不满,他们认为,中国有关贸易的条例和规章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不够,造成美国公司的经营困难;中国方面片面提高关税税率,影响美国对中国出口,中国对知识产权未提供足够保护,中国公司在美国有倾销商品现象。^⑫

对于这些问题,中美双方希望通过磋商加以解决。1988年5月9日至11日,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副总理田纪云和美国商务部长维里蒂亲自到会并共同主持了这次重要的会议。双方就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方面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措施,在增强中国出口能力方面予以合作,以实现1985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美贸易额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每五年平均增长1%的目标;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更多美商在华投资,使维里蒂部长1988年3月提出的关于争取美在华投资金额与项目到1990年翻一番的目标得以实现;早日落实放宽对华技术转让方面的限制,包括扩大范围,提高技术水平和转让生产技术。对此,美方表示:美国政府将坚决阻止保护主义贸易立法的通过,反倾销法已作修改,征收反补贴税不再适用于非市场国家;关于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问题,商务部与其他部门正在草拟

方案,原则同意采用分销许可证,美国将于今夏将此方案提交“巴统”讨论。^⑫双方还签署了医疗器械工业领域工作计划和天然气、石油开发、医用注射器、人员培训等六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资助协议,并就在华举办法律和保险研讨会问题达成了协议。通过这次会议,中美双方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明确了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方向。

重视开展中美科学技术合作

邓小平一贯重视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早在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⑬

中美建交之前,邓小平在回答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是什么时,进一步说:“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⑭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即把中美科技合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1979年1月31日,他在访美期间亲自与卡特总统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有效期5年。1984年1月12日,中美双方又签署了将此协定延长5年的协议。在此基础上,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发展迅速。

1985年,中美核能协定正式生效,这从法律上为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核能技术扫清了障碍。里根总统认为,“这项协定对共同防御和安全将起促进作用,而不会对其构成不合理的威胁。这项协定是同共产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和平核出口政策,是同另一个核国家签订的唯一这样一个协定。”^⑮此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一年,中国国家海洋局和美国国家海洋局的专家联合组成海洋气候考察组,乘“向阳红”14号船出海考察大气与海洋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合作项目是中美技术联合委员会执行的450个科研合作项目之一。

1986年3月,中美农业科学、技术合作共同工作组在北京举行第15次会议,双方经过谈判,制定了1986年中美在农业领域交换科学技术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森林遗传、病理保护、虫害防治、灌溉、幼苗种植等多项技术。

这是中美在农业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进展。

中美两国还在 1986 年签署了核物理和磁约束核聚变科技合作议定书、邮电科技合作议定书、铁路科技合作议定书、自然保护科技议定书。延长了核安全合作议定书、地表水科技合作议定书、卫生科技合作议定书等。除此之外,在美国等国的努力下,巴黎统筹委员会免去了 27 项本来要经过“巴统”批准才能向中国出口的高技术商品。这表明了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姿态。到 1986 年底,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已从 1982 年的 1.44 亿美元增长至 1986 年 10 亿美元,成为进口美国高技术的前 20 名国家之一。

1986 年 10 月 18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提出了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的重要论点。他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实验室的工作。”他还指出:“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⑭

1988 年 9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⑮的重要观点。1988 年 10 月 24 日,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又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⑯的战略任务,由此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科技工作者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并进一步促进了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

1988 年中美双方续签了中美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附件,中美测绘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附件,中美化石能议定书附件和中美地震研究科技合作议定书附件等。中美两国还于 1988 年 11 月在北京就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增加知识产权附件文本进行了第一轮会谈。

截至 1988 年底,中美双方已在教育、农业、科技情报、计量、大气、海洋、空间技术、高能物理、工业科技管理、卫生、地学、地震、水电、地表水、环境保护、基础科学、建筑和城市规划、航空、交通运输、统计、测绘、电信、铁路、化石能、自然保护、核安全、核物理和磁约束核聚变等 27 个领域签署了政府间对口部门的合作议定书或谅解。中美双方组织了 500 多个合作项目。合作

方式也从最初的互派专家和学术考察,逐渐发展成联合主办学术研讨会、联合考察、合作研究、合办培训中心以及合作生产等形式。

在中美政府有关部门间科学技术合作不断发展的同时,两国民间的科学技术合作亦取得较大的进展。两国的许多城市、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公司企业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科技交流关系。

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使双方都获得了极大的收获,不仅促进了两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增进了两国专家、学者之间的了解,而且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已成了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促进中美文化教育新闻交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鉴于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落后状况,邓小平在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曾自告奋勇主抓文教工作,并把文化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当作尽快提高中国文教水平的重要一环。他在1977年8月即提出: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⑮1978年6月,他再次提出:“我赞成增加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⑯

邓小平不仅重视自然科学的教育和普及,同时也注重社会科学的均衡发展。1979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⑰

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月31日,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文化协定。在此之后,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开始增多。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恢复和实施。富布赖特项目是美国政府直接出资管理的一个全球性的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正式启动始于1948年。中国曾是最早与之进行合作的国家之一,但1949年之后,中美之间的合作中断了30余年。中美建交后,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恢复实施。1980年首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学者,获得富布赖特项目资助,赴美讲学或从事科研活动。同年,美方也有十一名学者获得资助来华讲学。此后,在80年代,有数百名中美学者利用这一项目进行了有益的交流。获得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资助的有以下类型的人员:一、赴美从事为期十个月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高级研究的中国学者;二、赴美学习三年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中国留学生;三、来华讲学的美国学者,主要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讲授美国历史、社会文化、文学、政治、法律、新闻学、国际关系、哲学、经济管理学等;四、赴美讲学的中国学者,他们在美国大学讲授汉语、中国历史及其他有关中国的人文或社会科学。^⑬

1980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率领的美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并且指出:“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很长的历史,它对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起了积极作用。几年来,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往有不少发展,这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个好事。”^⑭在此之后,中美文化交流有了更大的进展。

不过,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中美文化交流中间也经历了一番曲折。1983年4月因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网球女运动员胡娜以“政治庇护”,中国政府曾一度中断了中美两国政府1982年和1983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

1984年中美政府首脑实现互访之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中美文化交流项目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以1986年为例,中美文化交流项目已达近百起,其中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绘画、摄影、电影、出版、文物等方面的活动,并且逐步形成了官方、民间、商业、旅游等多渠道,中央、地方、人民团体等多层次的交流局面。这一年中国方面访问美国的团组达44个,人数约400人,美国方面访问中国的团组达56个,人数约500人。到了1988年,中美双方互访团组或个人增至200起,人数增至1500人。这些活动和交流有利于双方取长补短,促进中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中美教育交流也逐年增多,代表团互访,人员往来,学者交流和互派留学生等已形成相当规模。到1988年,中美之间已有34个教育代表团互访。

中国向美国公派留学生人数达到 1.9 万余人,自费留学人员达 1.6 万余人,中国已成为向美国派出留学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来华留学人员也逐渐增多,到 1988 年,美国留学生总人数已达 7000 余人。其中多数学习汉语,也有一些人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

在新闻交流方面,中美自 1979 年起互派常驻记者。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了分社和记者站。到 1988 年,中国新闻单位向美国派驻记者的已达 10 家。美国新闻媒介向中国派驻记者的已达 25 家。在此期间,中美双方的新闻报道量也逐步增加,双方交往形式也日趋多样,除了常驻记者的报道外,以采访团,卫星传送电视、电视专题采访、电视实况转播、专家应聘等形式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促进了中美新闻交流的不断发展。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对外部事物的看法和对外工作的重心也逐渐发生变化。1987 年 5 月 12 日,邓小平会见了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变化。他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

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感觉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命题,概括为“两大主题”,并且提出:“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大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⑯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⑰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8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工作。并根据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强调要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摆到对外工作更重要的地位。会议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总的来说对我国是有利的。我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以集中力量搞好改革和四化建设;各国改革和调整的潮流也为我国积极开展外交、扩大对外经济联系,进行互利合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会议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践证明,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以发展和丰富。我们要积极推动国际形势朝着长期缓和的方向发展,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大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我们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把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摆到对外工作的更加重要地位。^⑱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所提出的中国对外工作的新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正确地指明了在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抓住机遇,为国内方兴未艾的改革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各国发展政治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合作、交流和民间往来,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的。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强对外经济、科技合作不能不在中国对外工作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向新任美国总统布什强调中国稳定的重要性

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对美外交非常活跃,到1989上半年,不仅中美官方关系仍继续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而且两国民众之间的好感也在增加。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1989年初,70%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或极有好感,只有13%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没有好感。^⑬

1989年1月11日,邓小平的老朋友,一向重视中美关系的布什派已内定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斯特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正式通知中国方面,布什将于1989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第41任总统,两三天后赴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但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要到北京会见邓小平。^⑭布什曾于1971年至1972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73年至1974年任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会见过邓小平,并对邓小平的能力和水平有很高的评价。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预言:“邓小平是中国正兴起的力量,很可能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后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⑮1976年至1977年,他就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至1988年,布什当了8年的副总统,为发展中美关系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2月25日,布什在参加完日本天皇的葬礼之后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上任伊始就出访亚洲国家的美国现职总统。布什此举具有重要的含意。当时,中美苏三角关系呈现出微妙的变化,中苏关系已有明显改善,美国对此是很敏感的。特别是1989年2月6日,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日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布什访华的意图之一,就是想在“中苏首脑1989年上半年会谈之前,摸清中苏关系的底牌,以牵制中苏关系的发展,确保中美关系继续高于中苏关系。美国在新形势下的对华战略是要把美中合作的领域从过去的对付苏联扩大到“维护地区稳定”,并把合作范围“从亚太地区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此外,布什访华也是要实地

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以便采取措施进一步加深中美经济关系。

邓小平对布什总统来访表现出应有的重视,他于2月26日上午11时会见布什总统并设午宴招待布什总统和夫人。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战略时,邓小平说,中国是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国内外政策、作出战略决策的。我们不打什么牌,也不搞权宜之计。邓小平对布什总统恳切地说道:“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⑭他特别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⑮在谈到中美双边关系时,邓小平说,10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邓小平还说,我们希望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我们也希望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邓小平对美苏达成中导条约表示欢迎,并希望美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谈判也能取得进展。^⑯

布什总统表示:“现在世界上发生很多变化,为我们提供了机会与挑战。报纸上有人说,我访问中国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要到中国来。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来访是因为我同意你对我们两国关系的看法,两国关系有很大的潜力。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正因为中美关系已具有自身的价值,我们才能再来讨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挑战。如苏联的变化、欧洲共同市场的一体化,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这也就是我就任总统以后就来访问中国的原因。我们有分歧,都是一些小问题,可以进行讨论。但分歧点远远少于共同点。我向你保证,在我四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在会谈中,邓小平还详细阐明了中苏关系的历史,给布什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布什说:“这一小时,对我

和在座的美国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将就苏联问题作出重大决定。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不管是有关战略武器、常规武器或任何其他问题的决定,都不会只对西方有利,而损害中国利益。”^⑮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与美国总统布什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谈。李鹏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欢迎促使国际形势更加缓和的努力,希望美苏在裁军,特别是在核裁军方面继续作出努力。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李鹏说,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苏国家关系已经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我们希望中苏两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希望建立睦邻关系,这将是一种正常的、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会是结盟关系。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李鹏说,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我们衷心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保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李鹏说,我们特别重视台湾问题,对美国方面恪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表示赞赏。他还指出,美方有少数人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企图影响中国的政策、干涉中国的内政。如果这种做法来自官方人士,将势必给中美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投下阴影。^⑯

布什总统说,美国重视对华关系,重视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希望看到美中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他说,世界形势的变化不影响美中关系的继续发展。美国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欢迎中苏改善关系,认为这将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关于台湾问题。布什表示,美国坚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国公开宣布这一政策,以表示反对岛内分裂主义分子。^⑰布什还谈到了他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敬意和印象。他说:“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我的夫人结束在北京的任期时,邓小平为我们破例地举行小型宴会的情景,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现在我作为总统来到中国,不会忘记当年邓小平给我的礼遇。”^⑱

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并有针对性地指出,各国的事只能按各国的实际情况办。中国不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制度,也不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赵紫阳说,中国的改革已进行了10年,步子迈得不小,现在正在中途,仍未完成和结束。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从旧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到新经济体制(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牵涉到整个经济的运行和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他说,改革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只能实事求是地逐步推进。赵紫阳说,我们自己在分析中国改革形势时,常提到两个基本情况,一是中国人民是改革的参与者和受惠者,从总体上讲,都是支持改革的;二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对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一个因素是我们的有利条件,第二个因素是不利条件。在改革顺利的时候,不利条件容易被掩盖起来,但在改革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它就会显现出来。赵紫阳说,现在中国有两种各走极端但又互相影响的观点,一种是埋怨改革搞“坏”了,想走回头路,这种议论不得人心;另一种是把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归咎于政治原因,他们主张引进西方的多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极少数。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谈,这种观点的根本问题在于无视中国的国情,因而是行不通的。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推动改革,而是为改革回潮提供借口,激起社会动乱,小则为改革增加阻力,大则使改革受到挫折,后果将是严重的。赵紫阳说,也许美国舆论界有部分人对中国那些主张引进西方和美国政治制度的人感到亲切,从而企图影响美国政府现在和今后的对华政策。但是,真正推动中国改革的现实力量,是正在按中国特色办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因此,美国社会上某些人士支持这些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人,既不利于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进行,也不利于中美友好。在会见时,布什总统高度评价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⑭

值得一提的是,在布什访华期间,中美之间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2月26日,布什总统夫妇在北京长城饭店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答谢宴会,在拟议邀请的客人名单中出现了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方励之的名字,这显然是向中国发出的有关人权的信号。虽然方励之夫妇最终未能出席长城饭店的这次答谢晚宴,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令中国方面极为不快。事后,美国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邀请方励之并不是布什总统的主意,他表示由此引起的意外事件是美国驻华使馆的过错。他说,温斯顿·洛德领导的美国驻华使馆若干时候前曾向华盛顿提供一个拟议的客人名单。他说,美国驻华使馆和国务院都没有在方励之的名字上“做记号”,表明邀请他赴宴可能引起争论。^⑮由此才铸成大错。从白宫官员的解释来看,布什总统此时还不想因方励之影响中美关系的气氛。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和布什总统的会谈结果总的说是成功和有益的。

首先,在国际形势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大背景下,中美双方再次确认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并重申必须遵守中美三个公报所确立的原则,这对促进中美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而邓小平为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的方针更是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布什总统通过实地考察,在发展经济关系方面找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是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新的基础。在会谈中,中美双方都认为,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在发展经济贸易乃至科学技术合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又为中美两国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再次,对中美双方来说,在中苏举行首脑会谈之前实现中美首脑会谈,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增进了解,这对中美双方都是十分必要的。

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与发展中美关系相平衡,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苏联在克服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的问题上逐渐采取积极的态度,同中国达成了谅解,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应中国的邀请,1989年5月15—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从而使中国在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获得较大的改善。

对此次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接待礼仪,邓小平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两国关系未来的定位。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邓小平提出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⑤

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由此标志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完成。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邓小平从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讲起,他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

邓小平说：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我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50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1931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32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

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后,邓小平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⑮

对此,戈尔巴乔夫表示,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并赞同讲过去就到此为止。^⑯

邓小平所强调的开辟未来,是指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什么样的国

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中苏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他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结论,那就是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正因如此,中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50年代的那种结盟关系,更不同六七十年代那种对抗性的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⑮

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使中国结束了与最大的邻国之间长达几十年来的关系不正常状态,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安全,而且也使中国外交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增强了中国在对美外交中的地位。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场政治风波,不久,美国开始对华制裁。在此之后,国际形势逆转,东欧剧变。但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这对于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外交来说具有一种重要的战略意义。

注释:

①早在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详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8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28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⑩关于这一点,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曾经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已经搞了八年,取得了初步效果,但是路还很长,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状态,达到小康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详见《邓

- 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 ②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 ④《瞭望》周刊,1985年第31期,第5页。
- ⑤《中国建设》,1985年第11期,第36—37页。
- ⑥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 ⑦《人民日报》,1985年10月16日。
-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 ⑨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 ⑩周文琪、褚良如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9页。
- ⑪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 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360页。
- ⑬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 ⑭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 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 ⑯《人民日报》,1987年3月4日。
- ⑰《人民日报》,1987年5月22日。
- 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 ⑲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7页。
- 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 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 ㉒《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 ㉓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
- ㉔邓小平同杨力宇谈话要点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 ㉕[美]《巴尔的摩太阳报》,1983年7月30日。
- ㉖[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3年8月1日。
- ㉗《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265页。
- ㉘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 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④⑩在1984年6月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访美前后,里根政府为了安抚亲台保守势力,曾宣布售台一批C-130军用运输机,但也事先向中国方面通报,怕由此引起中国政府的“过激”反应。与此同时,美方还婉拒了台湾当局一再要求出售的先进性能的战斗机。此外,里根政府在与台湾当局打交道时,注意避免给人以“官方往来”的印象。如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办公室两名官员赴台谈判贸易,因台湾报纸故意渲染这两名官员系“官方”代表,美国政府立即出面干预,将这两名官员调回。

④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④⑫《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④⑬《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④⑭《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

④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

④⑯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④⑰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④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336页。

④⑲《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1页。

④⑳《国际问题资料》(沪),1986年第18期,第17页。

④㉑《人民日报》,1987年3月6日。

④㉒《台声》(京),1987年第8期,第17页。

④㉓《国际展望》,1987年第10期,第2页。

④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82页。

④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230页。

④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④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④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④㉙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110页。

④㉚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编:《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④㉛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④㉜Joshua Muravchik, “Preface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The Uncertain Crusade——Jimmy Carter and the Dilemmas of Human Rights Policy*, Hamilton Press, 1986, p.xxiv.

④㉝John Spanier and Steven W.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13rd ed, 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5, p.175.

④㉞劳伦斯·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八十年代权力和政治》(中译本),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155页。

④㉟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④㊱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

180—181 页。

⑥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1—352 页。

⑥8 《人民日报》，1987 年 8 月 15 日。

⑥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3 页。

⑦0 Hoyt Purvis and Steven J. Baker, *Legislating Foreign Policy*, pp.7-8, Westview Press, 1984.

⑦1 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0 页。

⑦2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7—168 页。

⑦3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6 页。

⑦4 《人民日报》，1987 年 6 月 27 日。

⑦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2—393 页；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2 页。

⑦6 喜饶尼玛：《“西藏人权问题”与美国“人权外交”》，载黄楠森等主编：《当代中国人权论》，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8 页。

⑦7 《人民日报》华盛顿 1987 年 10 月 6 日电。

⑦8 《人民日报》，1987 年 10 月 8 日。

⑦9 《人民日报》，1987 年 10 月 8 日。

⑧0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4 日电。

⑧1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4 页。

⑧2 《人民日报》，1987 年 12 月 27 日。

⑧3 《人民日报》，1988 年 3 月 9 日。

⑧4 《人民日报》，1988 年 3 月 10 日。

⑧5 《人民日报》，1988 年 3 月 11 日。

⑧6 《中国外交概览》（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8 页。

⑧7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9 页。

⑧8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2 页。

⑧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7 页。

⑨0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1992, p.209.

⑨1 全国台湾研究会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北京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69 页。

⑨2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3—264 页。

⑨3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4 页。

④卡斯珀·温伯格著,傅莹等译:《温伯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4 页。

⑤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5—276 页。

⑥《人民日报》,1983 年 9 月 29 日。

⑦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5 页。

⑧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2 页。

⑨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4 页。

⑩参见张静怡:《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回顾与展望》,载《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43 页。

⑪张清敏:《美国对华“双轨”军售的技术转让政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载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2 页。

⑫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8 页。

⑬ Bates Gill and Taeho Kim, “China’s Arms Acquisitions from Abroad: A Quest for ‘Superb and Secret Weapons’”, SIPRI Research Report No. 11, 1995, p. 42.

⑭除了人权和西藏问题之外,美方在 1987 年下半年,还以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为由,宣布中止审议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1987 年 10 月,美方称,伊朗用一枚由中国制造的蚕式导弹攻击了停泊在科威特水域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10 月 22 日,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海湾形势日益紧张的时候,我们决定,从现在起,停止考虑适当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的问题。” American Foreign: Current Documents, 1987, p. 544.

⑮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5 页。

⑯ American Foreign: Current Documents, 1988, p. 536.

⑰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3 页。

⑱路透社北京 1988 年 9 月 7 日电。

⑲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3 页。

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 页。

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1 页。

㉒《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9 页。

㉓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9 页。

㉔《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0 页。

㉕王孜弘:《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与中国对外开放》,载顾云深、石源华、金光耀主编:《鉴往知来——一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4 页。

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6 页。

- ①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368页。
- ①⑧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 ①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和立法动态”，载《外贸调研》，1988年第22期。
- ①⑩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 ①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 ①⑫参见美国商务助理部长穆尔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博恩答中国记者的发言记录，1988年10月11日。转引自《中美关系十年》，第204页。
- ①⑬官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 ①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 ①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 ①⑯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 ①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 ①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 ①⑲《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 ①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 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 ㉒《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 ㉓ America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xchange, U.S—China Fulbright Program Alumni Directory, 1980—1995(Beijing: America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xchange, 1995), pp.52—53, p.75, p.58.
- ㉔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 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234页。
- 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3页。
- 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 ㉘《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5日。
- ㉙ See Steven M. Teles,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s in the Marking of US China Policy”, in Robert Ross, ed, After the Cold War Domestic Factor and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p.44.
- ㉚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113页。
- ㉛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112页。
- 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421页。
- 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页。
- ㉞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2月27日；《中国外交概览》（1990），第307页。
- ㉟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115—118页。

⑭《人民日报》，1989年2月27日。

⑮《人民日报》，1989年2月27日。

⑯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114页。

⑰《人民日报》，1989年2月27日。

⑱参见美国《纽约时报》1989年3月3日的报道。

⑲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5页。

㉑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㉒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第九章

打破美国对华制裁的对策

1989年,正当中美建交进入第二个十年,人们对此寄以很大期望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因“六四”事件骤然跌入低谷。由于美国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干预发生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尔后又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从而使中美关系遭受严重的挫折。尔后,苏联东欧剧变,使中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处变不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和方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稳住阵脚,坚决顶住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与此同时,邓小平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埋头苦干,避免过分张扬,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应对复杂局面的思想方法和解决外交难题的对策和策略,使中国在扑面而来的惊涛中逐渐站稳了脚跟。

国际格局的变动与中美关系潜在的危机

如前所述,在1979—1989年间,中美关系的确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这是两国关系的主导方面。正如邓小平1988年9月对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近几年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应该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①

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格局的逐步变动,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原有基

础,两国关系中也存在着潜在的危机,积累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逐步改变了对外扩张主义的政策,美苏关系真正进入了一个缓和的新阶段,中苏关系也有较大的改善,中美两国原有的共同利害关系——对付苏联,逐渐消失了,中美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8年12月21日提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②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1988年7月15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就曾指出:“两个国家之间总会有些不同的见解,甚至存在一些分歧,这是正常的。中美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③

但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士却有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制定对华政策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的形势是,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考虑,例如武器扩散、技术转让和人权问题”^④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不再采取克制的立场“迁就”中国。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中美之间除了台湾这一根本性的分歧仍未解决之外,其他的一些矛盾也开始突显。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问题,攻击中国在西藏违反人权,指责所谓中国向伊朗出售武器,攻击中国迫害知识分子等等不友好的举动所造成的。此外,中美之间在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和政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也出现明显的分歧。这些都是对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考验。

平心而论,尽管国际格局发生变化,中美矛盾开始增多,但在整个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显然大于两国之间的分歧,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美国的经济技术,而美国也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此外,中美两国同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

重要的责任,两国相互合作远比相互对抗为好。而且中美关系经过自建交以来的十年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只要两国政府真正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中美关系是能够在第二个十年中,克服障碍,继续向前发展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当前国际缓和的大气候下,只有不怕麻烦,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⑤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方面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掌握了称霸世界的实力地位,可以为所欲为,一切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不理解也不愿意去考虑别国的利益和要求,不愿意“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甚至一厢情愿地想把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随意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样就把中美关系置于了危险的边缘。

在“西藏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

1989年首先引起中美关系动荡的是“西藏问题”。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的西藏以及内地在1989年初即已出现了若干不稳定的因素。如何面对这种局势,成为中国能否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尖锐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他还提出:“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⑥据此,中国方面做出了应付动乱的准备。

果然不出邓小平所料，一场风波很快就来临了。1989年3月上旬，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与境外的分裂主义集团相勾结，在拉萨制造了一场严重的骚乱。他们一面在街头烧汽车、砸商店，向民警开枪射击，一面又要求外国人干预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他们的实际目的是想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在这场骚乱中，有一名武警战士牺牲，40多名干警受伤。在混乱中，有60多名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受伤，10人死亡。

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这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严重扰乱了拉萨的社会治安，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为了平息骚乱，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规定，宣布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为维护内部秩序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戒严令下达之后，骚乱迅速平息，拉萨很快恢复了平静。

然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上述必要措施，却在美国遭到无端的谴责。1989年3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雷德曼就西藏发生骚乱说，美国对这次暴力行动，尤其是对使用武器表示“遗憾”。3月8日，雷德曼又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政府在拉萨地区实行戒严发表谈话，表示美国“有人关注西藏人权的问题”，并对导致多人伤亡的暴力行为再次表示“遗憾”。^⑦美国国会参议院还于1989年3月16日就所谓西藏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关切西藏人权为借口公然支持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骚乱行动，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和国际组织插手西藏事务。

对此，中国方面针锋相对，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1989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国会干涉中国内政并以大量事实批驳了美方对中国的指责。声明指出：

一、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一决议歪曲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历史和现实，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镇压”和侵犯人权，公然支持西藏少数分裂分子的暴行，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和国际组织插手西藏事务。对美国国会参议院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的抗议。

二、最近在拉萨发生的事件，既不是民族、宗教问题，更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预谋和蓄意制造的分裂祖国的暴力活动。这些人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帜，到处打、砸、抢、烧，甚至向执勤的公安武警开枪射击，破坏了拉萨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宗教活动，造成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而对于这种分裂主义的暴力行为,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为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安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中国政府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是完全正当的主权行为。拉萨实行戒严后,那里的局势很快平静下来,恢复正常,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事实证明,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暴力行为是不得人心的。

三、必须指出,少数人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制造分裂活动,企图得到外国的同情和支持,其目的是要在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度。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农奴制下的西藏人民,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哪里有什么“人权”可言。正是在实行民主改革、摆脱了农奴制之后,西藏人民才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广泛民主和自由。在民族大家庭中,西藏人民的正当权益和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宪法的保障。30年来西藏自治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对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制造骚乱表示同情和支持,不能不使人认为实际要支持他们在西藏恢复黑暗的农奴制度。

四、众所周知,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议会或国际组织都无权干涉。任何分裂中国、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行为,无论来自何处,都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我们愿意并准备同达赖喇嘛举行谈判,但要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进行,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美国参议院的决议竟然要求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插手中国西藏事务,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五、中美建交十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进一步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198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明确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则。我们希望美国国会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⑧

1989年3月21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在美国国务院会见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威廉·克拉克,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决议一事,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韩叙强调: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外国政府、议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支持分裂主义的活动。韩叙指出,美国政府曾多次表

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内政,美国不进行干涉。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能恪守自己的诺言,从维护中美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⑨

但美国并没有就此甘休。1989年5月16日,美国众议院也就西藏问题通过一项决议,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插手中国西藏事务。

对此,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于5月19日发表声明,对美国众议院继参议院3月16日就所谓西藏问题通过决议后,又一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并提出抗议。

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邓小平提出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1989年3月23日,他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有的大国的议会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明天通过那样一个决议,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提出抗议。我们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仍然面临着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所以说,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⑩

顶住美国对华“制裁”的应对措施

在这之后不久,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又发生了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和国会曾不断发表言论进行干预,美国的新闻媒体也推波助澜,攻击中国政府,从而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一位美国学者说“天安门危机把人权问题带到中美关系的中心,并把它变为冲突的主题”。^⑪

“六四”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就中国局势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进行指责,声称:“美国不能原谅暴力攻击的行为,不能无视这种行为给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造成的后果”,为此,他宣布对中国采取如下“制裁”措施:

-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 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 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美中双边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⑫

同日,布什还在白宫会见了4名中国留学生代表,宣读了关于中国局势的声明。6月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又致信美国司法部长,建议“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身份。6月8日,布什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此后,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要视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中国的局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将“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他表示不会“听从极端主义者所说的‘召回大使,切断一切同中国的联系’”。^⑬在此期间,美驻华使馆允许并接受方励之夫妇在美驻华使馆寻求“避难”,使中美关系陷入危境。

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些举动,中国政府表示“极大的遗憾”,并因此推迟了钱其琛外长原定6月12日对美国的访问。6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美国政府公然对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横加指责,并单方面采取损害两国关系的行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两项基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任何以这种或那种手段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也是短视的。我们希望美国方面能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要做任何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⑭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也于6月8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就美国驻华大使馆给予方励之和李淑娴所谓“保护”一事,提出了严重抗议。朱启祯说,据我们获悉,方励之和李淑娴已进入美国驻华使馆寻求所谓“保护”。美国驻华使馆已给予庇护。本月6日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证实了此事。

这一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同时也是违反中国有关法律的。众所周知,方励之和李淑娴一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使馆的行动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我们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⑮

但美国方面此时正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对此根本听不进去。6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他在白宫举行的电视记者招待会上威胁说:“除非中国领导人承认个人的权利、尊重持不同政见者并承认学生要求的合法性,否则美国不可能同中国保持正常关系。”他还说,如果目前的局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将在适当时机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表示“希望维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美中关系”,但“谴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可怕的过分行动”。^⑯事实表明,“六四”风波已使人权问题占据了中美关系中的中心位置,并使中美关系从合作转为对抗。

在此危机的时刻,为了使全党正确认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渡过难关,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他认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这

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两手抓。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在讲到计划与市场，以及对外开放时，他说：“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总结过去的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他最后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①邓小平的讲话，对党的高级干部统一思想认识，稳住阵脚，从容应对困难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前后，形势还进一步恶化，美国方面又接连采取了一些不友好的举动，使中美关系陷入危险的境地。

6月7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纽约同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以示抗议；美国国务院责成驻中国使馆和总领事馆放宽对去美国的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

6月8日，美国防部根据布什指示，通知美国格鲁曼飞机公司下令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离开该公司，从而中断了美中双方签署的一项改良中国55架歼-8型战斗机的5亿美元的合同。

6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赖斯通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暂时停止同中国的科学交流活动。

6月10日，华盛顿市市长巴里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

6月13日，美联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取消向中国销售核电厂装置的出口许可证，这批装置价值5亿美元。

面对美方掀起的反华浪潮，邓小平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受他们挑

动。6月16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¹⁸

6月20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试图进一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总统今天指示美国政府停止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他还说:“除禁止接触外,美国将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他声称此举“是为了对中国当局对于要求民主的人士使用暴力和进行报复的浪潮作出的反应”。他同时指出,中国是个重要的国家,美希望同它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¹⁹在此前后,美国国会提出一系列议案,企图以立法形式重申和延展美国政府的对华制裁措施,其中包括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减少中国的纺织品配额、中止对华武器及卫星出售、撤销美国的出口信贷、投资和金融资助等。²⁰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6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美联社记者有关美国宣布中止同中国高级官员的接触的问题。她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施加压力。李金华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还说,中国方面希望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但这需要双方互相尊重,加深理解。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她说:“我们认为,只有遵循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美关系才能继续得到发展。”她说,外国人对中国当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一时看不清楚。可以多作一些观察,采取冷静和慎重的态度,不要匆忙做出结论。她指出,有的国家想用政治或经济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这是不明智的,也是徒劳的。李金华说:“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于外来压力。我们希望他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从维护双方关系的大局出发,不要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也不要做不利于双方关系的事情。”她重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²¹

由于美国方面带头接连对中国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随后有西方七国集团,以及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对中国的制裁²²,世界银行也于6月26日

宣布推迟考虑对华贷款,中美关系的温度已降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也开始出现动荡,对中国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表达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气概。他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这个会上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²³

邓小平还及时提出了应对政策的基调和斗争策略。在1989年7月召开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言简意赅的重要指示: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势很重要。不要怕,要立场坚定,礼貌周到。用软弱态度不能稳定关系。硬一点,反而能促使它转弯子。²⁴

中国方面据此重新估量了中美关系,并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经过这次震荡之后,不会很快恢复,也不会一直恶化下去。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西方在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还不敢把文章做绝。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估计美方迟早要转弯子。至于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钱其琛强调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要据理斗争,不屈服于它们的压力。二、要注意利用西方各国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区别对待,注意策略,留有余地,防止在失控情况下轮番升级。三、把政府间的高层往来与其他往来区别开来,地方性、民间、经贸和科技往来

可以照常进行。四、要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政策不变,以争取西方国家愿意和中国保持关系的力量,牵制反华势力。^⑤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外交在邓小平的战略指导下,坚决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施加的种种压力,并逐渐稳定了国内局势,由此在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向美方传送两点重要的信息,奉劝美国决策者不要误判形势。他说:“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经过动乱以后,新的领导班子将坚持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没有曲折,没有缺点。但我们相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第二,中国人吓不倒。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也有人怕,方励之那些人怕,因此做尽损害自己国家的事,但这种人不多。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请你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⑥

9月16日,邓小平在接见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又对国际局势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复杂局面的方案。他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

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②7}中国方面根据邓小平制定的对策,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沉着应对,首先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逐渐稳住了国内的局面。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注意寻找时机,利用矛盾,分化瓦解西方国家的对华制裁。这里的关键是要在西方对华制裁的联合阵线中找到一个易于突破的薄弱环节。这时,日本的动向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

日本作为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追随美国参与了对华制裁,但它同时作为中国的邻国和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不愿意过分地得罪中国。1989年8月1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巴黎出席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时,日本外相三冢博对钱其琛说,在半个月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为中国做了解释,劝告西方不要使对华制裁升级。^{②8}由于日本对华采取的态度相对温和并留有余地,由此成为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对华联合制裁的一个突破口。

1989年9月17日,由著名日本政治家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成为“六四”事件发生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议员代表团,

受到中国方面的精心接待。

邓小平于9月19日会见了伊东正义,并且指出:“中日友好十分重要,友好对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②他还针对在美国主导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指责,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我们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中国的国家,其内部是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现在事实上也没有行得通。一个国家自称为世界宪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本身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但也没有把中国搞垮。老实说,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国也还是存在。”^③

在这之后,中日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1989年11月12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以“老朋友”的名义在东京接见了有官方背景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和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止与中国进行一切高层往来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

邓小平利用这一契机,继续对日本做工作。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并且对他们顶住压力前来访华表示了赞赏。他说:“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你们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患难见真情。虽然我们并不算处于患难之中,但你们此时来我国访问的真情是可贵的。现在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比要制裁我们的人多得多,我们没有孤立感。”他还动情地表示:“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你们的勇敢行动证明,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④

邓小平的努力很快取得可喜的成果。1989年12月5日,日本政府与中国正式签署日本向中国提供50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的协议。3天之后,日本政府正式邀请中国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这两项大的动作,使日本成为“六四”事件后西方七国集团中第一个突破制裁禁令,

不仅向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并且邀请中国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的大国。美国精心设下的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防线不到半年,就被中国方面以扎实的工作撕开了一个大的缺口。

在打开了日本这一突破口之后,邓小平再接再厉向其他西方国家做工作,一再指出,制裁对中国不起作用,呼吁他们放弃对华制裁的政策。1990年7月11日,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②这实际上是提出了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来打破西方的制裁的方略。

在邓小平战略指导下,经过中国方面的不断努力,除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制裁开始逐渐松动。1990年6月28日,意大利外交部通知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欧共体都柏林首脑会议决定,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爱尔兰外长柯林斯和卢森堡外长普斯希望在当年联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会晤。

其他欧洲国家也不甘落后,1990年7月,德国经济合作国务秘书访问中国。不久,英国外交国务大臣也来到北京。

1990年9月28日,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如期与中国外长钱其琛在纽约会晤。由于意大利当时是欧共体主席国,因此,会谈主要是在德米凯利斯外长与钱其琛之间进行。德米凯利斯对中国外长说,尽管过去的事件使双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趋向于一致。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建立的。欧共体希望尽快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他还表示,曾以为西方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现在认识到,适合欧洲的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能够进行良好的合作。他还透露,作为欧共体理事会主席,他将在10月份召开的欧共体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完全恢复”欧中关系。钱其琛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告诉他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并表示赞赏意大利外长关于每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的观点,强调人权应从各国的法律来体现,并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这次会晤实际上标志着欧洲与中国高层官员接触禁令的结束。^③

在西方国家中,西班牙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比较好。1990年10月1日,

西班牙外长奥多涅斯在纽约约见钱其琛,并且说,西班牙一直支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与欧共体国家外长在联大会谈的良好气氛感到高兴。他还告诉钱其琛说,现在欧共体内对华强硬国家的态度有所改变,下周欧共体外长将开会,会就尽快恢复对华关系做出决定。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两国外长互访的共识。1990年11月,奥多涅斯访华。三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回访了西班牙。^④

1990年10月22日,欧洲共同体12国外长在卢森堡作出决定,宣布恢复欧洲共同体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由此表明已没有多少国家愿意捆在美国的战车上将对中国的制裁继续维持下去。

在亚洲,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于1991年8月10日访问中国,成为西方对华制裁后第一个访问北京的西方大国的政府首脑。

由于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渐改善,1991年财政年度,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5.79亿美元的贷款,恢复到了1989年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前的水平。对此,一位西方官员说:“事实证明,中国的生意太好了,无法舍弃。”原世界银行行长小巴伯·康纳尔也说:“获得利益的愿望战胜了理想主义。”^⑤

至此,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的全面制裁已难以为继了。

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意见

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之后,美国一方面对中国保持压力,企图以压促变;另一方面,也留有余地,注意观察中国事态的发展,注意邓小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动态,并适时作出一点姿态,以防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一发而不可收拾。

美国在宣布中止中美两国副部长以上的高层官员互访之后,仍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中国对话,特别是寻找与邓小平直接对话的机会,因为这是了解彼此立场,避免错误判断的有效途径。

在这种背景下,1989年6月7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盖茨电告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说美国总统布什希望在当天下午6时以前与邓小平通话,请中国大使馆将这一信息转告国内,帮助安排。当天下午3时,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外交部美大司的回电,请其转告美方,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习惯,美方有事可以通过中国大使馆与北京联系。^⑥

布什由于未能与邓小平通话,于是亲自起草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说明了他的想法,并提出要派一名特使去中国,希望中国有所回应,以便让特使“得以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使命”。^⑤6月10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办公室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讨论解决方励之夫妇在美驻华使馆“避难”问题。

中国方面很快做出反应,1989年6月12日晚,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国内致布什总统的一封英文口信,口信指出:“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您,中国政府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形势,我们一贯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邓小平主席在最近所作的讲话中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口信对美方的信件作出回应说:“您表示愿意恢复与发展中美关系,这与中国方面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双方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并且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做伤害对方民族感情与利益的事情。”^⑥

6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拿了布什总统的一封密信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面见韩叙大使,并且说:布什总统本来想下午接见韩叙,但是怕被记者泄露,改派他来与韩叙碰头。布什表示他本人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希望中国政府发表宽恕闹事学生的声明,并妥善解决方励之问题,为了商谈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布什决定派一名特使去北京见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领导人予以考虑。^⑦

邓小平于6月22日复信布什,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邓小平表示同意布什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意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⑧这样,中美高层之间的私下联系终于有了着落。

1989年7月1日,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乘坐经过伪装的专机(外部涂掉了标记),按照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在空中连续飞行22小时(空中加油),进入中国首都。为了保密,这次访问的所有会见、会谈以及宴请场所;客人乘坐的汽车、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国旗;有关活动没发任何消息;有关活动的摄影也事先征得同意,所拍资料一律封存。

邓小平直接领导中方参与了这次重要的中美会谈,并为会谈定了基调。7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之前,先对李鹏和钱其琛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钱其琛说,

不久将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邓小平指出:“不要说七国,七十国也没有用。”他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做外事工作的人要注意这个问题。^④

随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作为美国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并与其就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伊格尔伯格事后所述,在会见中“我们坚定地表明,美国不宽恕使用骇人听闻的暴力来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也不宽恕随后采取的镇压措施”。“我认为,第一次访问表示了美国的目的是严肃的,清楚表明了我们的关系的恶化包含了多大风险。”^⑤

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我需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⑥

邓小平的讲话使美国方面了解了中国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减少了错误的判断。在此之后,美国于1989年7月7日宣布批准波音飞机公司向中国出售4架原定于6月交货的商业性喷气客机,但中国政府订购的其余飞机的交付仍然“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

1989年7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秘密致函邓小平,一方面感谢邓小平接见美国特使,并通报在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辞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辩护,企图把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中方。布什在信中说:“您在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提到一句中国的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您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系铃’。而我们认为,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系铃’。我非常尊重中国关于不干涉内政的一贯立场。因此,我也知道当我建议现在可能采取何种行动时,我在冒损害我们友谊的风险。但是,

我们双方曾竭力加强的美中友谊要求一种只有朋友才能表达的坦率。目前,美国国会继续试图压我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我将尽力防止这条船摇摆过度。”他还指出:“请理解这是一封亲笔信,它来自一个希望看到我们共同前进的人。如果我跨越了建设性的建议与‘干涉内政’之间无形的门槛,请不要对我生气。在我们上次会面时,您告诉我,您已将更多的日常事务交给其他人。但我出于尊敬,出于一种亲密和友谊的感情向您求教。您几经起伏,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现在我请求您同我一起展望未来。这是一个具有戏剧变化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对这个令人激动的未来都能作出很大贡献。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友谊重新回到正轨,那么,我们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和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事。”^④

邓小平于8月11日复信给布什,赞赏他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并就“解铃”、“系铃”的含义,特别做了解释。邓小平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⑤

布什政府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中美之间的沟通。7月下旬,恰逢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美方暗示东道国法国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在开会期间“有机会彼此能长时间见面”。会议期间,贝克三次会见钱外长。7月31日,中美外长的会谈长达90分钟,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贝克为此推迟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

在会谈中,中美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也就中美关系进行了坦率的谈话。钱其琛外长向贝克国务卿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他强调指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贝克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外长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⑥

不久,美方做出一些姿态。1989年8月8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赴天津,参加美国MGM商业公司在天津租借签署土地划片开发合并的

仪式,表明了美方对在华商业利益的重视。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中美关系恶化后,双方签署的最大一个项目,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8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北京安全情况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

中国方面抓住这一机会,作出适度反应,向美国商界人士及美国大使阐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希望中美能够保持在经济领域的合作。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会见美国MGM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繁荣富强。马利克波尔一行是在天津签署了划片开发的合同后来北京的。李瑞环对马利克波尔的远见表示赞许,对为此项目尽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李瑞环认为,这一项目的签署有力地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最近,有许多外国朋友都很关心或者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能持续下去,他表示相信,如果这些外国朋友到中国来看看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些顾虑就可以很快消除。李瑞环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历史,大量的事实证明,实行改革开放对于四化建设的推进,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问题,那是因为改革开放搞得还不够好,而今后的困难如何解决,也要靠继续搞好改革开放。李瑞环说,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也必须改进和适应。毫无疑问,由于我们长期封闭,对国外情况不太了解,加上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在思想、作风、政策、措施等许多方面还不适应。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使对外开放搞得更好,步子迈得更大。李瑞环对会见时在座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到天津参加合同签字仪式表示赞赏。他说,希望大使先生多跑跑这种地方,多促成这类事情,这很有意思,其意义可能超过具体项目的本身。^④

为了使处于困境中的中美关系早日出现转机,中国方面继续作出努力。1989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参加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钱其琛向贝克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一些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实际步骤。

10月2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

讲。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钱外长在讲话中阐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根本不同,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中美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需要。其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发展经济贸易中获利。

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中美目前出现的困难并不是因为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是由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所引起的。其次,中国对纯属自己国内的事务实行什么政策,采取何种行动,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如果有人企图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那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首先要准确地了解事实,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其次,应该避免用本国习以为常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是非。如果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那是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我们不想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输出给其他国家。我们也希望别的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台湾当局利用某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出现暂时困难之机,加紧推行“弹性外交”,其实质是谋求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做法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美国政府多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希望这些声明能见诸于行动。

钱外长还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战后历史的发展表明,凭借军事优势发动军事入侵、对别国施加压力、实行经济制裁,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既不合时代潮流,也不能奏效。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才有希望,中国不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一贯身体力行,并主张在此原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⑧

讲话结束后,钱其琛外长还耐心地回答了美国朋友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向美国传递信息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对布什总统对外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肩负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美国白宫在尼克松抵达北京之前就在一项声明中直言不讳地说:“总统正期待着阅读尼克松的报告。”^④尼克松的发言人在谈到此次的目的时指出:“这是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的访问,以估价中美关系目前形势,并讨论两国目前所处的战略格局。”^⑤

邓小平对尼克松的来访也极为重视,并于10月31日与尼克松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他对尼克松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⑥邓小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邓小平的这番话意在表明,中美关系是在现实地把握各自国家的战略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理应不在中美关系的利益框架之内。现实主义地理解和处理中美关系,是这种关系得以确认的基础。

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

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⑤邓小平还强调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⑥

邓小平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邓小平认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还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⑦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也分别会见了尼克松。江泽民对尼克松表示,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⑧

尼克松在上述会谈中表示,现在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困难,但是,按照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仍能找到现在和未来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他希望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想办法,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⑨尼克松不同意中方关于解决中美冲突,应先由美方采取主动的提法,他认为,恢复两国关系的势头,需要双方的努

力,向前迈进的唯一方法是共同起步。^⑳

在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尼克松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份发生的事件重新作出估价。^㉑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像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㉒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

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希望找到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正常化的方向。他对记者说,尼克松是受中国尊重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在情况非常困难的时刻打开同中国关系的人,他看到这种关系至为重要,我也看到这种重要性。他说,我们有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原因要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希望以静悄悄的方式找到或许是双方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他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㉓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989年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

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以及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基辛格。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㉔在谈到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原因时,邓小平认为:“美国确实有人希望中国动乱。你只要查一下美国之音前两三月的报导就可了解”,“美国在中国动乱中卷入太深了”。^㉕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③

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接见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纷争的建议。主要内容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国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④

钱其琛外长会见并宴请了基辛格博士。钱其琛说,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妨碍两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只要我们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差别现在和将来也不应成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钱外长说,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发现这样的客观现实,即中美之间有着长远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国希望尽快结束中美间这几个月来不愉快的纠葛,共同开辟未来。他接着说,我们为了维护两国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事情不取决于我们单方面。我们期待着美国政府采取主动行动。基辛格强调说,他继续重视美国同中国发展密切的关系。基辛格指出,多年来,两国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双方发现彼此间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自17年前“上海公报”起草以来,情况一直如此。他说,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不过还有一点,就是一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既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要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传统。基辛格说,一些美国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走第一步,而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应走第一步。他认为,由于稳定与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共同采取步骤,使双方的关系更顺利地发展。^⑤

在此之后,邓小平又于1989年11月17日会见了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夫妇,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

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⑥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与以私人身份所进行访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谈话与沟通,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中美两国间的微妙联系,促进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这对于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反对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议案

美国国会在美国国内推动“制裁”中国方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六四”事件发生伊始,美国参议院就于6月6日以100票对0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资助与中国贸易情况;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作出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立即增设华语节目。美国众议院也以406票对0票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并提出一系列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措施建议。^⑦

在此之后,美国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并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一再要求加大“制裁”中国的力度,在恶化中美关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9年6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418票对0票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并提出一系列对华“制裁”措施。其中包括:把已经实行的“制裁”措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把武器出售的禁令扩大到可能用于治安目的的装备;禁止向中国运送本来由中国发射的一颗美国卫星;暂停实施一项有关在中国促进美国贸易和投资机会的计划;禁止向中国出售核设备和核燃料;反对政府提高向中国出售的技术水平;建立一个特别小组讨论决定如何帮助留在美国的没有资金来源的中国学生。修正案称:总统如果能向国会证明中国人权问题上已有重大改进,这些新的“制裁”措施允许不予实行。^⑧

此后不久,美国国会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于1989年7月14日,以81票对10票通过由米切尔提出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布什

总统务必使中国领导人知道,“除非他们承认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人权和正义的合法愿望,否则我们两国关系将继续保持紧张”。该修正案提出下列“制裁”措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暂停办理贸易与保险和暂停使用美国资金支持对华贸易6个月;暂停出口将由中国发射的卫星;暂停在核方面的合作,直到总统能够证明中国未参与核扩散。该修正案也规定如果总统认为为了美国的安全,可以灵活宣布结束暂停或中止的做法。美参议院还通过了一系列非约束性的建议,要求布什采取更强硬的步骤,其中包括:指示进出口银行立即推迟批准资助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申请;指示国际金融机构里的美国代表反对向中国提供一切贷款;重新研究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是否明智;重新审查两国间的所有贸易协定;重新审查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与美盟国磋商对中国采取集体的经济“制裁”;重新研究对中国的高技术输出等。^⑩

7月19日,美国42名参议员致抗议信给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声称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在“暴力和恐吓的道路上走下去”,美中关系将会遭到“极大的”危害。同日,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把中国驻美使馆附近的一块草地命名为“天安门广场公园”。^⑪7月21日,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支持达赖喇嘛所谓“争取人权的斗争”。^⑫

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中国方面做出强烈的反应。1989年7月19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7月20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华秋在北京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就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进行了严正交涉,并提出了强烈抗议。7月22日,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8月16日,中国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止中美富布赖特教育交流计划。

但美国国会不顾中方的严重抗议,又于11月15日和16日由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的“美国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在众参两院分别于6月和7月通过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基础上,经两院会商委员会修改后分别通过的。该修正案除了支持继续中止向中国出口军事装备、中断双方政府高级官员接触、中止同中国的核能合作、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贷款之外,还要求中止以“援外法”所提供的资金用于“贸易发展办公室”与中国有关的活动。修正案威胁说,如果中国的“镇压”措施“继续深入”,总统就应“重新审查”给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两国间所有的贸易协定以及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地位等。修正案还建

议由联合国“谴责”中国的“暴力镇压”和“大规模逮捕”，要求美国的对华政策应“明确地同西藏的局势联系起来”，同时还要求把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对柬埔寨问题的政策同“制裁”问题挂钩。修正案规定，如美总统能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中国在政治改革中取得进展或出于对美“国家利益”考虑，可以撤销对中国的“制裁”措施。⁷²

中国方面对美国国会提出的这一新的更为严厉的对华“制裁”举动十分愤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1989年11月19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刘华秋指出：国会通过的“制裁”中国的议案是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行动的又一次升级。美国政府对此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政府一再表示，愿意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我们欢迎这一表示。但现在更需要的是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实际行动。他说，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从维护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明确反对国会的这个议案。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美国政府承担。⁷³

美国国会的这项“制裁”中国的修正案是包括在美国国务院的对外关系授权法案获得通过的，经美总统签署后即可成为法律。但这个一揽子法案通过后，白宫与国会发生了争执。布什政府对法案中的一项条款（即禁止政府使用美国援助款项支持外国执行与美国法律相违的政策）表示不接受，认为这一条款“将会限制美国外交政策的行动”。众院因此撤销了这一条款，但这一条款在参院中因仍争议不休而未作出决定。21日深夜布什则因这一条款否决了“国务院授权法”及其修正案，包含在其中的对华“制裁”修正案也被否决搁置。由于国会两院已于11月23日感恩节前夕休会，因此直到1990年1月23日恢复正式工作才能再次讨论这一问题。⁷⁴

这项修正案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美国国会又采取了另一项严重的举措。

1989年11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该法案以所谓中国留学人员会受到“政治迫害”为理由，决定豁免全部持J-1签证的数万中国留学人员在学业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也不符合国际通常的惯例。早在1978年，中美双方就曾达成互派留学生和学者的谅解。1985年中美双方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交换留学生与学者的议定书》。1987年，中国教委负责人与美国新闻总署进一步发表了“中美教育会谈新闻公报”。该公报指出：“双方讨论了美国关于外

国留学人员在学业结束后返回国的法律规定和确保中美教育交流的根本目标得以推进的必要性。”“美国方面认为,美国关于外国留学人员的法律适用于所有的外国留学人员,包括外国留学人员需要按有关规定学成后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美国还在公报中承认,“如果来美国的外国留学人员在学到了技能、知识后不回本国服务,美国进行国际交流的目的就无法达到”。^⑤可是美国国会却置两国间达成这些郑重的协议于不顾,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中国方面不能接受的。

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贝霖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刘华秋指出,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势必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后果。刘华秋还敦促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总统否决美国国会的这一法案。

美国总统布什为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于11月30日搁置否决了美国国会的这项法案,他希望以总统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以保持总统管理对外事务的能力”^⑥。为此,他同时发表有关中国留学人员的声明和备忘录,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可能受到“政治迫害”为由,决定通过采取行政手段,实施与国会通过的法案内容一样的措施,即豁免全部持J-1签证的在美中国留学人员在学业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等。这也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已注意到美国国会“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遗憾的是总统又以行政手段使法案的各项措施得以实施。12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约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就美国政府发表有关中国留学人员问题的声明和备忘录向美方进行了交涉。刘华秋说,美国国会“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虽被搁置否决,但美国政府又就此事发表了声明和备忘录,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可能受到迫害为由,宣布了同国会上述法案内容一样的豁免全部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等行政措施。他说,“对于美方这一破坏中美教育交流协议、损害中美关系的举动,我奉命向美国政府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刘华秋指出,“所谓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可能受到‘迫害’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立即停止一切破坏两国教育交流和损害两国关系的行动。”^⑦

同日,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就此事发表声明,揭露美方制造的谎言,抗议美方违背中美教育交流协议,干涉中国内政。声明指出:“美国国会辩

称这是为了所谓保护中国留学生不受‘政治迫害’。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是极其荒谬的。我国政府历来把留学人员看做国家的宝贵财富而予以重视和爱护,希望他们学成归国,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我国政府和领导人曾一再重申,对于远在国外包括美国的留学人员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的过激言行,一律不予追究。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从6月4日到11月底已有700多名留学人员,其中300多名留美人员回到祖国,还有更多的人回国休假、探亲或公务放行,他们受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欢迎,得到妥善的安排,并可按照现行规定重新再次出国。这些有目共睹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充分说明,所谓可能遭到歧视与迫害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希望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正视现实,不要在干涉中国内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鉴于美国方面的行动违背了中美教育交流协议,干扰了中美两国留学人员的正常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不得被迫作出必要的反应,并且宣布:“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全部责任。”^⑧

美国国会在其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被布什搁置否决后,指责布什是在“向北京磕头”,并经过一番准备,又于1990年1月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根据美国法律,美参众两院如均有2/3的票数赞成推翻总统的否决,便使议案重新通过成为法律。

对此,布什总统警告说,如果国会推翻他的否决,将有损于美中长远关系,美国需要保持同中国的接触。美国白宫还于1990年1月19日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陈述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受到保护,不会被迫遣返回国的情况。

但美国国会众议院仍于1990年1月24日投票表决,以390票对25票推翻了美国总统布什1989年11月3日对国会通过的“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的搁置否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参院的投票表决也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这项议案将重新通过成为法律。

1990年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谈话,谴责美国众院的“霸权主义行径”,同时敦促美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恶化。

同一天,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推翻布什总统对国会通过的“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的搁置否决进行表决,结果仅以4票之差,未获三分之二多数票的赞成,这项法案终于没有成为美国法律。而这关键的4票是共和党人的。因此,美国参院少数党领袖鲍伯·多尔说:“这不是关于对华政策,这是美国政治。”^⑨但布什总统对此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他的对华政策的

胜利,但他又于1990年4月11日发布行政命令,准许在美国的所有中国人,无论其护照或签证是否到期,都可以继续留在美国,直至1994年1月1日止。这是后话。

美国国会在参院未能推翻布什总统对“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的搁置否决之后,又于1990年1月30日重新讨论“制裁”中国的“国务院授权法”,结果获得通过。

1990年2月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就此问题进行交涉。刘华秋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中美双方在中美历次联合公报中确认的指导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则。对于美国国会违背上述原则,一再通过反华议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美国政府理应履行自己在历次中美公报中承担的义务,及时予以制止。美国国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掀起反华浪潮,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华秋说:“目前中美关系存在的困难,完全是美国方面造成的。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中美关系重新回到积极的轨道。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中方也希望两国关系早日恢复正常,并为此作出很大努力。美国撤销对中国的制裁,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我们敦促美国政府真正实践自己的诺言,从维护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明确表示反对国会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并采取有效步骤,尽快撤销对中国的制裁。”^⑩

2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分别就此事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国会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国会的种种反华举动已经使中美关系置于十分危险地位,由此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

与美国国会咄咄逼人的对华姿态相比,白宫的态度稍稍冷静一些。因为,布什认为“一个总统必须关注两国关系中的战略重要性”。^⑪1989年9月18日,布什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正在等待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发出能导致两国关系改善的“适当信号”。他说:“我一直尽力保护和维持这一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长期关系,但现在还不是正常化的时候。”他声称,

他不想“因切断商业联系而伤害中国人民”^②。

对此，邓小平已有所察觉。1989年10月26日，他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指出：“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认识中国的话。”^③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鉴于中国政局逐渐趋向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具有的重要地位，布什总统开始考虑采取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来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

尼克松的访华结果显然对布什总统作出上述决定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曾建议布什总统，“应考虑主动采取一个步骤，即恢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这一行动不应要求中国方面先行采取。”^④尼克松还在向国会两党领袖提交的访华报告中指出，假设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不再是美中两国的一个重大威胁，我们仍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来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为此尼克松列举了五点理由：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我们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就不会奏效。我们就根本无法阻止人家向位于中东这样的麻烦地点的国家出售导弹和其他毁灭性武器。二、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而且有能力成为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在此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对平衡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三、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的十亿人口将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难道我们希望我们被排除在外面把那个市场留给日本人和欧洲吗？四、展望未来，尽管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不是因为它是共产党国家，它将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难道我们希望冒在下一个世纪做中国的手，而不是盟友的风险吗？五、没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合作，我们怎么能解决全球变暖和其他环境问题呢？尼克松还认为，恢复中美合作关系对中国就和对我们一样，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尼克松指出中美双方都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弥合分歧。中国可以考虑解决围绕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事出现的争端、取消戒严、赦免举行和平示威的人，并对外国游客、学生、科学家以及希望在合资企业中投资从而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的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美国则可考虑取消经济制裁、恢复政府对希望在中国投资的那些人的帮助。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信贷机构可恢复对中国重大项目的资助。尼克松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谁

先采取行动。答案是,如果我们今后要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起走下去,我们就必须一起采取行动。^⑤

在此期间,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改善美中关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而预计在1989年12月2日至3日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为布什策划派遣特使去中国提供了机会。因为自1972年以来,美方一直向中方通报美苏高峰会谈的情况。

这样,1989年11月6日,布什给邓小平去信,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为此,他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见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通报会晤情况,并探讨如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11月15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指出:“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⑥

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谈之前一个多星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即通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布什总统想向北京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

12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再次给邓小平写信,提出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谈后一周内,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向中方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信中还要求中方对邓小平提出的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的澄清,表示希望并相信可以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布什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⑦

12月4日,布什总统从马耳他回国后立即着手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并很快与中国方面就此行的细节达成协议。尽管布什总统的这一主动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布什仍然认为这一举措是必要的。^⑧事后,他在向国会解释此事时说:“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我觉得有必要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通报。在马耳他会议之前我就清楚地告诉他们我要这样做。”^⑨

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抵达北京。随同特使来访的有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总统人事事务助理查·格·昂特迈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道·海·帕尔。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同机到达。

在美国总统特使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分别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钱其琛外长同他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伊格尔伯格后来在谈到这次中国之行时说:“中国领导人需要知道,他们怎么做才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告诉他们。”^⑩

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完全赞成您的说法。”邓小平和客人落座后接着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分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他说,“尽管您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我代表布什总统告诉您,我非常感谢,尤其是在您已经退休了又是在星期天抽时间来见我。”邓小平笑着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⑪

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它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不是地区性的,至少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整个是一片混乱。当然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⑫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

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⑧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双方都应让点步,要双方努力,不要久拖不决,这是在布什总统先采取主动行动^⑨之后中国作出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方面对恢复中美关系的诚意。

江泽民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双方都真诚地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我们的合作前景就是广阔的。斯考克罗夫特对认识江泽民总书记感到非常高兴。他说,布什总统十分重视美中关系,总统希望把美中关系放在积极的轨道上,而脱离过去几个月的消极轨道。^⑩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12月9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举行了会谈。在近两个小时的会谈中,斯考克罗夫特向钱其琛通报了不久前在马耳他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的情况,钱其琛对他的通报表示感谢,并向客人着重介绍了中国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问题的方案。他说明,邓小平提出一揽子方案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间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他还指出,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一揽子建议,充分表明了中方解决中美纠葛的诚意,也充分考虑了美方的反应及布什总统来信中的想法。中方考虑的后续行动是:一、建议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二、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明年恰当时间正式访美,届时应当有一个中美关系比较好的环境。他强调,中美之间不能做相互伤害的事。中国从来不做伤害美国的事,也希望美国不做伤害中国的事。中美之间要友好相处,并要相互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斯考克罗夫特表示,中方的建议很重要,他将带回去仔细研究。然后,他谈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主要是用美国国内情况的复杂性来进行辩解,要求中方理解美国国内的情况。他说,布什总统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6月宣布的对华“制裁”措施,是为了照顾美国人民感情上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布什总统实际上取消“制裁”措施,很可能导致国会以总统无法否决的多数票通过立法。对于方励之问题,斯考克罗夫特说,双方确实需要进行仔细的谈判。这最好在北京谈。如果有些对美国非常敏感的问题,可以在美国进行谈判。钱其琛说,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希望美方认真研究后,

提出自己的方案。问题的解决,当然必须经过双方共同的努力。你们有你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困难。你们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在寻求解决的方法。^⑥

会谈结束后,钱其琛设宴欢迎斯考克罗夫特一行,宾主发表了讲话。钱其琛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多年来,他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曾数次访华,为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这次布什总统派他作为特使来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并就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说明了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在谈到国际形势时,钱其琛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战后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前景和它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影响,为各国人民所关心。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应该经常交换意见。良好的中美关系无疑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钱其琛强调:中美关系几经风雨,仍能始终向前发展,充分证明它是富于生命力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不可能抹杀我们之间的重大共同利益。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各自的立场而又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了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困难的途径,我们应该加强接触,互相沟通。我们相信,这次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必将有助于我们增进相互了解,有助于克服困难,消除分歧,使中美关系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⑦

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和我的同事们今天作为朋友来到这里,就我们两国都极为关心的国际问题,来恢复我们之间的重要对话。我们认为,这种对话能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谈到美苏首脑会晤时,斯考克罗夫特说:“上周末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重要会谈。随后布什总统指使我到中国来,向我们的中国朋友通报马耳他会谈的情况。”斯考克罗夫特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我们今天来,还为我们的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和活力,并寻求双方意见一致的新领域——经济、政治和战略。我们是为减少我们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来的。斯考克罗夫特强调说:“总统的强烈愿望是这次同中方的会谈取得进展,并为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打下基础。”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在这次会谈中,我们将寻求勾画出我们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找出那些有分歧的领域。我们越早完成这个任务越好。在过去,当我们一起努力时,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双方必须坚持不懈,现在更应如此。^⑧

几天后,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就中方的建议提出了反建议,表示美方原则上接受中方提出的一揽子建议中四个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同时有以下相应的考虑:第一,为了满足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利益,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和中方代表在北京讨论解决方励之的问题。第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应由中国驻美大使和美方代表在华盛顿讨论。第三,美方原则同意做出认真的努力,就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并欢迎中方就这些项目提出建议。第四,美方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的时间访问美国,以完成关系正常化进程。第五,美方愿提出一个双方采取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计划的建议。^⑨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作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然而,布什总统的这一举措引起了美国一些人的强烈批评。美国国会参院民主党领袖乔治·米歇尔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说,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没能使中国领导人有任何举动表示要进行民主改革,并保障公民的人权。米歇尔说:在勇敢地宣布了(在人权问题上的)严格标准,并看到它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后,总统现在却以一种最不恰当的、最令人尴尬的、最令人遗憾的方式向那个政府屈服了。格普哈特说:“在美国两党致力于自由的立场在东欧结出果实这个时候,他(布什)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致力于中国国内自由的问题上摇摆不定。”^⑩

因派遣特使访华而受到攻击的美国总统布什对此辩解说,他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寻找发现共同基础的方法”^⑪,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想孤立中国人民。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知道保持这样一种关系是困难的,但我不想使这种关系进一步恶化。”^⑫

布什还说,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是为了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苏马耳他首脑会晤情况,这不意味着美中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布什说,“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战略地位,这一点对美国来说仍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又称,中国应采取措施,使“目前仍然存在的某些不满情绪得到平息”。^⑬

布什总统之所以要冒着某种政治风险来保持美中之间的联系,是因为

他对当时苏联东欧的形势发展前景还不能确定,仍需保留中国牌,以着眼于世界政治的未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布什总统在派特使访华后不久,又采取以下的主动行动来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1989年12月19日,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布什决定给三颗美国制造的由中国发射的通讯卫星颁发出口许可证。中美两国曾于1988年就中国发射美制卫星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所承担发射的三颗美制卫星中有两颗是由澳大利亚卫星公司订购的,美国政府已于1989年3月颁发了出口许可证。另一颗是由亚洲卫星公司订购的,出口许可证也在“巴统”获得通过。但在北京政治风波过后,美国政府根据布什总统的“制裁”措施,暂停了澳星出口许可证的实施和亚星的出口许可证的审批。这次布什总统决定批准这三颗美制通讯卫星的出口许可证,实际上是在对华全面“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同一天,布什总统还作出决定,取消一项不准美国进出口银行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的美国公司给予资助的禁令。布什在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一封信中说,出售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这些卫星将由中国制造的发射器送入太空——和撤销对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的限制符合国家利益。布什写道:“因此,我放弃禁止进出口银行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贸易活动提供资金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信用贷款、信贷担保、保险或分保……”^⑩布什称这些决定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上述姿态也作出了一些呼应。如针对美国所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中国公开声明,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中国还准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入境。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富布赖特交流计划中的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但不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

中国国务院还于1990年1月10日正式宣布,鉴于“首都和全国局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一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⑪

中方这一决定既是基于国内政局已趋向稳定的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有缓和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考虑。因为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实行戒严以来,已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

美方对此作出反应。布什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欢迎中国解除戒严，这是一个好迹象”。他重申，他不愿采取不接触的办法来孤立中国，不愿使时钟倒退。美国副总统奎尔也认为，北京解除戒严的决定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说明布什总统对华政策取得成果。他还暗示准备重新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做法。但白宫发言人称，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没有改变”。^⑩

1990年2月2日，美国政府所属的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提供了975万美元的贷款(但未予宣布)。这笔贷款数额虽然不大，但影响不小。^⑪

随后，美政府正式宣布美国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但将密切注意贷款是否用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并在逐项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虽然还留有尾巴但毕竟是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华“制裁”。

反击美国发表的《人权报告》

布什总统为稳住对华关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虽然在美国国内获得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但大多数人则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不仅抨击布什总统派特使访华是“叩头”而且认为中国方面作出的回报少得可怜，有影响的《纽约时报》评论说，“红利如此之少，这只是对布什政策的嘲弄”。^⑫白宫由此受到较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东欧国家自1989年10月起开始出现动荡的局面，柏林墙倒塌，一个接一个国家转向。在美国特使访华之后，罗马尼亚又发生了推翻和处决齐奥塞斯库这样的戏剧性事件，给美国以很大的鼓励。正如美国学者所说：“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和冷战的结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改变了美国决策环境。”^⑬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爱德华·马基在一次听证会上说：“冷战已经结束……如今……当我们翻开中国这张牌，却是一张小牌。”^⑭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对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也不再感兴趣，转而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布什政府估计，国际局势还会有重大变化，中国也有可能重蹈东欧国家的覆辙，

因而加强了对中国施压的一面,特别是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试图以压促变。

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⑩

1990年2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989年“人权报告”。这份长达千余页的官方文件,对10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逐个进行点评。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份报告以24页的篇幅专门针对中国,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明显恶化”。报告在多处用“可能”、“据说”、“据估计”、“据消息灵通人士说”、“未被证实的报告说”等含糊的字眼,集中抨击中国政府在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中“可能”杀死了“几千人”,还说“估计有十万人被捕”。这份报告还认为,1989年在中国西藏和其他地方存在着普遍严重的“违反人权”的事例,甚至指责中国政府“不容忍以宗教方式鼓吹西藏独立”。这份报告还指责“中国政府实行一种全面的、具有高度侵犯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横蛮干预个人和家庭”。攻击中国“公安部实施携带和检查身份证制度”是“控制中国公民在本国行动的自由”,^⑪等等。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声称,总统是同意报告的估计的,报告代表了总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面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抨击,中国外交部于2月22日发表声明反唇相讥。声明说:众所周知,美国国内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人权问题,美国政府不去认真解决自己的问题,却到处伸手去干涉别国的事务。最近美国军队大举武装入侵巴拿马,就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巴拿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蛮横地侵犯和剥夺了巴拿马人民行使其主权和自由决定其前途的权利。事实证明,侵犯人权的正是美国政府自己,它有什么资格谈论别国的人权?声明指出,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的人民,从不屈服于任何外国的压力。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决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中国人民走自己选定的

道路的决心是坚定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任何外来的攻击、压力和“制裁”都必将以失败告终。^⑭

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在向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金米特转交这份声明时还强调指出,自去年6月以来,美国政府常以“三权分立”为由,推卸自己对美国国会中某些人破坏中美关系的行为所应负的责任,这次是美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和警告,执意在其“人权报告”中诬蔑、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这种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又一次使中美关系受到重大损害。朱启祯大使指出,中美关系只能建立在中美历次联合公报所确认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各项原则之上,特别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之上。我们敦促美国政府言行一致,努力使中美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否则,由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美国政府负责。^⑮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奉命向美国国务院转交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

美国政府没有就此罢休,1990年3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提案。5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公告,宣布5月13日为“全国支持自由和人权日”,并“呼吁美国人民本着下述精神来纪念这个日子:铭记那些死去的人们;从为了他们的理想面对暴力镇压进行绝食的那些人的勇气中受到激励以及督促中国政府对去年示威中所表达的争取自由的基本愿望作出积极的反应”。^⑯再次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发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问题发表谈话指出,我们一贯反对美国国会以“自由、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污蔑攻击中国政府。现在美国政府竟然根据国会要求发布公告,我们对此极为不满,表示强烈抗议,并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交涉。^⑰中美之间因人权问题引起的种种纠纷,延长了中美关系的低潮阶段。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中国黑云压城一般的攻击和“制裁”,邓小平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⑱

邓小平还认为,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攻击和“制裁”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中国自己怎么去把握。他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

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⑧

争取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

1990年4月,为了缓和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国提出派特使秘密访美,一方面通报李鹏总理访问苏联的情况,一方面就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美方则以目前美国国内气氛不适合来访为由婉拒。不久,美方提出,两国官员可以在第三国会面,并听取通报情况。而中方认为,特使访美通报情况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三国进行,因此,没有接受美方的提议。特使访美一事,由于美方的消极态度而不了了之。

对于美方的短视,邓小平于5月14日托来华访问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告美国总统布什,提醒他不要因东欧事情过分兴奋,也不要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双方很难不发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⑨

但是,布什总统没有听进邓小平的劝告,由此延长了中美关系的低潮时期。在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之后,本来不成为问题的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从1990年起也遇到了麻烦,并从此成为影响两国全面关系的一个热点问题。

所谓最惠国待遇,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8年拟出的《最惠国条款(法)最后草案》第5条规定,是指“给惠国给予受惠国或者与该(受惠)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优惠,不低于该给惠国给予第三国或者与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作为一条国际法规则的最惠国原则,是旨在实现各国贸易上的平等互惠,一视同仁。然而,美国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在和“共产党国家”签订贸易协定中,虽然规定了互惠的最惠国待遇,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受美国国会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限制。1974年通过的该修正案规定,禁止给予任何不允许其居民自由移民的国家最惠国地位,但美国总统可以向国会提出报告,要求给予有确凿证据可以自由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美国的这项立法限定最惠国待遇与

某个国家是否允许人民自由移民有关。^⑫

根据这项规定,两国建交后,中美在移民自由方面达成协议,中国自1980年起获得最惠国待遇,美国总统每年就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作出决定,然后送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进行审议。

在1990年之前,由于两国关系尚好,这只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但在北京政治风波过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坚决要求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企图以此对中国施压,并在美国朝野掀起了一场政治辩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1990年3月初,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会见中国大使朱启祜指出: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关系会很困难。前一阶段没有按预想恢复关系,现在苏联发生的变化使人集中注意中国。反对布什的不仅有民主党,还有共和党人。在佩洛西法案的问题上,支持布什的人并非支持他的对华政策,而是支持他本人,布什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所罗门认为,最惠国待遇问题今年会有麻烦,要进行一场艰苦的奋斗。他希望中国不要再出什么事情,要放学生出国。随后不久,美国白宫亚洲事务主任道格拉斯·帕尔,又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向中国传送信息。他通过一位与中国大使馆有往来的情报分析人员格拉齐尔,与中国驻美大使馆政治参赞张德广作了一次十分坦率的谈话,有意把美国的底牌亮给中国。他说:“美国会将6月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如果决定不再延长,布什也不一定会否决,否则等于自杀。”^⑬

1990年4月,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政治辩论更趋激烈。一些国会议员把中国描述成“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⑭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说: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一项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方面没有满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关于自由移居国外的要求,因而要研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⑮甚至于连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设计师之一、主张同中国建立密切战略关系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说:由于中国一直在国内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应该取消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而美国对中国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⑯

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中国来说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自1980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以来,美国已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当大的,一旦最惠国待遇取消,虽然中

美两国同样受到打击,但中国方面的损失要更大一些。

有鉴于此,中国方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在华盛顿分别找到一些美国有影响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谈话,还奔赴纽约和亚特兰大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卡特,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开展工作。

在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朱启祯于1990年5月16日,在洛杉矶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讲话指出,如果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待遇,将对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并“会导致两国总的关系大倒退”,为此,他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本着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采取明智的行动。朱启祯认为,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三个关键因素值得两国认真考虑,即:恪守在两国发表的三个联合公报中规定的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增进两国间真正的相互理解;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处理中美关系,避免因短期考虑使两国关系大起大落。^⑮

在是否取消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美国白宫同国会的看法并不一致。布什总统看得远一些,不愿意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直至失控,同时他也看出一旦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美国将最终丧失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

因此,在经过长时间的、全面的深思熟虑之后,布什于5月24日正式宣布,把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美国助理国务卿所罗门在众院外委会亚太事务、人权及国际组织及国际经济和贸易三个小组委员会谈到布什总统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考虑时说:“总统认为:(一)取消最惠国待遇将对每天都在点燃改革开放火焰的中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造成损害。(二)贸易不只是钱财交易,它是中美两国人民交流思想与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商业是变革的力量,从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的事态表明,经济改革和信息革命必然迫使政治改革的进行。(三)给予最惠国待遇并不意味着赞同某个国家的政策。‘最惠国’是指‘正常的关税率’(非歧视性关税)而不是指我们给予最大优惠的国家。”^⑯

布什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说:“最惠国待遇并不是特殊照顾,也不是一种优惠,这是日常贸易的基础。我说过,取消最惠国待遇是一件我不会去做的事情,就是说,若是予以取消,就要采取伤害中国人民的步骤。我不想这样做。”他说:“我得出的结论是:继续保持(给予)中国的贸易地位是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若不这样做,会

伤害美国。贸易会下降,大大伤害出口商、消费者和投资者。中国每年购买美国的飞机、小麦、化工产品、木材等产品约 60 亿美元。丢掉这个市场,我们美国就业机会就会减少。”他认为,“出于我们经济竞争的考虑,我们也不应取消最惠国待遇。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从中国进口的货物的成本平均将上升 40%,对美国消费者来说,这将转化为价格上涨。”^⑩而这对美国是不利的。

布什总统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作出的上述决定及其看法是比较明智的,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不仅有利于中美双边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也有助于缓和中美双方紧张的政治关系。

中国方面对此作出了回报。在布什总统正式宣布这一决定的前后,中国司法机关分别释放了一些在北京政治风波中逮捕入狱的人员。中国方面还宣布,将继续购买美国波音客机,并将于 1990 年 10 月向美国派出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王润生为团长的大型采购团,总共购买价值 7 亿美元的棉花、化肥、粮食、木材、航空器材、石油机械设备以及计算机芯等美国商品。原来争执不下的方励之滞留美国使馆问题也于 1990 年 6 月下旬得到妥善解决。在方励之患病并保证离开中国后不再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之后,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同意方励之离开美国使馆前往第三国就医,从而解决中美之间的一个难题。

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于 1990 年 6 月 25 日分别就中国释放方励之出国就医“表示欢迎”。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这是一个有远见有重要意义的步骤,将为改善双边关系创造良好的气氛。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称,释放方励之不会使美结束对中国的“制裁”。^⑪

可是,在布什总统宣布继续延长中国惠国待遇的决定之后,仍有些人不肯善罢甘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共举行了数十次公开和秘密的听证会,前后有 100 多名政府官员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到会听证。

根据美国《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的“立法否决”,最终作出是否延长最惠国待遇的决定,须经过以下法律程序:总统在最惠国待遇期满前 30 天内,作出是否延长的决定,并向国会报告;国会在最惠国待遇期满的 60 天或 105 天内审议总统的决定;如果国会两院通过决议反对总统的决定,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国会的决议;总统否决国会的决议后,国会须以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

美国国会的一些人就是想运用上述法律程序,达到推翻布什总统决定

的目的。10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以“人权问题”为借口,以247票对174票的简单多数通过了一项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所罗门议案”;以384票对30票的压倒多数,通过有条件地延长下一年度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皮斯议案”。不过,由于众议院是在国会闭会前匆匆通过上述法案的,而参议院在共和党领袖多尔和财委会主席本特森等议员的抵制下,未就此采取任何行动,致使这些议案未能形成两院的联合议案,因而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据美国法律程序,这些议案在101届国会闭会后均告自动失效。因此,布什总统5月份作出的无条件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的决定未被推翻。

1990年10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众议院通过的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两项议案。如果这两项议案实施,那会对美国在中国进行的经济、人权和其他对外政策利益,造成严重损失。^⑫

虽然美国国会关于要求取消和有条件地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已被搁置,但投票结果表明,赞成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或者要给延长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意见已在美国国会占了上风,这就预示着,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还会有艰难的斗争。

对于困难的局面,中国方面已做好充分的准备。邓小平指出:“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⑬

注释:

①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283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④详见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88年9月8日的报道。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2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287页。

⑦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⑧《人民日报》,1989年3月20日。

⑨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 ①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6 页。
- ②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89, Book I,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 670. 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 295—296 页。
- ③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4 页。
- ④《人民日报》，1989 年 6 月 8 日。
- ⑤《人民日报》，1989 年 6 月 9 日。
- ⑥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7 页。
-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9—431 页。
- ⑧《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1—312 页。
- ⑨新华社华盛顿 1989 年 6 月 21 日电；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9 页。
- ⑩CQ Weekly Report (June 10, 1989), p. 1411. CQ Weekly Report (June 24, 1989), p. 1564.
- ⑪《人民日报》，1989 年 6 月 23 日。
- ⑫1989 年 7 月 15 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政治宣言，指责中国并对中国实行制裁。7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3 页。
- ⑬《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第 329 页。
- ⑭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95—196 页。
- ⑮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98 页。
- ⑯《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6—327 页。
- ⑰《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9—321 页。
- ⑱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1 页。
- ⑲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361 页。
- 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8 页。
- ㉑《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7—349 页。
- 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0—451 页。
- ㉓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6—197 页。
- ㉔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7 页。
- ㉕《美国对华制裁情况回顾》，载《参考资料》，1995 年 5 月 24 日。
- ㉖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20 页。
- ㉗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22 页。
- ㉘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37 页。
- ㉙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38 页。
- ㉚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0—171 页。

- ④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3—174 页。
- ④美新署华盛顿 1990 年 2 月 14 日电。
- ④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0 页。
- ④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7—178 页。
- ④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7—178 页。
- ④《人民日报》，1989 年 8 月 2 日。
- ④《人民日报》，1989 年 8 月 12 日。
- ④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1—73 页。
- ④合众国际社北京 1989 年 10 月 28 日电。
- ④美联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9—440 页。
-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1 页。
-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2 页。
- ④详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31—333 页。
- ④《中国外交概览》（1990），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0 页。
- ④《中国外交概览》（1990），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0 页。
- ④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0 页。
- ④美联社北京 1989 年 11 月 1 日电。
- ④合众国际社北京 1989 年 11 月 1 日电。
- ④《人民日报》，1989 年 11 月 9 日。
- ④《人民日报》，1989 年 11 月 11 日。
- ④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97 页。
-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2 页。
- ④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0 页。
- ④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4 页。
-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3 页。
- ④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7 页。
- ④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0—281 页。
- ④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2 页。
- ④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3 页。
- ④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4 页。

⑦②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5 页。

⑦③《人民日报》，1989 年 11 月 20 日。

⑦④详见 1989 年 11 月 25 日《人民日报》的报道。

⑦⑤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6—217 页。

⑦⑥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90, Book I,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p. 1683.

⑦⑦《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9 日。

⑦⑧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8—79 页。

⑦⑨ CQ Weekly Report (June 27, 1990), p. 245.

⑦⑩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2 页。

⑦⑪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89, Book I,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 814.

⑦⑫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7 页。

⑦⑬《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9 页。

⑦⑭美联社 1989 年 12 月 14 日电。

⑦⑮美国《时代》周刊，1989 年 11 月 20 日。

⑦⑯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9—180 页。

⑦⑰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1 页。

⑦⑱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特使一起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事后回忆，布什总统交给他们的“使命还是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需要中国采取行动改善两国关系。总统知道，他采取这项行动会引起公众反对，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是一个他愿意冒的风险，因为他本人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以及具有多年来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为他判断这样做可能开创一个进展。中国领导人需要知道，他们怎么做才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告诉了他们”。详见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5 页。

⑦⑲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89, Book I,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 1683.

⑦⑳美新署华盛顿 1990 年 2 月 14 日电。

⑦㉑《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11 日。

⑦㉒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4 页。

⑦㉓《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0—351 页。

⑦㉔在尼克松访华时，邓小平曾提出，中美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

⑦㉕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2 页。

⑦㉖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2—183 页。

⑦㉗《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10 日。

⑦㉘《人民日报》，1989 年 12 月 10 日。

⑦㉙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3—184 页。

- ⑩共同社东京 1989 年 12 月 11 日电。
- ⑪美联社华盛顿 1989 年 12 月 11 日电。
- ⑫路透社华盛顿 1989 年 12 月 11 日电。
- ⑬路透社华盛顿 1989 年 12 月 11 日电。
- ⑭路透社华盛顿 1989 年 12 月 19 日电。
- 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44 页。
- ⑯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9 页。
- ⑰《美国对华制裁情况回顾》,载《参考资料》,1995 年 5 月 24 日。
- ⑱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7 页。
- ⑲[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6 页。
- ⑳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 291.
- ㉑《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8 页。
- ㉒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0 页。
- ㉓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0—191 页。
- ㉔《人民日报》,1990 年 2 月 24 日。
- ㉕新华社华盛顿 1990 年 5 月 13 日电;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 页。
- ㉖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主编:《中国外交概览》(1991),第 315 页。
- 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1 页。
- 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9 页。
- ㉙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5 页。
- ㉚ Jeane Kirkpatrick, “Foreward”, The Uncertain Crusade—Jimmy Carter and the Dilemmas of Human Rights Policy, by Joshua Muravchik, Hamilton Press, 1986, p.xii.
- ㉛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53—154 页。
- ㉜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p.291.
- ㉝新华社华盛顿 1990 年 4 月 21 日电。
- ㉞布热津斯基:《取消中国的贸易地位》,《华盛顿邮报》,1990 年 4 月 23 日。
- ㉟新华社华盛顿 1990 年 5 月 16 日电,《人民日报》,1990 年 5 月 19 日。
- ㊱详见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0—311 页。
- ㊲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9 页。
- ㊳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7 页。
- ㊴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7 页。
- ㊵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8 页。

第十章

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和策略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之后,中国方面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对美战略和策略,一方面坚持内政不容他人干涉的原则,坚决顶住了美国带头掀起的对华制裁浪潮,逐步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另一方面又从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的角度出发,一再呼吁美国政府正视现实,放弃制裁,使中美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由于中国国内的政局日趋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当局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也不得不同中国打交道。这样,在经历了一番阵痛之后,中美关系开始从低谷逐渐回升。当然,这一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起步阶段的艰难曲折和反复是不可避免的。

利用矛盾,恢复中美高层接触

1989年,当美国对华“制裁”开始时,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曾指出,只要我们策略得当,把自己的事办好,美国人迟早要和我们打交道。1989年底,中国外交部又在一份全年形势分析报告中引用邓小平的“二十四字令”对外政策方针,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站稳脚跟,沉着应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数”。^①邓小平的意图是,面对黑云压城的不利局势,中国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行事,而要稳定情绪,冷静观察形势的变化,对外要尽量低调,收敛锋芒,避免成为焦点,先稳定国内局势,等待形势改善后,再图发展,要以此为准绳,沉着应付国际上的各种挑战,要尽量多交朋友,少树敌,并做到心中有数。

中国运用这一战略,果然收到良好效果。在成功地改善了国内局面后,

邓小平又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判断,提出了在世界上利用矛盾,增强自己回旋余地,以及尽快增强自己实力的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国际局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他认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他提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管意识形态的争论。”他认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的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②

邓小平对国际局势走向的深刻分析,使人们透过纷繁表面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事物将要起变化的内在因素和长远发展趋向,使中国外交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姿态面对世界。

此外,邓小平还多次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传递信息,呼吁他们正确看待中国问题,不要错误估计形势。1990年5月13日,他在会见来访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说:“听说你带来布什总统的口信。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告诉他,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我们的朋友关系始终存在。同时告诉他,不要因东欧的事情而过分兴奋,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中

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很难不发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对两国都不利。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世界上负责任的政治家决不能设想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有管不住这些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应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互不干涉是最根本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经得起考验,谁也不吃亏。”^③

此时,中国正在慢慢地积聚力量,静静地等待着打破外交僵局的时机。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起海湾危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联合国积极活动,寻求安理会通过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以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并未就范。美国开始重新估价中美关系的作用。8月3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方转交了布什总统致邓小平的信。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的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就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④

进入11月,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内活动寻求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解决伊拉克赖在科威特不走的问题。由于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所有这些决议的通过,没有中国的支持或是谅解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中国的这一票就成为了关键。对于中国外交突破困境来说,机会终于来了。

这时,中国外长钱其琛计划访问伊拉克,美国国务卿贝克听说后,表示他那时正好也在中东地区访问,希望双方能在途经开罗时会面,交换对伊拉克问题的意见。11月6日,钱其琛在开罗机场的候机厅与贝克会见。贝克表示,希望中国不要阻挡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决议。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他承诺美方将寻求机会取消对华“制裁”,美国也不反对早些时候世界银行向中国“星火计划”项目贷款1.1亿美元的计划。对此,钱其琛表示,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的行动已经显得缓慢了,中国与日本、欧共体的合作,都已有了进展。至于海湾危机问题,中方并未将其与中美关系挂钩,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中国都将坚持一贯的立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⑤

应该说在海湾问题上,中国也主张伊拉克应尽快撤离科威特,在这一点上中美是一致的。但是否要通过一个可以动用武力的决议,中国同美国的意见就大不一样了。中国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和平解决海湾问题,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尤其是由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样的重大问题更应慎重考虑,不宜匆忙行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对中国是否行使否决权没有什么把

握,但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决议,这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这使美国不得不重新估量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为了争取中国不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行使否决权,美国国务卿贝克利用在开罗与中国外长钱其琛会面的机会,邀请钱其琛访问美国,并许诺说,只要中国不使用否决权,布什总统将在华盛顿会见钱其琛。这将意味着美国不与中国高层官员来往的禁令有所松动。

由于美方对中方如何投票心里没底,美国国务卿贝克于11月20日从巴黎打电话给中国外长钱其琛,希望中国能投票赞成联合国授权向伊拉克使用武力的678号决议。对此,钱其琛表示,我们要研究一下,现在我不能回答我是否去,怎么投票。中国外交部把这次电话全部录音。同一天,苏联外长也从莫斯科打电话给钱其琛,要求安排会见,商讨海湾局势。由于情况紧急,当天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召开会议,讨论美国的要求,苏联的意图,以及安理会投票等事情,并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如何投票的三点指示:“第一,弃权;第二,作一个简短的说明;第三,要重申中国的立场,但字句上要斟酌。”^⑥据此,会议决定对安理会决议投弃权票。

于是,中方于11月24日答复美方,中国外长钱其琛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美国国务卿贝克喜欢“做交易”,也擅长于“讨价还价”。在得知钱其琛接受邀请后,美方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贝霖向中国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致钱其琛的信。信中除了再次强调钱其琛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中国外长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中国外长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对于美方出尔反尔,提高要价,中方当即指出,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钱其琛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中国外长就不去开会了。11月26日,美方的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中方支持美方

提出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中国外长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⑦

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提议不置可否,显得高深莫测。11月28日,钱其琛启程赶赴纽约参加定于11月29日举行的讨论海湾危机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但直到登机前,他与记者们周旋,仍然对中国如何投票一事不置可否。有记者问:“美国报界有报道说,中国已经保证将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投赞成票,您能不能详细谈谈这一点?”钱外长答道:“我想美国报界的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一贯的立场是主张和平解决海湾问题,避免使用武力,避免采取战争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将不投票赞成那项决议呢?”记者接着问。“我想是这样。”钱其琛说。“那么您是说中国将投票否决那项决议吗?”又有记者追问道。“我没有这样说。”钱其琛迅速回答。“那么中国将会弃权吗?”“我想我投票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中国外长的回答引起一片笑声。又有记者问:“您这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是否表明美国对中国进行的制裁正在逐步瓦解?”钱其琛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但是美国的发言人说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他说,接触和交流不一样。我不明白接触和交流到底有什么不同。”在回答他是否将与布什总统会见及主要话题是什么的问题时,钱外长说:“既然邀请我正式访问,日程中当然应该安排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要讨论的问题应该也是比较广泛的: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包括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这些都会涉及到。双方愿意提出来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讨论。”^⑧钱其琛还表示只要美国方面做出安排,他愿意会见美国各方面的人士。

11月28日晚,钱其琛抵达纽约,并立即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双方就安理会即将讨论的海湾危机问题及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贝克仍劝说钱其琛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投赞成票。钱其琛指出,动武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美方来说,采用军事手段,问题解决得可能快些,而用和平方式,也许需要更长些时间。但是,战争方式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后遗症会有很多。接着,钱其琛说,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而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有关决议,不予否决,已是最大的照顾了。11月29日投票当天上午,贝克又多次打电话给钱其琛,转达布什口信,继续劝说中方对决议投赞成票。^⑨

直到最后一刻,11月29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进行表决授权向伊拉克使用武力的678号决议时,谜底揭开,中国投了弃权票。决议得以通过。

当晚,美国国务卿贝克宴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表面上谈笑风生,私下里通过工作人员通报说,明天去华盛顿,由于布什总统忙于处理海湾危机,不能安排时间会见中国外长。当晚,美国国务院也同样通知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中方判断,这是由于擅长“做交易”的贝克,觉得这次亏了,于心不甘。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去还是要去,去了还要见到布什。为此,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连夜从纽约赶回华盛顿,并于午夜3时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交涉。后来,斯考克罗夫特于凌晨6时答复称,欢迎钱其琛按原定时间访问华盛顿,布什总统期待着与中国外长会晤。^⑩

经过这样一番周折,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之后,按照预定的安排,于11月30日由纽约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后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问美国,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方面对中国在联合国表决时没有投赞成票略感失望,但中国毕竟没有使用否决权,这也算给了美国一点面子。虽然在表决后,美国曾一度想要取消原定布什总统接见钱其琛外长的计划,但经过中方的据理力争,布什总统权衡利害关系,还是决定会见中国外长。对此,贝克对钱其琛解释说,由于中国未投赞成票,他个人觉得,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似乎不妥,不过,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布什总统已决定会见。钱其琛对贝克说,美国为争取安理会通过决议,国务卿先后访问了12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外长会晤。美国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却不到中国去访问。我向你发出过到中国去的邀请,结果只接到你一个电话,电话交流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仍欢迎你到中国去访问。^⑪

11月30日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正式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布什表示他本人仍然十分重视中美关系。虽然对中国的弃权感到失望,但他认为决议的有效性是更为重要的。如果中国赞成,这对布什本人将会有很大好处,可以对付美国国内对他的批评,也会提供更好的机会促使伊撤军。对此,钱其琛表示,中国的投票是不容易的。中国领导人一再考虑这次投票,现在我们的行动已经使美国的决议得到通过。在撤军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美国并无差别。^⑫在会谈中,双方还表示,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双方都认为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

关系近来已经有了不少改善。双方认为,虽然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只要加强接触、增进了解,相信两国关系将回到正常轨道。布什向钱其琛介绍了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钱其琛表示,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虽有一些不同看法,也有许多共同点,今后双方仍可继续配合。^⑬

在中国外长钱其琛同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等美国高级官员的会谈中,美方再次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强调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执行什么政策我们尊重,但美国也应尊重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也关心和重视人权问题,但中国的人权问题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看法,美国对此也是清楚的,并且美国也表示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至于中国司法机关起诉和审判某些罪犯,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审理犯罪案件是独立进行的,任何外力都无权干涉。钱其琛在会见美国商业部长莫斯巴赫时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问题,这是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经贸合作已有一定规模,而且还有巨大的潜力。但美方表示担心,目前美中贸易美方逆差过大,对华出口减少。对此钱其琛指出,由于双方统计方法不一致,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美国近来对华出口减少是个事实,这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结果,同时美方在高级技术转让方面限制太多。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最近将访美,希望双方主管官员就双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讨论。中美经贸混合委员会也应尽早开会。^⑭

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阶段的微妙时刻,中国外长的这次访问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目的是推动关系进一步发展”,它给陷入困境中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线曙光。因为自1989年6月以来这种级别的高层官员的正式访问还是第一次。虽然美国方面有种说法,即接触不等于交流,但实际上美国中止高层互访的制裁被打破了,美国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了维护面子。正如钱其琛所说:“无论接触也好,交流也好,都是增进相互了解,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⑮而这对推动两国关系尽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

钱其琛外长在访美期间还接触了许多参、众两院有影响的议员,包括多尔、佩尔、索拉兹、利奇、布鲁门柴尔德、兰托斯等,他们都表示欢迎中国外长的来访。钱其琛分别同他们就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这是有助

于增进相互了解的。在此期间中美双方还商定,美国副国务卿巴塞洛缪、助理国务卿希夫特将于近期分别访华。

中美双方官员的这种接触,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1990年12月4日,世界银行开会,对是否全面恢复对华贷款投票表决时,美国代表仿照中国在安理会对伊拉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问题投弃权票的做法,也投了弃权票。于是世界银行全面恢复了对华贷款。^⑩“从1990年下半年起,中国外交开始好转,有所突破。”^⑪从策略运用的角度看,这是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的范例。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定所评价的那样:“美国是在为一种本来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付钱。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中国绝对不可能否决那项(安理会678号)决议。”哈定认为,海湾危机为中国提供了显示其重要性的机会,所以北京就“十足地利用了他这一票的价值”^⑫。

应对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第二次审议

美国国会在1990年未能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1991年度总统宣布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定期限日益临近,美国国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一次的较量更为激烈。因为,在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应该轮到中国了。^⑬在此背景下,美国众议员所罗门提出拒绝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美国商会报告说,华盛顿的反华情绪相当强烈。国会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⑭就辩论的情况来看,美国参院的调门比众院更高,民主党的言辞比共和党更为激烈,他们反对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所谓理由,除了人权和贸易不平衡外,还提出了中国出口劳改产品、武器扩散、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变换了策略,由要求取消逐渐变为要求“有条件延长”。1991年4月30日,美国众议员佩洛希提出关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议案。佩洛希议案所列的附加条件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完全地、不折不扣地做到的;一类是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必须落实的条件主要指说明1989年政治风波中被捕的人的情况并释放他们。需要取得“重大进展”的项目包括:(1)采取适当行动防止侵犯西藏人权;(2)防

止宗教迫害,释放由于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宗教信徒;(3)取消对新闻自由和美国之音的限制;(4)结束对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恐吓和骚扰行为,其中包括发还和延长当局作为对争取民主活动的惩罚而没收的护照;(5)确保国际人权监督组织接近犯人、审判和拘留地点;(6)确保免除拷问,免除不人道的监狱条件;(7)解除在1989年6月3日之后对和平集会和示威实行的禁令。^{②1}

进入5月,美国参议员赫尔姆斯和米切尔分别提出有条件延长的议案。其中米切尔最初提出的议案比佩洛希议案要严厉。它除了提到佩洛希议案的大多数条件外,还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180天内全部执行这些条款,否则就取消最惠国待遇。^{②2}经过一番试探,这样的附加条件难以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为了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米切尔又修改议案,降低了某些条件,使得议案的内容更接近佩洛希议案。^{②3}这些议案所表达的要点是,要求中国释放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在押犯,停止迫害民运人士,自由移民,遵守宗教自由,实行公平贸易,停止武器扩散与劳改产品出口,等等。由于这种意见更具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基本态度是,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也作最坏的打算。1991年4月中旬,中国方面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最惠国待遇问题。外交部主管美国的副部长刘华秋认为,海湾战争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4月6日布什在白宫会见达赖。美国有人头脑发胀,以为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中国了,对华政策存在观望态度,中美关系一两年内不可能迈出大步子。当前工作要力争保住最惠国待遇,但是附加条件的呼声很高,要有两手准备。经贸部长李岚清主张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处理,不要搞得很紧张。要花几十亿美元从美进口,开放国内市场,简化手续,增加透明度。^{②4}

1991年5月7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对美国新闻、企业、学术界人士发表演讲,详尽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及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立场,意在争取美国各界人士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支持。

朱启祯强调指出,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两国相互给予对方的贸易优惠条件。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促进了两国间贸易及经济关系的发展。他说,现在美国有些人为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制造障碍。如果美国单方面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者在延长这一待遇时附加某种条件,“这不仅会直接地严重损害两国间的经贸关系,而且也会严重损害两国其他方面的关系”,对美国以

及对香港和澳门造成不利的影响。朱启祯大使还谈到了美方提出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出口劳改犯生产的产品、武器销售及人权等问题。他说,中美贸易统计方法不同。按中国的统计方法,中方是逆差,但美方的数字为美方是逆差。中美贸易额也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冻结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有关。尽管如此,中国方面已经和正在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解决双边贸易中的问题和分歧,中国从去年起已经并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希望美国也能采取相应的态度。朱启祯大使说,中国的贸易部门从来也没有允许出口劳改犯生产的产品。美国方面有人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朱启祯大使重申了中国在对外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说,中国一贯采取的是“严肃、慎重、负责”的态度,中国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也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中国不拥有、不生产化学武器,不出口用于化学武器为目的的化学品。他说,中国主张各国通过全面的平等协商来公正、合理、有效地解决武器的扩散问题,其中也包括导弹的出口问题,而不是由少数几个国家作出决定。关于人权问题,朱启祯大使指出,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占世界总人口 22% 的中国人民的吃、穿、住的基本人权。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这些基本人权才能得到保障和保护,而动乱只能带来灾难、饥饿以至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数百万人死亡的局面。他说,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权,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对人权有不同的解释,人权必须符合各国的法律。中国的宪法为人民提供了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言论、宗教信仰、集会和出版的自由。^⑤

朱启祯大使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的必要性。美国新闻界、企业界、学术界人士出席了午餐会。朱启祯大使在演讲后还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

1991年5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问题表示,中美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有利于双方,中方绝不接受延长这一待遇附加条件。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呼吁美国方面从中美长远利益出发,审慎妥善处理这一问题。^⑥

美国总统布什也为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做出了努力。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也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1991年5月27日,他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服务,又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止在边界。随着民主的思想已经在影响着每个大陆的诸国家,它将不可避免地会来到中国。”^⑦取消中

国的最惠国待遇,或者延长时附加条件是“不明智”的做法,“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②同时也会给香港带来沉重打击。为此,他宣布将向国会建议继续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对此,中国表示欢迎。5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这是一项现实而明智的决策,中国政府表示赞赏。中国政府始终认为,妥善解决中美间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也有助于保持和促进香港乃至亚太地区的繁荣。”^③

5月29日,布什总统正式向美国国会建议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他表示,美国应维护对华关系,孤立中国是错误的。

然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布什总统的决定并不买账,他们仍想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来阻挠布什总统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定。1991年7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313票对112票的多数通过了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佩洛希议案”。

在参院进行表决的前夕,美国总统布什为寻求支持,于7月19日写信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鲍克斯表示,尽管中国在人权方面有缺点,但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在信中,布什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华政策计划:只支持国际机构对华提供“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贷款;将运用“301特别条款”来调查和“制裁”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停止进口劳改犯生产的产品;如果就停止扩散核材料和导弹的谈判失败,将对华实行贸易“制裁”;同意支持台湾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④

中国方面对布什总统坚持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和重申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表示欢迎。7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我们注意到布什总统7月19日致鲍克斯参议员的复信中关于坚持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发言人还指出:“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早日恢复中国在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有利于加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扩大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才能解决台湾作为中国的单独关税区加入总协定的问题。”^⑤

由于布什总统的信满足了一些美国参议员在此之前提出的要求,^⑥因此换取了他们的支持。在7月23日的表决中,美国参院虽以55票对55票通过了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米切尔议案”,^⑦但由于票数没有形成三分之二绝对多数,不足以推翻总统可能作出的否决。

1992年3月2日,布什总统否决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有条件延长1992—1993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议案。根据这项议案,中国为了继续获得最惠国待遇,必须履行一系列为它们所规定的条件^④。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在总统否决议案后,参、众两院必须分别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支持票,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使议案成为法律。

美国国会不肯罢休,1992年3月11日,美国众议院推翻总统否决获得成功,但3月18日美国参院的表决,100名参议员中支持推翻总统否决的共60人,不足三分之二多数,因而未能推翻布什总统的否决。

虽然经过这番激烈的争斗,中国最惠国待遇再一次无条件延长一年,但是民主党人由此形成了对布什政府的强大压力,使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相当的牵制,形成了以下的特点:第一,以前在对华政策上两党积极的共识不复存在了;第二,国会从行政部门手里夺回了对华政策的主动权;第三,民主党人认为应通过立法来表达对华政策;第四,对华总政策成为一个政党打击另一个政党的棍棒。^⑤这些都给中美关系增加了新的变数。

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基本立场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中国方面的应对策略有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六四”风波之后的最初阶段,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密集的人权指责和攻击,邓小平一方面进行回击说,他们没有资格和我们谈人权;另一方面也提醒西方政治家注意,中国不怕“制裁”,同时也有能力抵御“制裁”。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⑥他还指出:“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

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⑳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再次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㉑

在此之后,邓小平觉得有必要选一个时机详尽地阐明中国对待西方“制裁”的总体态度。1990年7月11日,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㉒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努力阐明中国的稳定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什么‘人权’?一打内战就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往外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⑩

在初步顶住了美国压力之后,考虑到美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国方面开始提出新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日益突出,中国方面也开始加强对人权问题的研究。虽然中美之间对人权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但中国方面开始主张在平等的前提下,加强对话,增进了解。为了打开对话渠道,多作解释工作,中国方面不再拒绝同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讨论人权问题。1990年12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夫特来到北京,有史以来第一次与中国官员就人权问题举行正式对话。此后,中国方面还提供方便,安排一些美国议员参观中国的监狱,以便他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1991年11月1日,经过精心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权威文献,全面回答了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白皮书的前言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前言指出,当前,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宣言和一些公约,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和尊重。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权宣言》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但是,人权状况的发展受到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巨大差异,因而对人权的认识往往并不一致,对人权的实施也各有不同。对于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公约,各国基于本国的情况,态度也不尽一致。人权问题虽然有其国际性的一面,但主要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因此,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按一个模式或某个国家和区域的情况来套。这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

白皮书共分以下十个部分,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权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

一、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白皮书提出了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的观点,并且认为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白皮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获得了根本保障。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成功的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力,从而使人民的生存权不致受到威胁,这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二、中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权利。白皮书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质。中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政治权利。建国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是满意的。当前,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下,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努力健全和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以保证人民能够充分地享有公民权和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

三、公民享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白皮书列举大量数据说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是世界上分配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广大劳动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中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已就人民经济、文化、社会权利进一步改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

四、中国司法中的人权保障。白皮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司法制度,指出中国重视在司法活动中保护人权。在公安、司法工作的各个环节以及司法程序上,中国法律为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权,作了明确的严格的规定。在中国,任何人不会仅仅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处以刑罚。中国不存在所谓政治犯。罪犯服刑期间的应有权利,依法受到保护,享有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罪犯劳动的产品主要是满足监狱系统内部自身的需要,一律不允许对

外出口。被劳动教养的人,仍然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广泛的公民权利。

五、劳动权利的保障。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劳动者就业,保证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加以改善和提高。中国十分注意劳动保护,特别重视对女职工的保护。中国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工人的利益同企业的兴衰紧密相关,企业管理者与工人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保障劳动者权利的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下的模式不同。

六、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白皮书指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各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在宪法和法律的 protection 下,独立地组织宗教活动和履行宗教教务。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支配和干涉中国宗教的内部事务,以维护中国公民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国内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和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同外国宗教团体及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

七、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白皮书援引大量统计数字说明,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相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权利受到特殊照顾。四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从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

八、计划生育与人权保护。白皮书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完全符合1984年联合国《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的要求。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推行计划生育,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维护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的权利。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坚持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中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九、残疾人的人权保障。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的权利问题,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和保护。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同健康人一样享有公民权利。中国政府制定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的相应政策、条例和规定,通过扶助、救济、补助、供养、保险和特别照顾等多种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产。为保障残疾人的权利,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福利、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十、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白皮书指出,中国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宗旨与原则,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长期以来,在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中,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中国一贯认为,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任何国家实现和维护人权的道路,都不能脱离该国的历史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国情,并需由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对人权制度予以确认和保护。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表尚属首次,它有助于国际社会客观而全面地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有助于澄清主要是美国及西方国家一部分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歪曲和攻击。它还向世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视,以及愿意就此问题同国际社会对话的诚意。

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自1990年起,由于海湾爆发战争,东欧、苏联局势动荡,如何看待纷乱的国际局势,并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成为中国成功开拓外交局面的当务之急。

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的是苏联局势的变化。苏联解体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中共党内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吸取苏联和东欧的教训、防止“和平演变”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要把防止和平演变置于优先地位的观点,有人甚至主张再同苏联搞一场意识形态辩论。但是,这种观点和主张并未被采纳。^①邓小平确定的方针是:“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②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决不当头”的重要思想。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

失掉了。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④3}“决不当头”思想贯彻实施,避免了把国际斗争的锋芒集中到中国身上,有利于减轻中国当时面临的压力。

邓小平还指出:“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看来我们农业的潜力大得很,要一直抓下去。钢要有一亿到一亿二千万吨才够用,这是个发展战略问题。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邓小平最后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④4}邓小平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重要思路。

在对美国关系方面,中国外长钱其琛访美之后,中国方面趁热打铁,继续对美国朝野多做工作,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艰苦的努力。为此,邓小平于1991年秋提出了对美政策的十六字令,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④5}1992年11月30日,江泽民会见美国大选后第一个国会议员访华团时首次公开这一方针,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美外交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方针。

在中美官方接触还有障碍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邀请一些美国的前政要访华,传递信息。1991年4月14日,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并且提出,中美要增加接触,增进了解。江泽民指出,从1972年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就是因为之间有着共同利益。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中美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中美尽管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但两国要增加接触,增进了解。^{④6}

此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观察与分析。1991年8月,布什总统向

国会提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其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提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在坚持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这同苏联一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挑战。中国关注于国内事务并力图保持稳定,但由于贸易和技术的发展,中国仍会发展同邻国的交往。对话和接触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中心特点。中国必然会变,我们同中国的联系必须保持下去。”^④

对于国际局势的发展,邓小平又有了新的认识。1991年10月5日,他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因为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的同时,布什就宣布中国是不能孤立的。”^⑤

在孤立中国办不到的情况下,继卡特前总统访华之后,又有三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黑格接踵而来。中国领导人继续向他们表达了中国政府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原则和立场。1991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基辛格博士一行时强调,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们没有理由不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应高瞻远瞩,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只要我们双方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并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完全能够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向前发展。基辛格完全同意江总书记所指出的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双方有共同利益的说法。他说:“我钦佩中国人民。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基辛格说,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美中双方应该坚持三个公报的原则,恢复高层政治对话,恢复信任,这对美国的利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十分重要。^⑥

1991年11月11日和12日,江泽民总书记又分别会见了舒尔茨和黑格。江泽民对舒尔茨说,中美两个大国逐步恢复正常关系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江泽民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的主要课题。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交往与合作。^⑦江泽民在会见黑格时表示:“虽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都有差异,近20年前,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黑格将军冲破重重阻力,来中国访问,同中国领导人一起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而恢复了中美之间中断了22年的交往,使中美关系在以后的20年间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他说:“这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了双方的分歧,现在中美之间又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但只要

两国领导人具有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增加接触和高层往来，就一定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使两国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⑤

从江泽民总书记的上述谈话来看，中国方面着重强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仍有许多共同点，并把恢复中美高层的接触和对话看做是解决中美之间深刻分歧的重要途径。

在此期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美国官方的对华访问也有所恢复。从1991年3月至1991年7月，先后有美国的两位副国务卿和两位助理国务卿访华。双方会谈的内容涉及中美关系、武器不扩散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等。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布什决心采取一个大的行动来改善中美关系。1991年10月10日，他在华盛顿约见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表示他决定派国务卿贝克访华，且不附加任何条件。这是他作为总统做出的决定。布什说，尽早恢复中美关系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这既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希望贝克国务卿访华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布什特别强调，鉴于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这次访问只能成功。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双方应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在维护两国关系方面，他将难以有所作为。^⑥

在作了上述铺垫之后，美国方面正式宣布，美国国务卿贝克将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的邀请，于1991年11月15日至17日访问中国。这将是自1989年6月以来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贝克本人在谈到这次访问的缘由时说，华盛顿在其同中国的关系上确实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华盛顿只有坚持同中国政府保持高级接触的政策，才能使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他宣称：“我们只有讨论这些问题，才能期望取得进展，无视这些问题是不会使它们得到解决的。”^⑦贝克所指的这些问题分别是人权、武器不扩散、控制中东的军备以及贸易问题。经过两年多的较量，美国方面终于意识到，只有经过中美高层对话才有可能达成谅解，而单纯依靠施压则可能适得其反。“保持中国改革道路的关键是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特别是与美国的接触。这就是布什当时派贝克访华的动因。”^⑧

贝克国务卿还在美国《外交》季刊秋季号上撰文，进一步阐明布什政府对华实行接触政策的理由。他认为，“美中关系必须停止其剧烈的摆动。中国几乎占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不能单纯地靠愿望消除他们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国际作用涉及影响我们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广的全球

和地区问题,从人们所关心的导弹和核武器扩散到海湾危机中的合作,到解决地区冲突。这就突出强调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我们最近就柬埔寨和平进程同中国合作和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所取得的经验表明,我们同中国接触产生结果。”他强调:“回到敌意的对抗无助于中国人民,也无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唯一明智的方针是按我们的议程向前进,在有可能改进的地方谋求改进,并创造便于左右有朝一日会出现变化的环境。”^⑤贝克的这番见解虽然立论是建立在有朝一日能够对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基础之上的,但他毕竟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与中国接触的重要性,这是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

1991年11月15日,贝克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贝克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们很重视这次访问。中美这样两个大国的高层领导互不来往,这既不正常,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关于国际形势,江泽民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处在新旧格局的交替时期。前景如何,现在还看不清楚。总的来说,旧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中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核心就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用一种模式是做不到的,甚至是危险的。关于双边关系,江泽民说,20年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主席、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认识到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0多年前,在邓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手上,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近20年来,中美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关系迅速发展,这是来之不易的。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很重视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关系虽然仍处在一个困难时期,但中美之间现在的分歧同20年前相比要小得多,而双方的共同利益却比那时候增加了。当前所需要的是双方高级领导人加强来往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互相尊重,使两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我回忆起中国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说,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使中美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他说,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遭受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所找到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42年来,这条道路已经使中

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自70年代末中国实行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事实证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光明大道。因此,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坚持改革开放。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强调民主与法制,使政治改革逐步深入。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贝克说,我这次来访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有一些困难的问题需要讨论。我对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江总书记感到十分高兴。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中美两国可以各走各的路,但是两国进行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为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逐步恢复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布什总统派我来贵国访问。江泽民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和政治经济改革的情况。他赞赏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为恢复中美关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并请贝克国务卿转达他对布什总统的问候。^⑤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同美国国务卿贝克就双边关系和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正式会谈。在会谈中,贝克说,此次来华访问本身,实际上意味着禁止高层往来的禁令的解除,这在美国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政治行动,许多人不理解。美国国会正急不可待地要接管对华政策,而那对中美关系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如果他这次访问无功而返,两国关系的维持将会更加困难。因此,他的访华本身,就是已经“装满了中国的篮子”,现在需要中国给他的“篮子”里装满东西,让他带回去。钱其琛外长问贝克,篮子里想装什么东西呢?贝克直截了当地说他有三只空篮子,一个想装防止武器扩散,一个想装经济贸易合作,一个想装人权。总之,访问结束之后,他不能空手而归。李鹏总理在会见时对贝克说,中方不反对就这三方面问题与美方进行讨论,也希望在这三只篮子里都装些东西。但是,中方也有几只篮子,最大的一只,就是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于是,中美双方就围绕如何装满对方的“篮子”,进行了艰巨的谈判。15日晚,贝克主动约钱其琛单独会谈。贝克反复强调,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访问结束后如何向新闻界介绍情况,以显示访问的成果。钱其琛说,对此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方没有获得成果,在国内同样也会产生强烈反响。对中国而言,美方能做些什么非常重要。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前年年底访华时,双方达成了协议,中方采取了行动,但美方没有跟上,有些方面没有落实。这也许与东欧形势的变化有关,美方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因此,双方在一些方面

达成一致,就必须付诸实施;如果达不成一致,也要加以说明。贝克表示,如果现在中方要求布什总统采取的步骤,远远超过中方可以采取的行动,这将在美国国内招致更大的不满。目前紧要的是,要让此次访问有成果,使美国人感到这次访问的重要性。17日中午,钱其琛和贝克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这次谈得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半,以至于美方专机离京时间不得不七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双方激烈较量,包括两国外长在内的双方谈判人员,都连续工作,不离谈判现场。^⑤

经过几天来长时间的会谈,中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一些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的,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关于双边关系,钱其琛指出,尽管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美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事实证明,近两年多来中美关系经历的困难局面对双方都不利。当今的世界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中美两国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彼此关系。钱其琛认为,“制裁”使中美双方都受到损害,美国应当取消对中国的“制裁”。对此,贝克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就是要保持中美关系。美国政府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公报。美国方面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方面希望中国稳定和发展;美国愿意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和加强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美国政府主张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因为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符合美国和中国国家利益。关于国际问题,中美两国外长一致肯定,双方在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中东军控、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和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等方面的合作是积极的。^⑥

最后,中美双方达成如下的协议和谅解:

美国方面表示支持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参加关贸总协定,台湾作为单独关税区加入。美方还认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模式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关于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中方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并要求美方结束对中国的“特别301”调查,将中国从“重点国家的”名单中删去。美方对中国就知识产权问题提出的积极建议表示欢迎。双方商定,中国经贸部将派出代表团于11月21日和22日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方表示,中国政府将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审议,批准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法律程序,

待人大常委会完成上述法律程序后,中国政府将在3个月内完成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手续。

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中方表示一贯关心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支持一切有助于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区的主张和行动,并愿意与各方一起努力,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中方还认为,国际社会的努力应有助于推动朝鲜北南双方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

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中方表示可以考察在转让时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条件是美方必须取消今年6月16日宣布对华实施的三项“制裁”措施。美国方面表示愿意为此做出努力。^⑨

此外,中美双方还讨论了人权问题,但由于分歧较大,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中方坚持内政不得干涉的原则,同时通报了一些美方“关切”的情况。美方拿出了一份长长的所谓被拘押的“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其中,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没有汉字,常常不知所指。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钱其琛对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噢,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⑩

关于劳改产品问题,中方明确表示采取有效措施实施中国政府关于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双方就中美劳改产品进出口贸易谅解备忘录达成原则协议。

11月17日,贝克国务卿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同中国方面达成的有关谅解时说:“首先,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中国方面已经告诉我们它打算遵守其准则和参数。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它将把这些准则和参数应用于任何导弹与有关技术的出口。我们理解这适用于M-9和M-11导弹。中国人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取消6月16日加于两家中国公司的扩散‘制裁’以及在许可出口高速计算机和发射卫星方面的‘制裁’,他们将对《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原则作出无条件的承诺。”^⑪

与上次中国外长钱其琛访美相比,贝克国务卿的这次中国之行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而且美方这次也不再说什么“接触和交流不一样”之类遮羞的话。这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双方不进行高级互访的禁令,并使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出现了一个高潮,这是一个重要进展。此外,中美双方虽然在会谈中对人权问题的看法还有很大不同,但还是解决了许多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并达成了上述协议和谅解,这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也具

有重要意义。

贝克访华后,中国敦促美国落实中美之间达成的有关谅解,尽早解除“制裁”,但美方坚持要得到中国方面的正式保证。1992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纽约会见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总理李鹏。事后,美方声称,李鹏答应提供一封肯定中方这一承诺的信件^②。第二天,中国外长钱其琛在一封信中确认了中国将遵循《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③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92年2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取消1991年6月对华实施的三项“制裁”^④,同时表示“期待着中国宣布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声明称:“我们的行动是在2月1日收到中国外长钱其琛给国务卿贝克的复信后采取的。这封信确认中国将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这是去年11月份国务卿访华期间在北京达成的协议。中国答应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界限的书面保证在争取中国支持弹道导弹不扩散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制度是为限制弹道导弹扩散而作出的关键性多边努力。”但声明表示:“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将放松监视导弹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或中国出口导弹及其技术做法的努力。根据美国法律,转让《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所涉及的导弹技术将继续受到‘制裁’。”^⑤

中国方面对美国政府宣布打算取消对华三项“制裁”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2月22日说:“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于2月21日宣布打算取消去年6月实施的对华三项‘制裁’。”他说:“中国在武器转让方面一贯奉行慎重、负责的政策,并遵循三项原则:一、有助于有关国家的正当自卫能力;二、不损害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三、不利用军贸干涉别国内政。在美国政府实际上取消上述三项‘制裁’后,中国将在导弹及其技术出口方面,按照现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行事。”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希望,去年11月27日中美两国外长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和谅解尽快得到全面落实,以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⑥

美国自1989年以来宣布实施的全面对华“制裁”是使中美关系陷入低潮的重要原因,经过两年多来的较量与谈判,美国“制裁”措施虽然还未完全解除,但在高层互访以及部分经济领域已有突破,这是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的。

南方谈话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进入1991年,中国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较量中逐渐稳住了阵脚。中国国内历时两年多的“治理整顿”,包括降低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巩固已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等也已取得初步成效,由此消除了8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经过这次“治理整顿”,虽然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中很多深化改革,深层次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甚至于又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但经济发展的势头毕竟已初步得到恢复,从而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内政与外交的联系更加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更为明显。按照邓小平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国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在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初步达到人均800美元的小康水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与接触并重的双轨政策,以及东欧剧变的复杂国际局势,如果中国发展的速度太慢,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经济衰退,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这对中国又是一个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以开发上海带动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

现在就要做起。”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指出：“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⑥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切下，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1992年，中国正式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五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四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十一个内陆省会城市。由此初步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在中国酝酿新的突破的同时，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压力，长此以往，人民群众就会在比较中感到困惑。邓小平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实行跳跃式的前进，而不能只为求稳，而错过了有利时机。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作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⑦

此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已有较大的改观。中美关系虽然没走出低谷，但已在缓慢地回升，两国部长级的正式接触也已经恢复，中国最关心的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也有惊无险，没有中断，西方其他国家的对华“制裁”已有较大的松动。总之，到了1992年，中国外交面临的态势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有好转。

邓小平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看到了新的机遇,他决心运用其巨大的威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期以来“左”的积习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此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做了重要谈话,尖锐批评了风行一时的“左”的和保守的思想,并从战略的高度,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

邓小平的谈话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邓小平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搞了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二、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特别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

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三、邓小平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他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四、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指出: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五、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邓小平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

六、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

七、邓小平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⑩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思想一以贯之的高度体现和新的的发展,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成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思想禁锢的锐利思想武器。他的讲话很快得到新一代领导人的响应。3月9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改革进程再次启动。中国由此开始形成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潮。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引起了大洋彼岸——美国的高度关注。1992年2月10日,美国的《时代周刊》以《邓激起浪花》为题,报道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消息,文章认为,中国外交所获得的成就似乎使中国重新迈开了脚步。同一

天的美国《新闻周刊》也认为,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将以它自己的方式回归世界大家庭。邓小平的努力是要使中国一方面能够在国际形势的动荡下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积极开始实验自由市场的改革。该文还认为,邓小平趋向于坚持这条道路。路透社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向西方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将要继续坚持进一步改革,以此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决心。^①

上述局面的形成,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由于中国兴起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使美国更加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随之而来的是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对稳定中美关系大局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随着中美两国对共同的现实经济利益认识的不断加深,中美关系渐渐走出了低谷,这就为中美最终建立两国健康稳定关系创造了条件。而中美关系的好转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又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更多的机遇。正是由于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更加宽阔了。

其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人们进一步冲破了长期形成的导致社会经济止步不前和政治运动频繁的“左”的积习,同时也使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保守心态,从而加快了同世界潮流融合起来的速度。由于中国有了进一步同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望,由此促进了中美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而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稳定,也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第三,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有利于中美关系完成从战略关系向常规国家关系的转变。面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中美两国需要重新考虑和确认新的共同利益基础。由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使中国在寻找和确定这种利益基础方面,更加现实,希望把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更加深入地引入互利互惠的轨道。而在美国方面,由于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因素消失,使得美国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对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持肯定和欣赏态度,使中美关系保持了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的态势。双方领导人的互访逐渐恢复,两国最高层接触始终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

总之,中美关系在经历了自1972年以来的大起大落之后,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和他在晚年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使中美关系置于一个更

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因此,中美两国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来处理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才是明智之举。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认清这一点,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 ①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00 页。
-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356 页。
- ③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6 页。
- ④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7 页。
- ⑤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7 页。
- ⑥转引自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285 页。
- ⑦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8—99 页。
- ⑧《人民日报》,1990 年 11 月 20 日。
- ⑨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0—101 页。
- ⑩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104 页。
- ⑪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4—105 页。
- ⑫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207—208 页。
- ⑬《人民日报》,1990 年 12 月 2 日。
- ⑭《人民日报》,1990 年 12 月 3 日。
- ⑮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3 页。
- ⑯肖虹:《中美贸易史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3 页。
- ⑰钱其琛 1990 年底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作了上述判断,转引自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200 页。
- ⑱转引自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209 页。
- ⑲ Harry Harding, “Red Star Rising in The East”,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1997, p. X04.
- ⑳《南华早报》,1991 年 5 月 21 日。
- ㉑新华社华盛顿 1991 年 6 月 7 日电。
- ㉒美新署华盛顿 1991 年 5 月 17 日电。
- ㉓美联社华盛顿 1991 年 6 月 25 日电。
- ㉔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235 页。
- ㉕《人民日报》,1991 年 5 月 9 日。
- ㉖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0 页。
- ㉗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91, Book I,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 567.

- ⑳新华社华盛顿 1994 年 5 月 27 日电。
- ㉑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8 页。
- ㉒法新社华盛顿 1991 年 7 月 19 日电。
- ㉓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9 页。
- ㉔ 1991 年 6 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鲍克斯等人致信布什，要求布什政府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反对向中国提供多边贷款，并在中美人权、武器扩散、贸易和劳改产品出口等方面分别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以换取其支持布什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
- ㉕该议案把解决所谓中国人权、武器扩散等问题作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附加条件。
- ㉖ Export Control News, v. 8. no. 2, Feb. 27, 1992, p.2.
- ㉗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顾问查德·布什的总结，转引自朱成虎主编：《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3 页。
- ㉘《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4 页。
- ㉙《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5 页。
- 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9 页。
- ㉛《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9—360 页。
- 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1 页。
- ㉝章百家：《九十年代的中国内政与外交》，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 ㉞《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 页。
- 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2 页。
- ㊱《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3—365 页。
- ㊲陈有为：《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 1999 年版，第 100、182 页。
- ㊳《人民日报》，1991 年 4 月 15 日。
- ㊴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6 页。
- 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7 页。
- ㊶《人民日报》，1991 年 9 月 10 日。
- ㊷《人民日报》，1991 年 11 月 12 日。
- ㊸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2—93 页。
- ㊹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8 页。
- ㊺路透社马德里 1991 年 11 月 4 日电。
- ㊻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员布里克的文章，该基金会《背景材料》，1991 年 11 月 15 日。
- ㊼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8—329 页。
- ㊽《人民日报》，1991 年 11 月 17 日。
- ㊾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9—190 页。
- ㊿《人民日报》，见 1991 年 11 月 16 日。
- ①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5—96 页。

⑩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9—190 页。

⑪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2, no. 46, Nov. 17, 1991, p.20.

⑫ Washington Times, Feb. 1, 1992, p. A1, p. A5.

⑬ Statement by Margaret Tutwiler, “China-Lifting of Missile Sanction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eb. 21, 1992.

⑭这三项对华“制裁”是：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一些公司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

⑮刘连第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4 页。

⑯《人民日报》，1992 年 2 月 23 日。

⑰《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6—367 页。

⑱《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8—369 页。

⑲《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0—383 页。

⑳赵雷：《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反应》，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1974年

4月6日 上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10日 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思想。

4月14日 晚上,出席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举行的宴会。

5月24日 晚上,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6月28日 下午,同叶剑英副主席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7月4日 上午,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坦率的谈话。指出:自从上海公报发表以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还是好的。就我们来说,政策没有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就国际形势总的估计来做出的,不是一时权宜之计。

9月5日 上午,会见以参议员詹姆斯·富布赖特为团长、众议员彼得·弗里林海森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谈到中美贸易时,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吸收国外先进的东西。希望中美贸易能逐步有所发展。

11月2日 下午,会见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我们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得比较正常。当然,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快发展也不可能,只能逐步来。双方肯定的是,要沿上海公

⋮
⋮
⋮
⋮
⋮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报的路线发展,肯定了这一点,有些问题总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办法的,一时条件不成熟,可以慢慢来。

11月14日 上午,会见由美国教育理事会主席罗杰·海恩斯教授率领的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二十多年来中美两国从政治角度来说隔绝的,但两国人民长期存在友好感情。上海公报的签订开辟了我们两国新的政治关系,我们两国人民交往的前景是好的。但两国间还存着些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所以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总会有限度的,但这不妨碍两国人民交往的发展。

11月25—28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并与之进行了会谈。

12月12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谈话。指出: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近三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正常的。当然,步子迈得不大,主要原因是台湾问题。上次基辛格博士来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说了。不能考虑任何别的方式。“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就我们来说,都不能接受。

1975年

4月1日 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时指出: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总的来说,在这差不多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觉得发展还是好的。只要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逐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指出:我们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

6月2日 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说:我们也知道,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

8月6日 上午,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指出:毛主席在1949年讲话就

谈到中美两国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 25 年的隔绝中,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两国人民总是希望友好的。

8 月 23 日 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会谈中他谈及了中国的长远经济规划、少数民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

10 月 10 日 上午,会见由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率领的美中友协全国指导委员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 月 11 日 上午,会见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赛勒斯·万斯为团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阿瑟·罗森为副团长的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 月 20 — 22 日 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四次会谈,着重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双边关系问题。

12 月 2 — 4 日 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在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说,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2 月 6 日 上午,会见即将离任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976 年

1 月 1 日 中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大卫·艾森豪威尔,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 月 2 日 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在谈到福特总统访华问题时说:福特总统来的重要性在于访问的本身,谈问题也好,不谈问题也好,谈不拢也好,访问本身就是重要的。在会谈中,我们双方都认为在国际有关的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存在着根本分歧,这在上海公报上也讲了。

1977 年

8 月 16 日 会见美籍生物学家、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牛荫江和夫人张藻英,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8 月 17 日 会见美籍物理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和夫人

及其女儿,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8月24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

8月27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时说:关于恢复“臭老九”名誉的问题,我们正在做。当然要做许多工作,要具体解决许多问题,只讲恢复名誉,不给工作条件不行。

9月6日 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谈及了按劳分配问题。

9月26日 下午,会见美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9月27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及其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坦率、友好的谈话。关于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可以快一点。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来往。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我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

10月8日 上午,会见并宴请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博士,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月10日 上午,会见美籍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中,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月23日 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

11月3日 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肯定他提出的《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

1978年

1月7日 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2月16日 上午,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同他就国际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坦率、友好地交换了看法。

5月2日 会见以美国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号角》主编丹尼尔·里昂·伯斯坦为团长的美共(马列)《号角》编辑部代表团。

5月19日 上午,会见以美国合众国际社社长兼总经理罗德里克·比顿为团长的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有关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等方面的问题。

5月21日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布热津斯基说的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美中关系问题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

6月8日 下午,会见美籍医学家李振翩教授和夫人汤汉志。

6月20日 上午,会见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亨利·福特为团长的美国旅行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6月22日 上午,会见应外交学会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和夫人,就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

7月9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团长莱斯特·沃尔夫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团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7月10日 上午,会见由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7月25日 上午,会见美国专栏作家马至斯·威廉·荣尔兹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7月28日 下午,会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家翘,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8月18日 上午,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10月9日 上午,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威廉·西威尔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1月27日 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他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

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

11月28日 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

12月13—15日 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并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79年

1月1日 打电报给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热烈祝贺中美建交。电文主要内容如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之际,谨致以热烈的祝贺。中美两国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并把中国人民的友好带给美国人民。

1月1日 出席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祝酒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1月2日 会见由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他希望在中美建交后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以增进相互了解。

1月9日 上午,会见由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月24日 上午,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他的助手《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回答了多诺万先生提出的有关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问题。

1月29日至2月5日 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2月7日 下午,会见美国驻日本大使曼斯菲尔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2月27日 会见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2月28日 上午,会见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杰·哈蒙德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3月17日 晚上,同宋庆龄副委员长观看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的演出。演出休息时会见了团长及乐团主要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说:这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第一个艺术团到中国访问,表明中美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在日益增多,这将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我们为此高兴。

3月26日 上午,会见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艾尔·厄尔曼及其率领的美国议员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是两国发展贸易关系的新开始。今后我们在政治、文化和贸易等领域有许多具体事情要做。

4月15日 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4月16日 下午,会见美国众议院军委会议员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要求我们中美两国加强交往与合作。我们双方都要以世界局势这个大局为重,改善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

4月17日 上午,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何炳恢先生,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4月18日 上午,会见美国众议院议员团。指出:中美两国需要相互合作的事情很多。要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增进互相了解,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只是我们内部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这毫不影响我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发展同友好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5月10日 会见美国商务部部长克雷普斯。

5月30日 上午,会见美国总统贸易谈判特别代表罗伯特·施特劳斯大使和夫人一行,就发展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6月5日 上午,会见以萨里为团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指出:中美双方要多找一些门路来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目前,中国在同美国贸易中出现的很大逆差的状况应该改变。美方应该允许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6月11日 晚上,会见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美方成员,就扩大两国科技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8月23日 上午,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就中美关系、印支局势、中东问题和双方关心的其他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8月25日 下午,到机场欢迎应邀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26日至29日,陪同蒙代尔副总统在中国访问,并与之进行了会谈。

9月18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就国际问题友好地交换了看法。

9月20日 上午,会见美国华盛顿州州长迪克西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9月22日 上午,会见美国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家翘博士,就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教育、科研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9月24日 上午,会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丁肇中和黄克孙教授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11月26日 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指出市场经济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2月19日 会见美国拳王阿里,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980年

1月8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同他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谈话,指出:大家要联合起来,认真对待苏联的全球扩张主义政策。

1月24日 会见分别由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美方主席、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博士率领的中美两国科技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在这次会议上,中美双方达成了许多协议。这就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上午,他出席了中美航空、海运、纺织、领事、科技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3月12日 上午,会见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威尔逊先生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4月8日 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麦克唐纳和夫人一行,

解起了积极作用。几年来,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往有不少发展,这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个好事。

11月15日 上午,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回答了客人的提问。

1981年

1月4日 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

2月17日 上午,会见由英尔登·温希普·克劳森行长率领的美国美洲银行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谈话。

2月21日 上午,会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顾问、清华大学名誉教授任之恭和夫人。

3月23日 会见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友好地交换了看法。

5月5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负责东南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及其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交谈。

5月23日 会见前来北京同中国有关人士会晤的由北美主席洛克菲勒、日方委员长渡边武、欧洲主席贝图安等35人组成的三边委员会。

6月5日 上午,会见国际著名语言学家、美籍华人赵元任教授及其家属,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四化建设情况。

6月16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黑格及其一行。他说: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继续发展,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

7月3日 会见由董事长哈默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代表团,就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同中国的合作进行了谈话。

7月19日 上午,会见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有关国际问题及中美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8月27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表示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指出:发展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需要。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

题上的一贯立场。

9月4日 上午,会见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和夫人一行,以及由查尔斯·威克署长率领的美国国际交流署代表团、美国绘画展览代表团团长泰莱夫人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说:中美两国的关系应进一步发展,两国各方面的人士应增加来往,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10月18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对台湾的局势,蒋经国能够控制。在叶剑英委员长的九点声明发表以后,美国没有理由向台湾提供武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的确存在着中美关系停滞或倒退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十分强烈。

11月17日 会见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在谈话中,他主要论及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11月22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中美双边关系时,他说:中美关系不只是同中美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也就是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他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出现曲折,强调:台湾问题只有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作出正确的答案,才能处理得比较好。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余地。这是10亿中国人民的感情问题。

12月25日 中午,会见并宴请美籍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对李政道博士多年来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and 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1982年

1月11日 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

2月19日 上午,会见美国依柏斯公司总裁、美籍工程专家吴光叔博士,

⋮
⋮
⋮
⋮
⋮
⋮
⋮
⋮
⋮
⋮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同他就经济和工业建设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3月26日 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时说,中国要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

5月8日 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指出:一九八〇年你访华时,我们在交谈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的一些原则,即中美关系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要发展,而不要停滞,更不应该倒退。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6月1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小霍华德·贝克,双方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指出:只有中美双方本着既维护自身国家的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所面临的问题,两国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继续得到发展,而不受到损害。他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里根政府能够采取明智的立场,尽早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7月13日 上午,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接受了恒安石大使转达的里根总统的信件和口信,以及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新草案。

8月10日 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人。会谈中,他主要谈了中国的发展目标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8月17日 在中美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发表前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并转达了致里根总统的口信。

9月8日 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并指出: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

9月30日 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我现在是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边去,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随后他又谈了中国的国内情况。

11月13日 上午,会见作为美方主席来华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美能源、资源、环境会议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袁绍文教授,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1月15日 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指出:中国正在解决能源问题。

12月9日 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等时指出：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正如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合乎两国自身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维护和发展这种用10年时间建立的关系，关键是要互相信任。如果出现一些造成彼此不信任的事情，那就很难了。

1983年

2月5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谈到两国之间信任问题时说：我们深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的连贯性有很大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互相信任。

3月9日 上午，会见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他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对李政道教授的母亲逝世表示慰问。

3月30日 上午，会见由小托马斯·奥尼尔议长率领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指出：中美双方都应认识到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当前两国之间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但消除障碍需要行动。希望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消除两国间的分歧、建立互相信任方面作出努力。

4月11日 上午，会见美国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美国福陆公司总裁大卫·塔潘，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表示：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不变，希望福陆公司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能够成功。

6月26日 会见美籍华人教授杨力宇先生，阐述了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8月27日 上午，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障碍所在，因为这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他希望美国当局对此能有清醒的认识。

8月31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员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一行，同他们就中美关系和一些地区性问题进行了交谈。当谈到1979年

⋮
⋮
⋮
⋮
⋮
⋮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对美国的访问时,他说:那次访问美国,我过得很愉快,那时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高峰。以后走了一点下坡路。就我们愿望来说是想回到那个时代的,但是看来不容易。中美关系经过一段曲折,最近向好的方面发展,好的程度还要观察。

9月13日 上午,会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秀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9月28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指出:三年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核心问题还是个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就排除了,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

12月1日 会见美国阿科公司董事长安德森。

12月28日 上午,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宾主就科技发展方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984年

2月22日 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4月28日 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说: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

4月29日 会见由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美国基威特公司代表团。

5月21日 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在国内培养和安排“博士后”科技人员的建议,表示赞成。

8月16日 上午,会见著名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8月25日 会见并宴请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

9月19日 上午,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吴健雄教授和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高级研究员袁家骝教授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月2日 上午,会见前来参加我国国庆庆典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60多位华人科学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11月17日 上午,会见美国使节基金会主席赫伯特·阿姆斯特朗,就战争与和平、中国的发展前景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1985年

3月25日 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成员。

4月24日 会见美国汽车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指出:随着相互熟悉,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会相信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是可以打交道的,是可以交朋友的。同样,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也会感到,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是可以交朋友的。希望中、美两国工会之间今后有更多的来往。在来往中,把意识形态问题撇开,根本不去管它,就讲友谊,谈可以合作的东西。美国工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力量,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5月27日 上午,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博朝枢,同他进行友好的谈话,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形势。

6月30日 上午,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对中美合作经营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将于次日破土开工表示祝贺。

7月16日 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

9月6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谈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时,他说:我们担心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我们反对一切外空军备竞赛,无论谁搞外空武器,我们都不赞成。

9月10日 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邓小平谈了“七五”计划及中国的改革问题。

10月15日 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双方就中美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10月23日 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首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会见时,他回答了格隆瓦尔德的有关腐败等问题的提问。

11月11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时,基辛格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
⋮
⋮
⋮
⋮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12月14日 上午,会见应邀来访的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是现在还不足,还有些问题,希望能逐渐得到解决。发展两国经济和科技关系对两国都是有利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扩大在各方面的合作。

1986年

3月31日 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博朝枢,同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回答了对方提出的有关三峡工程等方面的问题。

6月18日 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称赞荣家在历史上为发展祖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贡献。

9月2日 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

9月11日 上午,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健雄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高级研究员袁家骝,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0月8日 上午,会见美国王安电脑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安博士,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我们主张多吸收一些外资来加快建设的步伐。至于偿还能力,中国人不担心,外国投资者也不必担心。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最没有风险。中国这个市场大得很,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来。

10月9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指出:中美关系总的来说是发展得好的。他对温伯格为推动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的发展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并请温伯格回国后转达他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问候。

10月18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和夫人、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和夫人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11月3日 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在谈到培养使用人才问题时指出: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损失。要努力争取在国外学习的人回国,并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专长。

11月14日 会见前来参加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一行。在谈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时说:实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

两个目标,关键是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的这几年,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但规模还不够理想。

1987年

3月3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

5月16日 上午,会见美籍科学家李远哲、李政道教授,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人拿走。看来,只有按“一国两制”的办法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

6月29日 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指出: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

9月3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

9月13日 上午,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表示:中国要更加开放。加快改革步子,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企业家同中国合作。

1988年

5月24日 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说: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还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

7月15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

·
·
·
·
·
·
·
·
·
·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中国的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

9月7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中美关系近几年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应该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1989年

2月26日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

7月2日 会见秘密来华的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指出: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9月16日 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

10月31日 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

11月10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11月17日 在会见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时说: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

12月10日 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1990年

3月3日 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回答哈默提出的对戈尔巴乔夫有何看法、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否高兴等问题时说:我们对别人不幸的事、不好的情况不会落井下石,我们不会发表或采取伤害别人的言论和行动。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我们希望他们的情况好起来。苏联的问题比我们多。我们希望中苏关系搞好,我们更希望中美关系搞好。

9月15日 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说: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11亿人口。其中汉族占92%,少数民族占8%。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1991年

10月5日 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时说: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因为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的同时,布什就宣布中国是不能孤立的。

1997年

2月19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天在波士顿获悉邓小平不幸逝世后随即

⋮
⋮
⋮
⋮
⋮

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

发表声明,称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非凡的人物”,并高度赞扬他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所起的作用。他说,由于邓小平果断地确立对外开放政策,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主要的作用。邓小平推动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克林顿说,邓小平 1979 年对美国的访问为两国关系和两国之间合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说,中国将继续作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大国出现并成为建立安全国际秩序的完全伙伴,美国对此怀有极大的兴趣。

后 记

本书是在《邓小平与美国》一书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在探讨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发展轨迹的同时,还论述了这一时期风云变幻的中美关系。在本书出版之际,恰逢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注邓小平,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前途的人们。

邓小平曾经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决策人,他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对美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探讨中美关系变幻的前因后果,有助于总结重要的历史经验,作为今天的借鉴,正确处理好当前复杂、微妙的中美关系。

研究和考察邓小平对美外交政策思想及其实践,既要注重邓小平深邃的外交战略思考,又要注意国际格局变动对中国外交产生的深刻影响,还要不失分寸地评价决策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因而其难度是很大的。我在这本书中运用的写作方法是,以邓小平的重大外交决策和历史活动为线索,运用大量文献资料,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点上,对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进行阐述和评价,力求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现邓小平为使中华民族能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作出的特殊贡献。

在本项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借鉴了许多学术同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央党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研究中美关系过程中的多次学术讨论使我获益匪浅,中方课题组的姜长斌、刘建飞、章百家、李捷、贾庆国、江英、李丹慧、王仲春曾给予我很多学术上的帮助。还有许多同志为本书的研究,包括繁琐的资料搜集和整理作出了贡献,他们是孙相东、李启龙、郑泽民、曹令军、姜运仓、李敏伦、储新宇、曾军、张玉慧、贾芳、崔久恒。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姜运仓为本书撰写了大事记。另有五位专家、学者对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进行了鉴定,并提出了中肯的审阅意见和建议。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时

⋮
⋮
⋮
⋮
⋮

后
记

殷弘教授,北京大学的贾庆国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王仲春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的姜长斌、刘建飞教授。此外,红旗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高质量地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近些年来,邓小平在中国外交,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日益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我希望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对于人们研究和了解邓小平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对于人们从更深的层次上了解这一时期波澜起伏的中美关系有所裨益。



邓小平

与中美外交风云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其间，邓小平以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大战略家的深刻见识、宏伟胆魄和精湛艺术，参与和主持至关紧要但又包含重重困难的中国对美关系决策，并在国际局势历经巨大变化、中国内部情势亦多复杂的基本环境下取得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功。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宫力教授基于异常丰富的文献资料，以详细过人的史述、系统深入的论析和准确可靠的理解，内涵丰富和条理分明地展示了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并且在中美关系重大事件真相和重大历史过程的发掘、梳理、澄清和阐释方面多有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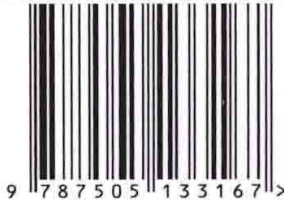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时殷弘

《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是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极好的参考书，也是学人了解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刘建飞

上架建议：政治/领袖人物

ISBN 978-7-5051-3316-7



9 787505 133167 >

定价：45.00元